

# 激情的年代 辉煌的壮举

## ——北京煤矿机械厂 1958—1966 年

### 北京煤矿机械厂党委工作部

北京煤矿机械厂（原名北京矿山机械厂）位于房山区境内，距北京广安门 40 公里、原区政府所在地 1.5 公里、京周公路 1 公里、京石高速公路 13 公里，南邻城关街道北市村、东与田各庄村毗邻，京广铁路有 5.5 公里分线由石楼站直达厂区。厂区东西走向，地势西高东低，呈狭长布局。

1958—1966 年，是北京煤矿机械厂初建和简易投产时期。从选址、购地到施工、投产，北京煤矿机械厂的创业者们用火热的青春和辛勤的汗水在一片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初具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他们历经曲折、坎坷，在艰辛的创业进程中到处留下了为之忘我奋斗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速煤炭采掘机械化的发展，煤炭工业部在 1958 年 7 月召开的煤炭机械制造工作会议上决定，将在北京附近建一座矿山机械制造厂。8 月 29 日，北京矿务局受煤炭工业部委托发（58）京办第 790 号文决定，抽调党政干部张世铭、张格民、江日光三位同志组成筹备处领导班子，进行建厂的筹备工作。之后，工厂经过筹备人员和有关部门的实地考察、勘探，选定现厂址；经过第一工业机械部第一设计院设计，北京市规划局批准，从房山人民公社及其它村落购买土地建工厂、修铁路。从北京城市规划局领取设施许可证后，部分生产车间及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先后开工，并在各路建设大军和本厂职工的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之下逐一建成。其间，1959 年 12 月 16 日煤炭工业部下文批准将工厂定名为北京煤矿机械厂，年制造能力定为 21122 吨。到 1962 年底，历时四年，工厂共完成基建投资 2324 万元，铺设铁路专用线 7.675 公里（厂内 2.1 公里，厂外 5.575 公里），厂区占地总面积为 32.9 公顷，安装了 200 余台机械设备。至此，工厂具备了部分投产的基本条件。到 1966 年间，又投资 282 万元，工厂总体基建工程已初具规模，并开始简易生产。同时，为了配合企业生产生活，工厂还相继建设了简易办公室、厂子弟学校、半工半读

学生宿舍、理化实验室、职工家属宿舍，建筑面积约合 7000 平方米，使企业生产、生活各类设施初步配套，形成了建厂初要求的雏形。

工厂在建设过程中始终贯彻边建设、边投产的方针，一方面准备投产需要的技术资料 and 装备，一方面尽早启用已安装设备服务于建设。经过不断地调整和充实，工厂的生产经营逐渐转入正轨。

随着部分生产车间的竣工，工厂立即以“边安装、边练兵、边生产”为指导思想组建车间，安装设备，进行了生产，且生产水平逐年提高。1963 年，完成产品产量 724.6 吨，工业总产值达 395.9 万元，为计划的 100.5%；1964 年全年工业总产值完成 885.5 万元，产品产量完成 1631 吨，分别是国家计划的 132.7%和 130%，实现自 1962 年投产以来第一次上缴利润，上缴了 48.5 万元；1965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了 1308.3 万元，产品产量为 2629.7 吨，分别为计划的 110.2%和 148.6%，上缴利润 128.3 万元；1966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882.5 万元、产量 3548 吨分别为计划的 115.5%和 105.8%，实现利润 157.2 万元。几年间，工厂试制或生产过的产品为：IIA 型煤水泵、7B 型煤水泵、WMB-150 型煤泥泵、ZYC-18 型平巷装岩机、SSQ-120 型高压水枪、L2L-1000 型脱水机、PTY-30 型胶带输送机、ZM1—17 型装煤机、ZM2-17 型装煤机、QBL-45 型手提泵、ZZY-1 型装载机以及煤矿采掘机械设备的多种配件和工厂自身基建零件等。工厂还根据生产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陆续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并实施，实现了多方位管理，其中包括生产、技术、财务、计量、设备、供应、能源、基建、保卫和劳动人事等方面的管理，构建了较完整的企业管理体系。

从建厂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在建厂和生产过程中起着领导核心作用。而且，伴随党组织自身的不断发展，党群工作十分到位。稳健中发展的党组织在建厂时期的基本建设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初建时的支部到后来的总支再到党委，认真地按照上级的批示或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领导全厂职工发扬自己动手，实干加苦干的革命精神，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共产主义协作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同时，厂党委坚持了领导与群众、专业与一般、解决问题与建立制度相结合，坚持说服教育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主动地做好党建工作，并在生产和工作中积极考察、培养后备干部以及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随后成立了工厂工会和团委，二者与工厂行政部门一起在工厂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立足于同一目标为北京煤矿机械厂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工厂建立了人民武装部及后

来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和防空委员会，在工厂党委和上级军事部门的领导下，认真地对民兵进行了教育、训练工作，完成了当时的征兵和人防工作。

蹒跚起步的工厂非常重视职工的文化教育工作，注重招收、培养技术人才。

建厂伊始，工厂便开始招收、培训技术工人。首先，工厂分别从京西技工学校招收学员，从社会招收青年，并将其中大部分送到北京、上海及东北的一些电机厂、机床厂和北京矿务局技校进行各种操作技术培训；从鸡西、张家口引入熟练技术工人，增强了工厂各工程的技术骨干力量。之后，针对大批新工人的入厂，为了迅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全日制教育体系，加速培养技术人才，满足生产建设和不断发展的需要，经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北京矿务局同意，开办了“北京煤矿机械制造学校”和“北京煤矿机械厂技工学校”。再后来，又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开办了业余文化学习班，大规模的开展职工文化补习工作，并选拔学员送出去进行深造。以上，对工厂后来的生产经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不会忘记，1958—1966年，北京煤矿机械厂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些忘我奉献的创业者。他们不辞辛苦，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用勤劳的双手为未来的北京煤矿机械厂的成长和扩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建厂的整个过程中，工厂的职工们默默无闻、朴实平凡，满怀无比的工作热情和豪情壮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发扬着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在低洼滩地、棘草从生的恶劣场地上工作，在简陋的工棚里、潮湿的地铺上休息。他们早晨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平整土地、打夯基础、搬运砖瓦建厂房，架桥梁、挖涵洞、拉石子、铺铁轨修铁路，扁担挑、小车推以人力把几千立方米的木材、几百吨的钢材和设备从几公里外的周口店火车站运到建设工地。在厂房建设、铁路修筑、施工准备等工作场地上，到处可见他们忙碌、奋战的身影。特别是在1959至1961年的三年中，职工副食供应不足、劳动强度大、粮食不够吃，他们忍饥挨饿、流血流汗、历尽艰辛，却仍然不计报酬、任劳任怨、顽强奋战。鲜活的事例举不胜举，他们忘我的付出和奋斗，为的就是工厂早一天建成，早一天投产，早一天为国家做出贡献。

激情的年代孕育了北京煤矿机械厂最可爱的人；辉煌的壮举是他们勤劳、无私、艰苦奋斗、奋勇当先的真实写照。工厂的创业者们为北京煤矿机械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琉璃河水泥厂恢复生产的经过

王 良

琉璃河水泥厂是 1948 年琉璃河地区解放后没收的北京地区 44 个官僚资本企业之一，也是建国初期北京几个重点工业企业之一。

1939 年，日军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将东京浅野公司深川水泥厂的一套旧设备拆迁来华，在琉璃河镇建设了琉璃河水泥厂，设计能力为年产 16 万吨，1944 年建成投产。日本投降后，该厂被河北省国民党当局接管，后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华北水泥公司。自投产至解放前夕，共生产水泥 10.8 万吨，最高年产量仅 3.4 万吨，1948 年只生产水泥 8700 吨，后因设备破旧、损坏而停产了。

1948 年 12 月 8 日，琉璃河地区解放。至此，被国民党统治三年的琉璃河水泥厂回到了人民手中。12 月 15 日，华北人民政府派以田光壁为组长，窦洪勋、李文瑞、任佐为成员的军管组进厂接管。12 月下旬，北平军管会西南分会派丁士厚为组长，李长胜、段劲军、于成武、冯军为成员的群众工作组来厂开展工作。军管组和工作组以恢复生产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是宣传教育。我工作人员主要围绕国内形势、我党我军的政策和任务以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要当家作主人等内容向厂矿职工进行正面的宣传教育。同时还举办了三期训练班，每期一周。全厂 254 名正式工人（运输、装卸都是临时工）中，有 156 名受到训练。经过教育和训练，工人群众由对我党我军政策不了解变为热烈拥护。

当时水泥厂大部分设备因损坏而无法运转，厂里所有职员都在解放前就撤回北平东交民巷华北水泥公司去了（北平和平解放后，从 1949 年 2 月 15 日起，才分批把他们找回厂里），工作组就组织发动工人自己推选各车间负责人，组织起来积极抢修设备。日本时期当牛作马经常挨打，国民党时期仍未被当人看待的劳苦工人，翻身以后积极性很高，铁路不通就用马车、骆驼运石料。只用 3 个多月就修好了大部分设备。1949 年 4 月 15 日正式点火，瘫痪了的琉璃河水泥厂生产恢复了，开始为建设新北京提供水泥。

1949年5月25日，朱德同志（陪同人员有康克清、刘宁一等）来厂视察，到各个车间看望工人。朱德同志对工人们说，你们工人要当家作主，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国家需要水泥，你们要多生产。

总司令的视察使人们受到很大震动和鼓舞，军管组便及时把工人的热情引导到搞好生产上。当时全厂四台旋窑中有一台窑从来就未生产过，铆工张义远主动领工人，将这台窑进行了重新安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将它修好了，使全厂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还有一台磨机也从来未生产过，工人李希民便带人进行了维修，下半年就投入了生产。1949年仅用了八个半月的时间，水泥厂就生产水泥3.5万吨，超过了日本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高年产量。到1952年，年产量就达20万吨，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设计能力。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水泥厂还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经过宣传教育，运输、装卸工人都自动起来取消“把头”制，选举真正的负责人，建立起了有利于发扬民主的规章制度。在群众有了一定觉悟之后，经过讲清政策，开展了反动党团登记工作，三天之内就有47名国民党员主动登记，其中绝大多数是被国民党的“占人战术”拉进去的，参加国民党后并未做过坏事。因此，这些人登记后，很快予以解脱。

1949年7月，琉璃河水泥厂工会成立，李长胜任主席，委员都是民主选举的工人。同年8月，厂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10月成立党支部，当时只有田光壁、李文瑞、李长胜三名党员，到年底发展到26名党员。同月军管结束，华北窑业公司委派了厂长。

后来，琉璃河水泥厂经过1953年、1958年、1975年三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水泥产量由1952年的20万吨逐渐提高到44万吨、103万吨、130万吨，1985年首次达到137万吨。40多年来，琉璃河水泥厂累计生产水泥近4000万吨，为北京城市建设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首都电业职工的骄傲

宋景宽

1964年10月16日是令人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对美、苏两个核大国核威胁的一个沉重打击。制造原子弹某个控制系统所用的两面控制盘就是位于良乡地区的北京送变电公司（当时叫第五工程处）生产的。我们为它而自豪，而骄傲。它是首都电业职工为加强国防和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的贡献。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世界局势动荡，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内部和它们相互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紧张，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当时党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重要因素。在这种世界局势下，第五基建工程处于1964年1月承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试验原子弹急需的两面控制盘的制造任务，要求在农历正月初七以前完成。

六十年代的表盘生产在北京市只有第五基建工程处一家，尽管质量是过得硬的，但机械化水平还不高，许多工序是靠手工操作。当时的生产车间还没有暖气，在低温度下，喷漆这道工序就是最大的难题，底浆不干不能刮腻子，腻子不干不能打磨。就喷漆这道工序，生产一面盘按常规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还有下料组装工序、电工配线工序，全部下来至少也得20天时间。那么这两面控制盘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1964年春节前夕，当时第五基建工程处所属线路器材加工厂生产表盘的四班，召开了部分工人、技术人员会议。班长在会上说：“我们接到一项非常紧急的政治任务，给解放军某部做两面控制盘，要求尽快的抢出来，争取正月

初六上午将盘送走。因此，从现在起各工序都把手里的活放下，集中力量抢这两面盘，干上道工序时，下道工序做好准备，上道工序完成后，下道工序立即投入工作，不得有半点耽搁。为了给喷漆创造条件，处里决定把俱乐部化装室腾出来，喷漆班到那里去干，工程处保证充足供暖，以缩短喷漆工序时间。”同时特别指出，这次任务急，时间紧，但各工序一定要保证质量，不得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当时班长讲话很严肃，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工作中不能出现丝毫差错。任务就是命令，大家什么困难、什么条件也没讲。交给大家的图纸只有工程代号，没有标明是哪里的工程，因此，这两面控制盘是干什么用的大家都不知道。

会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首先，是下料组装工序。由于准备工作充分，从铁板下料、划线开孔、冲角弯边、焊接组装，这一系列工序，当天后半夜就全部完成了。其次，是除锈喷漆工序。盘下料组装完了，连夜守候在那里的喷漆工，立即投入了除锈工作。当时表盘除锈是用废旧砂轮片和砂纸手工打磨。为了加快速度，除锈采取了分片负责的办法。一月份北京的深夜，没有暖气的车间是很冷的，但因紧张工作，人人都是满头大汗。锈除完了，立即将盘用小推车推到俱乐部化装室，随后喷了一道底浆，这时天已经亮了。

喷漆这道工序，不同于其它工序，因为它有一个自然过程时间，不能连续工作。这两面控制盘要喷4次浆，刮3道腻子，喷3道面漆。前两遍漆还需打光，打光后在不平处补薄腻子。每次浆、每道腻子、每遍面漆都需要一个自然过程。为加速自然过程时间，当时采取了适当加温又连续工作的办法，只用了7天时间（日历天），任务就完成了。其间，农历正月初一上午九点，局领导在工程处主任、党委副书记的陪同下，慰问了在俱乐部加班的喷漆工师傅、电工师傅，并一一同大家握手拜年。最后，是电工配线工序。电工配线是表盘生产最后一道工序，当配线电工接到任务后，开始做准备工作，看图纸、领料、准备接线头塑料管打号等。为加快进度，电工们按盘面设备开孔位置，量好尺寸提前下线、绑把。喷漆交了活，已是凌晨3点。电工接过来，立即在盘上装附件、装设备，将准备好的线把绑扎在盘架上，在设备上接线。接线是个细心活，不允许有半点大意，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屋里只剩下两名接线电工，静悄悄的，除不断传出偏口钳的剪线声，整个化装室里就像没有人一样，鸦雀无声。

正月初五晚上11点，最后的一根线头接完了。随后进行自检（校线）、互检（互相校对方的线），最后，将盘交给了在那里等候的专职质检员。专职质

检员检查验收后，整个控制盘的生产任务全部完成。当大家离开化装室已是正月初六凌晨两点。

正月初六上班后，工人们用汽车将两面控制盘披红戴花的包装好，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受到驻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和称赞。事隔多年后才知  
道，原来这两面控制盘是为我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某个控制系统所用的。



# 落户在良乡的北京送变电公司

章世铭

北京送变电公司是 1954 年在良乡落户的华北第一家大型输变电建设专业施工队伍，被国家建设部定为国家施工资质等级一级送变电施工企业，专门承建 110 千伏、220 千伏和 500 千伏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建设工程、变电站安装工程、电缆与光缆敷设工程、500 千伏超高压输变电设备带电检修作业和运行维护任务，以及各种类型的微波塔建设工程；承揽与输变电工程配套的铁塔、金属结构件和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电杆的加工生产制造。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北京地区供电电网极为落后，只有 77 千伏输电线路 3 条、33 千伏输电线路 23 条，总长 330.8 公里；77 千伏变电站 1 座，33 千伏变电站 11 座，总容量 10.14 万千瓦安。供电范围主要是北京市区、近郊区及门头沟、良乡、琉璃河等极少数远郊地区。北京地区也没有输变电建设专业施工队伍，只有原冀北电力公司留下的 205 人的送电队，负责生产设备检修及恢复性大修的生产任务。当时，曾以简易的生产工具，繁重的体力劳动，为恢复首都供电，完成了一定的生产检修和电力建设任务。但由于技术力量薄弱，也只能承担 33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输变电工程的施工。

1954 年 3 月，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支援和加速华北地区、特别是北京地区电网的建设，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决定改组东北电业管理局送变电工程公司，将该公司的 302 工程队、303 工程队三工地和 304 工程队三工地的全部职工 706 人，调往河北省武清县杨村镇，组建送变电第二工程公司，建设北京南苑至天津宜兴埠 110 千伏输电线路。1954 年 4 月 28 日，送变电第二工程公司正式宣布成立，并将基地由河北省杨村迁到良乡，在良乡城东北关外二公里昊天塔下扎下 800 亩营盘。从此北京地区第一支、也是华北地区第一支输变电建设专业施工队伍在良乡落户了。

在北京送变电公司的发展中，单位名称几经变动，先后曾称为：电总基建工程管理局送变电第二工程公司、送变电第二工程局、电力工业部北京送变电工程局、北京电力建设局第七第八第九基本建设工程处、北京电业管理局送变电工程

局、基建工程公司第五基建工程处、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北京送变电工程公司、北京电力工业局北京送变电公司、华北电业管理局北京送变电公司等。其中,1958年实行基建管理体制改革,当年4月,公司的施工队伍改组为北京电力建设局第七、第八、第九基本建设工程处,分别下放给河北省电力局、山西省电力局和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局管理。自此,华北各省、自治区开始有了承担输变电建设的专业施工队伍。同年8月,北京电业管理局又将在北京承担送变电工程建设的第八、第九两个基建工程处的部分队伍合并,组成北京电业管理局送变电工程公司。

是良乡这方水土哺育了北京送变电公司的职工,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在公司所承建完成的输变电工程项目中,1954年11月,建成了北京地区第一条北京南苑至天津宜兴埠110千伏输电线路;1955年11月,建成了北京地区第一座北京东北郊110千伏变电站;1955年12月,建成了山西省第一个太原至阳泉输电线路和太原变电站、阳泉变电站110千伏输变电工程;1957年1月,建成了河南省第一个郑州至洛阳输电线路和洛阳变电站110千伏输变电工程;1957年底建成了江苏省北部第一个韩庄至徐州输电线路和徐州变电站110千伏输变电工程;1958年6月,建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包头至白云鄂博、包头至呼和浩特110千伏输电电网;1960年12月,建成了华北地区第一条下马岭至清河220千伏输电线路;由于管理严、标准高、要求细、工艺精,1961年8月,建成的220千伏北京高井至东郊铝厂输电线路被水利电力部评定为全国第一个输电线路质量标兵工程;1964年6月,建成的华北地区第一座专为农业供电的河北高碑店110千伏变电站,被全电会议评为全国电力基建系统第一个变电质量标兵工程。

经过几十年的锻炼,北京送变电公司的施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对500千伏及以下各种电业等级的输变电建设任务,已有着丰富的施工经验和完善的施工装备与手段。具有年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450公里和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220公里;年安装500千伏、容量为100万千伏安的变电站3座和220千伏、容量为12万千伏安的变电站4座的施工能力。同时还具备年产铁塔及铁构件3万吨的加工能力;年产预应力混凝土电杆3万根标准段的生产能力。几十年来,北京送变电公司不仅为首都北京电网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奉献,而且扎根良乡,立足华北,辐射全国,走向世界,施工的足迹遍布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辽宁等16个省(市、自治区)和亚洲、非洲的几内亚、马里、孟加拉等11个国家,为中国和第三世界电力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房山供销合作社支援生产救灾情况

王绍清

大灾之年，排民忧，解民困，赈济灾民，古往今来，历代皆有。但社会制度不同，赈灾的目的及所采取的方法、手段、结果亦各不相同。

封建社会，凶灾之后，民贫众困，易滋事，多骚乱，社会动荡不稳，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则进行“赈穷”“抚恤”，采取赏耕牛、免赋税、开粥厂、拨黄银、赈粟粮、恤孤寡、官米菜价于民等方法，以昭矜恤，收揽人心。但往往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灾民仍是饥寒交迫，露宿街头，妻离子散，卖儿卖女，饿殍遍野。仅举几例，以飨读者。

据史料载：汉代（108年），“州郡大饥、人相食广阳（今良乡地区），黎民流离失所，老弱相弃于路”。

明成化七年，“京师灾荒饥馑，岁饥大疫，民多道死”。

嘉庆三十二年（1553年），“良乡大水大饥，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日本统治区，“良乡佛尔山洪暴涨，83个村庄受灾，死亡108人，日伪政府束手无策，灾民投亲靠友”。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房山日本统治区，从春到夏，滴雨未落，土地干裂，苗木焦枯。房山日伪合作社联合会理事长中小洛道田（日本人），常务田口多喜雄（日本人）为配合日军开展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经济封锁，彻底垄断粮食，在县城城隍庙戏楼前（今公安局处）囤积粮食，昼夜由日军守护，造成粮荒。县城西北部村庄，土地贫瘠，灾情严重，民众无粮，以树叶、河草度日，以至树叶被捋光，河草被捞净，油房的花生皮被抢空。红薯秧面、榆树皮面、麻饼是充饥的最佳食品。但连续食用会造成腹沉、大便不通，成人忍痛走遛、孩子憋得嚎啕大哭，母亲只好用手指将堵塞在孩子肛门内的粪渣掏出。坨里至长操内的几十个村庄，饿死2035人，流离失所1538户；其中，不足三百户的东班各庄村，就有83户外出讨饭，27户卖儿卖女，先后饿死83人。

由于饥馑大发，导致河套沟（河北地区）灾民涌向县城，昼夜歇息在南街

两侧商号屋檐下。日伪政府为防灾民闹事，不得不在城东饶乐府、城南肖庄开设粥厂。附近灾民起早提着罐子、抱着沙锅排队等候，等到半晌才能领到五六勺粥。管理粥厂的日伪人员，丧尽天良，从很少的赈灾粮食中克扣自肥，为使粥粘稠，在熬粥的大锅里放上石灰，致使灾民食后腹痛，有的抱碗死于路上，有的躺在粥厂旁奄奄一息。日本人怕传染瘟疫，在清理尸首时，把带着气的也拖去埋在乱葬岗，仅定府辛庄一村食粥胀肚而死就达 36 人。在日本统治区内，出现了“家无隔夜粮，树叶全吃光，妻离子散卖儿女，冻饿而死倒路旁，无钱买布白纸上戴，村村送葬忙”的悲惨景象。

而在同一场灾害面前，平西抗日根据地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房涞涿抗日政府在这场自然灾害和日军的严密经济封锁——囚笼政策面前，县委按照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委员实业处长张苏讲话精神，将二区合作社（今六渡）迁十渡，改为房涞涿县合作社，任命贾荫轩为主任，设一部二股（业务部、组训股、会计股）。中心任务是配合政府通过供销业务开展生产自救，在生产度荒中完成四件大事：

一、组织群众上山割荆条，砍木棍，烧炭，刨药材，掏五灵脂，编筐，驮运，纺织等副业。收购的土特产品如：花椒、檀木、杏仁、蜂蜜、名贵中药材及羊只等，通过地下商品流通渠道，乔装巧运到敌战区换回银圆、粮食；并采取收购的产品销售后利润返还的办法，激发了群众积极性，很快在一二区（今霞云岭、十渡地区）掀起了生产自救热潮。

二、为解决群众吃粮燃眉之急，全社干部全力以赴，披星戴月，赴涞水蓬头、南城寺等地采购粮食。据不完全统计，购进粮食共六万多斤。业务部长隗福勤激动地说：“每天有上千斤小米用毛驴驮运回来，但我们不敢动用一斤，仅吃供给的十二两小米（十六两一斤），饿了吃点野菜”。采购员李和深入敌占区销售土特产品，一次，在运盐途中被日寇包围，身中三弹，牺牲在下寺村三岔路口。

三、收购的羊绒、羊毛，分配给各村副业组及八路军九团战士打毛线，织毛衣、毛袜，用这些毛织品从外地换回粮食。

四、为缓解根据地经济状况，在一区庄户台、二区十渡开辟集市贸易。十渡逢五排十为集日，涞水、易县、野三坡等地商贩云集而来，多达五六百人，庄户台逢一排六为集日，此举对调节物资余缺，引进粮食，度过灾荒，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共度灾荒，百花山山前山后，据马

河畔一左一右，处处有八路军七团、九团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荒种田的身影；各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开展各项副业生产，纺车昼夜嗡嗡响……战胜了灾荒，度过了难关，还粉碎了日军的经济封锁。到1943年，抗日根据地军民基本达到了“丰衣足食”，儿童团的歌声响彻拒马河谷。

同一场灾害，敌占区官悍吏诈，灾民吃树皮、捞水草，服赈粥胀肚横尸街头。而抗日根据地军政民团结，开展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喜气洋洋，真是一场灾难两重天。

1946年，良乡县北窖村（良乡板栗产地）因受日寇“三光政策”“经济封锁”及国民党还乡团骚扰破坏，粮物被抢劫一空，损失惨重，二十多座小煤窑停业，断绝了生活来源；加之天旱少雨，土地瘠薄，粮食歉收。据1946年5月1日调查，该村457户中，当时断粮的83户，204口人，占总人口的11.8%；能吃两个月的137户，558口人，占31.6%；能维持三个月的有89户，454口人，占25.7%。在秋收无望的严重春荒面前，北窖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性质）发动群众近千人，开展熬柏油、纺线、卷烟、撻木榄叶熬染料膏等十一项副业生产，总收入粮食三十二万多斤，战胜了灾荒。平西专署授予北窖农民合作社“合作指南”称号，《北岳日报》多次刊登北窖农民生产度荒事迹。

1948年春，房山一区（今霞云岭地区）天花、麻疹瘟疫流行，严重地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据当时的统计，鱼斗泉村一百多口人，染病者在二分之一以上，死亡十六人（大都在二十岁以下）；霞云岭染病者一百多人，死亡22人；森水34户，194人中，患天花者26人，患麻疹者33人，患汗病者8人，其中，十八岁的1人，十岁的2人，其余皆为十岁以下的幼儿，刘德全一家八口就死亡四口。在严重疫情面前，一区委同医药合作社共同召开全区个体医生紧急会议，房山县生产推进社（供销社前身）副主任方锡智与一区药社主任郑玉山共同研究措施，制定医治方案。由郑玉山率领二十四名医生，分成四个医治小组，分工包片，深入到村，医治到户。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治疗，广泛组织卫生宣传，破除了拒医信巫的封建迷信思想，对困难户采取先取药，秋后结帐的办法，有效控制了疫情。

1949年4月，房山新区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农民分到了土地，但却缺乏口粮及籽种。房山生产推进社信贷部遵照平西专署及县委指示，发放救济款734000元（旧币），贷粮282458斤（其中小米103560斤，玉米178898斤），8月霉雨连绵，暴雨成灾，山洪夹带泥沙，堵塞河床，漫堤溢流，酿成水灾。九月，正是抢种小麦季节，农民缺乏麦种，供销合作社想农民之所想，

急农民之所急，采取先贷给农民小麦，秋后按市场价归还粗粮的办法，共贷出麦种 32907 斤。入冬组织群众开展副业生产，砍山货，刨药材，熬柏油，开粉房，搞运输等，在张坊、石亭两处收购荆条 100 万斤（十六两秤），收入小米 16 万斤，盖条 3000 捆，收入玉米一万斤，杈股子 2000 捆，收入玉米 4.4 万斤；檀木 10 万根，收入玉米 3 万斤；收荏子 500 捆，收入玉米 1.5 万斤；开粉坊 8 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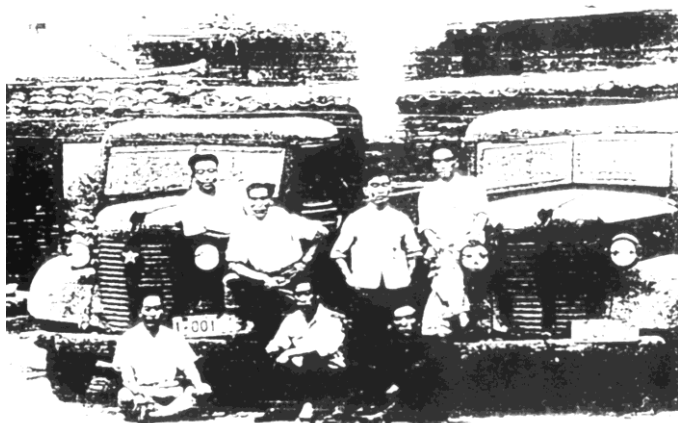
良乡县水灾严重，25996 亩土地秋收无望，为灾民抢种小麦贷出麦种 10 万斤。入冬组织灾民开展多种副业生产，供销合作社派出业务人员赴邻县推销产品，增加了灾民收入。

新中国成立后，供销合作社继承发扬老区的革命传统，本着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方针，扶植灾民生产，开展生产自救。为度过灾荒，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受社员及民众的爱戴。

1949 年底，由于华北歉收，西北发生了鼠疫，京绥铁路中断，粮价上涨，面粉由每袋 2.4 万元（旧币）涨至 4-5 万元（旧币）；粮商还故意开门无货，给市面造成“粮荒”错觉。群众由于恐慌心理便抢购粮食。为稳定市场，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于 11 月 13 日逮捕了 16 名奸商，连夜审判“粮老虎”，对严重者判处了徒刑，情节较轻者予以罚款、教育后释放。消息传到房良地区，立即粮价下降，市场稳定，民心得到了安定。

1950 年春，房良两县供销合作社总社为度过春荒，采取以粗换细的办法，向农民发放玉米、谷子等粮食，良乡发放玉米 33999.3 斤，换回小麦 22133 斤，房山发放谷子 48553.3 斤，避免了困难户借高利贷和小麦上市后“麦贱伤农”的现象发生。

1950 年夏，房良两县发生了风、雹、洪水等灾害，尤以水灾为重。据当时统计，房山被水淹没土地 139302 亩，占总亩数的 31.2%，受灾人口 121482 人，占总人口数的 61%，倒塌房屋 7752 间（二、六区为重），秋收无望。房



房山解放后，县供销合作总社运输科全体人员合影。左一汽车为我攻房山城部队入城时所获，左二为国民党暂三军丢弃在长沟的汽车。（王绍清 提供）

山供销社在周口店开办灰窑三座，煤窑一座，煤厂、石料厂各一座，每日有灾民四百至五百人参加劳动，日产灰 75 吨，方石 300 吨。还组织灾民大车 33 辆，牲口 75 头，骆驼 50 头，进行短途搬运。以上几项仅 180 天灾民就收入小米 790920 斤。为便利二、六区灾民销售山货，在张坊设立了山货栈，收购大煤、山木、药材、铁砂，计货款 12 万多元(旧币)。为推销石灰石料、农副产品，在周口店火车站及天津三条石设立了货栈。从东北运进的大豆饼、玉米，以及输出的石料，均由货栈办理。六间房、辛街、辛庄、山口等村组建了生产合作社，当时在灾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活，找合作社”。

良乡县被水淹没土地 17 万多亩，颗粒不收的有 79626 亩，全县减产六成左右，塌房 8472 间，砸、淹、伤 12 人，亡 18 人，淹死大牲口 20 头，猪 127 头，鸡 805 支，三、四区为重(今琉璃河、窑上地区)。灾后，良乡供销总社组织灾民大车 540 辆，给煤铁公司运煤 3 万多吨，两个月净挣运费 1375000 斤小米，解决 13095 人三个月生活；还组织位于永定河、小青河之间重灾区的 18 个村 247 户、1002 人熬硝 10 万斤，熬碱 45000 斤。这年春节有的灾民在门口贴上“勤俭生活能致富，熬硝制碱渡灾荒”的春联。

1951 年入夏，房山干旱少雨，连续发生蝗虫、蚜虫、钻心虫等灾害。六区鲍水等五个村，玉米仅长一尺左右，几乎颗粒不收。据当时调查，全县总平均减产四至五成，山区减产六成。全县估产(含果木)折合小米 55490600 斤，除交公粮、地粮外，群众估有粮食 50570600 斤，每人每月按 35 斤口粮计算，仅能维持七个月的生活，生产救灾即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房山县供销总社所属三个制灰厂、两座煤窑和吉羊砖厂，平均每日有灾民 327 名参加劳动，仅第四季度收购灾民荆条、荆编制品、檀木、石板、石渣等十二项产品，收入粮食达 594690 斤。

1954 年下半年，房山县发生水灾及风、雹、虫灾，129 个村受灾，259952 亩土地减产，占耕地的 61%，受灾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72%，因灾缺粮 1026 万斤。县供销社在政府救灾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救灾办公室，基层社建立了救灾小组。为稳定灾民情绪，及时调运了麦种 295318 斤，各式农具 3216 件，肥料 164900 斤。还组织灾民开展 40 多种副业生产，九至十二月份，灾民收入 205383 元，还收购灾民土产废品 223273 元，折合粮食 5043000 斤，基本稳定了灾民生活。

1955 年，房良两县局部地区遭受水灾，房山所辖蒲洼等 13 个乡镇遭受虫灾，镇江营因虫灾有 8000 棵红果减产大半。两县供销社通过组织灾民开展各项副



业生产和收购灾民土产、废品等，至次年6月，灾民总收入643266元，折粗粮7147400斤，基本解决了两县灾民缺粮问题。

1956年，房良两县发生水灾，良乡县受灾土地248633亩，占总耕地面积53.83%，颗粒不收的有87384亩，受灾人口达89143人，塌房13291间，被洪水包围有67个村。良乡县供销社组成生产救灾办公室，派出29人，深入重灾地区作好救灾工作。北白基层社划船为群众运盐3100斤，葫芦堡社采购员和大车工，趟三四尺深、十来里水路，从良乡县城背回电池30打，及时供应守堤人员，解决了燃眉之急。县供销社还为受灾农业生产社的大牲畜越冬与非灾区预定饲料450000斤，付出订金4031元，帮助北白、立辛庄两村推销梨190万斤，增加收入13万元。房山县因灾减产7698295斤，受灾人口63243人，基层供销社为受灾村庄开展了各项副业生产，增加了收入，以丰补歉。

1957年8月，房山县镇江营一带红果树发生虫灾，县供销社得知后，当夜用汽车送去二百架喷雾器及农药，及时消灭了虫灾。

1961年6月，房县长沟、周口店、张坊等13个公社19000亩庄稼发生蝗虫，受灾的基层供销合作社及时派出车辆和人员，调运各种农药、器械，及时消灭了虫灾。

1963年，房山县全县大面积农作物发生虫灾，供销合作社为保障农业丰收，组织二十辆汽车连夜为四个公社送农药二十万斤，及时消灭了虫灾。

1965年12月，遵照北京市供销总社指示，经房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对1965年以前生产队因灾打欠条的赊欠货款，确无力偿还者实行一次豁免，仅七个供销社豁免60多万元。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到京、津地区，房山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县社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党委成员亲自出马立即奔赴震灾较重的长沟、岳各庄、赵各庄、窦店等基层供销社实际查看。当日下午，从机关科室及田各庄食品厂抽调30名同志组成突击队，赶到长沟供销社，与职工一起，在余震不息，雨不停的情况下，将主要副食品及西药转移安全地方备用。当日深夜，县社接到县委支援通县、平谷一部分蛋糕和熟食的任务后，由紫草坞、周口店两饭店抽调了五名职工从子夜开始到次日晨，打火烧223斤，蒸馒头、烙烙饼240斤，及时运到了通县；田各庄食品厂职工昼夜两班为平谷加工糕点11000斤；紫草坞饭店想到震后阴雨连绵，群众做饭有困难，于是，每天有五六种主食，十几样现成菜出售。附近村庄顾客随到随吃，川流不息。

中午、晚上还把油饼、火烧、肉肠、饭菜送到防震棚，深受群众欢迎。良乡、琉璃河、长沟、长阳等基层供销社收购站收购人员，想到震后猪圈倒塌，社员喂猪困难，不顾余震危险，冒雨收购生猪 396 头，收购草帽绳 18000 多丈。震后各基层供销社及直属公司职工积极调运供应抗震物资苇席 73000 斤，塑料布及薄膜 54000 斤，油毡 4300 多捆，苫布 1000 多块，竹木竿 3200 多根，基本满足群众抗震搭棚的需要。

1982 年，崇各庄、坨里、良乡等五个公社 61 个大队遭受雹灾，当地供销社为抗震救灾积极组织菜子 3600 斤，供应给受灾大队，进行抢种补种。

1983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上旬，房山县周口店公社 12 个大队发生黏虫灾害，周口店供销社立即组织人力、物力，派一辆汽车、一辆马车专拉农药，直接送到南韩继、娄子水、大韩继、拴马桩等大队。计敌百虫、六六粉、多福粉等农药 47 吨，瓶药剂 308 瓶，四架喷雾器，及时消灭了虫灾。

1989 年，房山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庄稼医院”发现南召乡的六万多棵果树发生了虫灾，“庄稼医院”的技术人员与果树专业户共同确诊后，立即将 20 箱敌敌畏、18 箱氧化乐果共计 1520 斤农药，送到交道、窑上、南召三个乡的果农手里。

1990 年 6 月 8 日，下午五时十五分至五时四十分，房山区石楼、窦店、周口店、琉璃河等八个乡镇遭受雹灾，全区风力 5-6 级，最大时达 8 级，冰雹密度 100 粒/平方米，最大密度 300 粒/平方米，最大直径 2.5 厘米，小麦、蔬菜受灾较重，据当时统计：全区 2.8 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减产 560 万斤。重灾地区坨头、双孝、窦店、周口店村，小麦减产 160 万斤，风雹过后，受灾地区的供销社深入到农村，及时供应农民化肥、菜子、农膜等物资。

(两县生产推进社于 1949 年 6 月改为供销合作总社，1950 年 1 月信贷业务及人员归属两县银行。数据出处：房山、良乡商业有关史料及《房山供销社六十六年大事录》)。

# 良乡农业社的过渡

刘振祥

1958年房良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此前，良乡是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区的一个县。

良乡县于1949年土改后，党和政府便组织农民村互助合作，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互助组。在此基础上，1951年以县北部的岗上村吴春山的常年互助组、县南部的北彰村王全的常年互助组。开始进行两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初级社试点。县委派人亲自总结了“吴春山农业社从建立到分红的具体经验”，得到了通县地委的肯定。1953年，在全县开始推广吴春山的办社经验。由于良乡条件较好，领导重视投入力量较强，因此合作化进程较快。到1955年底，全县大多数农民入了社，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农业初级社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参加分配将农民的土地依据不同质量作成股，土地股分红最多不超过五成，即“劳五地五”被称作五五分成。后来逐步增加劳力分配比例，逐渐发展为“劳六地四”、“劳七地三”的分配比例。

良乡的初级社，从开始就得到了健康顺利的发展。80%以上的实现了增产，只有10%左右的初级社由于领导不力，管理混乱未能实现增产，这就是所谓的“三类社”，“三类社”后来成为每年冬春整党整社的重点。

纵观这段历史，在发展合作化的指导思想上曾先后发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央最初的指示精神是：“大力整顿农业社”、“在整顿巩固规定的基础上再稳定基层”、“坚决停止基层，立即进行收缩”等等，这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主持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

正当我们按照这一部署开展工作的时候，不久中央又发布新的指示。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开头便讲：“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位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

错误的方针。”又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七届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的结论中，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题，进一步明确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

从此，良乡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了反“右倾”的运动，加快了农工合作化的进程，取消了不允许地主、富农入社的限制，并酝酿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社过渡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为此，中共通县地委于1955年冬在大兴县委召开了部分县委农村部干部参加的办高级社的经验交流会。当时，通县地委农村部干部张德茂、大兴县委书记陈修正等人参加会议，向我询问了良乡县委书记张令德的情况。会上，大兴红星集体农社主席于朝海详细介绍他的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他们未叫合作社而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叫作集体农社）的具体经验和过程。他们的主要作法：一是取消土地股参加分配，土地收归农社集体所有；二是农民的果树林木、牲畜、马车等重大财产，合理作价，不计息、不升值、由逐年收益中逐渐清还；三是收益中除上缴农业税和扣留下年生产费用外，还必须扣留3-5%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以不断壮大集体的经济实力。总之，除了土地股不参加与配外，

其余与当时的初级社没有太大的差别。会上，地委农村部的同志要求各县回去后要搞好试点，以点带面，积极推进农业社高级化的进程。回到机关后，我立即向县委和农村部领导汇报了会议精神。县委领导当即确定岗上村吴春山农业社作为县委直接抓的试点。同时要求全县4个区都要抓两、三个试点。



1957年1月中共良乡县委农村工作部全体同志合影  
(刘振祥提供)

不久，县委根据河北省委和通县地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制定出全县实现农业社过渡到高级社的计划。并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进行传达、贯彻，“过渡”工作便在全县展开。当时的理论根据是：劳动创造世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土地参加分配是个不合理的因素，所以只能算是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要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就必须取消土地股分红。至于果树林木牲口大车等财产只能算是资产，只能作价入社记帐，逐年偿还。而且资产不能计息，也不能升值，否则就成了资本主义性质了，只有完全按劳分配，才能算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才能更大限度的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将这些道理，首先在岗上吴春山农业社对广大社员进行了表达，社员们都表示赞成。随后，全县各区也确定了重点，领导亲自动手，抓点带面推进初级社过渡到高级化的进程。到 1956 年底良乡县的 187 个村的初级社完全转为农业高级社。

实现高级农业社后的几个月后，即 1957 年初，以中农、富裕中农为主的部分社员又闹起了退社风。有的想要回自己入社的牲口大车，有的想要回自己入社的土地。针对部分社员的退社风，全县开展起大辩论，反右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当时，这一切称作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闹退社的社员在大辩论中受到了批判，有的做了自我批评。退社闹得凶有破坏言行的受到了拘捕。按照当时的说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场大辩论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这成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连村社，从连村社到人民公社发展的政治动力。

# 我在农业战线的一段经历

李希贤

1960年，我在密云水库度过了国庆节之后，便随最后一批战友们回到了阔别已两年的家乡。到家后，接手了良乡公社五街大队食堂的会计工作。

六十年代初正是国家的困难时期，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党的农村政策相继进行了重大调整。如解散公共食堂、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解决一年二调乱刮共产风等等。这一年的秋后，五街大队的食堂也宣布解散，我又当上了生产大队的会计。由于以前没干过会计工作，业务上不熟，也没人辅导，对这项工作便产生了厌烦心里。到了1962年，我听说区兵役局征召新兵入伍，要一名文书，赶紧就去找大队负责人提出要求，当即得到同意。但到了公社党委那却卡了壳，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立即写信给县委书记霍梁。霍梁很快回了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完好无缺）。他在信中跟我讲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农业战线上正缺少像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要我安心农村工作，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面对信中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我放弃了打退堂鼓的想法，服从党的需要，下了继续在农村干下去的决心。这一关键的抉择决定了将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党的农村事业，也重新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历程。1963年，我又被推选当上了五街大队党支部书记，从此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当时我24岁。

这时我已经在大队干了近三年的时间了，对五街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些了解，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贫困落后、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集体。更大的困难是我年纪轻轻。既没当过什么领导，也没有农业方面的知识技术，更谈不上工作的实践了。但是我想，这样也好，就从零开始，从零学起吧。就这样，我便开始走上在我一生中一段崭新的里程。好在那时公社干部几乎天天有人下乡，催收催种，一方面向他们学习，另外一方面则与社员们搞好“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大队主要干部实行固定补助工分加劳动的制度，即支部书记每年补助2000分、大队长补助1500分、大队会计补2500分，除去补助的这部分外不足部分要靠个人参加集体劳动去解决。这项制度也促使了我经常和

社员们在一起，使我很快融进了这个大集体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干部在历次运动中面对的是频繁的检查交待，“上楼下楼”、“洗手洗澡”、晚上开会要开到很晚，第二天还要坚持领导生产。我虽然参加农业战线的并不长，但也要挖空心思给自己上纲上线，否则不好过关。在工作组的启发帮助下，甚至将不在自己任期内发生的事也要揽过来，间接地承担责任。

在日常的生产与工作实践中，我和大队其它领导成员深感生产队核算这种体制，制约和束缚着生产的前进与发展，浪费了许多领导干部的精力，因此在四清运动后期我被“三结合”以后，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向工作队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将两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大队核算。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工作队的肯定与支持，很快又在大队领导班子内形成了统一认识，报经公社分团党委同意后又报县团和县委批准，我们的并队工作便很快行动起来。广大干部和社员对这件事都很支持。改成大队核算以后，领导班子无形中免去了很多无谓的矛盾与纠纷。虽然没有了生产队，但又重新划分了劳动组织，大家的精力和生产工具更集中了，既便于分散指挥也便于打歼灭战。

当时干部和社员，上上下下集体劳动的热情空前高涨，涌现了很多爱护集体的好人好事。这时大队领导班子为了解决城根园田的干旱问题，又适时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新奇的设想：搞一个“南水北调”工程。即将距城根五、六里地以外的范家坟和老沟的两眼机井水引过来，以解决城根园田缺水的燃眉之急。这项工程虽然“庞大”，但由于我们巧妙的利用了原有的一些渠道、建筑物和已经干涸了的刺猬河河槽，只在良坨铁路支线上修建了一个水泥管的“倒虹吸”，清澈的机井水很快就流到了良乡老城的城根下。这件事显示了并队以后大集体的强大威力，也体现了“四清”运动后人们迸发出高涨的生产热情。这一年秋后，我们取得了几年来最好的收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集体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个人被停职，接受批斗监督劳动，“靠边站”长达六年之久，家里人也跟着受到了牵连。

当我被落实政策再次担任五街大队的领导后，已经是1973年的春天。此时面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分队的工作，原因是以生队大队为核算单位不符合党的政策，上边不顾我们的实际情况，强调还要退回到原来的生产队核算。没办法，只好照办，让社员感到困惑（又过了一年多以后，两个队才又再度合到一起，体制才得以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到1984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没有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也没有核算单

位过小的束缚，领导班子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把心思都用到了谋发展上来，农村牧副产业都取得了很好成绩。八十年代初的几年，农副业总收入、粮食单产和总产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副业项目已达十几个，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广大社员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年人均生活费接近 500 元，口粮水平 400 斤。

1984 年春，由于党的农村政策的变化，我感到已不适应新形势需要，向良乡镇党委提出辞职申请，后得到批准。至此，结束了我在农业战线二十多年的战斗和工作。



# “厂办商店”始末

张广明

1972年,《红旗》杂志发表过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厂办商店好》。这篇文章肯定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即北京燕山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为了保障第一线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需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创办商店的做法和经验。

石油化工区最早建设的第一家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就是东方红炼油厂。厂址选在房山县周口店镇坟山村。这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附近没有商店,职工吃、穿、用等生活急需,只能到房山县城和长沟峪矿区等地购买。数万名职工家属“粮、油、肉、蛋、菜”的供应和生活用品的修理服务等成为一时的老大难。

为了解决困难,化工区领导决定自己动手、建立系统内的商业服务设施。当时是“计划经济”,又处在“文革”时期,一没经验,二又缺少专业人员。而凭证定量的商品又需要由国家统一调拨,困难重重。这时,北京市和房山县主管部门伸出援助之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决定全力以赴组织各方面力量帮助“特区”建立商业服务设施。没有经验,他们就是通过人事、组织部门从商业部、计委、市一商局、二商局、糖业烟酒公司、食品公司以及百货大楼等处调来一批有经验的领导骨干。没有专门人员就由房山商业部门抽调,一般的服务人员则由职工家属和当地“农转工”人员担任。经过紧张充分的准备,石油化工区第一家综合商店——东炼商店,就在一家旧库房内开张营业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东方红炼油厂车间按军队编制为营,仓库和商店为直属连,东炼商店便称为“商店连”。人员的身份,岗位,待遇和工人一样,属东方红炼油厂领导。

“商店连”的任务是直接为化工区的生产生活服务。职工队伍经过培训教育,组织纪律性很强,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很好。平时保证计划内凭证定量商品供应到每一户,遇到重大活动,如学雷锋、开展“百日质量竞赛”、“装置大检修”、“开工典礼”、“大会战”等,都要摆摊设点,送货到现场。并制定了“服务公约”、“职工守则”。节假日不休息,为烈军属智弱病残送货上门。

为了保证蔬菜供应，特别是冬储大白菜，商店还和夏村、苏村、瓦窑头等村签订供销合同，菜农按计划种植大白菜，商店统一收购，在化工区内分摊设点按量供应。为了保证“淡季不淡”，还在西庄村挖了菜窖，保证冬季人民群众的“当家菜”不脱销断档。

由于领导重视、职工努力，市、县两级主营部门的大力支援，厂办商店越办越红火，品种全、服务佳、购销两旺，吸引了周围山村群众也常来商店购货，声誉很高。当时，越南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也曾带人前来参观学习。厂办商店做为新生事物，在当时引起了一定影响，也取得一定经验。

随着化工区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设施也在不断增加。在成立了燕山办事处后，分别组建了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和粮食局。东炼商店也划归了副食品公司管理“厂办商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东方红炼油厂的建厂决策

孙 明

东方红炼油厂是燕化公司最早建设的一个工厂，但是关于炼油厂建设的一些情况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原因是关于炼油厂建设决策最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当时参与决策的人主要是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的领导。在决策的关键时期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批人大都受到冲击。再加上当时正常的管理秩序被打乱，能够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几乎没有。笔者在编纂《燕化志》和《北京志·工业卷·北京石油化工志》的过程中，曾在北京市档案馆遍查北京市政府的相关档案，也未查到相关资料。所以在《燕化志》（1967 年—1990 年）一书中对这一方面的记载是不全面的。

2000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市委编写组编写的《刘仁传》，其中记载了炼油厂建设的一些情况。随后笔者又采访了有关人员，包括当时参与决策的北京市和燕化公司的老领导王纯、韩伯平等，对建设炼油厂决策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陈云最早提出要抓“吃穿用”的问题。1962 年 2 月，中央召开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陈云讲话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3 月 7 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周恩来总理高兴地插话说，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大家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在制定“三五”计划前，中央已形成了抓“吃穿用”的共识。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京市为满足市民穿和用问题，考虑发展化纤工业。当时解决化纤原料问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是发展煤化工工业，因北京京西房山、门头沟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原料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当时煤化工面临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其二是通过石油化工解决原料问题，当时大庆油田已经发现，可以通过火车运输将原油运到北京，而且通过石油化工可以比较

容易解决原料问题。当时兰州炼油厂已经建设了乙烯裂解装置。经过比较，北京市决定发展石油化工工业解决化纤原料的来源问题。

1963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发展石油化工工业。

1964年，北京市决定筹建石油化工厂，由副市长兼计委主任王纯和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贾庭三负责牵头组织。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韩伯平、北京市化工局局长赵庆合等人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在石油工业部（简称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的协助下，北京市请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化工学院的专家，撰写出北京建立化工试验基地的报告，正式上报国务院。

1965年，石油勘探部门在北京市大兴县凤河营地区钻探出了几口低产油井。同年石油部副部长张定一率有关人员和北京市等有关部门人员开始在北京周围山区房山县、密云县、大兴县凤河营等地区勘察选址，进行筹建炼油厂的前期准备工作。厂址选定于大兴县黄村地区，成品油罐区选在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坟山大队栗园地区。

1966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北京市建设北京炼油厂，规模为100万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文件上签字。

1966年5月，石油部抽调兰州炼油厂技术人员俞绍成（后曾任北京石化总厂设备处处长，现为中国企业管理联合会退休干部）到北京，与北京市北京炼油厂联合工作组赴大庆炼油厂进行工作，成员由石油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人员和石油科学院、石油设计院、电力部电器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兰州炼油厂等单位人员组成。工作组在大庆工作了一个月，回到北京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做为工作组主要成员的俞绍成四处找领导汇报成果，但是当时石油部的主要领导已经“靠边站”，当时他住在石油部的执行所里，每天到部里领导汇报工作，但是领导不是找不到，就是已经被“造反派”管制，没有人听他的汇报。

“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后，老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基本上全部被打倒，同时中央也加大了对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加之当时战备形势的需要，炼油厂筹建工作由北京市改为石油部负责，建设目的由解决化纤生产的原料问题和最终解决吃、穿、用问题改为以军用燃料生产为主。

当时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认为在大兴县黄村地区建厂不符合“靠山、分散、隐蔽”，“进山、入洞”，“少占

或不占耕地”的原则。经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石油工业部、北京市政府审查，决定将厂址选择在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坟山村的一个狭长的山坳里，背靠大山，面向丘陵。

1967年1月，石油部北京设计院综合设计室完成炼油厂初步设计。

1967年2月，国家计委在给石油部《关于建设北京炼油厂问题的复函》中，将原油加工能力提高到250万吨/年，并正式列入1967年国家计划。

1967年3月14日，石油部成立东方红炼油厂（简称炼油厂）筹建处。4月初，筹建处在坟山村东面的山沟中搭建了一栋木板房开始办公。4月22日，石油部决定将炼油厂的筹建、施工及投产前的生产准备委托给兰州炼油厂全面负责。4月28日，北京第六建筑公司的首批人员抵达施工现场，先后修建了100多栋简易篱笆房。5月3日，兰州炼油厂副厂长葛立兴带领由石油部机关、北京石油设计院和兰州炼油厂等单位人员组成的30人的筹建小分队进驻。5月下旬，北京市政公司、北京第六建筑公司等队伍开始架桥、修路、盖单身楼。6月，开始土地征用工作。第一批征地范围包括：周口店仓库用地，征用河滩地8万平方米；周口店经长沟峪到坟山村5.7公里公路用地，征地8.6万平方米，其中征用耕地3.9万平方米；一期工程生产装置、辅助工程及施工用地，征地110万平方米，其中征用耕地20万平方米；征用住宅用地3000平方米；北京市政工程公司及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大型建设工程临时用地，征地2.7万平方米；筹建施工基地征地7.8万平方米。

7月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同意从罗马尼亚进口的一套年产15万吨润滑油装置建在东方红炼油厂。

8月，开展了大规模“四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通风，平整土地）工程建设。参加施工建设的有来自兰州、抚顺、山东等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大专院校的师生1.4万余人。

10月30日，石油部军管会决定成立东方红炼油厂筹建处领导小组，李世源为组长，葛立兴、白凤仪、白耀亭任副组长，吴协刚、杨一广、孙伯诚为组员，同时决定李世源为筹建处主任，葛立兴、白凤仪、白耀亭为副主任。

11月13日，石油部军管会决定，东方红炼油厂筹建处改由石油部直接领导。11月22日，石油部军管会就东方红炼油厂领导关系问题请示国家计委，并建议筹建和生产工作由石油部军管会直接领导，党的工作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

1968年3月，炼油厂开始进行系统基础工程，油、水、电、通讯等厂外

工程，部分设备预制和油罐、系统安装。

6月以后，兰州、淄博、抚顺等各路建安队伍相继进入工地，8月开始装置开槽打基础和设备制造、安装。一期工程共完成土石方近200万立方米，其中石方50万立方米。

9月20日12时，为了建设运输成品油的装油站台，实施了108吨炸药定向爆破，创出了当时的北京之最。

10月20日，北京市基本建设会议决定，将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列为北京市向国庆20周年献礼项目。

12月，原油转运站动工建设。

1969年2月17日(春节)，参加东方红炼油厂建设会战的14个单位的1.3万名职工冒雪在露天广场召开提前建成东方红炼油厂誓师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口号声此起彼伏，一场声势浩大的建设大会战开始了。职工们在现场吃完热气腾腾的饺子，立即投入建设热潮。

常减压蒸馏装置建设由兰州炼油厂安装公司建设。3月27日，竖立起第一座炼塔——重达160多吨的常压塔。减粘装置由山东胜利炼油厂红旗总队负责施工。催化裂化装置建设工程由石油部抚顺炼油厂建设工程公司承担。

1969年7月27日，东方红炼油厂成立一期工程试车领导小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军代表朱文俊为组长，李世源、白凤仪、赵玉秀为副组长。

8月8日，原油转运站建成通车，“毛泽东号”机车运进第一列大庆原油。

8月19日，北京供电局正式向东方红炼油厂供电。25日，污水净化场隔油、脱水、排放等主要工程完工。30日，锅炉投产，并向常减压蒸馏装置送汽。

9月9日、19日、27日，东方红炼油厂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减粘3套生产装置和贮运系统、公用工程相继投产成功并生产出合格产品，结束了北京不能大规模生产石油产品的历史。30日，一辆满载着油品的彩车开进北京城，实现了广大建设者向国庆20周年献礼的目标。

# “东炼厂”筹建经过简记

罗玉源

1967年，东方红炼油厂在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坟山、栗园村筹建，距今已有37年了。当时，房山县的责任和任务是：排除困难，积极协助东方红炼油厂搞好筹建工作。

由于我长期在农口工作，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比较熟悉，被安排到房山县第一线指挥部工作。炼油厂开始筹建前，领导小组组长李士元、副组长白凤仪持北京市革委会介绍信，来房山第一线指挥部联系筹建工作。我和武装部长王恩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们。他们说明炼油厂要设在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坟山、栗园村，需要县里协助作好搬迁转户等工作。听了介绍，我觉得这项工作困难程度较大，因为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各级组织机构已不健全，领导涣散，而且一个村转了户，又会引起周围邻村的连锁反应。经反复研究，认为东方红炼油厂是在房山县地区建的第一个国营大企业，建好后对房山经济的发展很有利，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

于是，我们第一线指挥部的领导先后多次到周口店公社和坟山、栗园村，调查座谈征求意见。我们了解到当地的干部还能坚持工作，群众情绪比较稳定。为把工作做好，我们动员抽出原房山县人事科长阎福庆、劳动科长张俊岐、县武装部秘书赵宗月、干事王凤菁等七八名同志组成工作组，深入公社、农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解决搬迁转户等各种问题。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68年，在房山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我继续负责这项工作，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任务。

最后，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公社三级领导到现场办公，达到了筹建组领导、公社村内群众都满意，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东方红炼油厂于1969年10月1日建成投产。房山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也参加了庆祝大会。

东方红炼油厂的建成，为后来燕山石化总公司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是房山境内最大的国有龙头企业，对带动房山乡镇企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华北第一座超高压变电所的建设

章世铭

在阎村镇西坟村南侧座落着一处占地面积 334 亩的大型变电所，它就是 1985 年建成的当时北京地区第一座、也是全华北地区第一座电压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枢纽变电所——北京房山 500 千伏变电所。它的建设是有历史背景的。

北京市由于用电负荷增长迅速，电力建设相对缓慢，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电力供需矛盾就已显露，“大跃进”期间电力供应已显紧张，60 年代供电紧张日益严重。由于电源不足，使发电厂及变电所母线电压降低，影响全市供电电压得不到保证。据 1970 年 6 月 24 日北京供电局向上级的紧急报告称：“中南海供电电压 400 伏降低至 340 伏；人民大会堂、国宾馆、国防部、新华社、电报大楼、北京日报……等重要用户电压均低于 340 伏以下，据人民大会堂反映：电梯不能动，电动机转不起来；首都机场 10 千伏降低至 8 千伏，影响飞机起飞；码头电台低至 9 千伏，长阳电台、北京电台、外交部电台、双桥电台等单位均由于电压低影响通讯、广播和军工用电；电车公司无轨变流站 10 千伏降至 8.2 千伏，东北郊水源厂 400 伏降至 290 伏，友谊医院降至 300 伏，影响交通、供水和医疗；化工二厂 10 千伏降至 8.2 千伏，电解槽被迫停产……”。

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电力供应愈益紧张，电压低、周波低、拉路限电也更加频繁。1972 年 2 月 20 日至 28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期间，当时电力供应紧张到缺电 10 万千瓦。北京市只得拟定紧急限电方案，要求每天 7 时至 21 时压下负荷 4.15 万千瓦，对北钢、特钢、首钢、铁合金、化工二厂等大企业，都指定专人现场站岗 24 小时，监督其用电情况；对远郊区县 47 条农电线路，每天 6 时至 11 时、13 时至 22 时拉路；对 44 条工农混合线路，每周一、二、三由 6 时至 11 时 30 分，17 时至 20 时，每周四、五、六由 17 时至 20 时拉路。采取这些措施才保证了尼克松访华期间的电力供应。

1974 年，北京地区电力供应缺口越来越大，城区各配电线路凡是能停电



拉路的，全在停电范围之内。由于大面积停电，影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各方反映强烈。语言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因停电，甚至怀疑电业职工罢工了。据北京供电局 1974 年 11 月上报的《关于北京地区缺电情况的报告》中称：“1974 年 1 至 11 月，全市拉路 178 天，累计拉路 3838 路次，累计拉路负荷 1370 万千瓦。各企业损失严重。如北京涤纶厂 11 月 6 日两次停电 5 小时，减产 3.6 万吨，产值 5 万元，仅纺织机需更换 18 个组件……；纺织局系统 11 月份共停电 334 小时，少产棉纱 344 件，布 20 万米，印染布 40 万米，产值 180 万元；其它如化工二厂因停电氯气中毒，矿物局、化工厂停电引起炸药爆炸……；11 月 16 日至 18 日因停电牛奶减产，使 10 万市民牛奶中断……”。

“六五”计划期间，北京市的电力供需矛盾仍日益激化。1980 年全年拉路 10775 路次，平均每天 29.52 路次。1985 年全年拉路增加到 48339 路次，平均每天 132.43 路次。连年的拉路限电，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面对这一形势，为了缓解京津地区用电负荷中心严重缺电的局面，保证首都的安全可靠供电，国家决定对华北电力工业采取重大举措，调整电源建设布局，在路口、港口建设发电厂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晋北、蒙西等煤炭基地建设大型矿口电站，通过 500 千伏超高压输变电设施，向华北东部特别是首都负荷中心输电。

1979 年 10 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建设“晋京 500 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将山西大同、神头两个大型矿口发电厂发出的电力，通过大房 500 千伏双回超高压输电线路输送到北京，决定在北京房山建设 500 千伏变电所。之前，水利电力部已批准建设 220 千伏房山变电所，选址在北京市西南郊，距北京市区 45 公里的房山县大紫草坞公社西坟村南侧贫瘠的土丘上。1976 年，北京市批准建设 220 千伏房山变电所，占地 60.9 亩。考虑到建设 500 千伏晋京输变电工程，其北京受电端的 500 千伏变电所所址亦选在房山县，为避免在同一地区建设 500 千伏和 220 千伏两座变电所，决定将 220 千伏和 500 千伏变电所合并为一座变电所，扩大面积，连同以前批准的 60.9 亩地，共批准占地 339 亩。

北京房山 500 千伏变电所的建设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 220 千伏部分，于 1983 年 8 月开工，1984 年 12 月竣工。第二期工程为 500 千伏部分，于 1979 年开始筹建。原水利电力部确定该工程采用前苏联进口的 500 千伏电气设备。1980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批准计划任务书时，要求改用国产 500 千伏

电气设备。由于国产设备因制造上的问题不落实，1983年水利电力部决定仍采用前苏联进口设备。由于前苏联的500千伏断路器等设备不能满足中国的技术要求，又确定由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进口。因主要设备决策的多次变化，致使设计周期三次变化，时间长达5年之久。经与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反复研讨论证，最后形成的变电所设备包括三类：第一类为国外进口设备，采用了前苏联、日本、联邦德国、瑞典、瑞士、法国、加拿大、美国等8个国家、11个知名公司工厂的产品；第二类为按引进专利制造的国产第一批设备；第三类是国内电气产品。变电所建筑工程于1981年开工，设备安装工程于1985年5月开工，1985年9月竣工，经系统调试，于1985年12月6日正式以500千伏电压等级投入运行。

北京房山500千伏变电所的建设规模为：220千伏部分，安装有主变压器3台，总容量36万千伏安。500千伏部分，安装有主变压器2组8台，总容量180.1万千伏安；总容量为36万千乏电容器和18万千乏电抗器组成的无功补偿装置。变电所出线通过220千伏输电线路，向东与北京南苑220千伏变电所、向北与北京西南郊吕村220千伏变电所两大枢纽站相连。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向东与北京安定500千伏变电所、天津北郊500千伏变电所相连，向南与徐水500千伏变电所相连，向西与山西大同发电厂、神头发电厂、内蒙丰镇发电厂相连，向北与昌平500千伏变电所相连。北京房山500千伏变电所已成为华北电网中把首都北京与京津唐电网、冀南电网、山西电网和蒙西电网相连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大型枢纽变电所，是北京电网最重要的电源支撑点，是华北电网西电东送最重要的通道，也是保证首都北京政治用电的基础。

由于工程性质的重要，北京房山500千伏变电所在施工中自始至终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与亲切关怀。开工前夕，国务院总理李鹏曾来工地视察。变电所投入运行时，水利电力部钱正瑛部长亲自为变电所剪彩和启动按钮。工程进行中，《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图片社以及《水利电力报》、《机械报》等报刊的记者或编辑，相继来工地采访、摄影，多次刊登了关于房山500千伏变电所的新闻与图片。

## 北京化工四厂二三事

高志民

### 首都化工行业的缩影

位于房山区马各庄的北京化工四厂是首都化工行业的缩影。

1949 年以前，北京市只有资本家经营的小化工厂，只能生产人力车胎、球胆、胶鞋底以及碳酸钙等几种产品，大半已经奄奄一息，濒临倒闭。

私营化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试点是从 1954 年开始的。当时，公私合营的小厂在北京共有 47 户，其中 22 户是烧碱业，10 户是碳酸钙厂，8 户是苏打厂，7 户是漂水厂。每个厂的人数最少只有 3 人，最多 10 多个人，这些小作坊在解放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给生产和经营都带来很大困难，多数亏损，只能靠贷款发工资，员工思想根本不稳定，生活无保障。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贾庭三亲自组织召开公私合营试点会议，要求一切从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群策群力发动群众，力争把北京市的工业搞上去。仅在几个月内，私营新华橡胶厂实行公私合营，这就是北京化工四厂的前身。

建厂后，广大职工坚决执行市委的指示，并制定出详细的措施，决定停产一个月进行整顿，对新成立企业的动产和不动产重新进行评估和整顿。首先从劳动组织调整入手，对烧碱、碳酸钙 32 户进行了改组合并，部分户停产，由原来的两个分厂改为四个分厂，下设一个碳酸钙车间，共分五处生产，并组建相应的管理机构。停产户的工人调往其它劳动力不足厂工作。劳动组织调整后，工人们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1954 年 7、8、9 三个月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弥补了一部分亏损。12 月，党支部向全厂党员职工发出号召，并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路，一个是坐吃山空，让国家养着我们；二是挺起腰杆克服困难，现在自己当家作主了，一定要干出名堂。随着全厂干部职工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烧碱平均月产量很快达到 530 吨以上。当时北京解放仅仅几年，各项事业百业待兴，市场供应非常紧张，广大职工昼夜奋战，夏天一身汗，冬天冒严寒，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

在新兴的企业在抓好生产的同时，化工四厂没有忘记科研项目研究。他们从化学工业公司借调一名高级工程师李温和进行项目研究。李温和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对化工生产颇有造诣。经过认真分析，他提出搞金属钠的研制生产。金属钠是制药、燃料和原子能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当时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很贵。厂党支部对李温和的计划非常支持，克服种种困难，花了200元买了一块苏联产品，供其实验。在李温和的带领下，全厂职工昼夜苦战，经过两个月的实验，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块光灿灿的金属钠，含量达99.9%，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公私合营仅仅一年，广大工人不但政治上翻身，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党的领导下，工厂有了较大的改观，产值达到百万，不但不靠贷款吃饭了，还向国家交了2万元的利润。年底，被评为全国和化工部的优秀单位。数名领导干部和职工出席了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和北京市先进生产代表大会，为建国后的首都化学工业赢得了荣誉。



1956年1月，信大化学酸碱厂全体职工庆祝公私合营纪念合影（高志民提供）

### 华罗庚亲传优选法

1971年，化工四厂正处于开发建设、努力提高生产能力的艰苦创业阶段中。全厂职工上上下下正在为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而努力地工作着。2月初的一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缓缓驶入化工四厂大门。从车里走出来的是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在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华罗庚直接走进生产车间。

这个时期我国正处于“文革”期间，科研已经在停顿状态中。华罗庚正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中取得了0.618优选法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化工四厂正在“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特别特是社会上正在批判唯生产力论。华罗庚听到这种情况，及时深入实际，深入科技生产第一线。他来到当时的金属钠车间、氰化钠车间和钠置换军工产品生产车间，进行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广。他走到哪里，广大的工人和干部都非常热烈地欢迎他。化工产品都是高温、剧毒、易燃、

易爆，恶劣的生产环境可想而知。但华罗庚仍然紧握着职工的手，亲切地询问着的生产情况和物料配比量，召开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的现场座谈会，仔细记录各种数据和参数。反复宣讲优选法的研究过程和生产中的实际作用，努力指导把优选法应用于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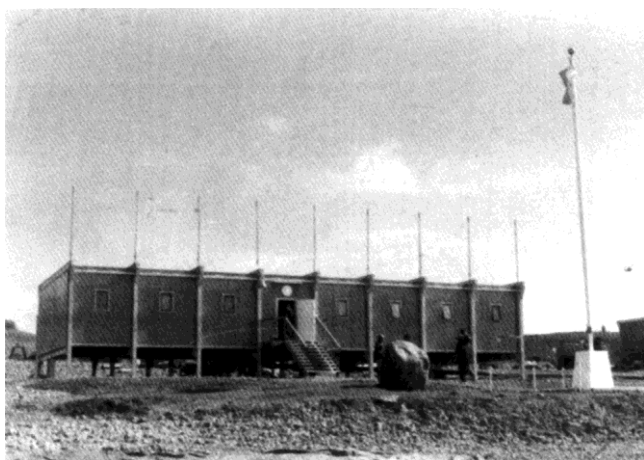
随后，三车间钠置换小组用优选法寻找最佳投料配比。经多次试验，将金属钠的投料由原来的 400 公斤，降到 270 公斤。结果反应稳定，不仅避免了生产出钾钠合金，而且产量也提高了 30%，周期缩短了 14 个小时。每生产 1 吨钾，可节约 900 千瓦电。这是药板生产史上的又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科学家在那种政治气候条件下，仍然为强国富民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 光荣的任务

每当大家看到南极科学考察站那橘红色的站房时，化工四厂的全体职工就感到由衷的自豪。因为他们生产的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墙体板，为中国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 年上半年，北京市有关科技部门为了我国在研究南极地理环境、气象探测、地理地貌的形成进行实地考察，要求北京化工四厂用新型材料制成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生产站房墙体板。接受任务后，广大职工精神振奋，在厂党委的动员下立即展开科研，将此项目进行科研攻关。许多工程人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吃住在厂内。从 6 月份开始，大家每天冒着炎热的天气和蚊虫叮咬，硬是在 8 月份就完成了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的研制工作，并将研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由于南极考察站的房屋是按照有关部门提供的图纸去做，给生产带来一定的困难，于是广大科技人员根据提供的图纸做模具，然后生产一块块的墙板，为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建筑又喷上桔红



1985 年 1 月，北京化工四厂生产的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墙体板正式用于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的建设（高志民 提供）

色的涂料。整个工程完后，仅仅用了 10 个月，完成了北京市交给的任务。产品完成后，从周口店火车站装了 6 个车皮送到上海港，再从上海港启运南极。

1985 年 1 月，在南极用化四生产的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墙体板正式用于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的建设。建站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那桔红色的站房，吸引了许多已在南极建站的外国考察队到此参观。当时各大媒体都做了报道，北京市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给化工四厂送了锦旗。上书：“大力协作风格高，南极建站做贡献”。

# 牛口峪水库第一期工程施工侧记

张广文

在房山城西南三四里的地方，有一处方圆几百米的山洼，周围被卧虎山、磨盘山、骆驼山等几个海拔一百多米的山峰包围。其南边山口有牛口峪村，村边一个长年流水不断的马刨泉形成马刨泉河，流经南关、顾册、辛庄、坨头、双柳树等村汇入周口店河。1959年秋季，为了消除马刨泉河下游山洪的危害和减轻周口店河下游水旱灾害，以及解决城南几个村的农田灌溉，兴修水利的民工大军五个兵团开上了牛口峪水库工地。

当时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全北京市都在大兴水利。各郊区县以密云水库为龙头和总指挥部，相继有密云水库、海子水库、金海湖水库等十余个大中型水库开工建设。为了实现大跃进，牛口峪水库是边设计、边勘探、边施工的。工程指挥部由城关公社社长马岱森任指挥，副指挥有安沛云、刘满贵、傅长兴、李正斋等人。指挥部下设工程科、后勤科、卫生科分管各项工作。工程科是个大科，由年仅23岁的水利局干部翟鸿儒任科长，负责施工技术、工程质量监督、施工土石方统计计量、供电、施工机械等，最多时有一百多人。当时全周口店区已经实现公社化，调动人力物力实行“共产主义”（即后来所说的共产风）。城关公社受益为主的水库，却调集了除城关公社以外的石楼、周口店、黄山店、岗山公社的民工组建的兵团参战，平时有五六千人。还经常组织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参加义务劳动，最多时有近万人。工地上彩旗飘扬，机器轰鸣。大喇叭里不断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等歌颂三面红旗的歌曲，以及工程进度，好人好事等鼓舞人心的现场采访稿件。通过参加水库工地劳动，深受水库宏伟蓝图和热烈劳动场面感染的房山中学高中二班学生张广文还编写了一出名为《牛口峪水库畅想曲》的广播剧，和同学们抓紧排练后，由周口店区人民广播站录制，在全区的广播网中播放。

牛口峪水库的施工，比一年多以前的丁家洼水库有了很大进步。砂石土方的运输虽然还是人力为主，但肩挑人推变成了全部用双轮手推车，运到坝脚后再用皮带输送机送到坝顶。由于密云水库统一调配，大坝的碾压也用上了羊角

碾和链轨式拖拉机，工程质量提高，工程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取土在顾册村西，取沙在南关外的西沙河边，到大坝都有近千米的距离。工地是三班倒，城关附近的民工可以回家，其他几个兵团民工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安营扎寨，吃的是共产主义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为了有一个大跃进的速度，指挥部给每个兵团都下达了每个班必须完成的土方上坝指标。本班如果完不成，兵团负责人就立即被叫到指挥部挨训。因为不许影响下一班的施工，所以不能用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补任务，只能在自己下一班工作时间内用多拉快跑的办法弥补。一遇这种情况，兵团负责人都急红了眼，紧紧盯在施工现场督战，就连拉屎撒尿都催促着快点。

随着冬季的来临，天寒地冻，施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大坝建到十米左右时，粘土送上去，虽然按规定碾压，密实度取样却总是达不到标准。指挥部决定取掉这层粘土再上新土，可还是不行。指挥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急得团团转，工程陷入停顿。情况报告给区委书记李明和区长曹庶民，经过向上级请示汇报，密云水库总指挥王宪同志带着一位纪总工程师来到了牛口峪水库工地。经过一番考察研究，认为在零下十度左右，粘土均质坝施工如果没有保温措施就不能进行。搞工程不能光靠热情，还要讲科学，想继续施工就要修改设计。纪总工程师和设计单位代表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把原设计的粘土均质坝，改为前面为粘土斜墙坝后面为砂土重力坝的组合坝，施工得以继续进行。

经过一个秋冬的施工，转眼到了1960年春天，主坝达到了15米的高度，1、2、3、4号副坝的清基也基本完工。1959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急躁冒进等人为的工作失误，苏联的逼迫还债，终于压过了人们大跃进的热情。水库建设资金几乎告罄，粮食短缺，农村也到了春播大忙季节，曾经轰轰烈烈上马建设的牛口峪水库也终于被迫停工下马。民工队各自打道回府，施工机械交回密云水库指挥部，工程指挥部也宣告解散。水库设了一个留守处看守大坝，由原工程科部分人组建的城关公社水电管理所兼管。周口店区也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直至十多年后，水库第二期工程才重新开工。

牛口峪水库第一期工程是由北京水利发电学校的师生设计的。原设计主坝一座，长237米，高35米；副坝5座；设计库容1000万立方米。由于水库上游直接控制流域只有23平方公里，汇水远远不够。就同时设计了在周口店公社山口村附近修一道拦河坝，并修一条长2260米的引水渠（包括一条隧道），把长沟峪河和周口店河上游的水引入水库增加库容（拦河引水设计最终也未能



实施)。下游则修一条经过南关的东干渠，准备引水库的水灌溉城南一些村的土地。由于工程仓促上马，出现不少违背科学的作法，是个典型的“三边工程”。尤其选择库址的先期勘察工作没有做好，留下无穷后患。水库在 1972 年重新开工进行第二期工程，原设计又作了修改。经过勘探查明，水库库区地质结构相当复杂，是个严重的漏库。直至 1974 年第二期工程完工并移交燕化公司作为污水存蓄库时仍无法解决。其存蓄的污水污染了下游的河道和地下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环境损失。水库工程虽然完工并投入运行，但始终没能按原设计初衷发挥预期效益。

# 丁家洼水库建设追记

张广文

出房山城北门，沿一条土路向东北走四五里路，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丁家洼。村前绿树掩映，村边小河潺潺，村后有一座十多米高的崖壁，一年四季流水不断，形成一道瀑布，下面是一个深潭。

连接瀑布上下游的丁家洼河，汇集上游羊耳峪、歇息岗、东流水等二十多平方公里的水流，向下流经饶乐府、马各庄等村汇入大石河。丁家洼河是自然河道，虽然流域不大，但丰枯水年流量相差很大。早年下游断流。每当下大雨，丁家洼以下河道河水漫溢，冲毁农田和路基。一遇山洪暴发，京周公路马各庄村边的漫水桥水深逾米，水流湍急，行人和车辆均不能通行。

1957 年底，农村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陆续转为高级社，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加强农田灌溉，减少水旱灾害，争取粮食稳产高产有了迫切愿望。房山县委县政府和城关镇，把大兴水利的起点定在了修建丁家洼水库。这是当时的房山县开工建设的第一个水库。县水利科科长郝志远和城关镇镇长马岱森组建了水库建设指挥部。水利科干部翟鸿儒当时正在河北省高阳水利干校学习。春节回家时，县长王新华找他谈话，让他担任水库工程技术负责人，他说学习还没结束。王县长半开玩笑地说：“还学什么？赶紧上水库吧，等学习完了，共产主义都建成了”。于是，翟鸿儒春节过后没再回干校，就开始筹备工程了。

工程未动，设计先行。可指挥部交给技术组的“工程设计”实际上只是两张主坝和副坝的纵断面图，是清华大学的两个学生绘制的。直到水库建成，技术组也没见到过设计单位的代表。技术组就凭这两张图纸开始了打桩放线，清基施工。丁家洼水库设计为小 I 型水库，总库容 110 万立方米；主副坝为均质粘土坝，主坝长 65 米，坝高 15 米；副坝两座，总长 400 米，坝高 7 米。为防止上游大量泥沙淤库，又在上游设计了一座长 30 米，高 2 米的拦沙坝。水库下游修建水渠名为幸福渠，喻意给予下游各村人民带来幸福生活，水渠可灌溉 5000 亩土地。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工程于 1958 年 3 月正式开工。民工都是城关镇各村的社员，每天三班倒。上班时自带干粮，自带工具，有的推着自家的独轮小推车，换了班就回家。工程开工后，正值房山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实现 1958 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的号召。四月份，国务院又决定将房山县与良乡县合并，从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建周口店区。工地上的干部群众更加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大坝距取土点有四五百米远，几万方的土方运输全靠小车推，大筐抬。那时没有碾压机械，每上一层粘土就用人工夯实。所用的夯就是脱粒轧场的碌碡，绑上四根大木杠，每个足有二三百斤，八个人一拨喊着号子打夯。工地上红旗飘扬，号子声此起彼伏，“高高举呀，唉嗨哟喝！加劲干哟，唉嗨哟喝……”技术组人员则深入各施工场地，认真检查施工质量。人员少，任务重，就昼夜不离工地。累得实在不行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有一次，技术组长翟鸿儒竟然累得在抽水的胶皮管子上睡着了。

在水库建设的同时，丁家洼村搬迁后的新村建设也开始了。缺少建房的木材，马镇长就带人到田各庄村去砍树。为了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显示大跃进成果，指挥部还决定在新村的南边建两栋三层楼房。不过，因为设计缺乏科学态度，施工水平低，又用了大量的湿木头，楼房盖成后没风光几年就成了危房，不敢住人了，最后只好拆掉了。

经过全体干部和民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奋战，水库的主坝副坝只用了四个多月，就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封顶蓄水了。全部工程也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的 11 月份基本结束。但是，在修建放水涵管的消力池时，设计和施工缺乏科学性，是采用大块条石衬砌，蓄水位提高以后压力加大，条石缝开始渗漏，甚至有的地方喷出水来。以至第二年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在池子内壁再衬砌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才解决了问题。上游的拦沙坝虽然按设计建成了，并且很好地发挥了作用。但后来的事实证实是设计标准低了，只运行了 13 年就被泥沙淤平。于是在 1972 年整修水库时，又在其上游 200 米的地方新建了一座长 35 米，高 7 米的新拦沙坝担负拦蓄泥沙的任务。

丁家洼水库建成初期，很好地发挥了蓄洪调峰、灌溉农田的作用。燕化公司在其上游流域大规模建设后，水库失去原有作用，成为了拦蓄污水的水库了。但丁家洼水库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和显示社会主义风采的丁家洼新村，在当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房山县第一部纪录片电影《跃进中的房山》中得到充分展现。电影放映后，给当时正在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的周口店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很大的鼓舞。

# 天开水库的修建经过

魏志华

天开水库位于我区原岳各庄乡天开村的西北部、夹括河南支流牯牛河的中游，距京张公路 3.5 公里。这个水库由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设计，由原来的长沟公社（包括现在的韩村河、长沟、大石窝、张坊 4 个镇的范围）组织施工。因施工时以民兵为主，故又叫“八一水库”。这个水库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

天开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48.5 平方公里，总库容 1475 万立方米。防汛标准按 50 年一遇设计。主体工程有主坝 1 座、副坝 1 座、放水管 1 处、溢洪道 1 处。主坝位于天开村西大石槽处，为粘土斜墙坝，长 250 米，顶宽 4.5 米，坝顶高程 93.2 米，防浪墙高 1 米。副坝位于库区东面古河床处，为均质土坝。长 800 米，坝高 9 米，顶宽 4.5 米，坝底高程 93.2 米，防浪墙高 1 米。放水管位于主坝体内左侧，为钢筋混凝土压力圆管，内径 0.8 米，长 110 米，进口底高程 73.7 米，最大泄量每秒 4.1 立方米。溢洪道位于主坝右岸一侧，是利用两山间自然垭口人工开挖的明渠，底部高程 87.5 米，溢洪水深 5.2 米，最大泄洪量每秒 1260 立方米。

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平均日出工 5000 人，从 1959 年 11 月初开始，经过 150 多天，到 1960 年 4 月基本完成主坝、副坝、放水管和坝前铺盖 4 项工程。共完成土石方 39.87 万立方米，用人工 66.6 万工日，投资 82 万元，水库基本建成，并于当年汛期开始拦洪蓄水。

1960 年 4 月，由于已到农忙季节，加之经济发生困难、公社组织机构的变化，民工相继撤离水库，有些工程没有完全达到标准。溢洪道未动工。1961 年 6 月大公社解体，原长沟公社划分为赵各庄、五侯、天开、长沟、南尚乐、张坊 6 个公社。未完成的工程由县水利部门与有关单位陆续组织施工修建。1961 年首先修环库路，解决天开村至孤山口村进山交通问题。环库路由天开村西经副坝北上，转至孤山口村，全程 3 公里。沿途有桥涵 3 座。1970 年，由县交通部门铺设沥青路面。1964 年加高主副坝达设计标准 93.2 米。1972 年为增加溢洪道的泄洪能力，提高水库的泄洪安全标准，开挖溢洪道工程、按

底部高程 87.5 米、底宽 20 米的标准开挖，长 135 米。共开挖土石方 1944 立方米。1961 至 1972 年，还对主坝迎水面干砌石护坡进行砂砾料灌缝，使主坝 85 米高程以下的护坡质量有显著提高。同时完成主、副坝防浪墙砌筑，建主副坝护坡排水沟 50 条。至 1972 年底，水库工程日趋完善，水库扫尾工程全部完成。至此，建库投资 112.94 万元。

天开水库的主体工程只用了半年时间，为什么修建的速度这么快，主要措施是：

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区委（1958 年到 1960 年房山县改为周口店区）、长沟公社党委对修建天开水库极为重视。派了几十名干部到天开水库工作。各管理区（长沟公社当时包括赵各庄、五侯、天开、北正、甘池、南尚乐、石窝、下滩、西白岱 9 个管理区）都有 1 名副书记或副主任带队。为了加强领导，各负其责，层层建立了领导机构。水库设指挥部，总指挥隗合龙（长沟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主任），政委赵振荣（房山县兵役局政委）。副指挥有田志丰、胡焕贵。下设办公室，主任李万成，组宣科科长鲍振东、副科长杨春荣，后勤科科长段中、副科长宋士祥，保卫科科长白秀德、副科长韩继敏，工程科科长田志丰、副科长刘兴周。指挥部下设三个民工团（因当时长沟公社有天开水库、三八大渠两大水利工程、有的管理区以三八大渠为主，到天开水库的人少，所以几个管理区设一个团。管理区设营，村设连）。党的组织，指挥部设党委，管理区设总支、村设支部。做到责任明确，层层负责。指挥部设在天开村内。为了指导及时，在水库工地建一个指挥棚，指挥部的领导和办公室人员轮流在指挥棚值班，24 小时不离人。

深入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为了发动群众，除通过会议对民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形势教育外，还组织几个通讯报导员，深入到工地、工棚，了解好人好事，通过水库战报和广播，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表扬。每月水库还办一次文娱晚会，活跃文化生活。同时，他们还经常开展以“五比”（比学习好，比工效高、质量高，比增产节约，比技术革新，比安全）为内容的竞赛活动，使民工的生产情绪特别高涨。工地上热火朝天、夜里灯火通明。寒冬腊月，甚至大雪纷飞，大部分民工都脱掉棉衣，还有不少人光着膀子往坝上拉石推土。平时是昼夜三班倒，突击任务时，几天几夜不休息。1960 年春节，大年初一，干部和民工都没有休息。在工地上吃饺子。1960 年 3 月，担心汛前大坝建不起来发生问题，各管理区党委书记又亲自带领村里的社员去水库支援，最多时工地上到 7000 多人，突击一周，加快了速度。

加强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水库开工以后就建立了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明确任务，层层负责。指挥部对管理区、管理区对村，实行“五定”（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劳力、定工具），通过竞赛，提高了工效，加快了工程进度。

大搞工具改革，保证物资及时供应。修水库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除几辆拖拉机外，就是靠人工和小推车。冬季干活，天寒地冻，工具和车辆经常坏，为保证及时供应，节约开支，水库建立 5 个修配组、138 名技术人员，做到随坏随修。而且他们还反复研究，搞技术革新，开工后 1 个多月就把 2300 多辆单轮车改为双轮车。还搞了 200 多米长的土高线，运送粘土和砂石料，大大提高了工效，加快了工程进度。

培养技术队伍，严格质量要求。水库建设是百年大计，因此一开始各级领导对质量就很重视，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水库开工前，北京市政设计院给水库培养了 6 名化验员。密云水库又派了质量控制技术干部，建立了质控站。市里又派了水利技术干部沈永全到水库帮助指导。水库总的技术负责人是县水利局的技术干部李学文，各管理区也配有 1 名技术员。他们长期在工地上检查指导，严格把关，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960 年 1 月，主坝开始垫粘土。可是由于夜里冻，白天化，加上压得不实，上到 6、7 米高的时候，发现有的地方下沉。发现后立即停工，检查原因，研究对策。经过领导和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决定将粘土改为砂石料，效果显著，保证了水库的质量。

天开水库不仅受区委、长沟公社党委的领导，而且还受密云水库的领导。天开水库指挥部政委赵振荣和办公室的赵文瑞每月都要到密云水库汇报一次。市委领导、密云水库总指挥王宪、王玉忠和房山支队的领导吕镒、胡汉文，都亲自听汇报，对水库建设，特别是工程质量，提出具体要求。1960 年初，水库进入紧张阶段，还派胡汉文同志到天开水库亲自坐镇五六天。

抓好后勤，安排好民工生活。天开水库的建设，前一阶段基本上属民办公助。指挥部的开支、购置设备、外购砂石料等，由区和长沟公社解决。民工没有工资，回自己的生产队记分。吃饭也由各管理区、大队自己解决。区和公社给予适当补助（每人每天补助 5 角钱），生活比较艰苦。民工一部分住在天开村和西周各庄村群众的民房，一部分住在工棚。为了安排好民工的生活，尽量吃饱吃好，指挥部和管理区都有专人抓生活。各管理区设伙房，24 小时有饭，民工到时能吃上热饭。各管理区都设有保健室，检查卫生，预防疾病，有伤有病能及时治疗。因此，在水库建设中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各管理区的党委书记

经常带人到水库慰问。1960年春节，民工没有休息，各管理区到水库慰问时，都带了猪肉、羊肉、蔬菜等，给民工改善生活。1960年3月份，区委书记李明、副书记刘永国、张革夫等同志也到水库检查工作，慰问民工，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

天开水库的效益和问题。天开水库于1960年建成并开始蓄水以来，主要是起了汛期拦洪作用，有效地保护了下游5万人口、3万亩地的安全。水库修建前，每年遇到洪水、水库下游牯牛河两岸的五侯、东南章、西南章、七贤、韩村河等村的土地、房屋被冲被淹，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损失。同时水库下边龙门口村东的京张公路，也经常被洪水冲毁，中断交通。修水库后，这些问题已根本解决。1963年当年降雨573.5毫米，水库蓄水水位达到85.36米，蓄水量376万立方。1979年降雨734毫米，最大日降雨量106.8毫米，8月份水库蓄水水位86.5米，蓄水400多万立方，是建库以来蓄水最多的一年，下游各村也没有发生问题。其次，水库建成后，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水库的副坝坝顶成为天开村的田间道路，平坦方便。1961年建成环库路以后，水库的副坝坝顶成为进山的交通干线，方便了山里山外的经济往来，也促进了上方山旅游业的发展。

当时水库的主要问题是渗漏严重。水库修建前经北京市政设计院的地质调查、勘测，提出了漏水问题。经当时市、区领导研究决定，水库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水库的立体工程，而后再采取措施解决漏水问题。事实证明，库底漏水是严重的。一般年份，水库蓄水30至50万方，一个多月即漏干。1963年和1979雨大，水库蓄水多时，水库下游的天开村的一部分水井水位上涨，街道多处发现滞水地带。有的群众屋内炉坑积水，有的群众土炕坍塌，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近几年来，由于连续干旱，雨量很少，根本蓄不起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水库的渗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天开水库基本上是个干库。

1960年水库竣工后，成立了管理所，开始归长沟公社管理。1961年大公社撤销后归房山县水利局领导，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有干部、技术人员4人。历任主任是：王金贵、刘井林、康英、张俭、隗合录、雷祥林、王文福、蔡贵臣。

# 房山特产磨盘柿

王绍清

柿子为柿科乔木植物的果实，属无核鲜果，品种浩繁，家族庞大。房山的盖柿，河北的莲花柿，安徽的铃灯柿，陕西的鸡心柿，河南的红柿等皆为柿中之名品。房山的盖柿品质、产量居全国之冠。

盖柿，俗称磨盘柿，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1992 年，房山盖柿荣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证书，2001 年，中国果品协会命名房山磨盘柿为“中华名果”。磨盘柿树是以黑枣树苗为本，选用优质磨盘柿树枝，远源嫁接而成。产地主要在拒马河、大石河沿岸及浅山丘陵地带，海拔高度约在 200 米至 600 米低山处。房山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区，山区与平原气候有明显差异，平原年均气温为 11.6℃，山区为 10.8℃，1 月份山区最低温度月平均 5.0℃，7 月份山区最高温度月平均 24.4℃。年均降水量山区 645.2 毫米，山区年均风速 1.8 米/秒，年均大风日山区 12 天，最多为 31 天，最少为 5 天。土壤大部为棕壤褐土，呈微酸性，无霜期 201 天。据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十渡测点观测，1983 年至 1987 年物候资料载：“柿树，芽始膨大（平均日期）4 月 6 日，始花（平均日期）5 月 18 日，落叶末 11 月 7 日，布谷鸟始鸣 5 月 10 日。”

磨盘柿在这种优越自然环境下，生长期为七个月，柿果大如拳，甜如蜜，口感别具一格。据史料载，明成祖朱棣将其封为“宫廷御用贡品”。明末清初，房良商业兴起，成为京都果品产地。张坊地处龙安、河潞、大峪岭等几条山沟的出山要道，是房、涞、易等地山货及干鲜果品集散中心，民众称之为“张坊城”。除经商外，张坊小镇与其他城镇商业不同之处在于出租土地，兼营借贷。春季看柿花坐果借给贷款，秋季柿子成熟廉价收购，就地装筐，驰运琉璃河，装船运往天津。民间流传“布谷叫，柿花开，指花借贷，买布换衣衫”的口头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仍把柿子作为“出口”商品（出边区即为“出口”）。商贩按沟看果包销，以物易物，双方商定在封锁壕外交换实物。

新中国成立后，房山县人民政府、房山县供销合作总社为发展林果，采取了多项措施。1951 年，委托南尚乐、下庄、水头的彭德山、崔少岩、田永恒



三户，培育黑枣树苗（嫁接柿子）10亩，每亩奖谷260斤。上世纪50代中期，在广录庄、南白岱、塔照诸村大面积发展柿树，由供销合作社收购，经周口店火车站运往东北延吉等地。1958年后，首都市场对瓜果的需求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要求质量高，供销合作社果品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促进了干鲜果品生产。1960年5月，北京市对十二种农副产品按交售数量实行粮食和其他物资奖励。1971年，粮食部门对山区产果队采取粮果双定产的办法，对果粮双超产、完成果品交售任务的生产队，社员口粮按邻近余粮队的标准，由粮食部门供应；对果粮减产，没有完成任务的生产队，社员口粮低于邻近余粮队标准供应。1980年起，对山区产果队的自产小麦，除留种子外，每人供应30公斤，1984年供应到50公斤。果林面积达2.85万亩，柿树63.31万株，产柿1517.60万公斤。1985年后，果品经营改为自由购销，价格随行就市，有升有降，产销直接见面。

这时的房山盖柿已经畅销京津及东北延吉等十七个市县。柿秋时节，千里客商云集张坊、河北等地，柿树下成交。张坊的大峪沟在唐朝时已有人家居住，称大峪口，每逢秋季，这里柿树果实累累，犹如彩灯悬挂枝头，柿香飘于沟外，享有盛誉。

自1949年至1990年，供销合作社为全区果农购销大柿子56679.4万斤。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走出新路，在张坊、十渡建立两个磨盘柿专业合作社，社员近千户。2002年秋天，市供销社主任符敬群，房山区政协主席游来柱曾陪同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亲临张坊考察。



房山以盖柿柿种为大宗，并有少量传统品种，火

柿、灯笼柿、忤桃柿和引进的甜柿富有、次郎等品种。故房山的柿子有浑汤、清汤，皮薄、皮厚之分。河套沟（河北镇地区）的柿子皮薄，汤呈橙红色，甜度高；河潞沟（张坊、十渡地区）的柿子皮厚，汤呈橙黄色，适宜远运冬储。

2002年秋，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前排左二）在区政协主席游来柱（前排左三）陪同下，考查张坊镇磨盘柿生产基地（王绍清提供）

柿子的吃法有多种,除红柿外,还有溲柿、柿饼等。溲柿,主要是去除涩味,食之甘脆如梨,而又远非梨子可比。霜降节前,摘柿入缸,加温水,数天即可。如在露天,秋夜较寒,晨起在缸外用文火烘,掌握火候十分重要。汤大、汤小均不适宜。霜降节后的柿子不可再溲,因霜降节后柿心开始糖化(软),民间有“霜降不溲柿”之说,即指此。解放前,饶乐府的九月庙会溲柿的销售季节。此时,柿子摆成小山,有的商贩再用麻绳将山里红串三、五十个不等,悬挂在柿堆旁,溲柿、山里红交相辉映,眩人眼目。

清末民初,因交通不畅,山区柿子不能及时运出,有的村民就将柿子切干,或制成柿饼、柿脯,经日晒,外观霜白,口感软、绵、沙、甜,糖分高达6.52%,10斤柿饼相当于8斤面粉,或8.5斤大米热量。柿子不愧“木本粮食”之称。1952年前,每年阴历三月初一至初三的顾册庙会,是销售柿饼的黄金时节。十里八乡的农民都来赶庙会,在购置小型农具如铁锹、镐、杈子、笤帚等后,顺便给家人带回一串柿饼。顾客选好柿饼后,用大铁针系上麻绳串成串,大串可达10斤,手提不掉,故有“麻绳串柿饼不掉个”之说。

柿子经阴处冬储,立春前后食用,清甜爽口。解放前,房良地区小食摊以柿汤为主,柿舌、大杏干加鲜藕混和在一起,添加桂花香料,制成“什锦柿汤”。每年正月初二至三月末,是销售“什锦柿汤”的季节。房山南门外东侧马记“什锦柿汤”制作精细,与众不同,是为佼佼者。三种主料分别放入磁盘内,杏干用少许冰糖浸泡,鲜藕用花刀切成条,撒上绵白糖,柿汤、柿舌选用大个的磨盘柿。马记摊主手打小铜碗,边卖边哼唱着莲花小调,歌词大意是:“大峪沟的柿汤甜如蜜,柿子舌头香又脆,南窖的杏干黄又酸,贾河的鲜藕白又脆,您喝了我的柿子汤,保您健脾又润肺……”,堪称当时一景。

柿子可加工柿酒、柿醋、柿粉,还是不可多得的良药。柿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可溶性糖16.3%,粗蛋白0.7%,含维生素、胡萝卜素、淀粉、果胶以及钙、磷、铁、钾、钠、碘等矿物质和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柿……其味甘而平,性涩而能收,故有健脾涩肠,治咳止血之功。”

经常食用柿子,有清热、润肺、止渴、祛痰、镇咳等功效。适用于慢性气管炎、高血压、动脉硬化、痔疮出血、大便秘结等症。

柿饼,性味甘平,能止血、止泻、止痢。

柿霜是柿子表面渗出的白色粉末,内含甘露醇、葡萄糖、果糖、蔗糖等,性味甘凉,入肺胃经,有清热消炎、润燥之功。又可医口舌生疮、咽喉肿痛、气管炎等。

柿蒂，性味甘苦，内含鞣质、三萜烯酸、桦树脂酸、莽墩果醇酸等，可治呃逆、恶心等。

柿叶，性味涩平，含黄酮甙、酚类物质、类脂香豆素、挥发油、有机酸和丰富的维生素 C，有抗菌消炎、止血、降压等作用。柿叶茶近年在日本风行，认为有防病益寿之效。现代医学研究认为，饮柿叶茶可清热解毒，防止动脉硬化和失眠。

柿子美中不足的是含鞣质，有涩味，遇酸可凝结成块，与蛋白质结合产生沉淀，吃多了或空腹食用，或食用未削皮的柿子容易和胃酸结合凝结成块，滞留胃里，难于消化，发生腹胀腹痛、呕吐等现象。另外，与蟹同食会胀痛吐泻，酒后食柿易醉而沉睡，或胸痛。鞣质易与铁结合妨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故贫血者不宜食。而且柿子不是年年丰收，民间有大年、小年之说。区果品协会为均衡上市，采取及时加水加肥的办法，初步改变了这种现状，取得了一定成效。

# 1962 年参加出国援阿建设的经过

杨健生 口述 刘振祥 整理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两国分歧明显，开始对立，阿尔巴尼亚党站到了中共的一边。我国对阿尔巴尼亚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

1962 年初，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我国参观访问时，对良乡文具厂生产的金鸡牌粉笔很感兴趣，就通过大使馆提出：能否从中国派专家帮阿建设粉笔厂，解决该国文化用具匮乏的困难。我国政府立即答应，并及时与国家二轻部、北京市二轻局联系部署，通知所属单位进行准备。

不久中共房山县委工交部、房山县工业局通知良乡文具厂书记李学智、厂长李吉唐确定人选，我当时任该厂粉笔车间主任，就被选为出国援阿人员。

当时出国还是个很严肃的工作，个人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等政治表现等等都要经过严格地审查才能确定的。可想而知我也是经过严格审查才定下来的。随后，北京市二轻局一位负责同志通过组织到我们文具用品厂找我谈话，当时很神秘。她说明来意，说明出国援阿的重大政治意义，问我能否去，有什么困难等等。当时厂内经常组织我们干部工人学习时事政治。党中央、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的事变评价，使我们干部工人懂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能响应党的号召，出国援阿是个十分光荣的政治任务，我当时的态度是：“服从领导的指挥，帮助阿尔巴尼亚去建粉笔厂，不存在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谈话结束时，叫我写了一篇关于建粉笔厂生产粉笔的材料，交给了二轻局的傅月明。

很快，北京市二轻局通知我去学习一周。当时住在轻工部招待所，主要内容是出国应注意事项、外交礼节等等。参加学习培训的二轻局系统共 20 多人，主要是制作梳子、牙刷、粉笔、服装、纽扣、刨花板等产品的各行各业的生产者。学习结束后，国家给每个出国援阿的人员，做了一套呢子大衣和一身工作服。傅月明为我们到机场送行。

1962 年春，我们一行 20 多人从北京乘飞机至乌兰巴托，稍稍休息后，继

续转飞行到莫斯科机场，休息一夜。第二天下午，我们乘坐的图 104 飞机到达阿尔巴尼亚。

到阿后，我们住在中国驻阿大使馆。三天后，由使馆一等秘书统一安排，阿有关单位到使馆与我们见面。我被安排到一个距阿某海港不远的某镇的一个小厂，准备在这里建粉笔厂。这个小厂条件很差，厂房很简陋，基本上和我们在国内白手起家办工厂差不多，大使馆派来一名留学生给我当翻译，厂里选派 4 名学徒工（两男两女），这样就开始了建厂工作。当时制作粉笔的原材料主要是石膏石。经化验，当地的石膏石可以使用。有了原料，第二步就是准备生产粉笔的模具。由于时间紧出国时没有带，也没有料到这里没有模具而且也无能力制造模具，这是生产粉笔的主要的关键设备。为此，马上告知大使馆，请他们转告良乡文具用品厂，迅速生产一套制粉笔的模具送来。当时，我随身只带来两片制粉笔的模具（一套模具由 24 片组成）可以试验性生产。在等设备期间，用两片模具搞试验。生活上，一切均由大使馆帮助解决。我和翻译二人在厂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吃饭，每周回使馆一次汇报工作进度和出现的问题。这时正当国内吃定量三年困难时间，出国在阿不论是在厂或在使馆，都是管吃饱，虽不十分丰盛，比起国内还是强得多的。

两个月后，粉笔模具转送到阿尔巴尼亚。工人们见到一套套全新的模具都十分高兴，立即投入了成批量生产。生产白粉笔成功之后，第二步又为他们研制生产出红、蓝、绿、紫等彩粉笔。据他们厂负责人讲，这个小厂所生产的粉笔就够他们全国使用的了。对我们的全方位的帮助，阿方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

从 1962 年的春天到秋天，历时半年的时间，我把帮阿建厂、搞原料、搞模具、带徒工传授技术、生产成果、群众反映等等，写成书面材料交到大使馆。使馆二秘找我谈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与使馆了解的情况完全一致，并告诉我，整理的文字材料将存入档案，转回祖国交给有关组织。

任务完成后，已是秋天，有些冷意了。我们一行穿着国家给做的呢子大衣，从阿尔巴尼亚乘飞机转飞到莫斯科，第二天便回到祖国。在机场送我们走的北京市二轻局的傅月明同志又来机场接我们。第二天，我回到我厂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表扬了我圆满完成了援阿这项光荣任务。

在阿尔巴尼亚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感受是离开了祖国想祖国，离开了亲人想亲人。大使馆就代表着祖国，当时我就把大使馆看成是祖国、是母亲，最亲的亲人，我们像孩子一样，一切的一切都有大使馆为我们料理和安排，就像在家中一样；再一个感受就是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出国援阿，有着一一种光荣

感和强大压力，从出国那天起，就下定决心要求自己，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要求自己，要为祖国争气，为祖国增光，要在援阿过程中，要比在本厂拿出更大的干劲，负起更大的责任。圆满完成援阿任务，对于这些我感受到了，也如实地做到了，向祖国、向有关领导和组织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 我在工口八年工作的回顾

刘振祥

原属河北省通县专区的房山县、良乡县，于1958年4月合并划归北京市所属范围，定名为周口店区。我原在中共良乡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合并划市后，我继续在中共周口店区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不久，于1958年下半年我又调区委工交部工作，从此以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整整八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工口办公室作资料工作，许多情况至今仍记忆犹新。



1959年5月，中共周口店区委工业部全体同志合影（刘振祥提供）

原两县均属河北省的农业县，以农为主，工副业是次要地位的配角。农业合作化后，为了支援农业和解决农业缺少现金收入的问题，搞了些与农业有关的小农具修制、农产品加工、马车运输等工副业。当时县里主管工业的部门和领导，总觉得县领导对工业抓的少，有时汇报工业工作，常常排不上队，很有怨言。划归北京市后，全区情况大变，从思想、组织、发展、管理等方面，都较前有了个突出的重大的变化。

第一，北京市作为全国的首都，是以城市建设，发展工、商业为首要地位，因此对工业工作特别重视，对区县委要求非常严格，这是个首要的变化。

第二，在领导力量上、组织领导上，市工口有个强大有力的阵容。除市委经常抓工口工作外，还从组织上有了可靠的强有力的保证。市委副书记郑天翔作为工业书记，主抓全市的工业工作。为了加强对郊区县工业工作的指导，市委工交部内设立了郊区工业处，由刘洪波任处长，由原通县专区抓各县工副业的主要干部为市委郊区工业处的成员，专抓区县工业工作。有时由部领导带队，深入区县了解推动区、县工业工作。副部长叶子龙就曾几次带领郊区工业处的同志到周口店区检查指导工业工作。为了市委市政府协同全力抓好全市的区、县工业，市政府相应的成立了区乡工业办公室。

第三,为了加快实现区乡工业化,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市内城区的一批企业,下迁到市内各郊区县,由各区、县直接领导,这对加强区、县工业的基础,促进区乡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第四,市委对全市工业包括区、县工业在内,每年召开两次有企业领导(书记或厂长)直接参加的市委工业工作会议。年初部署,年终总结,交流经验,解决问题。每次都请彭真同志到会讲话,能直接听取高级领导的讲话,对广大工业干部,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共周口店区委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部署,坚决迅速的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第一,教育全区各级干部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适应新形势,要努力学习,把发展区乡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把抓工业像抓农业那样,列为区委书记处的重要议事日程。当时区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是李明,副书记刘永国主抓农业,副书记张令德主抓工业。为了更好地协助区委抓好全区的工口工作,在区委领导下建立健全了区委工交部的专门办事机构,由区委常委秦芝儒任部长,马成琪任副部长,史维义任工交部秘书,干事有刘振祥、张俊卿、王少清、朱增志等。三年困难时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财贸部取消,合并为工交财贸部,部长始终未变,又增添了赵福林、胡长存两位副部长。1960年以后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李明书记去世后,霍梁担任第一书记。县委工交财贸部主管工作的范围扩大了,任务加重了,除了农业、政法、文卫外,其余工业、交通、邮电、供电、建委、商贸、金融等均属工口范围。

为了便于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区委、区政府建立了区乡工业办公室,办公室由工口所属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主任由工业局副局长隗永高担任,副主任由工交部秘书史维义担任。办公室主抓工业发展、管理、外协、上报下达等工作。

为了上下一致,迅速落实市区委有关工业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各大公社也相应的加强了组织领导。公社内确定一名副书记为专职工业书记,下设工业部,一般由3至5人组成,负责抓好全公社的工业工作。

第三,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区乡工业。

根据市委的指示和房山的具体情况,建起了一批农具修造、煤炭、建筑材料、服装、地毯、印刷、综合加工厂等。

同时,区委抓住机遇,努力争取尽量多的市下迁厂来我区安家落户。当时



还处在大跃进的年代，上下一致，工作好做，阻力较小，像办喜事一样，欢欣鼓舞迎接下迁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批新企业在我区建立起来，为我区工业增添了新血液，大大推进了我区区乡工业化的进程。

当时下迁到我区的企业有：三星棉织厂、陶瓷涂料厂、文具用品厂、红旗轮胎厂、塑料制品厂、胶布雨衣厂、服装一厂、35 缝纫社、韩继铸锅厂、废品回收公司、草绳社、窗纱社、瓦井化工厂、化工四厂、牛角社（后改电器厂）。另外市属建材局寰店砖瓦厂、周口店灰石厂等除业务关系不变外，其他党政干部管理、生产竞赛、检查指导均由区委负责。这些大大加强了我区的工业实力。几十年来，成了我区的骨干企业。

从两县合并到文化大革命的八年中，工口工作以工业局为龙头，带动所属工口和部门共同发展前进。区委区政府对于工业局的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为了上下对口，适应大发展的形势要求，工业局下设冶金科、建材科、轻工科、小农具科、社办企业科、小煤窑科、供销科、财务科、人秘科、办公室。随着形势的发展，区直机关设立了农机局、社办企业局、物资局、地方煤炭公司等区属单位，才减轻了工业局的工作任务。

为了搞清全区地下矿藏资源，在市地质局的指导下，我区还建立了地质队，划归工业局领导，地质队由傅清明任队长。除集中总结汇报工作外，常年战斗在深山老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普查，对全区矿藏有了初步的了解，主要有：煤炭、白云石、石英石、石棉、石板、铁矿石、草炭、大理石等几十种矿产品，为就地取材有的放矢的发展全区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 1958 年到文化大革命的 1966 年的八年历史时期，虽也走过一些弯路，如“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放卫星创高产，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粮等，工业战线还发生过大搞超声波，滚珠轴承，特别是大搞炼铁，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这些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行动，曾造成严重的损失。后来，房山工业方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实际问题，战胜困难，在前进中继续发展壮大起来。全区经过 1958 至 1959 年两年的跃进发展，在平原地区已实现了区乡工业化，全区工业总产值已超过了农业的收入。我区工业在全市郊区县中一直处于前列位置，多次受到市委领导的表扬。在中央、市委和区委指示精神鼓舞下，工业战线大干、苦干、巧干，努力拼搏，向上级交了比较满意的答卷。房山生产的大理石、白云石等建筑材料，为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建设做出了光荣的贡献。区乡的农具修配工厂为农业生产解决了农机具的问题。地毯、粉笔、墨盒、石板等出口产品，为出口创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房山工业不但在经济发展上一处处在全市郊区县的前列，而且还培养锻炼出一批有技术、有觉悟、能打硬仗的骨干队伍，并涌现出一批先进的模范人物。当时，全区的 12 面红旗，工口就占了五面：工业方面有被誉为“心中有五亿农民”的顾册农具厂；邮电方面有被誉为“红色邮路”的铁脚板任成水；商贸方面有被誉为“红色背篓”的背篓商店；农机方面有农机供应站；金融方面有大安山信用社。另外电话员刘秀苹、售货员罗秀玲等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任成水、王砚香被评为全国劳模，他们的事迹被拍成《红色邮路》和《红色背篓》两部电影，在全市和全国范围内放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 从背包社到塑料厂

## ——记房山县第一个出口创汇企业

张广文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少到全国各地出差的房山人，每当给上学的孩子买回一两个制作精美的塑料文具盒，或者带回一把物美价廉的塑料雨伞，到家仔细一看，却发现原来是房山县塑料厂出品。

提起这个产品行销全国的房山县塑料厂，还要从上世纪 50 年代说起，从北京城里说起……

### 艰苦创业

1954 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俗称一化三改）。在这个方针指引下，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全国掀起了“一化三改”的高潮。当时，北京市崇文区和前门区 50 多户做背包生意的手艺人，在李林坡、岳双钧等人联络下，由崇文区手工业联社出面组织，于 1956 年 1 月 15 日正式挂牌成立了“北京市背包生产合作社”。当时主要生产帆布背包，入社社员约 150 人。为了筹集资金发展生产，入社社员要交 3 元手续费，还要交 30 元股金，各家原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作价入社。就这样凑了近 5 万元资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背包社成立之初，理事会主任是由李林坡任，监事会主任是由白继义任，生产理事是由岳双钧任（后来任房山县塑料厂副厂长），财务理事是由阎从周任。合作社成立一个月后，迎来了第一个春节，社员们也第一次拿到了每人 5 元的工资回家过年。

由于资金有限，不能租占更大的场地集中生产，除了把位于东珠市口三里河一处较大的场地作为社址，还有五六个较小的生产点分布在附近的街道和胡

同里。即使是这样的条件，由于组织领导和各项活动开展得较好，产销年利润达到 2 万元，连续几年被手工业联社评为先进红旗单位。

为了响应北京市政府城市工业支援郊区的号召，1959 年 1 月，背包社迁到了刚刚划归北京市的周口店区。新社址在周口店街里一个原来是常姓地主的大院子里，6 个小院一部分当生产车间和办公室，一部分当家属宿舍。职工们从城里初来农村，生活又困难又不习惯。一是不会使用当地的土炉子，二是吃水用水特别不方便。住地附近没有水井，也没有城里那样的自来水，开始时只能吃用一股从小东沟煤矿流过来的水，水很浑，就放一些白矾，澄清了再用。后来才在周口店南门外找到一口可以用的井，井很深，离住地足有一里多地，挑水的人受不了，社里就买了一个小车拉水，开始用人拉，后来买了一头毛驴，又拉磨又拉水。

艰苦的生活条件刚有点适应，三年自然灾害又接踵而至。定量的粮食吃不饱，就吃白薯秧子，吃各种菜，吃玉米皮、玉米瓢磨的淀粉（那时叫“瓜菜代”）。刚从县工会调来的党支部书记杨权是韩村河当地人（后来任房山县工业局副局长），他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搞好生产和关心群众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提出在这样少见的自然灾害时期，社员们应该身体第一，生活第一，要想办法吃饱了再干活。于是到处联系买代食品，磨淀粉，自己冬贮大白菜。还买来小拐磨，给体弱有病的社员供应豆浆。生产也调整了进度，取消了加班和夜班。生活虽苦，党团支部还尽量组织一些文娱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并且在最困难的 1961 年春节前想方设法搞了一次会餐改善生活，让全体社员感到温暖。由于一时间没有了帆布指标，原材料受限，生产也几乎陷入困境。杨权就多方联系，终于从供销社揽到一批活，用土纱（一种再生棉做的帆布）做装粮食的口袋销往农村。经过背包社全体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背包社终于生产生活两不误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62 年春天，背包社又从周口店迁到了县政府所在地的房山城南关，社址在 1961 年因困难停产的棉织厂院内，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为了扩大生产，背包社又招收不少新工人，职工总数逐步达到 300 多人。为了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和不断把一些有技术会管理的年青职工提到班组和车间领导岗位上。经北京政治学校会计专业培训的徐淑兰等一些青年干部也陆续从手工业局分配充实到科室的一些管理岗位上。尤其第五生产小组还创造了既提高产品质量，又提高生产效率的班组管理方法，成为手工业局系统各单位学习推广的样板。组长张楷（后来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被评为 1962 年度北京市劳

动模范，背包社也成为当时房山县的十面红旗之一。

经过几年的努力，背包社生产的背包品种从最早的帆布包、土纱布包，到适应新材料生产塑料提袋，又从单色塑料提袋到 1963 年由鲁宪增、兰祺等人发明的塑料补花工艺，在北京地区首家生产塑料补花背包、提袋（北京日报曾经报道），产品性质有了很大转变。为了准确地反映产品特点和生产工艺，经上级批准，1964 年背包社更名为房山县塑料制品厂。

1966 年棉织厂重新开工，塑料制品厂凭借这次从棉织厂迁出的机遇开始了新一轮创业。首先是大量的建设工程。全体干部职工一面挤在原有车间坚持生产，一面抽出力量参加建厂劳动。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张楷还组织了由徐淑兰担任队长的青年突击队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搬砖挖土当小工。经过一年紧张施工，厂区面貌焕然一新。职工们有了近两万平方米的宽敞明亮的新生产车间和库房；还建起了三千多平方米的职工食堂和平房宿舍区，给以后塑料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革新奋进

1971 年，房山县大上五小工业，要求塑料制品厂进一步扩大生产上小化工项目，搞聚丙烯产品。上级决定将有 100 余人的原油布雨具厂与之合并，成立“房山县塑料厂”。因两厂中间隔着棉织厂和服装厂，于是将原塑料制品厂厂区称为北厂，原油布雨具厂厂区称为南厂。南厂是主要办公区，还有机修，化工两个车间。两厂合并后职工增加到近 500 人，企业管理更加完善。为了加强产品技术开发，把原来的生产技术组分为两个组，生产组主要抓生产管理和调度，技术组则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和试制。由此，塑料厂开始了一段辉煌的发展时期。

生产要发展，技术需领先，产品受欢迎，开发要先行。工人出身的技师兰祺（后来任厂长和工业经委生产科长）自担任技术组长以后，刻苦钻研塑料制品生产技术，并且收集了大量国内外同类产品的生产工艺和花色品种，终于在 1970 年拿出了四个品种的软塑料文具盒打入广州进出口产品交易会，并通过北京轻工业产品进出口公司批量出口“双菱牌”文具盒为国家创汇，成为北京市同类产品第一个创汇企业，也是房山县第一个出口创汇的工业企业。从此，房山县塑料厂的产品连续多年参加广交会。市场扩大了，反过来又促进了新产品开发。1972 年，学生背包也开始出口。到 1975 年，出口塑料文具盒 11 个

品种，背包 23 个品种；1980 年，出口文具盒达到 23 个品种，背包达到 72 个品种。产品内销全国，远销欧洲、美国、加拿大、东南亚。1977 年，中国进出口总公司授予“双菱牌”学生书包出口产品二等奖，授予“双菱牌”塑料文具盒三等奖，给产品设计者兰祺颁发了奖状和奖金。1984 年，“双菱牌”文具盒又被评为北京市优质产品，1988 年房山县塑料厂被评为全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塑料厂生产的文具盒和背包，经过格布——印格——补花——贴花覆膜——丝漏印花——圆盘印花机印花等多次技术革新，产品不断进步，花样不断出新，市场也更加开阔了。

原油布雨具厂生产的油布面木杆雨伞，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原材料的变化，逐渐改为塑料面雨伞。两厂合并后加大技术革新和改造力度，很快就从只生产透明膜雨伞，到增加兰、绿、黄彩色雨伞和印花伞，伞杆也增加了金属杆的品种。并逐步淘汰了 47 厘米 50 厘米小规格伞面，开发了 60 厘米 65 厘米的大伞面。制作伞面的高频电子热合机从原来的 6 台增加到 16 台，雨伞总产量从年产 40 万把猛增到 100 万把，市场也迅速扩大，“雨莲牌”塑料雨伞出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中国大地上。

房山县塑料厂产品俏销，效益看好，一时成为不少青年人羡慕和向往的企业。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80 年代初期全厂职工总数一度达到 800 多人。年总产值突破千万元，年利润总额最高达 125 万元，成为房山县主体工业十大百万利润大厂之一，年产值及年利润排在工业经委系统前三名达八年之久。

进入 90 年代，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而房山塑料厂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次机遇，没能尽快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逐渐老化落后，新产品开发力度不足，产品很快老化，明显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生产一路下滑，曾一度出现年产值只有 90 多万元，利润仅 1.1 万元的惨淡局面，和昔日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

# 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房良两县的农业

康 富

房山区的前身，即原来的房山县和良乡县。大家对当今日新月异的房山农业新形势早已耳闻目睹。然而也有不少的年轻人，对原来的房山县和良乡县不甚了解，对解放初期和解放前房良两县的农业就更知之不多了。为此，笔者将自己收集的一些相关史料奉献出来，以激励广大龙乡儿女更加知我房山，爱我房山。

## 解放前房山良乡两县农业状况

历史上的房山县和良乡县，就其农业而论，地理环境极差，生产水平很低，农业生产实不景气，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房山地势较高，水涝灾害较少，而且房山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山区，靠天吃饭是铁定事实。旱灾、风灾、虫灾、雹灾年年发生，且极为严重。远的不说，仅解放前夕，房山地区就发生过多起大的旱灾。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至夏数月未雨，田裂禾枯，农田颗粒无收，饥馑发生，饿殍斥野。日军占领区的坨里至长操数十村两千多人饿死，一千五百多户逃荒，四百多户卖儿卖女。民国三十六年，房山遭旱，三十六村四万亩农田产量减半……

良乡地区地势低洼，水灾涝灾连年发生，农业生产毫无保证。据《良乡县志》记载：“永定河自宛平县公义庄入县东南境，距城三十里，南流经任家营、窑上村，达固安县境。河堤屡决，沿堤村庄俱成沙淤矣”。又载：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一场大雨积水汪洋，破良乡西门月芽堤，灌入城内。当时有人以《大水行》记之：

五月晦月天黄昏，蛟龙来夺西城门。  
轰然一声斩关入，如山雪浪随而奔。  
奔流直向城中灌，水声响处人声乱。

……

山水欲以城为壑，大雨又从天上落。  
二水倾刻丈余深，平地波涛漫楼阁。  
天明雨止庆重生，厨中墙倒炊烟断。  
登高一望惨心目，全城雨水淹过半。  
填街塞卷波子预，巷口穹碑惟露顶。  
十家屋宇九倾颓，梁栋随波如泛梗。

.....

除此之外，民国十五年、民国二十六年、民国二十八年等年份，都发生过人力难以抵遇的大水灾。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暴雨倾盆。卢沟桥下右岸约 1.5 公里处石坝被毁，洪水直泻小清河、长辛店、南岗洼、长阳等处，良乡县八十余村受灾。良乡城内水深丈余。房山的大石河、拒马河也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沿河农田全部被冲毁，房屋倒塌无数，仅下石堡村被水冲走就有 19 人。

除天灾之外，房良两县还饱受兵祸之苦。据史书记载，房良地区自西周以来，始终是两军交战之地。如此天灾兵祸，严重地限制了两地农业的发展，有诗曰：

出都南望路茫茫，大邑犹存汉广阳。  
遗志当能读旧事，嘉名今已易良乡。  
当年干村称富庶，而今田野叹荒凉。  
年年水旱穷檐困，劫后田园宿草荒。  
老屋欲斜巢燕雀，远郊寥落收牛羊。  
流民失所悲鸿雁，闻乱惊心甚虎狼。

.....

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虽也标榜民为邦本，食为民天，但他们并不以百姓生计为然。而是在天灾兵祸之止还要施以苛政，强征暴敛，骄奢淫逸，其结果必陷百姓于水深火热，置农业于废耕荒田。

1937 年以后，日军占领房良地区八年之久。他们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极大地摧残了房良地区的农业。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为了内战需要，他们向解放区大肆进攻，烧杀抢掠，当时在良乡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儿：“打下粮食给保长，生下儿子给老蒋，养大车拉给养，我家里的两间房，还等军队来驻防”。

贫苦农民除了负担苛捐杂税外，还要受到地主富农的剥削。国民党统治时



期，农村大部分土地，垄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例如据房山县解放前调查，四区的吉羊村，全村 968 房，土地 10230 亩，人均 30 多亩。其中大地主 8 户，占地 4000 多亩；中小地主和富农 23 户，占地 3000 多亩；中农和贫农占地 3230 亩。另有雇农 150 户没有土地。当时贫雇农租种地主土地，要双重纳税。一是替地主纳粮，二是给地主交地租。有的农民辛苦一年，除了上交的租粮外，自己只剩下些南瓜豆角。

### 解放初期的土改和大生产运动

1948 年底，房山县和良乡县相继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房良两县的农业得以迅猛发展，生产条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不但有了保障，而且逐年得以改善和提高。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宣告解放。房良两县集中精力狠抓农业，当时房山县重点抓了新区的土改运动，良乡县则重点抓了大生产运动。土改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对于安定社会，稳定民心，恢复生产，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房山县委根据地委指示，于 1949 年 2 月，布置了新区土改运动的工作部署。房山新区包括 129 个村。其中有一部分村驻有宣布起义且尚未整编的傅作义部队。由于傅军的驻扎，群众有一定的心理负担，不易发动起来，所以决定有部队驻扎的村子和部分山地穷村暂不进行土改。75 个村先期进行土改。

土改工作的方法步骤是：召开区代表会议，对土改工作进行动员和宣传，大讲平津解放和家乡解放的大好形势，针对农民中的宿命思想，讲穷人只有投身革命，与地主老财斗争到底才能翻身过好日子的道理；组织群众产生村代表会，摧毁伪保甲组织。从组织上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向地主恶霸展开诉苦说理斗争；分配土改胜利果实。经过土改运动，获得了大量胜利果实。其中土地 39956.48 亩，房屋 5945 间，粮食 2862.95 石，衣服 7843 件，农具 6741 件，大车 103 辆，牲畜 437 头。为了有利生产不误农时，县委决定首先分配土地，然后分配粮食、牲口、农具，其余浮财待农闲时再公平分配。

房山县新区第一批土改自 1949 年 2 月中旬始至 3 月底基本结束。在第一批 75 个村进行土改的同时，对其它村进行了土地调剂。新区第二批土改始于 1949 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底结束。因为有了第一批土改的经验，第二批土改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土改运动的胜利结束，即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的开始。

良乡解放后，当务之急是稳定民心，恢复生产。县党政机关把恢复生产作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于1949年初开始组织发动了大生产运动。

当时全县成立了以县长和县委书记为正副主任的生产委员会。制定了生产草案，层层下达，一直到村。再由下边反复征求意见后反馈到县政府。3月上旬，全县7个区分三片，分别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106人。3月底，正式下达全县全年生产计划。生产计划中的增产指标是：粮食增产115586市石，其中要求三、五区每亩增5市升，其余五区每亩增产3市升。全县种植棉花5000亩，产皮棉12.5万斤，种花生15000亩，利用河滩、沙地、地边及废地种麻，要求每人达到半斤麻油，全县产麻油71443斤。

除了以上作物外，还要多种些芝麻等油料作物和白薯等高产作物。为了保证生产计划的落实，县区政府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努力解决生产资料的配置。才翻身的农民，普遍存在着缺乏种籽、农具、耕畜、肥料等问题。政府通过采取贷款、组织推进合作社和组织铁匠炉等方法，帮助解决了生产资料缺乏问题。

组织互助组、拨工组等新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存在着势单力薄之弊，有的家有劳力而无畜力和耕具；有的家有耕具却无劳力，为解决这一矛盾，农村中掀起了“五助”之风。据统计，全县自愿成立互助组、拨工组达734个，人员达2886人。当时良乡新一区的大富庄村拨工组搞得最好，坚持的时间最长，成为全县的典型。

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和组织优属代耕。解放后，妇女们社会地位得到提高。1949年三八节前，各区分别召开妇女座谈会，发起了妇女劳动竞赛活动。由此而激发了广大妇女的劳动热情。陈家台村的妇女首先组织了两个互助组，往地里送粪。突出的还有城厢区的黄辛庄村的妇女，她们自发组织起14个拨工组，人员达67人，种棉花75亩，超过了当时男人的劳动量。大生产运动中，优属代耕工作也是其中一大特色。当时良乡有一千四百多户军烈属。他们虽然有了土地，但缺乏劳力和生产资料。为了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各村农民以互助和拨工方式，主动帮助军烈属家庭生产，政府还为军烈属确定了代耕数、代耕证，有效解决了军烈属的生产困难。

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良乡是春旱秋涝严重地区，农民长期养成了靠天吃饭的思想，影响了大生产的进展。为此，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教育农民与天斗与地斗，自己掌握命运，一方面组织大家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1949年开

挖西北关小水渠和坨里小水渠各一道。修复和新打水井 368 眼，修复和新置水车 47 辆；清挖河下游两次，总共投入人工 3446 个。全县植树 170 万棵，其中植果树 13000 棵；荒滩造林 650 多亩；建苗圃 148 亩。

开展劳动竞赛。在大生产中，全县掀起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活动。竞赛按农时，分阶段进行。如春耕播种、植树造林、夏征夏收、秋耕秋种等。竞赛形式有三：一是个人与个人；二是组与组、片与片；三是村与村。为了引导和促进劳动竞赛的健康发展，县区政府注意加强了组织领导，定期检查，评模授奖。

大生产运动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加速了战争创伤的治愈，使濒临崩溃的良乡农业得以较快的恢复。1949 年 5 月底，全县已完成了生茬地的耕种；7 月中旬，又消灭了荒地 7500 亩，并及时种上了荞麦。秋收结束后，全县除少数低洼水地未耕种外，秋耕播种小麦 16 万 8 千多亩。

1949 年虽然自然灾害也曾不断，但新区农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不但战胜了头脑中的小农思想，还战胜了自然灾害，赢得了解放后的第一个丰收年。

# 房山三项农业气象科技成果的研究

张广文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当时的房山县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郊区县。1980 年全县 67.4 万人口中，农业人口 47.7 万，占总人口的 71%；农业产值 11440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2%。粮食总产 19819 万公斤，达到人均 294 公斤；干鲜果品总产 1704 万公斤，人均 25 公斤。农村和农业工作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为了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和果品的产量和产值，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工作，每年农业科技成果奖都占到 50% 左右。并且在郊区最早成立了县级农业技术顾问团（初时为农业区划顾问团），为全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和决策服务。我当时任房山县气象站副站长，是最早的顾问团成员之一。曾参与和主持了 1980 年到 1990 年期间三项农业气象科研工作。三项科研成果中，一项是基础研究，两项是应用研究。用当时的语言形容，就像打造了一柄战天斗地的宝剑，开辟了房山气象科研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先河。获得房山县 1983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的《房山县农业气候资源及农业气候区划》，就是这把剑的剑身；获得 1991 年农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的《房山区冰雹灾害的区域考察及综合减防措施研究报告》，以及同年获得北京市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优秀成果二等奖的《北京市房山区丘陵及山前暖区农业区域综合开发研究规划》就像宝剑锋利的两刃。一剑挥舞，对天防雷减灾，对地综合开发，二十多年过去了，三项科研成果仍对房山区的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

为了加快北京郊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1978 年北京市开始进行农业区划工作，房山县于 1978 年底成立农业区划办公室开展此项工作。农业气候区划是综合农业区划的重要基础工作，也是气象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一项战略任务。由于其资料收集和分析范围广，关联性强，房山县农业气候区划工作由县

政府和市气象局双重领导，业务上以市气象局为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房山县气象站成立了由站长朱文治任组长，我负技术总责的领导小组，除了全站人员都按分工开展工作外，县气象科的部分同志也参加了此项工作。

经过全体人员的努力，用了 12 个月的时间，经过三次严格校对，完成了 1961 年至 1978 年房山、霞云岭两个气象站 134 项约 12 万组资料计算整编工作。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受到了市气象局的表扬。在完成区划部门指令性工作的同时，由我按科研课题的标准，制定了一整套的研究试验程序，以便把农业气候区划做得更深入，更具科学性。并最终获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在郊区各县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其中具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和试验成果有：

1、从发生频率、造成的损失程度，明确了房山区农业生产的四大气象灾害。为此历时 5 个月走访调查了全县平原、丘陵、山区各种地形地貌的 31 个公社和 40 多个大队，行程 2000 余公里，其中步行行程就达 200 多公里。查阅 1950 年以来的房山县档案资料，收集了包括涿县、门头沟在内的相邻区县的气象灾害资料，为以后开展冰雹灾害研究打下了基础。

2、运用生态学理论和探空气象成果对房山县的热量空间分布作出了定量描述，分析了成因。绘制出包括年平均温度、各级别积温及各种农业气候指标温度在内的 17 套热量分布图。分析了房山山前暖区和山间河谷地带的相对暖区，主要是由气流下沉增温和局地逆温层造成的。并首次确定了房山县山前暖区的范围和强度，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打下了理论基础。

3、为房山县的粮食种植制度提供了热量、光能利用的理论依据。一是计算出了房山县平原地区粮食产量的光温利用率仅平均为 1.77%，当光温利用率达到 5% 时即可亩产 1200 公斤。为房山县平原地区一年两熟种植制度可以达到亩产吨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根据热量提出了冬小麦和玉米的适宜播种期、海拔 400 米以上地区不宜种植冬小麦等重要观点，给县政府调整粮食布局的重大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通过对山区六个公社 46 个大队的走访和调查分析，确立了年平均气温 9℃ 等温线的空间分布，给房山地区喜温果树的引进和栽培确定了高度上限，避免因盲目引进造成损失。

为了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房山气象站的区划工作增加了近一倍的工作量。所采用的生态学方法解决弥补了气象观察站点稀少，资料不足的问题，但工作起来却非常艰苦。为了抢农时，在进行小麦抽穗期定点观测时，个个观测小组成员包括部分女同志，自带行李，住在农村百姓家，一连十几天到麦田里观测，数麦穗。气象科的窦长启为了检查工作，天黑了才往回赶，不幸翻车摔

成腰椎骨折，住了近半年医院，为农业气候区划工作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山区考察和补充观测时，交通是个大问题，挤公共汽车，搭运煤车还算好的。下了公路就要爬山，有时要走十几里山路，啃干粮喝泉水，爬到一千多米的山顶。正是有了全站同志的艰苦工作，才使房山县的农业气候区划工作不仅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还取得了全市一流的农业气候科研成果。也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重要基础。

## 二

通过农业气候区划工作，使人们认识到房山县重要的灾害天气是冰雹，它可以在农作物和果树的整个生长季出现，危害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灾情严重。据统计，平均每年降雹 5.7 日，其中 50% 造成重大灾害。1980 年至 1988 年间平均每年造成粮食作物减产 3000 万公斤，干鲜果品 1000 万公斤，雹灾损失居全市之首。为了摸清房山区冰雹灾害的分布及其规律，并能够采取综合措施达到减少降雹、减轻灾害的目的，区政府农业区划办公室和区科委，在房山县农业气候区划基础上，首次以农业生态学和系统工程学为指导思想，于 1986 年至 1988 年领导了《房山区冰雹灾害的区域考察及综合防治试验研究》科研课题工作。课题组由我和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许焕林任技术负责人，共同组织北京市气象局、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38521 部队气象台及房山区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共二十多名技术人员进行协作攻关。

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努力，收集了大量资料数据，进行了从海拔最低处到全区最高的百花山、白草畔的大范围实地考察，做了多个分课题研究，最后由我执笔完成了课题成果报告，1989 年 11 月 30 日由北京市区划办公室组织进行了科研成果鉴定。这项科研工作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房山地区降雹的年、月、日特点和地域分布，绘制了冰雹路线及灾区分布图，明确了北、中、南三条雹线位置。从生态环境和内在因素两方面分析了冰雹及其灾害的形成因素。确定了冰雹灾害可以减轻和有效防治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了从生态学上可以开展流域治理，利用植被条件的科学布局抑制冰雹形成；从生物学上可以通过调整种植制度、品种布局抵抗和减少灾害损失；从气象学上可通过建立人工防雹体系消减成雹动力因素减少降雹。

项目边研究、边应用，取得了国内领先水平。不但被评为房山区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被评为农业部和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三等奖，并于 1991 年载入《中

国技术成果大全》第十五期，向全国推广。给房山区的山区生态治理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 三

在房山农业气候区划中，通过比较和初步观测，指出了在北京地区虽还有昌平、怀柔山前暖区，但都没有房山强度和面积大。尤其是北京地区 5℃、15℃、20℃ 初日，房山最早出现，积温数值最高。这引起县政府和农业区划办公室高度重视。

从事房山农林业的领导和科技工作者对山前暖区的感知由来已久，但得到科学的解释和 100 度级别的定量的分析结论还是头一次。为了充分利用和开发这一宝贵气候资源，需要把山前暖区的范围和强度了解得更精确，精度提高到 10 度级别。为此，1983 年 4 月至 5 月，在区划办公室支持下，我编写了《用物候观测方法对我县平原地区热量条件差异的考察试验方案》，其间有城关、坨里、大紫草坞、良乡、石楼、窦店、交道、东营、琉璃河、南召等十个公社科技站参加的大范围多布点的物候观测。观测对象为 1982 年 9 月 25 日播种的红良 5 号冬小麦的拔节期和抽穗期，共取得观测数据 10000 多组。最终确定  $\geq 0^{\circ}\text{C}$  积温  $4600^{\circ}\text{C}$  暖区范围内共有 13 个乡的 164 个村，有耕地 307861 亩，占全县耕地的 50.9%。

在摸清山前暖区资源的基础上，1989 年，房山区政府决定对山前暖区及相连的丘陵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综合农业开发。并于 1990 年初成立了以副区长赵振隆为指挥，以区农办主任柳广田、副主任李学文、科委主任李兴泽、计委主任李有发为副指挥，区各有关委办局和乡镇领导为成员的开发指挥部。开发规划由我执笔，经多次研究讨论后，于 1990 年 3 月开始进行全面实施。这次综合开发，确立了依靠科学技术，面向首都市场，宜粮则粮，宜果则果，建设名、特、优商品基地，贸工农互相促进，产供销、储运、加工紧密衔接，实现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的指导方针。给房山改造中低产农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磨盘柿、猕猴桃、苹果及仁用杏生产基地，发展肉牛和流水养鱼，发展农机和节水灌溉，加强山区小流域治理和植被恢复作出了科学的安排。

规划实施后，取得了显著效果。不但受到北京市农业区划委员会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多次组织视察和参观，还获得了北京市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优秀成果二等奖。这项规划的实施，给房山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十几年来规划的原则和开发建设思路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 龙骨山下“红旗渠”

## ——记周口店地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情况

沙秀英

地处北京猿人故乡——龙骨山下的周口店公社，在上世纪 60 年代，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各种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低，亩产一直徘徊在 400 斤左右。山区的粮食不够吃是普遍现象，就是平原村的百姓也是今天你家断顿，明天我家借粮。为了防止群众断炊，各村干部费尽心思，为了使群众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也是三天一分粮或是五天一分粮，好一点的村最多也是十天分一次，目的是减少断炊时间，从上到下大家都在为能填饱肚子而着急。1970 年，北方农业会议召开。周口店公社以此为契机，从 1970 年开始到 1976 年，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逐渐改变了家乡面貌。

### 明确重点抓关键

当时的周口店地区，“土薄水缺石头多，除了河滩就是坡。”全公社两万多亩耕地，有的挂在半山腰，有的横在丘陵地上，仅有的几千亩平原地，一尺以下还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跑水漏肥。1970 年以前，为了改变家乡面貌，周口店的干部群众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没少下工夫。当时全公社 17 个大队，有的队修渠打井、有的队改河造地、还有的队垒坝修梯田。工没少费、钱没少花，可是收效不大，全公社大部分土地上的庄稼还是靠天收。上帐统计的灌溉面积有五千多亩，但能浇上水的土地却只有两千来亩，粮食产量低，群众吃不饱，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赵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种状况也使公社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深深反思：周口店要把粮食产量搞上去究竟应该干些什么？正在迷惘之际，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了，在这个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感到：水是制约周口店农业发展的关键，要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就必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周口



店地形、地貌复杂，抓水怎么抓？以前也没少抓，可是也没见什么效果，经过反复研究分析，一致认为，要抓就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抓主要矛盾和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的教导，抓住影响本地区粮食产量的关键环节，既然水是关键，就以水为突破口，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决不能向以前那样队自为战，而应是集中全公社的力量改变本地区缺水的现状，以水保土。找到了主要问题，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以后，在党委书记赵英的带领下，从实际出发，制定出了符合周口店实际又便于操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

从1970年秋开始，全公社掀起了以开发水源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为了尽快扭转缺水的严重局面，党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带着300多名水利专业队员，勘测设计了一条贯穿全公社的大型引水渠。引水渠北起车厂村，途经良各庄、山口、周口店、辛庄、新街、大韩继村，南至南韩继村，打响了北水南调、引附近工厂废水灌溉农田的战斗。经过短短九个月的艰苦奋斗，引污灌溉的万米主干渠就建成了。接着他们乘胜前进，又大搞配套续建工程，陆续建成主支干渠共23000多米：凿通大小隧洞8个，总长1130米；铺设管道1776米，修倒虹吸15处。这条大渠的干渠通水后，就给14个大队送了水，使灌溉面积由原来的5000亩扩大到了180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在大旱的1972年全公社获得了大丰收，仅夏粮就比头一年增长了44%以上。

引污灌渠的建成，极大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这时的党委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万米水渠虽然建成，但这只是解决了一半问题，对于水的问题，不能满足现状，必须立足彻底解决；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能低标准，必须坚持高标准。为了充分利用现有水源，节约用水，他们组织人力，狠抓了渠道防渗工程。为了实现灌溉双保险，在基本解决了自流灌溉之后，又广泛打深井，开发地下水源。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治水工作的推动下，改土工程也陆续上马。在国家基建和水利工程占地增多的情况下，改河滩，造粮田，扩大耕地面积，又成了一项新的任务。治理周口店河滩、楼子水河滩，造地一千多亩。

缺水，是周口店公社17个大队共同的特点，由于他们自然条件各不相同，缺水原因又多种多样，当时的党委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不强求一律，几年来，公社主干渠能自流的地区，集中力量搞好田间配套设施；不能自流的地方搞扬水站；接不上干渠的地方打井；暂时打不了井的搞蓄水池；山区则搞好坑田、条田，加厚土层。

经过六年的努力，他们共修防渗主干渠道26公里，大小涵洞11处，总

长 1800 米，铺设管道 3300 多米，砌渡槽 47 座，共长 3800 多米，大型扬水站 1 处，蓄水池 9 个，田间渠道衬砌 110 多华里，大平大整土地 3000 多亩，造地 3000 多亩，共动土石 61 万方，用工 53 万个。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平均亩产达到千斤，比 1970 年的亩产增长了 60%，群众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通过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们达到了自己目的，使粮食产量无论是单产还是总产都稳步增长，成为当时房山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 不图形式重实效

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周口店公社始终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治水改土，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追求形式”这一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公社和各大队都有一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从长远出发，他们在保证搞好当前生产的前提下，把劳力和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立足当前，他们每搞一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都力求对当年或下一年生产有益，做到“三不影响”：不影响当年生产、不影响粮食产量、不影响社员分配。为了保证平整土地之后尽早受益，他们规定：平地一般要在春种前完成；平地后要增加施肥量，促使生土熟化。这些年，全公社新平整的土地，大都当年或下一年显著增产。对于当年受益和将来见效的工程，他们掌握恰当的比例。一些大型工程尽可能作到边施工、边受益。他们摆正农副关系，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从资金和技术上武装农业，加快投入人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步伐，不断稳定社员的情绪。六年多来，周口店公社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投入人工 53 万多个，投入资金 200 多万元，做到了“三不影响”，使广大干部群众保持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积极性。

二是处理好多快好省的关系。周口店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舍得出工、花钱，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使工出得合理，把钱花在刀刃上，决不搞劳民伤财的事。修建万米引水渠工程，需要大量水泥，公社党委决定自力更生创办水泥厂。组织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满足了工程的需要。修渠要穿山凿洞，他们群策群力，没有测量仪器就用高粱杆自制土仪器，经过上下测量验证是合格的。没有炸药他们自己配，白灰自己烧，钢钎自己打，石料自己开，砌拱没有拱架就用推土模的办法解决。几年来所用大批

物料不仅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而且还节约了大量外购资金和运费。他们干当前想长远，平整一块土地就考虑到水源的布局、渠道的走向；打一眼井就注意到如何与地上水相配合，避免“今年修，明年改”浪费人力物力。每一项水利工程他们都尽量避开村庄、道路，能少占耕地的争取不占，能占赖地的不占好地。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施工中他们坚持做到好中求多、求快、求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一丝不苟，每一项工程都做到保质保量，经得住考验。

三是处理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发挥效益的关系。他们尽可能地把两者统一起来。在两者有矛盾的时候，建设工程要服从效益的需要。在设计万米引污灌渠的过程中，引渠要经过一条跨度100多米、深18米的深谷。怎么通过这个地带？有人主张修一座大渡槽，但是投资大；有人主张修一条“倒虹吸”，让水从地下穿过，一来省工省料，二来可以少占耕地。党委经过研究，采用了后一个



周口店地区万米水渠一角（沙秀英 提供）

方案。这个引污灌渠全长26华里，穿山越岭，跨沟渡涧，有时地势蜿蜒曲折，有时利用旧渠扩展，有时从地下穿过。从外观上看，并不显眼，然而，正是这条渠，所到之处，粮食产量显著大幅度增长。群众称它是龙骨山下的“红旗渠”。

周口店人民在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从实际出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天斗地。全公社一盘棋，开展团结协作，坚持科学态度，实干加巧干，在改变家乡面貌、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改善社员生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北京地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历史上，在群众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的辉煌。

# 三八干渠与房涿涿灌区

任全钦

三八干渠是由房山县长沟大公社主持，在 1958 年开始建设的一项水利工程。该工程起点在南尚乐村南柴范铺北 120 米处。途经南尚乐村南、村东，平行于周张公路南侧，到石窝村南过公路北侧，从半壁店和纸房村中间跨过南泉水河。在南正村、北正村北挖开两个山头，穿过坟庄村北，在沿村和东甘池村中间又跨越北泉水河，东进在二龙岗村南，于龙门口村边过龙潭河，在岳各庄村北绕村东南向至东营。干渠总长 24 千米、设有支渠 17 条。初始设计供南尚乐、长沟、岳各庄、东营 4 个公社 26 个村 9.2 万亩地自流灌溉。

1961 年，龙潭河以上渠段基本竣工。干渠段长约 20 千米，有支渠 14 条，基本通水，发挥了效益。但由于半壁店和沿村两处过河渡槽的工程质量差，经常漏水；南北正二村两处山头挖方段的施工尺寸不足，雨季淤积阻水，效益均受其影响。

1962 年春，三八干渠并入房涿涿灌区管理，由房涿涿灌区的半壁店管理所管理，是石槽沟总干渠的北干渠。

这一举措是很有必要的。其一，石槽沟总干渠是房涿涿灌区原有渠道之一，与其南干渠早已建成收益。总干渠长 800 米、设计通水能力 12 立米/秒，引水闸设施齐全。其二，三八干渠工程从立项、勘察、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都有房涿涿灌区的领导干部、技术人负参与。其三，房涿涿灌区曾受到国务院农垦部、河北省水利厅的重视，是一个管理经验丰富、多次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其四，三八渠的周边相邻水利设施、房山县的水浇地过去一直由房涿涿灌区的半壁店管理所管理。

房涿涿浇区又称“水利会”，管理处设在涿州市孙庄镇（公社）孙庄村，设有工程、灌溉两个管理科，另有财务科和办公室，下设横岐、西町、石亭、半壁店四个管理所和配水组。

房涿涿灌区有义让沟、三岔沟、石槽沟、元互沟 4 条主要渠道。另有三联沟、大青沟、凉亭沟、屈邵沟、胜利渠、益民渠、南泉水、北泉水 8 个支渠道。

房涿涿灌区的管理范围为房山、涿水、涿州、新城、定兴 5 个县 24 个公社（乡）近 240 个村，灌溉面积达 36 万亩。属于国家级大型（30 万亩以上）灌区。义让沟渠在涿水县王家碾村西北，由南拒马河南岸引水，至松林店、高碑店、高涿路义安大桥。三岔沟渠在房山县镇江营村南，由北拒马河引水，经城坊、边各庄至涿州。石槽沟南广渠分水后，经惠南庄、广润庄、茂林庄、兰家营至普利庄后接续益民渠至涿州（北干渠即三八渠）。元互沟引水于南拒马、板城，流经石亭等两公社。

房涿涿灌区经过多年的管理实践，更有华北局河北省水利厅、保定专署水利局的领导重视，形成了比较成功、有效的管理体制。灌区的重大事项的决策由灌区代表大会决定。每年春灌前（3 月）和汛期前（5 月下旬）召开两次例会。个别特重事项，加一次特别会议。与会代表 100 人。保定专署及其水利局领导，房山、徐水、涿州、新城、定兴五县分工水利副县长、水利局长各 1 人，受益各乡镇（公社）领导，重点村代表和灌区处所领导参加，会期 2 至 3 天。会议主要内容是通过和认可灌区处所主任人选、灌区工作总结报告、灌区下步工作计划指标和措施、四灌区财物管理工作等。

灌区管理处是常设工作机构。因此，当地人常称为“水利会”。其主要领导党支部书记和正副主任都是由保定专署指派。几任都是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或县长的同志，管理处下设工程管理科、灌溉管理科、财物科和办公室。处所两级专管机构人员是经过上级确定的人事指标，有时也有部分短期临时工，计有 35 至 45 人左右。其中房涿涿三县派的 40%，当地施工中施工员转正 15%，大中专毕业学生分配的 25%，其他 20%。

半壁店管理所在大石窝镇半壁店村西，石窝村东南，原高庄发电站旁。有人员 7 人。初期主任刘岗甫（南白岱村人），技术员任合钦。1955 年后，刘岗甫退休。赵琇接任主任（石楼镇二站村人）。

房山县占房涿涿的水浇地面积的 85%，在半壁店管理所管理的灌溉面积中，主要是原来的南尚乐公社中南尚乐村、南河村、北尚乐村、辛庄村、石窝村、半壁店村、惠南庄村、广润庄村和长沟公社的南正村、北正村、双磨村、坟庄村、沿村、太和庄村、长沟村、北良村、东良村、南良村，灌溉面积 3.5 万亩。

半壁店管理所管理的渠道有石槽沟南北干渠、胜利渠、益民渠、南北泉水河、屈邵沟等。涿县的浇地面积主要是兰家营乡、百尺竿乡和下胡良乡计 38 个村，灌溉面积 3.8 万亩。

房涿涿灌区的水费征收方案依据国家政策, 由灌区代表会决定。1964 年前以亩计征 1.0 元/亩·年。后来除南北泉水河、胜利渠、益民渠、屈邵沟以亩计征 3 元/亩·年外, 义让沟、三岔沟、元互沟、石槽沟渠改为以水量计征。1968 年前为 0.15 元/100 方, 后提到 0.25 元/100 方。每年终由各管理科制作计划征收方案, 批准后进行征收上缴管理处。

房涿涿灌区的灌溉管理采取群众与专管相结合办法, 各渠道都组建渠道委员会, 由受益村根据受益大小选派。每个渠道委员会一般 5 至 9 人, 包括正副主任和 1 名会计。半壁店管理所下有石槽沟总干渠、南干渠、北干渠上段、北干渠下段、胜利渠、益民渠、屈邵沟、北泉水 8 个委员会总人数 58 人。

房涿涿灌区对于渠道及各种配套建筑物工程由管理所管理处制定计划统一审核批准, 实施方法, 原则是民办公助。一般由灌区出材料费或材料受益社队出劳务由管理所组织施工。

1964 年以后, 我国北方天气干旱少雨, 地下水位下降, 拒马河尤其严重。河源至灌区沿途引水点处密集, 紫荆关引水补充易水河水库, 加之其它产业用水迫使水源口近干枯。所以渠道防渗, 发挥输水有效利回率就成为灌区管理的重中之重。

从 1965 年开始, 灌区首先从沙滩地渗水性严重的三岔沟渠开始, 进行现浇和预制安装式混凝板的防渗工程, 后来逐渐推广, 情况如表:

房涿涿渗区渠道防渗情况表

渠道名称	时间	材料	长度 (千米)	湿周 (米)	形状	毁坏或 效果
义让沟 干渠	1973 年	塑膜粘 土夯实	6.5 至高村	12	梯形	隐蔽 不明
三岔沟 干渠	1966 年	现、预制 砼板	240 全程	5.5	梯形	冻鼓 2 年
石槽沟南 干渠上段	1973 年	砌石	0.2 柴范铺边	3.8	矩形	不坏效 果良好
石槽沟南 干渠下段	1974 年	砼预 制块	6.0 茂村庄以下	4.6	矩形	人为破坏 口一年
石槽沟北 干下段	1972 年	砌石上 盖板	1.2 东山头	4.6	矩形	人为破坏 不重无水
南泉电站 引渠	1972 年	砼板	2.8 全程	2.4	梯形	水流恒温 效果良好

房涑涿灌区随着逐年河源水量减少，浇地面积也随之逐年减少。至 1985 年就只剩蔡庄、王家磨、下滩、镇江营、南尚乐、北尚乐、南河、惠南庄了。灌区人员也逐渐减少，后不再新补员，只剩下部分留守人员。

# 开山填渠建东炼

王岗

在大庆、胜利油田相继投入开发之后，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为就近解决北京和华北地区石油产品供应问题，1967年2月14日，国家批准石油工业部组织建设，4月22日，决定由兰州炼油厂负责筹建一个炼油厂。当时，由于战备需要，工程要依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国家计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石油工业部和北京市共同决定：厂址选在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坟山村一带，并派十余人深入现场勘察，由石油部定名为“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



东炼厂当年建成的装油站台  
(赵思敬 提供)

为了建设成品油的装油站台，实施108吨炸药定向爆破，开山填沟，劈出新场地；铁道部在京原路良各庄站上铺设铁路支线，使石油产成品直达北京。

该厂为原设计能力年产250万吨的燃料——润滑油型炼油厂，国务院、北京市将其列为重点项目。1968年，石油部军管会决定：为了体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该厂基本建设中原准备使用的进口设备、仪表等全部换成国产的。并在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精神，采取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边投产的作法，得到较高的评价。

## 第一期工程——向国庆20周年献礼

1968年8月，东炼第一套生产装置——常减压蒸馏装置开工建设。

推土机推平现场后，土建单位用经纬仪确定设备基础位置——叫“抄平”，用白灰撒出形状——叫“放线”。挖土机进行设备基础挖槽，深度合格后进行人工修边，并进行人工钎探——采用梅花式。用8磅大锤，打下1米长钢钎，



记录锤数，证实基础下无异状，再夯实铺下的三比七灰土和无筋砼垫层。基础按设计形状支木模，绑完钢筋，安放好预埋螺栓，现场浇灌砼，养护 28 天，达到强度，然后将各种记录等移交给设备安装单位，交付安装验收签字后，完成土建工作，这阶段通称叫“交付安装”。

设备安装开始前，先进行防腐处理。安装塔类、管道、容器等设备，是采用我国当时特殊自有的吊装机械——金属抱杆。指挥吊装的工人师傅，按照安全生产要求，头戴安全帽，手拿红绿旗，口含金属哨，旗帜上下左右指挥，口哨长短吱吱叫，多方配合，一声长笛安装就到位。

设备就位后，电焊工们身穿防护衣，一手拿防眼罩，一手拿焊枪，使出浑身解数：平焊、立焊、仰焊……在焊接质量上严格要求作：焊缝高低平直，焊流均匀如鳞，像鱼鳞般一片压一片，达到最高等级。

焊接完毕，还需经过无损探伤仪检查、水压试验、气密试验，合格后焊口上刷防锈漆，才算完成这一工序。

安装试压完毕后，有的还需要保温。针对不同设备，保温分别使用 40 至 150 毫米厚的玻璃棉或牛毛毯、矿棉瓦席、岩棉瓦席及泡沫塑料瓦板等材料；有的管道还有伴热管道要求。在保温层外面仍要穿上一层铠甲——白铁皮，铁皮上刷层油漆保护。以上只是装置安装的一部份，其它尚有水、电、自控仪表等项安装。

等到全部装置完成后，携带着竣工图纸、检测资料，办完验收手续，一并移交给生产单位，再进行投料生产。这阶段叫“交付使用”。

经过“平整场地”、“交付安装”、“交付使用”三个主要环节，1969 年 9 月 9 日，东炼第一生产装置——常减压蒸馏装置建成，并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同月，又先后建成了减粘装置催化裂化装置（I）及配套的八大系统。由于严格推行国家颁发的施工及验收规范，质量评定标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加上职工们艰苦奋斗，一丝不苟，才取得了一次投料试车投产成功的优异成绩，实现了“确保高速度、高质量，为革命投产，为战备出油”的誓言。至此，东炼厂一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向国庆 20 周年献了一份大礼。

1969 年 10 月 6 日至 7 日，参加首都 20 周年国庆观礼的万余名各界优秀分子代表分两天到东炼厂参观。

## 第二期工程——完善配套、技术改造

1969 年 10 月 15 日，东炼厂在会战工地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

促战备”誓师大会，布置二期工程会战。

1970年2月19日，召开“抢建第二期工程誓师大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把二期工程列为国家抢建项目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搞好生产、建设的指示，完善了一些配套项目。

1970年10月1日，丙烷脱沥青装置建成投产，该工程于1968年8月开工建设，设计规模为年产轻脱油、重脱油、沥青共35万吨。

1971年6月1日，分子筛脱蜡装置建成投产，该工程于1970年2月开工建设，年产液体石蜡、低凝柴油共6万吨。

1971年6月2日，酮苯脱蜡装置建成投产，该工程于1969年12月动工兴建，设计规模为去蜡油、脱油蜡、蜡下油、含油蜡共30万吨。

1971年6月，催化裂化铂重整装置竣工投产，该装置于1969年12月动工兴建，设计规模为年产苯15万吨。

1971年9月25日，石蜡成型装置建成投产，该项目于1970年7月开工，设计规模为年产成型石蜡6.5万吨。一块块长方形白色石蜡，源源不断地从生产线上滑出。

1970年10月4日，润滑油加氢精制装置建成投产，该装置于1970年2月动工建设，设计规模为年产润滑基础油21.5万吨、精制蜡油6万吨。

1976年12月23日，润滑油糠醛精制装置建成投产，年产加工润滑油料36万吨。

1983年10月23日，催化裂化装置(Ⅱ)建成试生产。该装置于1979年3月动工建设，设计能力为年产加工蜡油120万吨。

进行了几项技术更新：

1973年8月18日，贯彻燃化部决定：东炼厂开始逐渐消灭火炬。这只“火凤凰”终于慢慢“涅槃”了，既省了国家资产又清洁了环境。

1993年8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建设60万吨/年连续重整和100万吨/年中压加氢改质装置立项，1996年建成投产后，炼油厂可以全部生产90号以上的无铅汽油，实现更新换代。

1994年1月，四蒸馏装置是对原蒸馏装置场地改造项目。竣工后，原油加工能力从700万吨/年提高到800万吨/年，还为45万吨乙烯装置达标创造了条件。

1994年11月，生产出首批90号无铅汽油3150吨，结束了燕化公司东炼厂不能生产高档无铅汽油的历史。

从 1969 年到 1972 年两年多时间，经过建设，使东炼年原油加工能力达到 700 万吨，且形成配套比较完善、技改有效的全国最大的炼油厂。两年间，全厂工业总产值(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由 1969 年的 2981 万元增长到 1972 年的 83894 万元。实现利税由 1969 年的负 1165 万元上升到 1972 年正增加到 30377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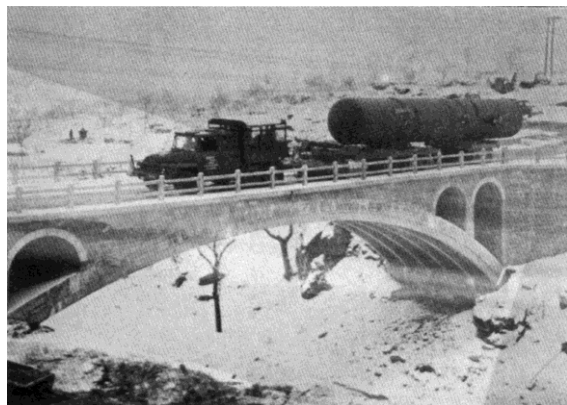
### 石楼原油转运站的建立

早在确定东炼施工的同时，经过地质勘探，发现房山县石楼村的地下土层很厚，适合于地埋式油罐建设。由北京市机械化公司承担挖土任务。经过昼夜施工，一个 10 米深 10 米圆的土坑挖成了。接着用灰土搅合机在池内搅合铺设灰土，用压路机压实后，将任务移交给土建队进行建筑施工。

土建施工为完成这一任务，在坑边设立 9 个混凝土搅拌站，翻斗汽车、调车机、切断机、弯曲机、刨床等大、中、小型机械都集中到现场，准备打一场机械化施工会战。

按设计要求，底板砼（混凝土）RC 施工约 1000 立方米次上，必须在 48 小时内完成浇铸，中间不得留接茬。

于是，现场指挥部从东炼请来了两队学生支援。并将施工现场以搅拌站为中心，人员分成前台、后台、中心三部分，三班倒，人歇机不停。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百余名同学，由一位下放干部带领，负责往搅拌斗内装砂石。女同学三人一辆带斗双轮车装砂子，男同学每三人也是一辆车装石子。为保证质量，车车都得经过磅过称。



东炼厂运输汽车通过周口店地区胜利桥（赵思敬提供）

每个搅拌中心，安排一名机械工操作，两名操作比较熟练、身体健壮的老师傅倒水泥，每盘次装水泥两袋、一车砂子、两车石子，搅拌后倒翻斗汽车内，运往境边倒在落料溜槽内，顺槽往下滑料，经过 48 小时连续奋战，顺利完成施工任务。

在修建罐壁、罐顶工程时，采用预应力钢模预制钢筋砼板，只需用汽车吊安装就位即可。但因钢模制品砼

板表面太滑,不能用手工抹灰。经研究将抹灰项目分成三边工序——用水清扫,机械喷底,手工罩面。于是采用消防高压水做“龙身”,开关水枪做“龙头”,机拌砂浆被压缩机将“特殊砂浆”喷在钢壁上,附着力强,速度又快,灰浆初凝后再用手工抹上罩石灰,构成了机械抹灰,大家都送称名“抹灰龙”,顺利完成了内外抹灰工作。后来,到总厂后由计划统计员王岗设计了“拆叠式抹灰高凳”,学用了华罗庚数字“综合施工作业计划法”。高凳轻便快捷,对完成石化建全公司公用、住宅室内全部抹灰任务起到快速施工作用。

1969年8月8日,在完成大罐水压试验合格及火车站建成后,由“毛泽东号”机车牵引的一列原油罐车,从大庆奔驰千里,运到石楼九条铁路编组站,卸油进罐。

# 表盘厂的创业历程

宋景宽

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力生产很落后，除了一些大城市，一般的县城还都没有电灯。到 1953 年，全国只是东北小丰满有一条 220 千伏高压线路，其它省市最高电压等级只有 110 千伏。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1 年 10 月，中央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成立了修建工程局和土木建筑工程公司。1953 年初，华北电业管理局成立，修建工程局和土木建筑工程公司归属华北电业管理局领导。修建工程局所属第六工程队（送电）、第八工程队（变电）肩负着统一北京及华北地区电压等级的改造工程、输变电的检修和安装任务。

当时，变电站的施工常常受到表盘（配电盘）的困扰，由于表盘不能按时到货，影响了施工进度。那时全国只有上海华通开关厂生产表盘。每次接到变电站施工任务后，再去订货，最快要半年时间，工人们只好耐心等待。

华通开关厂生产的表盘是按苏联生产表盘的标准生产的，图纸也是苏联的。在这之前，我国变电站的表盘大多是解放以前做的，没有统一的标准，都是用角铁焊个架子，面上焊块铁板，也有的装上七合板，面板上装仪表或继电器。

面对当务之急，当时的第八工程队队长陈端林（天津大学毕业）和技术员裴振清（清华大学毕业）大胆设想：自己动手做表盘。

1954 年 6 月初，从华北电力设计院买了一套苏联版的图纸（即今日的 PK-1 图纸），7 月 5 日由老工人肖增带几个青年工人着手试做。试验地设在北京北城（六铺炕）35 千伏变电站施工现场。

制作表盘谈合容易。第一，老工人看不懂苏联图纸，必须由技术员一个个的交待。第二，没有机器设备，全部用手工。这样，8 面盘做了 5 个月。盘做好后经检查验收，符合图纸及产品生产要求，领导很高兴。经安装、试验，该工程于当年 12 月 29 日竣工了。

1955 年 4 月 15 日，修建工程局第八工程队去北京东北部 100 千伏变电站施工。当天，又在施工现场搭了个席棚，调来 4 名电工师傅，继续用手工制

作表盘。不过，有了第一次经验，这次做盘比第一次容易多了，不到5个月，12面表盘做出来了。使该变电站按计划（当年11月15日）顺利竣工。

1956年3月，为了满足现场施工需要的表盘，送变电第二工程局（北京送变电公司前身），从原变电八队调入14名工人，在良乡筹建北京电气修配厂，1957年6月7日，正式成立北京电气修配厂，同年12月3日改为表盘厂。

当时，它是华北地区第一家表盘厂（配电盘厂或开关厂），全国也只有上海华通开关厂和沈阳开关厂两家。所以那时变电站施工，往往由于表盘供应困难，而影响施工进度。

1956年5月，表盘厂从上海公私合营裕记机器厂购入一台3毫米剪板机。工人们高兴了，有了它，铁板下料再也不用剋子剋了。厂里原有手摇冲床1台，砂轮机1台，气泵1台，台钻1台，这是建厂初期的机械设备。

厂房是原有的五栋平房（职工宿舍），平房地面是用砖铺的。后来又搭了两个大棚。

1956年8月1日，电气修厂分配来20名北京电子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充实了电工班。又从社会上招收了35名学徒工，分别充实了钳工班、喷漆班和两个电工班。管理有技术组和管理组，厂长付林泽。到1956年底全厂职工2100余人。

这一年，表盘生产仍然靠手工操作，自从有了剪板机铁板下料省事了。长边用两根大角钢（150mm）做个架子，将铁板用丝杠按事先划好的线夹住、压紧，用大锤打，然后再用平锤找平。开孔用剋子剋，继电器孔用手电钻打，铁板用平锤平，除锈用旧砂轮片、砂纸用手工打磨。当年生产表盘286面，不但满足了本局施工生产需要，还对外加工一部分表盘。

1957年9月，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3面直流盘，由于是出国产品，各工序在生产过程中更是精益求精，以优质产品按期交了货。

1957年11月，电气修配厂购入一台德国产弯边机和两台国产35吨冲床。有了冲床，盘面切角也不用剋子剋了。从此以后，表盘生产品种不断增多，不但能生产控制盘、保护盘，还能生产控制平台，直流盘及各种动力盘、动力箱、照明箱。此时的表盘厂生产的表盘面向全国订货。

1960年，表盘厂开始制做热电厂用的热工盘。

1963年12月，表盘厂开始制作高压开关柜（GG-1A型），面对这高大的开关柜，用手工打锈难度就更大了，必须技术革新。于是在技术改造中，研制一套喷砂设备。建了一个用草席搭成的打砂房。表盘除锈，用气泵将石英砂喷

在盘面上打锈，这比用手工打锈速度提高了许多。

1964年1月，表盘厂承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试验原子弹爆炸急用的两面控制盘。大家春节没休息，各工序连续加班，在假日期间把两向盘做出来了。正月初六上班后，工人们用汽车将两面盘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1964年10月16日，是令人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控制发射原子弹的这两面控制盘，是首都电业职工为加强国防和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的贡献，大家为它而自豪。

1971年2月，开始安装平板机（1970年8月购入），同年9月投入使用，从此，结束了多年来一直去北京开关厂平铁板的历史。

1973年7月，厂里派人去上海华通开关厂学习电泳技术，准备将手工操作喷漆改为电泳漆。1975年10月电泳车间投入使用。从此，盘体除锈不再用喷砂，而是在酸池子里用酸水除锈。盘回漆也改为电泳，这样节省了好多工序，而且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从1973年，由培先工程师用了5年时间边工作边整理仿苏式开关柜结构图3000余张32种。它既方便了使用，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表盘生产过程中，原来用手工开孔，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由培先工程师设计了一套模具，用机器冲孔代替了部分手工开孔。他要实现表盘全部机器冲孔，而原有的冲床没有那么深的虎口，市场上也买不到，于是，1975年6月，他开始设计深虎口冲床。机床设计可不那么简单，没学过机器制造，怎么能设计机床呢？他不畏艰难，大胆地向技术难关冲击。他翻阅、收集、整理了大量技术资料，分析、计算，用了3个月时间边工作边设计，终于将深虎口双柱80吨冲床的全部零件图及总装图设计出来了。

冲床在制造过程中，为了节省开支，由培先同工人师傅共同研究，用现有的50毫米摇臂钻加工，用它代替铣床、镗床。他设计了一个夹具，可以变换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变换角度加工，不到一年时间，冲床制造出来了。随后，他又设计、制造了一个电动定尺。从此，开关板生产达到了半自动化程度。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十多倍。

1981年初，北京供电局决定在配电系统中逐步安装计量柜（高压柜），旨在控制用户定量用电；其次，准确电能计量。它对缓解供电紧张，减少电能漏计，起着重要作用。当时，他们想到技术精湛，对生产开关板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由培先，委托他进行第一批计量柜的设计、试验。经他设计，新产品诞生了。试验品经半年运行，情况良好。

1982年初,北京供电局又要他进行第二代计量柜8个方案的研究、设计。该项目难度很大。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他又勇敢的承担了。他集电气工程师、结构工程师为一身,有基础理论指导,又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再加上他有不惧吃苦的精神,第二代计量柜很快又诞生了。通过运行,供电局高度评价了他设计的计量柜。从此,开关板生产又增加了一种新品种。

这时,表盘厂已能够生产高、低压各种类型的表盘,是具有国内先进技术水平的工厂。

随着技术进步,表盘不断发展,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表盘年产量300面左右,到80年代中期表盘年产量3000面左右。

进入20世纪末期,全国表盘生产和其它行业一样,发展很快,北京市生产表盘的大小工厂共有三十多家。表盘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 房山印刷业的初期发展

李会同 口述 李兰义 整理

我从事印刷工作三十余年，亲历了房山印刷业从石印到机印，从手工到机械化，从半自动到自动化的发展进程，许多情况至今仍然记得比较清楚。

1954年1月20日，我和两位印刷业同行从河北省衡水老家来到房山，办起“建国印刷局”，地址在房山城关南街马家胡同路口。当时，只有一台石印机，一台脚踏铅印机，手工裁纸。由于设备和生产工艺落后，生产能力十分低下。所谓石印，就是把一块长80公分、宽60公分，磨平了的人造石头，放在带摇把的铁架子上用来印字。石印操作程序繁杂。第一道工序是制版，先把桃胶刷在纸上，将纸晾干后写上字，然后把石头擦湿，把写上字的纸铺在石头上，用铁板盖住，再用裹有牛皮的刮板顺着铁板刮一下，把纸揭下来，字就印在石头上了。而后往石头上撒上松香粉，用镏水刷一下，字就烧在石头上了。这样就完成了制版。第二道工序是印材料。首先用湿毛巾擦湿石头，用礞子往石头上滚上油墨，铺上纸，盖上铁板，用牛皮板再刮一下，把铁板掀开，一页材料就印好了。如果印的材料页数多份数多，以上程序需周而复始进行。整个过程，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可操作。我们三个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天晚上点着煤油灯干到深夜，也只能印四开纸500张左右。这种石印方式一直延用到房、良印刷业合并。当时用的脚踏铅印机只能印16开纸。一个人脚踏机器，一只手往机器里续白纸，另一只手往外拿印好的纸，一天能印5000至6000张。那时，印的活儿有供销社的财会单据、发货票，有政府的布告等。石印加铅印，一个月的营业额在400元上下。

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房山县工商联组织个体生产者，成立生产联合体或合作店、组。这年的1月20日，建国印刷局连同房山西街石印部和刻字、修表、照相、修收音机五个行业共15人组成一个混合业生产合作社。照相的王鑫任理事主任，我任监事主任，县工商联派来会计。社员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营业收入集中入账，个人所得按劳分配。在合作社期间，印刷业增添了四开铅字印刷机1台，四开纸裁纸刀1个，脚踏印刷机2

台，人员增至 7 人。承担了县政府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部队的文件、资料的印刷业务。个人收入由单干时的 30 元增加到 50 多元。

1958 年 4 月，撤销房山县和良乡县，成立北京市周口店区，我们这个合作社随着行政区划变动而解体。按行业划分，四家服务业由服务公司管理，印刷归工业部门管理，于 1958 年 5 月，与良乡“华记印刷局”（建于 1956 年）合并，建立了良乡印刷厂，纳入地方国营企业序列，厂址在良乡南街史家胡同。工业局派杨瑞生担任书记，华记印刷局的李文华任厂长，我任副厂长。建厂后，员工增加到 43 人，机器设备有了十几台，后又添置了对开印刷机，全张印刷机，印刷方式得到改进，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1958 年，印刷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7.6 万元，利税总额 5.1 万元。

1960 年 2 月 1 日，撤销周口店区，成立房山县，良乡印刷厂更名为房山县印刷厂。1961 年 1 月，印刷厂从良乡迁到房山城南矿机路。这时期，除了承接本县的业务外，还给北京成文厚帐簿商店印制账册，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学生课本，给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印杂志、书籍。文革期间，还承担了北京市文化局交办的印《毛主席语录》的任务。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业务量不断增加，厂里又先后购进自动印刷轮



房山地区早期的裁纸机（李兰义 提供）

转机、胶板印刷机，已能生产彩色挂历等各种色彩、多样规格的印刷品了。1980 年我退休时，县印刷厂已有职工 208 人，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34.4 万元，利税总额 11.3 万元。产值和利税分别比 1958 年增长了 257% 和 122%。固定资产也由 1958 年的 2.6 万元增加到 84.3 万元。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乡（镇）、村办印刷企业纷纷涌现，印刷业快速发展起来。

几十年中，房山的印刷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步，基本上满足了不同时期社会各界的需要。

# 房山山区的荆编

潘惠楼

房山区的山场范围很大，约占全区面积的三分之二。广阔的山场，生长着许多种类的乔木、灌木，但以荆棵棵为最多。不论土薄土厚，漫山遍野，皆有生长。荆棵棵的枝条，含有一定水分时十分柔韧，干燥后又非常坚固。聪明的山区人民，就地取材，利用荆条，编成许多生产生活用具。

编织用的荆条，采用荆棵棵的茎，最好是当年生长的细长条，等立秋之后方可收割。夏天割的荆条，木质太嫩，编出的物品不结实，只能作为急用品。秋后的荆条，木质柔韧性好，硬度好，结实耐用。用镰刀割下荆条后，将上面的叶和枝杈用手捋下，晾晒一周左右，去掉荆条中的部分水分，就可进行编织了。如割下的荆条不进行晾晒，当时编织，荆条水分多，松脆易折，编出的物品也不结实。秋后割下的荆条，如果来不及编织，也可贮存起来，待到冬闲时再用。那时的荆条已全部风干了，编织前要用水泡上两三天，等到荆条中含有一定水分、达到一定柔软度时方能使用。编织之前，要根据编织物品的需要，对荆条分类，按长度、粗细单独码放，以便编织时得心应手。一般较粗一点的荆条作为编织物品的经条，也就是物品承受主要重量的立起来使用的荆条，约四五根并排列成一组。细一点的荆条作为纬条，也就是横起来使用的荆条，需一根一根地单独穿过一组组的经条压紧。

编织荆条时的工具主要有镰刀、锤子、麻绳。镰刀，用于修理荆条上的毛杈和劈削荆条。锤子，用于砸荆条，以使正在编织的纬条之间减少缝隙，互相联系更加紧密。很多人使用一个长方形约二指宽的铁块或硬木块代替锤子，效果比锤子还好，因二指宽正好是一组一组经条之间的宽度，便于砸纬条的操作。麻绳，用于围拢捆绑编织物的经条，以使经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维持编织物的形状。还有人在编织时准备个小板凳，坐着编。

房山区山区的荆编物品很多，主要有篓子、筐、篮子、粪箕子、拢驮、荆排子、粮囤、鸡笼等。

篓子，是山区人民最常用的人力运输工具。有多种形式，一般为长方形，

口大底小，没固定尺寸，视人的身材高矮需要而定。篓子的高度一般相当人的上身，篓子上口比人肩稍宽，下底与人腰宽相等。在篓子与人背部接触的面上拴两根背带，山区人民称为褡子，连接篓子的上沿和底座，用于把篓子固定在背上。编篓子时，先打好一个长方形的底，起底后立起来的条为经，在经条间横放的条为纬，编到一定高度时，将经条横拧缠在一起相互压紧，形成篓子的口沿，编织的篓子就完成了。山区人民用篓子背土、背煤、背粪、背石头、背庄稼等，用途非常广泛，几乎是家家必备之物。有的人家，家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篓子，大人有大人的背篓，小孩有小孩子的背篓。有的篓子腰部的纬条之间隔开一段空隙，将每组经条旁边的两根向相邻一组的径条靠拢，交叉编有一道“花”，透过花的空隙可以看见篓子里装的东西。这道花，还增加了篓子的美观和形式变化。不编花的篓子多用于背土，以防止土从篓花中漏出。还有一种叫大花篓的，比大水缸还大，篓子腰部编的花有三四道，多用于背树叶、棉花、花秸等体积较大而重量较轻的物品。

荆筐，有大筐、背筐、拉煤筐等很多种类。每种筐还有不同的编织方法，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方形荆筐编织方法同篓子；圆形筐编织时打的底如米字，然后加荆条起底。大筐，圆形较多，高度、直径均将近1米。多用于装水果、装蔬菜，有的煤窑用大筐作为计量工具装煤卖煤，还有人用扁担挑两个大筐运东西。拉煤筐，形如一只倒置的布鞋，底大口小，高约半米，长约近1米，可盛煤二三百斤，固定在拉煤床子上。旧时煤窑，多是从下山往上拉煤，煤筐的鞋跟在前，鞋面在后，好处是筐里的煤不易往外撒。有的人家还爱使用长方形或圆形的小荆筐，作为洗菜筐。

篮子，编织方法如筐，但比筐要小得多，有的如灯笼，有的象宝船，形制多样。篮沿上编有提梁，可以挎在胳膊上。用途广泛，上商店买东西，走亲戚装礼品，到地里摘豆角，去山上打野菜，山区人民都要用篮子。尤其是山区妇女，出门时都爱挎个篮子。山区家庭，几乎每家都有不同形制的很多篮子。有的篮子还编有盖，有的荆编篮子上还加上装饰。在盛产柿子的地区，还编有一种如水桶般高、粗的大篮子，称为嘴子。摘柿子时，将嘴子挂在树上，摘下的柿子放在嘴子里，嘴子装满后，用绳子从树子上系下来有人称为端筐。形状如同簸箕。一侧口敞开，便于向里装物品或倾倒入物品，在立起的沿上两端有对称提梁，便于两手端起。多用于就地或近距离运输物品。如撮土、撮石碴、撮煤、撮粪等。

粪箕子，形状如簸箕。一侧口敞开，在沿上编一个丁字形提梁，可手提，

也可用胳膊挎。可以方便地提起或就地放下，多用于捡粪，所以称其为粪箕子。拢驮，是牲畜驮运的工具，形如大筐，比大筐小，柘圆形。编织时打米字形起底，随着编织的进度，底要逐渐鼓起来。编好后用两根 U 形木棍，将两个拢驮穿起来连成一体，组成个马架子，放在牲口鞍子上。用马、骡、驴驮运土、煤、粮食等物品，多使用拢驮。在清代以前，这是百花山地区大宗物品的主要运输方式。

鸡笼，如同长方形的大筐，但口小。山区人民养鸡，多是散养。晚上将鸡圈入笼内，可防止狐狸、黄鼠狼偷鸡。

荆排子，是用粗荆条编成的如同席状的排子，面积大小根据需要而定。有的作为盖房用的箔，有的用于晾晒东西。有的人还编长方形的大荆排子，卷成筒立起来，用木柱子固定，里面抹上泥，作为粮食囤。有的农村场院，把荆排子捆绑在木头架子上，做成方形仓，存放收获的玉米棒子。这种仓的上面、下面和四个立面都是荆排子，共有六块，因下部悬空，所以六面都可透风，既便于风干玉米棒子，又可以防止野兽、家畜偷吃。马车上用的荆排子，编成柘圆形。将两个荆排子弯成 U 形对接为 O 形，放在马车上作为车厢挡板，便于拉土、拉煤，不易泄漏。有的饲养牲畜和拥有马车的人家，出入的院门较宽，就用荆排子做成院门，便于开关和防止牲畜出院。在京西的煤矿，还将荆排子用于矿井支护，放在支撑的空间，防止岩石和煤的冒落。将荆排子编成筒状，里面抹泥，作为矿井通风用的风筒。有的施工工地，还将荆排子连接起来，形成临时隔断墙，用荆排子挡沙子、挡石灰、挡土、挡煤、挡院子，安装和拆卸非常方便。

在房山的山区，还有人用荆条编成碌碡套，里面放上土或石头，用于农村压场。用荆条编成鱼鳖子，放在河里捕鱼。用荆条编成牲口嘴子，在使用毛驴拉磨时，套毛驴嘴上，防止毛驴偷吃粮食。用荆条编成筷笼子，盛放吃饭用的筷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木材供应紧张，山区人民还用铁丝把粗荆条包上木棍，捆成捆连接在一起，起拱作为盖房的横梁。当时出现的许多半圆形屋顶的房屋，多是用的荆条房梁。有的煤矿用此种方法代替井下支护棚子，煤矿称其为荆筋支架，还曾有外地人到来学习荆筋支架的作法。

在房山的山区，成年人几乎都会荆编。但编织的技艺却有高下之分，编出的物品质量也有很大区别。技术好的人，编出的物品既使用舒适，看着也美观，犹如工艺品。有的人在荆编过程中，有很多发明创造，编出的物品形成许多花样。比如，有的人可以将一根荆条，用镰刀劈开成两根或三根、四根使用，劈开的荆条一面是白色，一面是黑色，编成的物品黑白相间，十分美丽。有的人

编织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熟人一看物品就知道是谁编的。当阴天下雨，无法外出时，很多人就在家荆编。冬天的街头巷尾，常有人一边荆编，一边聊天。荆编技艺较高的人，多是头脑聪明、肯于钻研的人，很容易受到村中人们的敬重，几乎每个村里都有一批荆编的能工巧匠。有的村中还有人以此为业、世守其业。据说，有的青年人就是因为荆编技术好，得到姑娘的青睐并以身相许。许多村里的女人和孩子也会荆编，而且技术不亚于成年男子。

房山区的山区，植物资源丰富，除荆编外，很多人还用桃树、柳树、榆树、葛根、紫穗槐等树木、灌木的枝条编织生产生活用品。有时，还将几种树条综合在一起编织一种物品。桃树条、柳树条作为编织原料，去掉表面的嫩皮，露出白色的木质，编出的物品非常好看。但桃树条、柳树条不如荆条结实耐用。榆树条和葛根条，韧劲大但硬度小，一般不单独编成物品，主要是与其他树条混用。在荆编起底时，荆条多需形成直角，易折，山区人民就利用榆树条或葛根条的韧劲，将榆树条、或葛根条编在荆编的起底处，减少起底荆条的折断。编织用的榆树条，其实多是山榆树条，有乔木，也有灌木。有的地方，生长紫穗槐，其枝条也用于编织。在山区，桃树、柳树、榆树、葛根、紫穗槐等许多树木、灌木，远远不如荆棵棵的生长分布普遍，其编织的物品，在数量上也远远少于荆编。所以当地人笼而统之地都将其纳入了荆编范围。

# 房山的石头器具

潘惠楼

房山区，山区面积约占三分之二。山区多，石头自然就多，石为山之骨。房山区，是北京人类的发祥地，早在石器时代，这里的人民，就以石头制造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生活，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石头与房山区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石头与房山区人民有着不解之缘。聪明的山区人民，在进行自然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过程中，就地取材，以石头为材料，构房架屋，解决了居住问题。以石头为原料，制作了多种多样的器具，方便了自己的生产劳作，改善了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虽然，科技的进步，机器动力的普及，使许多石头器具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但至今，在房山的山区，几乎每个村庄、每个家庭，仍保留或使用着许多石头器具。

石碾，也称为碾子，是山区人民应用的大型石器具，主要用来碾压破碎加工粮食。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般的村庄都有几盘，有的大村可达到十几盘。

碾子主要由碾盘和碾砣组成。碾盘为一圆形平面大石，规格不一。大的直径可达两米以上，小的直径也在 1.5 米左右。高度为 1 米左右，重达万斤以上。如碾盘高度不够，则用石头垫起或垒墙蹲，把碾盘支抬起来。有的碾盘平面上雕刻有规则的扇面形沟槽，犹如机械的齿轮。碾盘的中心处凿有一孔，孔内插放一根铁管，称为碾柱，连接放在碾盘上的碾砣。碾砣也称为碾碾子，圆柱形，直径约半米。有的碾砣上也雕刻有规则的扇面形沟槽，与碾盘上的扇面形沟槽对应，互相咬合，便于物品的碾压。碾砣的两断面分大小头，但大小面区别不是特别明显，不注意细看有时感觉相同。碾砣大面朝外，小面朝里，小面靠近碾柱，这样可增加碾砣转动时的向心力。在大小面的中心，均以矾汁镶上一块方铁，方铁的中心形成一个铁窝子。在碾砣上安装有一四方形木架子，称为碾框。其中靠近碾砣里侧的称为里框，靠近碾砣外侧的称为外框。在里框和外框的中部，各安装有一个朝向碾砣的尖形铁楔，铁楔的突出部分正顶在碾砣断面中心的铁窝子里，使碾砣既能在碾框里转动，又不能从碾框中掉出。在木碾框里框的中部，凿有一立孔套在铁碾柱上并留有空隙，起到中轴的作用，使碾框

在转动时带动碾砣，共同在碾盘上滚动绕圈，又不脱离碾盘。在里框和外框的端头部位，还各凿有一孔。推碾子时，在孔上插木棍，称为碾棍。人工推碾时，一般要两个人。一个人把碾棍插入外框的孔，在前边推；另一人把碾棍插入里框的孔，在后边推，还可以边推边打理碾压的物品。推碾子是很劳累的活茬，总在碾盘周围转圈，单调而乏味。因此推碾子时，总爱找人一边推一边说话，以利解乏。农村的碾子周围，往往聚很多人聊天，是农村的信息中心。还有人役使毛驴拉碾子。在外框的碾棍前套上毛驴拉，为防止毛驴转圈拉碾子时间长了晕倒，还把牲口的眼睛蒙上。为防止牲口偷吃碾盘上的粮食，还给牲口带上嘴子，使牲口的嘴不能张开。碾子一般都是村中的公用品。也有人自家有碾子，但别人用也行，并无收费用一说。

石磨，分为推磨和手摇磨两种。

推磨，是山区的大型石器具，由磨扇和磨盘组成，主要用于磨碎加工粮食。磨盘，为一平面圆形大石，直径 1.2 米左右，高约 1 米左右。如高度不够，需在下部垫石头或垒砌石蹲抬起。磨盘上放置磨扇，同时承接磨扇磨出的粮食。磨扇，为上下两扇，两扇直径、高度基本相同，一般直径为 0.7 米左右，高度为 0.2 米左右。在上磨扇的下面和下磨扇的上面，也就是上下磨扇的接触部位，均雕刻有扇形的沟槽，以使上扇与下扇互相咬合，便于磨压物品。下磨扇的上面中心安设有一固定铁轴，上磨扇的下面中心有一铁窝子，套在下磨扇的铁轴上并留有转动的空隙，还可防止上下磨扇在转动时脱离。在上磨扇中心的不远处，凿有两个贯通的立孔眼，孔眼直径如乒乓球大小，用于往孔眼里放加工的粮食。其中，靠外侧的孔眼用于磨粗粮，靠里侧的孔眼用于磨细粮。在上磨扇的轴面横凿进两个斜孔，用于插推磨的磨棍。操作时，一人推磨，一人徐徐往上磨扇的孔眼里放粮食，磨好的粮食从两个磨扇之间徐徐流出，落在磨盘上。也有的人在磨棍前套毛驴拉磨。

手摇磨，也叫小磨。规格不一，操作简便。一般是家庭用品，放在屋内炕头或院内台阶上，用于磨粮食、磨豆腐、磨油料。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磨扇，下为磨盘。磨扇圆形，上有孔眼，用于往里放粮食。但突出一块，突出部分有一立孔，用于安木把摇磨。磨盘则与推磨的磨盘形制大为不同，这种磨盘是下磨扇和磨盘的结合体。其中间部位突起形成下磨扇，与上磨扇大小相对应；其周围却形成一个圆槽，承接磨出的物品，还有一个敞口，便于从槽中取出磨好的面或油。磨扇的下面和磨盘的上面均雕刻有沟槽，便于咬合碾压。磨扇下面的中心也安装有铁窝子，磨盘的上面中心也安装有铁轴，防止磨磨时上下脱



离错位。手摇磨操作，很需要臂力，一手摇磨，一手往磨扇的孔眼里放粮食。手摇磨大者，磨扇不过 0.5 米，磨盘不过 0.8 米，重量可达百斤。手摇磨小者，如同饭碗，可以磨芝麻，但多成为玩具，已失去实用价值。

有的人还用废弃的磨扇吊木杆子。山区收获核桃时，需要用拇指般粗的结实木杆子往下打，这木杆称为核桃杆子，多用枣木或苦黎条。刚砍下的枣木或苦黎的杆子水分大，经常有几道弯，当时不能用。为了把弯弄直，就将含有水分的木杆吊在高处，小头朝上，大头朝下，再将一个废弃的磨扇拴在大头上吊起来，以磨扇的重量拉直木杆，经过十天半月，木杆中的水分风干了，木杆也比较直了，就可取下使用。

石碌碡，也称为石碾子，是农村压场的脱粒工具。圆柱形，直径约 0.3 米，高约 0.6 米，上面凿有沟槽或麻坑，两头断面中心安设有铁窝子。用方木做成碌碡框，其中两条边框中部各向里安装尖形铁楔，顶住碌碡两个断面的铁窝子，作为轴带动碌碡滚动。碌碡框的两条边框上可以拴绳索，用于人力或物力拉动碌碡。

石砘子，也称石碾子，是种地保墒工具。形状、大小如同大哈密瓜。在两尖头的圆心处安装有铁窝子，用铁弓子卡在铁窝子上，连上绳索，以人力或畜力拉动。播种填埋后，拉动石砘子把土压实，以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

石杵，为砸地的工具，多用于修路或房屋等建筑的坚固地基。有梯形和圆形两种。梯形石杵为长方形，下大上小，一般高约 0.8 米，下边长约 0.4 米，上边长约 0.2 米，重达 100 公斤。在两侧距顶部约 0.1 米之处，各凿有一个约二指多宽、一指多深的沟槽。在两个沟槽内各夹入一根长约 0.8 米的木棍，并用铁丝或麻绳与石杵绑紧。砸地时，需两人或四人操作，手握木棍将石杵提起再放手放下，以石杵本身的重量下落砸地。圆形石杵，直径约 0.4 米，厚约 0.2 米，重约 50 公斤。石面中部有孔，穿上绳子，捆住石杵，留出的绳头至少长度 1 米以上，至少要拴上四根绳子。操作时至少四人，每人拽一根绳子往外拉提，用大家的拉力和提力将石杵提起，再放手，石杵下落砸地。也可多人操作，但必须每人都有一拽绳。无论梯形或圆形石杵，四人以上人数操作时需有人喊劳动号子，以使操作人员随号子声共同用力，劲往一处使。否则，用力不一，不但抬不起石杵，还不安全。

石槽子，有水槽、煤槽子、猪槽子等多种。

石水槽，有两种。一种为引水槽。长方形，长度约 1 米，宽约 0.3 米，高约 0.3 米。平面中间有半圆形下凹，形成沟槽。铺设时有一定坡度，节节相连

如接龙，每个水槽的上断面处向内多凿出约 0.05 厘米的深窝，下断面处伸出 0.05 米的接头。铺设时，将上一节水槽的接头压在下一节水槽的深窝上，可以防止流水通过两个水槽相接处漏水。有的村庄以此法将山泉水引入村中，形成了“自来水”。另一种水槽为储水槽。在石头的平面凿成坑，坑中储水。其形状多样，槽的深浅也不一。有圆形储水槽，有方形储水槽，有长方形储水槽。有时是按需要特意制作，有时是因石赋形制作。储水槽的槽深也视需要而定。有的长方形水槽有两米多长，半米多宽，特别适于群羊、群猪和牲口饮水。在磁家务村后场院内，原来有一个储水槽，长有两米，高有一米，槽深约 0.8 米，两个人可以坐在里面洗澡，可以储存几立方的水，据说是为骆驼饮水用的。大多数储水槽的槽底部都凿有一个孔，储水时用一个木头楔子裹上布插入孔内，使水槽不漏水。拔出木楔，水槽内的水会自动流出。过去的村中井台旁边、饮水泉旁边，多有石头水槽子，供人洗衣、洗菜或家畜饮水用。有的人在家中或河边洗衣服时，还将湿衣服放在平整而有坡度的石头目捶，这块石头被称为捶布石。

石猪槽子，用于喂猪盛猪食。没有固定尺寸，有大有小。一般家庭养猪，也就是一两头，使用小猪槽子既可。集体养猪，数量多，就用大猪槽子。猪槽子的槽深一般也就 0.2 米，不能太深，否则，猪食放进槽内后，猪爱乱拱，搅得猪食四溅。

石煤槽子，用于和湿煤用。也没固定尺寸，一般槽深 0.3 米，长、宽各约 0.5 米，一次可存入百八十斤的煤。和煤时，将煤与一定比例的黄土与水搅在一起，用煤铲或煤锨搅拌成均匀的稠泥状既可。冬天，为防止和好的湿煤冻结，有的人家还将煤槽子搬入屋内，放在墙角。小点的煤槽子，也可以和猪槽子互换使用。

石臼，为在石头上凿成槽或坑的石器。有粮食臼、药臼等。粮食臼多为圆形，在槽或坑中放入原粮，然后用小于槽坑的石杵捣米或舂米，将原粮在槽坑中加工捣碎。药臼，有元宝形的，里面是沟槽，将药材放入槽内，以石碾子在槽内滚压，将药材加工破碎。有的沟槽形药臼长达 1 米有余，槽内的石碾子有篮球般大小。药臼主要是圆形的，里面是坑，将药材放入坑内，用小于石坑直径的石药杵子捣药。此种圆形的药臼，大者如大缸，小者如碗碟，形制多多。还有捣蒜用的小蒜臼子，也是圆形。

石罄，形状如缸。多为矮胖形，肚大，口沿有收缩。家庭少见，多在庙中使用。有的庙将其作为香炉。有的庙中还制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的石制香炉。

石缸盖，为圆形石板，直径视缸口沿大小而定，厚不足一指，能盖住缸沿即可。多用于淹菜缸。河北镇东庄子村、李各庄村产的缸盖最佳，据说用此地产的缸盖盖菜缸，淹出的咸菜好吃。城里的许多酱菜厂都到东庄子村、李各庄村预订石缸盖购买使用。在淹咸菜时，为防止缸里的菜发酵后起浮，还要用一块圆形的石头放在缸内压菜，这块石头称为压菜石。

石桌面，有人制作桌子，在桌面上镶一石面，非常美观，且不怕火烫、水烫。上世纪6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木材供应紧张，许多学校缺少木桌，就以砖砌石蹲，上铺石桌面，作为学生课桌。

石凳，将石头雕刻成鼓状，中间稍粗，上下两个断面磨平，高约0.5米，上下两个平面直径约0.3米。多为花园或较富裕人家在庭院中使用。

磨刀石，种类很多，大小不一。磨铡草用的大铡刀磨石，长可1米，宽约0.7米。磨削铅笔刀的磨石，则有手指大小即可。磨刀石的石质，多为砂岩，据说砂岩杀铁。磨刀时洒上点水，可消除磨刀时产生的热量，防止烫手。用盐水磨刀，可加快磨刀速度。一般磨大刀用粗砂岩，磨小刀用细砂岩，开粗刃用粗砂岩，磨细刃用细砂岩。用得最多、最广的是磨菜刀用的磨石，一般为长方形，长约0.4米，宽约0.2米。无论粗砂岩还是细砂岩，作为磨刀石使用，都需石质均匀，不能含杂质，否则容易崩刀。

拴马石，旧时山区人家，运送大宗物品，多靠马、骡、毛驴、牛、骆驼。许多人家，都养有这几种大牲畜。为防止牲口乱跑，在家门口多设拴马石，其种类很多。有圆柱形的，埋在地里，地面部分可高出近两米，直径约0.2米，作为拴牲口缰绳之用。有的如石蹲，规格不一，或方或圆，或高或矮，或大或小，一般高约0.3米，直径0.4米，上面有镂空或雕刻出的环，便于拴牲口的缰绳。有的拴缰绳部位雕刻成猴子形状，在猴子的腿部或胳膊部位镂空成环，其喻为马上封侯。有的石蹲上镂空有四个石环，可同时拴几头牲口。有人将砖头大小的一块长方形石头镂空，形成单独的石环，垒在院门外的墙上，作为拴牲口用。有的大户人家，院门外预备几个石环。

石敢当，全名为泰山石敢当。是镇物，是在一块石头上刻出“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这几个字。旧时盖房子，受地形限制，只能盖厢房而无主房，就在院子应该盖主房的位置，立一块“泰山石敢当”作为主房。有的院子出门迎面是墙，无建影壁位置，就在墙上朝院的方向立一块“泰山石敢当”，作为影壁。

山区人民还以石头制作文化用品，主要有石画板、石笔、砚台、镇尺等。

石画板和石笔，都是书写工具。上世纪初，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生写字缺少纸张，就以青色石板代练习本，用白色石条代笔，在石板上写字画画。以后这种青石板的规格逐渐统一，并且被加上了木框，称为石画板。白石条的规格被统一，称为石笔。直至上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房山的山区学校仍有学生使用石画板和石笔。石画板以河北镇黄土坡产的最好，在六七十年代是房山县的出口产品。黄土坡有专门生产石画板的工厂。将石材从矿坑中采出后，以机械加工成长约 0.4 米、宽约 0.2 米的长方形板材，四周镶以木框，可以两面使用，放在书包里。木框上面拴上绳儿，学生上学下学，可以像背书包一样把石画板挎在身上。画板上加木框，可以防止石板的边缘割手，将石画板放入书包时割破书包。石笔，原有人用白马牙石，后来用叶腊石。叶腊石，石质软硬适度，且白，在石画板上写字清楚，易写易擦。叶腊石石笔的制作，是把矿坑中采出的石块，用专门的锯锯成长 10 厘米、粗约 0.4 厘米的长条即成。每 50 根石笔捆成一把，装盒出售。据说房山区周口店镇、河北镇都曾有生产，尤以周口店镇黄山店的叶腊石最好。

砚台，为文房四宝之一，唯河北镇东庄子村生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庄子村曾有制砚厂，产品为青石砚，有多种规格。有的砚盖上刻有图案或诗文，有的还专门在砚上刻拥有者的姓名。此地矿坑，石质细腻温润均匀。所产石砚，研墨时容易发墨，很受文人青睐。

石镇尺，也称镇纸。是写毛笔字或画国画时压纸的用品，以使纸张平整稳定，便于书写或画画。一般为长方形石条，长约 0.3 米，宽、厚各约一指稍多。房山很多产石头建材的地方和产石制品的地方，都捎带着产镇尺，不作为主产品。其中，大石窝、高庄一带村庄产镇尺较多，多以汉白玉石制作，石质均匀，抚之温良舒适，予人以宁静淡雅之感。

山区人民还以石头制作体育用品，主要有石锁、石杠铃、石球、棋盘等等。

石锁，是将一块石头雕刻成锁的形状，上有提梁。大石锁重达百斤，小石锁也有二三十斤，锻炼时将石锁提上放下，或提起在身边舞动。有的村庄还专门有石锁会，是民间花会的一种，在节日或集会时组织会员玩耍石锁，表演石锁技艺。由于经常锻炼，表演的人多是孔武有力的壮汉。还有人在两个形似磨扇的石头中间凿眼，穿在一根木棍的两端，作为举重的杠铃。有的人将石头制成比乒乓球稍大的圆球，握在手里把玩，锻炼手劲和腕力，灵活手腕。一般一个人的一只手中只能攥两个石球玩，有的人一只手能攥 4 个石球玩。

房山区的石头器具多，也就出现众多的石匠。制作体积较小、重量较轻的

石器，石匠可以在自己家中、客户家中或作坊中制作。制作较体积较大，重量较重的石器，石匠需到现场制作。尤其是制作石碾子、石磨等大型器具，选材、开采、运输、制作等都是很困难的，石匠需要有很高的技艺。发现可以做石碾或石磨的石材后，要先把石材从土中取出，或从连在一起的山石上撬下，形成独立的石料。再把石料的四周去掉，形成制作物品的大概轮廓，也就是石坯。然后把石坯运到使用物品的地点再进行细加工。运输时，碾碾子的坯料可以直接用滚动方法；磨扇的坯料要在正中凿眼，插上一根木棍立起来滚动，如果滚动时歪倒，两边都有木棍支地，可减少磨扇的坯料直接接触地，坯料不易摔坏；碾盘的坯料太大，运输前也需在坯料中间凿眼，拴上钢丝绳或大绳，然后用绞盘人工绞拉。一个大碾盘坯料，一般都要有十几个人运好几天，才能从山上运下来。有时，运输的道路较窄，还要先修道路。有时碾子的使用地点在高处，还要用绞盘往坡上拉，更为费力。运输坯料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还要精心操作，不能使石料在运输过程中遭受毁坏。坯料运到使用地点后，石匠再对坯料进行深加工，制作成碾子或石磨。在房山的圣莲山南庙前，有一盘石碾，其周围都是悬崖峭壁，碾盘重达万斤，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古代，如何运输至止，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制作石器的工具，主要有大锤、手锤、铁撬棍、钢钎、铁楔、铁凿子等。大锤，用于开采取石时打砸铁楔、钢钎、铁楔，打砸石坯料的多余部分。手锤，用于击打铁凿，将坯料铲出平面，雕刻磨扇、碾盘、碾碾子上的扇形沟槽。铁撬棍，用于开采取石料。

房山地区人民盖房屋，使用最多、最广的原料也是石头，并把石头加工成石材。主要有砌墙用的料石，做台阶或铺窗台面、地基面的阶条石，铺在房顶防止渗漏的石板，铺设土炕用的连板石，用于美观装饰的文化石等。房山还盛产汉白玉等石料，用于建筑和各种艺术雕刻。以石烧大灰，作为建筑粘接材料。但这些多为石材或建材而非石器具，本文就不详细介绍了。

# 房山地区供电网络的建设和发展

章世铭

北京市房山区原来是属于河北省的房山县、良乡县，1958年3月才划归北京市管辖，1958年5月房山县和良乡县合并为周口店区，后改为房山县，又改为房山区。房山地区供电网络的建设和发展，在北京市远郊区县中是比较早的。

北京地区有电，已有百年历史。但民用电是从1906年在前门西城根建设前门发电厂开始的。当时配电线路只是布设在市内前门、东城、西城重要繁华地带。对外开始营业时，用户仅数十户，供电范围很小。随着北京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用电需求不断增加，前门发电厂曾三次增加容量，已无地再扩建，遂于1922年建成石景山发电厂，同时建成石景山至前门33千伏输电线路和33千伏前门变电所，从石景山发电厂向北京送电。这是北京地区建设33千伏供电电网之始。截至1937年，北京地区的供电范围也仅是城区、关厢，以及青龙桥极少数近郊区，房山地区还没有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为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需要，供电设备和供电范围不断增长和扩大。1938年建成长辛店33千伏变电所，1939年建成丰台33千伏变电所，1941年建成南苑临时军用33千伏变电所。日伪时期，北京地区除前门发电厂和石景山发电厂为公用发电厂外，还建有20座厂矿、企事业单位的自备发电厂。其中最大的3座自备发电厂是通州电车公司自备发电厂、石景山制铁厂自备发电厂和琉璃河水泥公司自备发电厂。

琉璃河水泥公司自备发电厂于1938年开工建设，1942年建成发电。这可以说是房山地区用电的开始。1943年开始建设长辛店变电所至琉璃河水泥厂变电所33千伏长琉线，于1944年4月竣工投入运行，琉璃河水泥公司自备发电厂与北京电网联网运行。1944年10月良乡变电所竣工，同时建设良乡33千伏支线，于长琉线的143号杆T接引入该所。此后，只在良乡和琉璃河地区建设了很小范围的5.2千伏配电线路和配电设备。

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三年多时间，整个北京地区的输变电设备基本没有什么变动，只是对原有的供电设备进行了一些更新改造工作。至 1948 年底，北京地区的供电范围是以城区为中心，东至通州，南至南苑，西南至丰台、长辛店、良乡、琉璃河，西至门头沟，西北至青龙桥，北至清河。全房山地区只有 33 千伏输电线路 22.97 公里，33 千伏变电所 2 座，总容量 3200 千伏安。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房山地区供电电网建设不断得到发展，根据地区特点，基本上是以树枝形，向内深入，向外延伸，逐步布设，从平原发展到山区、深山区。房山地区的 35 千伏供电电网的建设，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至 1962 年，这一期间重点是对县镇和主要厂矿供电进行建设，将全部 33 千伏电压等级的供电设备，统一升压为 35 千伏电压等级。1949 年，为向周口店采石厂供电，将长辛店至琉璃河线路和良乡支线，改建为长辛店至良乡线路和良乡至琉璃河线路，并建琉璃河至周口店线路，向周口店采石厂变电所供电。1953 年，为向 12 号电台供电，建设长阳变电所，先 T 接于长良线，1954 年改建为长阳至良乡线路和长辛店至长阳线路。建设南苑至长阳线路，从长辛店、良乡和南苑分别送电。1955 年，为向 13 号电台供电，建设 13 号电台用户变电所，同时建设长阳至交道线路，1957 年又建良乡至交道线路，分别从良乡和长阳供电。1956 年，为向房山矿供电，建设房山矿用户变电所，同时建设石景山发电厂至房山矿线路。1956 年，为向 601 站供电，建设房北线，从房山矿供电给 601 站变电所，1957 年从良乡建设良北线，供电给 601 站的另一座变电所，并建设两座变电所之间的联络线。同年，建设房山至长沟峪矿线路，向长沟峪矿用户变电所供电。1958 年，将长阳线 and 南阳线，改建为南苑至丰台线路、丰台至长辛店线路和永定机械厂至长阳线路。同年，建成良乡至顾册线路和顾册 35 千伏变电所，1959 年改建为良乡至房山线路和房山变电所。1960 年，建设房山至张坊线路，后建设黄岩井 35 千伏变电所，房张线改建为房山至黄岩井线路和黄岩井至张坊线路，供给房山县南部偏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

这一时期，北京市房山县还向河北省一些地区供电。1952 年，建设琉璃河水泥厂至涿县线路，向河北省涿县供电。1953 年，建设涿县至定兴县线路，从琉璃河通过涿县向定兴县供电。1960 年，又从涿定线中间 T 接线路向河北省高碑店地区供电。

第二阶段，从 1963 年至 1975 年，重点是为主要厂矿和农田电力排灌设

施供电。1963年,在房山地区北部,建设磁家务35千伏变电所,将石景山至房山矿线路改建为石景山至磁家务线路和磁家务至房山矿线路,并建设良乡至磁家务线路,磁家务分别从石景山、良乡、房山矿供电。1963年,在房山地区南部,建设元庄35千伏变电所,建设良乡至元庄线路,从良乡供电。1969年,建设栗园变电所,同时建设房山至栗园线路。1970年,在房山地区西部,建设霞云岭35千伏变电所,同时建设栗园至霞云岭线路,向霞云岭山区供电。1970年,为了大灰厂地区工业用电,将石景山至磁家务线路引入大灰厂35千伏变电所,将石磁线改建为石景山至大灰厂线路和大灰厂至磁家务线路。1972年,建设陈家坟煤矿35千伏变电所,同时建设磁家务至陈家坟线路,向陈家坟煤矿供电。1972年,改建房山至长沟峪矿线路为栗园至长沟峪矿线路,改从栗园向长沟峪矿供电。1972年,北京燕化动力公司第一热电厂投入运行,这是东方红炼油厂二期扩建和新建胜利化工厂工程的配套项目,先后建设6条35千伏用户线路,栗园变电所各厂用户变电所联接。1972年,石楼油泵站建设用户变电所,同时建设石楼用户支线,T接于栗房线,建设房山至石楼线路,从房山向石楼供电。1972年,阎村油泵站建设用户变电所,同时建设阎村用户支线,分别T接于良磁线和房良线,向阎村供电。1973年,北京电力修造厂建设用户变电所,同时建设良造线,从良乡供电。

第三阶段,1976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相应的加快了35千伏供电电网的建设,将电网布局进一步伸向山区。在房山地区东南部,1977年,建设窦店35千伏变电所,用支线T接于良琉线。1978年,建设窗纱厂用户变电所,T接于琉涿线,最后改T接于吉琉线。1979年,建设窦店砖瓦厂用户变电所,1980年将良元线破口引进该站,改建为良窦线和良元线。1985年,110千伏吉羊变电所投入运行,1986年将良琉线破口引入吉羊变电所,改建为良乡至吉羊线路和吉羊至琉璃河线路,使良乡与吉羊相联,并经吉羊向琉璃河送电。1986年,窦店支线改T接于良乡至吉羊线路。1979年,在房山地区西南部建设红光机械厂用户变电所,用户支线T接于栗房线,后新建福红线,从福庄供电。原支线T接于福采线。1979年,建设59334部队用户变电所,支线T接于福采线供电。1976年,建设五侯变电所。1984年,建设新街变电所,先分别建支线T接于房山至黄岩井线,后改分别T接于福庄至黄岩井线和福庄至红光线路。1981年,在房山地区西部建设87403部队用户变电所,同时建设霞云岭至堂上线路。1985年,将栗霞线改建为福霞线,改由福庄向霞云岭变电所供电。1987年,建设史家营变电所,并架设支



线，T接于霞云岭至堂上线路。1978年，在房山地区西北部建设班各庄35千伏变电所，并架设磁班线路，从磁家务供电。1978年，建设建筑塑料制品厂用户变电所，先支线T接于栗房线，后改建福塑线，从福庄供电。1979年，建设大安山35千伏变电所，并架设线路，从大安山煤矿供电。1976年，在房山地区北部建设万佛堂煤矿用户变电所和用户线路，从磁家务供电。1977年，建设水泥二厂用户变电所和用户支线，从磁家务供电。1978年，建设化肥厂用户变电所，支线T接于良磁线，从良乡供电。1979年，建设北京送变电公司用户变电所，支线T接于良乡至修造厂线路。1979年，建设大富庄变电所，支线T接于磁家务至大灰厂线路，1983年退出运行。1985年，在房山地区南部长沟峪煤矿改建福庄至长沟峪线路，改从福庄供电。1986年，建设矿务局炼铁厂用户变电所，支线接于良福闫支线供电。

房山地区的110千伏供电电网建设，开始于1958年。由于城镇建设、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用电需要急剧增加，33千伏供电电网已不能适应用电增长的需要。1955年，北京市110千伏供电电网开始投入运行。1958年，在房山地区将35千伏良乡变电所升压扩建为110千伏良乡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2万千伏安，同时建设110千伏苑良线，从南苑向良乡供电。这是北京市远郊区县建设的第一座110千伏变电所。该站投入运行后，为煤炭矿井、采石厂、水泥厂、2座电台以及401所等用户用电，增加了供电能力，提高了供电安全可靠。1959年，为使北京地区110千伏电网与河北省保定地区110千伏电网联网运行，建设110千伏良保线。1960年，云岗507发电厂建成发电，建设110千伏良东线，从507发电厂直接向良乡供电。1964年，从良乡至保定的良保110千伏线路，在高碑店地区断开，接入河北省管辖的高碑店110千伏变电所。

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为北京市第一座大型石油加工工厂，其用电量较大，为保证该公司自备发电厂的安全可靠性，提高向该公司供电的能力，1969年，建设栗园110千伏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8.15万千伏安，相继从507发电厂以东炼110千伏线路和从高井发电厂以高炼110千伏线路向栗园供电。1973年，建设良东二回110千伏线路，从507发电厂双回线向良乡供电。1975年，前进化工厂建设110千伏用户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8万千伏安，建设2条用户支线，分别T接于高炼110千伏线路和东炼110千伏线路。1977年，将35千伏房山变电所扩建升压为110千伏，安装主变压器6.3万千伏安，从良高线T接入站。1984年，房山110千伏变电所改称

福庄变电所，建设房福 110 千伏双回线，从房山 500 千伏变电所向福庄供电。原去高碑店的 110 千伏线路，T 接于房福线。1984 年，建设 2 条良房 110 千伏双回线，从房山 500 千伏变电所向良乡供电。1985 年，建成吉羊 110 千伏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 7.65 万千伏安，先是建吉羊支线从房福高支线 T 接入站，1987 年改建为用支线从良福线直接 T 接入站，1988 年又新建福吉线，从福庄直接供电。1988 年，建成南尚乐 110 千伏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 3.15 万千伏安，建设福尚 110 千伏线路，从福庄供电，增加了房山南部地区的供电能力。1986 年，将燕化栗园 110 千伏变电所原高炼线、东炼线改建为两条用户支线，T 接于吕村至大灰厂 110 千伏线路。

房山地区的 220 千伏供电电网和北京地区一样，起步较晚。1971 年北京地区第一条 220 千伏线路才开始投入运行。在房山地区，1975 年即开始着手筹建房山 220 千伏变电所，并确定建设南苑至房山 220 千伏双回线路。1980 年，建成苑房 220 千伏双回线。1984 年，建成房山 220 千伏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 12 万千伏安。为了建成北京地区 220 千伏双回环网，1985 年，建设房山至吕村 220 千伏双回线路。1986 年，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建设 220 千伏用户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  $2 \times 12$  万千伏安，建设双回 220 千伏用户线路，从房山变电所以 220 千伏向用户供电。1986 年，房山变电所 220 千伏第 2 号主变压器 12 万千伏安投入运行。至 1988 年，北京地区已建成了 220 千伏双回闭式环形供电电网，房山变电所是闭式环网中的一个主要枢纽站。

北京地区的 500 千伏超高压供电电网是从房山地区起步的。在 1971 年和 1974 年，北京市编制的规划中，将建设 220 千伏房山变电所列为建设项目之一。1974 年，水利电力部批准建设 220 千伏房山变电所，选址为北京市房山县大紫草坞乡西坟上村。就在 220 千伏房山变电所初步设计提出后，有关单位考虑到酝酿多时的建设 500 千伏晋京输变电工程，其北京受电端的 500 千伏变电所，站址亦选在房山县。为避免在同一地区建设 500 千伏和 220 千伏两座变电所，决定将两座变电所合并为一座变电所。500 千伏房山变电所的建设设计决定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 220 千伏部分，在这部分设计中，考虑区域变电所的特点，尽量压缩 110 千伏进出线的回路，简化 110 千伏主接线的结构；第二期设计为 500 千伏部分。1979 年 10 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建设“晋京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作为“六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从山西省大同第二发电厂建设 500 千伏大房输电线路，将电源输送到北京房山，在房山建设 500 千伏变电所。由于 500 千伏电气设备国内外选用订货的几次

变动，影响了工程的设计与工期。1984年，大同至房山一回500千伏输电线路竣工。1985年房山500千伏变电所竣工并投入运行。1985年，大同至房山二回500千伏输电线路投入运行。1986年房山变电所至天津北郊变电所500千伏输电线路竣工。房山地区500千伏大房一、二回线、房北线和房山500千伏变电所的建成，是北京地区以及华北地区500千伏供电电网建设的起点，从此开始了华北地区500千伏超高压大电网的建设。

# 解放前后房山县粮食管理纪略

王硕儒

粮食是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房山县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机构的领导下，十分关注粮食的生产、储运和管理工作，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 农民的反抗和“夺粮”斗争

在旧社会，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生产粮食的土地和储备粮食，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少一点土地和粮食，或是既无土地又无粮。全县各村情况基本相同，山区较平原更严重些。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少数地主，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则只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山区王家台村有七十来户农民，有土地五百亩，其中四户地主占去四百五十亩，而六十多户农民每户平均占地不足一亩。北尚乐村地主杨家和东营村地主纪家，均有土地三千亩左右，顾册村地主李望之有土地四千亩，不仅在本村有大量土地，在顾册附近的村庄都有李望之的土地，人称“顾册李”，李望之还大量收购、贩运粮食，“大斗进、小斗出”，人又称“斗子李”。有些地主不但占有大量土地和粮食，还兼营工商业，少数官僚地主，倚权仗势，独霸一方。

抗日战争爆发前，由于代表封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房山人民始终处于贫困不堪之中。特别是地主阶级通过收取佃户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压迫广大农民，农民辛勤一年的收成要把三成到五成交给地主。如果遇到自然灾害，贫苦农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要用更高的代价向地主借贷，直至外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冻饿而亡。

“民以食为天”。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穷苦农民进行反抗和斗争。1899年大水灾，粮食颗粒无收，贫苦农民无生路。西东村穷人曾手拿锄头涌进地主韩庆西家，把韩家粮食分光。1920年大旱，自春至夏无雨，房山县一带忍饥待食者不下十万人。西东村贫苦农民再次涌入地主韩庆西家，分

了韩家的粮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房山大雨成灾，大石河山洪爆发，北窖村土地欠收，窑业凋敝，半靠种田半靠下窑为生的北窖村贫苦百姓，到青黄不接时有许多家断了粮，把山上的野菜、树皮都吃光了，不少人被活活饿死。在这种情况下，以陈国忠、孔凡昌、刘大转、张三元等人为首，联合部分贫苦农民去向财主家借粮。财主不借，还辱骂农民。贫苦农民忍无可忍，组织起“穷人党”，公开到财主家“夺粮”，在村西庙场支起大锅，准备熬粥解救濒于死亡的穷人。农民的行动，使土豪劣绅心惊胆颤，他们秘密开会，组织起“富人党”，以申某、李某为首，并和村保卫团头目孔某勾结，携带枪支、木棍、镰刀向穷人党下了毒手。穷人党首领孔凡昌、刘大转、曹瑞堂相继被害。这次“夺粮”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更激起了贫苦农民的反抗。就在酝酿更大的斗争时，响起了抗日战争的枪声。

### 解放区的粮食管理

房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隶属于平西抗日根据地，是解放区的一部分，先后分别设立房良联合县、房涞涿联合县、昌宛房联合县和房山县，由县到区、到村建立了一整套粮食管理机构，县政府设财粮科、区公所设粮科助理员、村公所设粮科委员。粮库有管库员，具体负责粮食生产、征集、储存、保管等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房山抗日根据地地处山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有限，给驻军、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封锁或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1941至1943年，房山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大生产运动等各项政策和措施，渡过了难关，部队每人每天的口粮降低到十二两（当时十六两为一斤）。

#### 一、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房山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开始就发动群众开荒种地，拒马河两岸村庄的驻军和群众先后在干河口、西关上、六渡、七渡、西河、平峪等沿拒马河河滩开荒砌堰，利用雨季拒马河河水上涨时挟带的泥沙淤地造田，插种水稻。1943年，县、区党政机关分别下达生产任务，要求县、区干部除领导人民生产自救外，必须实际参加生产劳动。部队官兵、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开荒种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增产了粮食。驻秋林铺村的部队官兵集体开荒4000多亩，种谷子、荞麦、土豆等。鸳鸯水村组织的价工组除正常生产

外，集体开荒很多，约可增收粮食 30 石。区、村抗联、民兵、妇女等群众组织，都集体开荒，解决本团体的经费开支问题，特别是民兵，通过开荒解决民兵战粮的占多数。据 1944 年的粗略统计，除驻军开荒外，全县新开荒地约 5000 亩，生产粮食约 4000 石，为抗日根据地解决了大问题。

## 二、粮食征集

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粮食征集是通过税收的形式进行征集。晋察冀边区自晋察冀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那天起，就废除了旧的苛捐杂税，实行了合理负担。经过两年的过渡，从 1940 年 8 月开始，实行了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把财产税、所得税、营业税都融合在一起，征收税额以米计算。有起征点，起征点以上按税等累进，基础越大，税率越高。统一累进税是直接税，是向财产所有人直接征税。群众缴税以粮、株、钱三种形式缴纳，征收重点是粮食，其次是粮食以外的其他实物，无粮无其他实物的才收取现金。

由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区域狭小，又处于深山区，地瘠民贫，物产有限，税源不足，靠根据地、解放区的税收，很难维持军民的生活需要。因此，不得不到游击区、敌占区征粮，从敌人手中夺粮。到游击区、敌占区征粮的方法主要是依靠人背、牲畜驮的办法，少量的是通过敌占区地下共产党员、伪保甲长或商人为我根据地、解放区秘密送粮。1940 年粉碎敌人春季“扫荡”之后，房良联合县、特别是房山区二渡、平峪、马安一带，已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1940 年春，房良联合县政府在镇江营村建立了交通运输站，以保障上级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当时专区决定：镇江营村附近十里以内村庄，不分县界，人力、畜力统归镇江营交通站调动，专供转运抗战物资之用，随到随运。同年 5 月，宛平、房良、涞涿联合组成了畜力运粮大队，牲畜由各县抽调；宛平 100 头，房良县、涞涿县各 200 头，以骡马为主，抽谁家的牲畜由谁家去人驱赶。各地征集粮食后，通过其县政府送往各自指定地点。运粮大队住在张坊、片上、沈家庵、穆家口村一带，分别去涞水县城、长沟良各庄，最远到新城县征粮。在麦收时节，原准备去新城县征麦。从张坊出发，由部队护送，经涿县，过铁路，走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到新城。在新城驻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才往回走，每天骡子运 8 斗小米(160 斤，因小麦尚未打轧完)。回来过铁路时碰上敌人的巡逻车，由于有主力部队掩护，未受损失。

1940 年麦收后，我县、区干部、游击队和主力部队密切配合，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到根据地外去征粮。7 月 4 日，我军某部第五中队队长刘义元率 40 余名战士配合县、区干部到新街村征粮，令新街村伪村公所办事人员迅速通知

附近各村，限各村于 15 日前将公粮交齐。7 月 27 日，县政府财粮科科长刘耀带一名工作人员到周各庄、瓦井、岳各庄、龙门口、尤家坟催公粮，限每村每日交公粮不少于 1000 斤。当时，房山县伪军头目孔宪江驻长沟，他慑于我军的威力和人民抗日热潮，不敢出据点骚扰。为使孔宪江不干扰抗日工作，县委（当时为房涞涿联合县）书记杨流萤、县长刘介愚到长沟坟庄村同孔谈判，向孔提出：“不得妨碍我抗日根据地对长沟镇以东的抗日征粮工作，孔宪江答应：“照办”。

1942 年，我县、区干部继续到敌占区催粮，让伪保、甲长限期把粮食送到指定地点。一年内，敌占区直接送往房涞涿根据地的粮食八、九万斤。另外，敌占区的人民千方百计把公粮凑齐，由各村的伪保、甲长秘密掩护，等待根据地的运输队去取运。同年麦收后，房涞涿组织人力运粮大队，去敌占区征粮。参加运粮大队的是 18 岁至 40 岁的男强劳力，各家各户都有人参加。运粮大队分长期和短期两种，长、短期相互轮换。参加长期运粮队的每次二、三百人，时间半个月左右。最远时越过涿县，到达新城、固安、雄县一带，每人背回小麦四、五十斤。运粮队一般在夜间行动，遇有情况想方设法避开敌人。长期队把粮食运回，在张坊、沈家庵一带通过封锁壕，再由短期运粮队运回指定地点。一连几个月，从敌占区运回了大批粮食。

1946 年，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房山解放区的人民经过土地改革斗争，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配合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开展征粮运粮工作。多次冒险去敌占区征粮，并全部运回，在郑家磨村又新建粮库，装小米 3 万斤。三区、五区百姓一天集中面粉 3.6 万斤。1948 年 12 月房山县城解放，接管旧政府粮库存粮 167.03 万斤。

### 三、粮食储存与管理

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粮食储存主要依靠各村分散设立粮库，由专人保管。储粮村庄重点选在大村、交通方便村、子弟兵活动频繁村和位置偏僻的村或地方。特别是房山二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群众的基础好，从穆家口村沿拒马河以上，到四渡岭、西关上、六渡、马合村、七渡、八渡、九渡、十渡、马安、西庄、西河、石门、平峪等村都有粮库。粮囤(仓)是用粗荆条编制而成，圆形，直径一、两米不等，高两米有余，里面用榆树皮面掺黄土泥把缝隙抹平，囤的中间和底部留出两个漏粮的方孔。每囤大小不等，小者装粮两、三万斤，大者装粮十万斤左右。

粮食是敌人同我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争夺的重要物资，除在敌占区进行严

格封锁，不准粮食流通入根据地、解放区外，敌人每次进犯根据地、解放区都抢夺粮食，烧毁民房。为了防止敌人抢劫粮食，我粮食保管人员千方百计做好坚壁清野工作。如把粮囤座在红薯井(或储粮洞)上，粮囤底部留一漏粮孔，打开孔门让粮食可以自动从粮囤内流入红薯井。在迫不得已，保管人员撤离时，打开粮囤的孔门，让粮食流入薯井，等人退走以后，再把粮食取出。1940年，日军扫荡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九渡村隐藏粮食20万斤，不曾损失一粒。平峪村百姓不仅隐藏12万斤粮食，还隐藏我冀中十分区步枪400支、兵工厂机械和医院医疗器械等，均未受到损失。

根据地、解放区的公粮，重点用于部队、地方支前人员、地方党政机关、教育、文化、卫生等公职人员用粮，其次用于社会救济用粮等。对过往部队、支前人员和县、区干部需在村中用餐的，凭证明由所在村安排，然后凭证明向区报帐。大规模作战，部队用粮需地方支援送往前线。1947年保北战役中，仅张坊一个接待站就筹粮27.8万斤。1948年底解放平津战役中支援大军粮食810.5万斤，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每年青黄不接季节，特别是受灾之年，各村都有一些贫困户需要救济。1942年，县政府根据掌握的公粮情况，经过专区批准，拨出一部分给群众，由各区、村救济群众食用。

在粮食管理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出入库制度。粮食入库，属于根据地、解放区各村征集的一般就地入库，从敌占区征集的粮食，按县、区安排入库，代表区征集的粮食单独入库。粮食出库经县批准，由区指定到村提取。粮食入库出库都有详细记载，每月由村财粮委员向区财粮助理员报帐一次，区财粮助理员向县财粮科报帐一次。为专区代管粮则单独建帐。

### 新中国初期的粮食工作

房山县城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了旧政权的粮库，建立了县粮库，由县财政科管理。原分散在二区各村的粮库，委托二区负责代管。

1950年下半年，县粮库改为通县专区粮库房山县分库，属于国家粮库，主要任务是接收国家公粮入库，国家粮食储运及部队粮食供应。县地方粮库称地方税收粮库。1951年7月，明确划分公、地粮库工作范围：国家公粮入中央粮库，县地方粮入地方粮库。同时，通专粮库房山分库改为房山县粮食局。1952年初，房山县地方粮库取消，所有地方财政粮及地方事业粮统由粮食局管理。9月，县粮食局改为县粮食管理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粮食征集仍然采取征税的办法，即把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累进税改为农业税。计算方法是：土地粮优中劣划分等级，按等定产(含地上其他收入)，折成负担亩，按负担亩计算应征税额(小米)，半年不增群众负担，灾年视情况减免。当时，处于经济恢复过渡时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振兴粮业，但粮食的供求矛盾日益显现。为了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县粮食部门除认真做好粮食征收外，采取了行政的、经济的措施控制粮食在市场上全年收购，重点是夏、秋两季。1952年6月，根据省、专区粮食部门的要求，收购的原则是：在服从征收的前程下，做到征收、收购两不误；从维护麦农利益，保证城市供应，支持国家收购三个原则出发，收购宁多勿少，重点放在农村市场，做到普遍开花，早下手，行动快；大力依靠合作社代购，加强自营，多掌握一些市场，增设流动小组，全力以赴；吞吐结合，通过推销杂粮、面粉，防止小麦价格上涨，小麦标准价为每市斤1060元(旧币)，6月20至23日，小麦市价1080元(旧币)，高于市场标准价，立即采取了措施。秋粮上市前，县粮食部门和供销社代购部门于9月20日挂牌收购。要求粮食部门除大力收购外，要适当照顾私商收购贩运。专区要求县粮食收购要建立健全收购指挥机构，迅速布置收购力量，在市场上争取主动地位；严格掌握分质论价，农村与农村之间地区差价要小一些，以便于合作社代购，主要粮种收购要紧一些，次要粮种收购可松一些，给私商经营留有余地。1953年，国家对粮食采取了“少征多购”的方针，粮食收购列为县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年小麦收购任务全县200万斤。规定市场上收购的小麦价格由县粮食部门掌握，凡粮食部门设有机构的市场，由粮食部门自行组织收购；粮食部门未设机构的市场，由粮食部门委托合作社代购。当时确定的小麦代购点有：夏村、吉羊、芦村、房山城关、大韩继、韩村河、长沟、石窝、南尚乐、张坊10个代购点。同时开展秋粮预购。全县秋粮收购任务1370万斤，其中粗粮1200万斤、大米110万斤，薯干60万斤。当时粮食形势比较紧张，县委、县政府直接布置，领导干部亲自抓粮食收购。在市场管理上，整顿集贸市场委员会。县政府明文规定：停止私商贩运粮食，不准私商囤积粮食。具体办法是：国营运输部门不给私商运输粮食，银行不给私商购粮贷款，外地私商不论有无证件，一律不准收购粮食，当地不经营粮食的私商不准收购小麦。私商、小贩及面粉加工户不准在市场上抬价、黑市诱售或到农村收购。私商、小贩和粮食加工户需要收购时，首先作出半月计划，向政府工商科登记，经批准发给准购证，指定市场，规定数额，由集市场成交员成交，必须执行国家牌价。

1953 年底,开始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 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要对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1953 年,中央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私营企业及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在同年 6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立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1953 年 10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 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人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严禁私商经营粮食;实行中央统一管理,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办法。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全省粮食统购统销大会,传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和中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省、专的具体部署,房山县把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做为当时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制定计划和工作方法步骤。

#### 一、粮食计划收购

粮食计划收购包括粮食征收和余粮计划收购。征收是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方法是把土地按优、中、差划分等级,按等级定产(含棉、油、果树等地上其它收入)折成负担亩,按负担亩计算应征税额,不分余粮户、缺粮户,一律以小米为计量单位,征收入库,半年不增加群众负担,灾年酌情减免。粮食收购是国家对农村余粮户的余粮有计划的收购,实行粮食统购。粮食自足户和缺粮户的农业税征收任务,可缴粮食以外的其它实物(油料、棉花等)或代金。

广泛宣传,充分动员。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是一项新的任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央房山县委高度重视,除组织召开各种会议,逐级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和省专的会议精神外,按照文件内容,拟定宣传材料,印发到基层;培训宣传员队伍,发挥县、区报

告员、宣传员的作用，广泛宣传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不少村庄、学校利用文艺形式，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山区下石堡小学师生认为到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保证了山区缺粮农村的粮食供应，把“余粮卖给国家光荣”，因此编了“双簧”、“二人转”等节目表演，很受群众欢迎。

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粮食统购统销，涉及到千家万户，既需要细致的思想工作，又需要深入的实际工作。县委组织县、区干部，全力以赴，深入到村、到户，进行具体调查研究算细帐，重点是核实粮食产量和人、畜数。粮食产量，参照农业税征收的计算方法，对照口粮、种籽和饲料的留粮标准，广泛地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选择不同户进行试算，计算余缺。

逐户核定产量，确定任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报公认，核定各户的粮食总产量。公认时，参照计算农业税的方法。粮食产量核定后，按标准留下全家的口粮、牲畜饲料和种子，还有余粮的为余粮户，不余不缺的为自足户，不足消费的为缺粮户。根据逐户核定划出的余粮户，确定粮食征购任务。1953年，全县粮食征购2272万斤，其中统购2190万斤。1954年因定减产，全县征购粮食1201万斤，其中统购1146万斤。

组织群众积极交售余粮。经县粮食部门检查，质量合格，通知入库地点和时间。县委对粮食入库非常重视，开始时，县党政领导在接收粮库门前表示欢迎，祝贺售粮农户“余粮卖给国家光荣”。为了方便售粮群众，粮库门前设开水站、医务室。广大农村理解党的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高高兴兴地积极交售余粮，有些有陈粮户，不仅交售全部余粮，而且把陈粮也卖给了国家。

但是，粮食统购是一项新的任务，工作非常复杂，一些农户存粮惜售的思想仍然存在，而某些基层干部不认为农民卖粮越多越好，给农村留有余地少，个别区、村的个别干部，甚至发生强迫命令，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8月，国务院又通过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任务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的措施，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定产，按正常年景评定单位粮田产量，以户为单位计算，三年不变；定购，从定产中扣除各项消费，剩余下的余粮按80%至90%定购，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固定减产适当减免；定销，按定产不足消费的为缺粮户，核定缺粮指标，

每年核定一次。全年定购任务 1225 万斤；1956 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粮食统购统销一般以社(含高级社、初级社)为单位计算，根据 1955 年分户、分社核定的“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粮食产量扣除各项消费后有余粮的为余粮社，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缺粮的为缺粮社，“三定”政策不变，要求粮食征购同农业社的粮食分配结合进行，农业社应首先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然后再进行社内分配。

## 二、粮食计划供应

根据政务院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房山县从 1953 年 11 月开始了国家粮食计划供应。粮食计划供应，是将城乡人民的口粮、军事供应、工业用粮和糕点、饮食、酿造以运输牲畜饲料等所有社会各方面的用粮，统一由国家有计划地供应和管理。

在粮食供应和管理上，开始掌握宽松些、计算粗略。全县根据人民生活情况和历年粮食销售概况，计划到 1954 年 7 月的粮食供应总量为 1053 万斤。对农村缺粮农民的粮食供应，是通过算细帐和民主评议的方法，计算出缺粮户数、人口、缺粮数，逐户建立粮食底帐，经核定后，按户发给购粮证，凭证到供销社粮食代销点分期购买粮食。对城镇人口的口粮供应，供应标准不低于农村产粮区的口粮数。一般私营工商业职员不低于农民。中共房山县委制定的《粮食供应暂行办法》规定：细粮按国家机关职工每人每月 10 斤，中小学教职员每人全年 44 斤(分 4 次供应)；粗粮由单位制订计划，经区、乡政府申报，县批准，凭计划到指定地点购买。粮食供应品种，基本上按粮库和供应点的库存品种搭配供应，特殊情况，适当照顾，当时规定：婚、丧、嫁、娶事凭乡政府证明可以从数量和品种上给予照顾。1954 年 4 月通专规定：城市人口除细粮定量供应外，粗粮不再定量，一般掌握每人每天一斤成品粮。农村本着保证吃饱，不许囤积，手续简便的原则供应。同年下达粮食供应指标，房山县指标 1035.5 万斤，其中第二季度 443 万斤包括粗粮 361 万斤，细粮 82 万斤。粮食指标由县控制到区，区控制到乡，乡控制到村、粮食管理力度加大，各项粮食供应一律凭证、凭计划供应。对乡村副业(粉房、豆腐坊、醋酱坊)有计划地适当供应。对饮食业、糕点业，供应量依其 6 个月的平均经营量，逐月编制计划，凭计划供应。供应中的细粮(面粉、大米)，首先照顾调往京津细粮计划的完成，对特殊情况，节日予以照顾，对驻军细粮给予安排。对糕点业强调粗粮细作。

1955 年 4 月，中央决定粮食由国家粮食部门直接经营，同年 5 月，中共

房山县委决定，县供销社的粮食代销点全部移交给县粮食管理局。房山县供销社原设 15 个粮食代销点，即房山城关、夏村、吉羊、天开、大韩继、赵各庄、长沟、张坊、南尚乐、吉羊(自设点)、十渡、蒲洼、龙门台、霞云岭、下石堡代销点全部移交。移交后，原粮食部门的区粮库改为中心粮食购销站，供销社移交的粮食代销点，定名为粮食购销站，经营粮食购销业务。1955 年秋，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市镇非农业人口按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标准。如机关干部，一般定为轻体力劳动者，粮食定量 28.5 斤。下乡吃派饭，每天交给农民 1.5 斤，定量不足部分，由单位做出计划，粮食部门予以补助。工商行业用粮和粮食制成品用粮由各单位编制用粮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发用粮供应证。市镇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一般居民饲养的从事生产、运输的牲畜所需饲料，按定量标准编制计划，经批准核发供应证。11 月，河北省发布《关于执行国务院〈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命令，规定了粮食供应定点、按月和品种搭配的办法，即根据行政区域和群众习惯规定粮食供应点，并在购粮证上注明由哪个粮食供应点供应。当月只能购买当月粮，品种搭配以粮站库存粮品种，考虑群众吃粮习惯，提出每季或每月按比例搭配计划，一般以一种主食粮(玉米、红粮、谷子等为主)，搭配一部分杂粮(豆、黍、荞麦等)和细粮(面粉、大米)。购粮时，以证为据，凭票付粮，并将所购数量，填入购粮证。

实践证明，国家对粮食及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既稳定了物价，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又促进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

# 房良两地落实粮食“统购”工作

康 富

粮食“统购统销”这些当年常挂在嘴边儿上的字眼儿，现在已经渐渐地淡化了。作为一段历史，它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它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是全国人民和广大粮食工作者难以忘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还未来得及休养生息，抗美援朝战争又开始了。国防用粮、军队用粮、工业用粮、生活生产用粮骤然增多。这种粮食供需空前紧张的严峻形势，使那些粮食投机商贩有了可乘之机。他们非法套购、倒运、哄抬物价和囤积居奇，使粮食收购工作陷于被动和困境之中。党中央为了及时控制粮食市场，于1953年10月16日，果断做出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计划收购政策，即统购政策。这一政策，是党中央在建国后粮食流通领域所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至1984年结束，共执行了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中，伴随国民经济的形势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为稳定当时的粮食市场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在农村余粮户中实行计划收购；二是在城市人口和农村缺粮人口中实行计划供应；三是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四是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这四项政策，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根据中央的决定，当时房良两县在河北省通县专区领导下，从1953年11月下旬开始，经过认真的研究准备，反复宣传，发动群众自报公议和核对数量等几个阶段，到1954年底顺利完成了粮食统购初期阶段的工作。据统计，房良两县至1953年底，共有农户72281户，非农户2202户；农业人口327544人，非农业人口13452人，社会粮食总产17049万斤，每人占有粮食520斤；两县共消费粮食15670万斤，人均吃粮水平361斤。在两县领导和两县广大农民共同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任务。1953年两县共完成统购粮食4565万斤，1954年完成统购粮食2319万斤。

通过两年的实践，粮食统购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发现了在运作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采取群众自报公议的办法，虽然在相信群众、发扬民主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但确实也存在着余缺划分不清、征购无底、增产无益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决定从1955年开始执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由于暂行办法的基本内容是定产、定购、定销，故简称“三定”政策。定产就是根据农户的粮田质量和自然条件，结合经济条件，按正常年景，评定单位面积和常年产量，三年不变。定购就是从余粮户的定产数量中，扣除口粮、种子、饲料和实征公粮后，尚有剩余部分，一般按余粮的85%至90%核定统购任务。对余粮丰收地区，实行增产增购，但增购数量不超过增产数量的40%。对受灾减产地区按减产程度，采取适当减购或免购。定销就是对农村缺粮户按照缺粮户的各项用粮加在一起，超过定产部分，中央实行定销政策，定销数量一年评定一次。

1954年春，房山县开始贯彻执行粮食三定政策。广泛宣传“增产不增购，定产定购三年不变”的原则，通过评产民主讨论会，然后把定购数字核算到户，签字定案。通过确定“定产定购”数量，并逐户建立了底帐，从而解决了“余缺不清，征购无底”的问题。三定工作的贯彻落实，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如深山区霞云岭乡475户，1770人全部实现了合作化。只一个月，就压青肥110万斤，割荆条6万斤，刨药材1220斤，坡地拔草250亩。五侯乡1955年定产163万斤，年底实际完成167万斤，超额完成4万斤。

良乡县三定工作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根据三定精神，县委动员干部挨家挨户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了保证三定指标又快又好地完成，县政府还采取了扩大收粮点的办法，深得粮农的欢迎和拥护。在1955年夏征中，良乡县出动大车2274辆，骡子1606头，驴2302头，马514匹，男女劳力6231人，又快又好地完成了征购任务。

在落实三定工作中，广大粮食职工也体现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在征收季节，他们主动带磅下乡，当场检斤验质，方便了群众，节约了开支，支援了生产，避免了群众交粮起早排队现象，深得百姓的拥护和赞誉。

三定时期的农村各项留粮标准：人的口粮平均定额掌握在360斤左右；种子粮，大田掌握在每亩4斤，麦田每亩15斤；饲料粮中骡马每头每年500斤，驴360斤，牛30斤，猪120斤，从1955年到1957是房良两县落实第一个“三定”任务时期，落实结果的主要数字见下表：

## 《房山文史资料全编·乙集》(上)

时间	农户	农业人口	耕地面积	集体产量	征购数量
1955年	72659	333467	826942(亩)	72809(公斤)	2831(万斤)
1956年	75352	338016	795803(亩)	70120(万斤)	1376(万斤)
1957年	75392	336228	789083(亩)	68836(万斤)	3014(万斤)

1958年，房山县与良乡县合并，成立周口店区，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管辖。从1955年至1957年，由于实行三定政策，农村粮食形势逐年好转。到1958年，更是风调雨顺，农村粮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年景。但是，由于社会上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不切合实际的“伙食供给制”，造成了粮食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在1959年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征购，已无法再按“三定”时期的政策继续执行，所以只能按当年粮食形势随时调整的办法，下达当年的统购政策。



##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政策的调整

王绍清

1953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城乡、工矿区非农业人口和就业人数增加，农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商品销售的猛增，人民购买力的增速快于生产增长速度，严重影响了市场供应。粮、棉、油、布消费品供应日趋紧张，为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保证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政务院于1953年至1954年，施行了粮、棉、油、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政策。

房山县政府遵照指示，从1953年12月、1954年3月、1954年9月起，分别对粮食、油脂、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粮食、油脂业务完全由国营公司掌握，供销合作社代理执行。1955年房良两县供销合作社奉河北省通县专区指示，将40处粮食购销点，77名职工移交给刚刚成立的粮食局，棉花收购与销售由供销社管理。为方便农民售棉，建立收棉站8处，轧花厂6处，在送往河北省纱厂絮棉时，由县社公安特派员、经济警察持枪押送。棉花由花纱布公司批发，供销社经销与代销。为加强对棉布市场管理，对两县89户私营棉布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有利于国家掌握货源，限制了套购囤积的投机商，从而稳定了物价，保证了城乡粮、油、棉定量按时供应。在统购上，在原自报公议的基础上，1955年中共中央统一了部署，改为“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四留”(留口粮、留种子、留饲料、留机动)的政策，得民心顺民意，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这年春节，有的农民家门口贴上了这样的春联，上联是：“毛主席号召三定，人人高兴”，下联是“共产党规定四留，家家不愁”，横批是“努力生产”。

1959年至1962年，国家连年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减产，粮源紧张，1960年全国农业减产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仅有1957年的三分之一，是年房山县粮食总产16556万斤，比1958年20950万斤少收4394万斤，减产近21%。北京市年初粮食库存约3800万斤，仅够一周的销售量。北京吃粮

主要靠外省市调入，小麦主要来自河南、陕西、甘肃；玉米、大豆主要来自黑龙江、内蒙；大米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等地。粮食最紧张时，调出粮食的省区，粮源接近枯竭，不能保证调拨计划，粮食部门派出大批人员到四川、云南等边缘地带挖掘粮源。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在往回运粮食时，先是用汽车运到贵州安顺，再装火车。采购人员随时电告到京粮食数量和到京日期。内蒙古自治区把小杂粮集中装车，向北京发出了支援首都的粮食“红旗专列”。由于粮食缺乏，农副产品及工业品货源匮乏，形势十分严峻。

北京市遵照中央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售量的指示，实行“低指标，瓜菜代”的措施，1960年9月，房山县对居民粮食定量在1954年河北省通县专区规定每人每天一斤粮食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压缩口粮1.65公斤。因食油近竭，暂停农村食油供应。职工食油定量每月2两，居民每人每月定量1.6两。由于农业减产，农民养猪减少，北京市人均吃肉每月减为1.5公斤，比1958年下降84.3%。1961年房山县养猪9.5万头，比1958年的14万头下降32.1%；生猪收购10849头，比1958年的29077头下降了62.69%。1962年春节，房山冷库仅有2000多斤猪肉，在人多肉少的情况下，商业局主要领导全力以赴到市有关公司及外地求援。

由于粮油、肉食供应压缩到最低点，副食品和工业品货源紧缺，蔬菜、鲜蛋供需矛盾突出，北京市取消了蔬菜自由市场，商品菜由商业部门实行统购包销，鸡蛋实行派购。特别对紧缺的工业品由商店采取突击闪电式的投放，购买群众排成长龙，群众对此议论纷纷。此后，采取分配到机关单位及生产队，少量商品则采用由群众抓阄的办法，但这样给单位增加了麻烦，也不利于合理分配商品，故改为凭票、凭证、凭券购买和特需供应的方法。

1959年以前，只有粮食、油、棉花、棉布、自行车5种商品凭票凭证供应，1960年增加到50种商品，凭证供应的先后有肉、蛋、糖、肥皂、碱面12种生活必需品，以及胶鞋、棉鞋、毛衣、煤油、火柴等。照明用灯泡凭证以旧换新；凭布票供应的先后有棉毛衫、卫生裤、床单、褥单、毛巾被等9种，1961年增加到69种商品，1962年发展到102种商品，大部分副食品、日用品都实行了凭票、凭证供应，自由购买的商品已经很少。所发的票证达20多种，如：粮票、面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线票、鞋票、肉票、烟票、酒票、毛衣票、煤油票、取暖炉票等等。城市里还有糕点票、豆票、饼干票、儿童副食票、排骨票、菜票。每户必备三本：购货本、购粮本、购煤本。大量票证给群众造成不便和麻烦，也给商业人员增加了大量工作为简化票证，北京市于

1962年4月23日由市商业部门正式投放购买工业品的购货券，职工按工资计算每20元发工业券一张，一月一次。房山县于同年8月在收购农副产品时，按交售的产品金额发给工业券。实行发放工业券以后，居民用一种购货券即可买到多种商品，避免了多种票证并存所造成的麻烦，购买力的投向也有了相对的自由。商业部门可根据货源情况，灵活地调高及减少收券标准，较好地合理分配商品。实行购货券，有利于稳定市场秩序，限制了投机商贩套购商品，克服了“机关分配”、“民主评议”、“闪电式投放”以及抓阉等办法的弊病，受到群众的欢迎。北京市实行购货券长达22年，1983年1月市场全面好转，才逐步停止发放。

三年困难时期，逐步扩大票、证、券供应商品的同时，为回笼货币，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供应的特殊政策。首先，实行的高价糖果、糕点和高价饭馆的菜肴。逐步增加到烟、酒、针织品、钟表、自行车、照相器材等工业品。对国庆节、中秋节、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多供应些副食品。房山县商业局驻京采购站，每逢节日进厂催货。北京市对高温、井下工作等特殊工种的工作人员，以及产妇、病幼人员实行一次性补助。对脑力劳动力，按照级别分别补助香烟、肉蛋、大豆、糖。对艺术、体育人员、少数民族、侨胞、侨眷、外宾、使馆人员给予特殊待遇。如1962年，北京民主人士乐松生一行来房山县视察市、县两级右派分子改造工作时，县委安排由统战部长李敬芳、工商联主任李雅三负责接待，改右办主任王绍清负责汇报，工商联秘书高树森负责食宿，高树森亲自到商业局，按副市长级别待遇，特批肉2斤，恒大牌香烟2盒，花三角茶叶2袋，白酒1瓶，指标拨给良乡饭店。

三年困难时期，房山县委、县政府，把人民生产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本着服务首都，富于农民的方针，商业局、供销合作社积极帮助农民发展副食品生产基地。在工作方法上，采取收猪到圈，收蛋到院，带着饼干换鸡蛋，收羊到山，背篓送货到村边，为首都人民提供了大量农副土特产品，特别是猪、禽、蛋、菜等副食品。

# 名冠一时的窦店砖瓦厂

孙奎春

1953年，全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确保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市府决定在原良乡县境内，由前苏联援建一个限额以上的大型砖瓦供应基地。市地方材料工业局责成厂长江明波、副厂长彭贵年等五位同志，负责勘测、选址建厂。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京广线窦店火车站东侧的大片粮田。此处地势平坦，土质优良，交通方便，建厂内铁路专用线可以节约一大笔资金，是建厂的最佳场所。

由于当时处于解放初期，刚分得土地只有三年多的农民，正在编织美好的理想，要让他们将热恋的土地交出来，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征购土地开始之后，反应强烈，阻力巨大。在这关键时刻，县委书记张令德、县长曹庶民明确指示：“要教育农民正确处理‘三者关系’，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并且要妥善解决出让土地农民的生活问题。”经过县有关部门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农民异口同声地说：“要听党的话，舍小家为国家。”因而，征地工作进展顺利，共征购土地3451亩。东西长2华里，南北长4华里。南邻大高舍村、小高舍村，东部与江村接壤，北部与刘丈村、大十三里村土地毗连。

1953年4月17日，建厂工程全面启动。当时的施工条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资金不足，建筑材料短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建厂领导小组本着“先生产后生活，边建厂边生产”的原则，全体参战人员发扬吃大苦，耐大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当时市里只批给160万块砖，只相当于全部工程的8%，他们就发动工人用手工扣坯，小土窑烧砖，不仅解决了工程急需，而且节约了资金。至同年9月，已建成4座轮窑，并生产出第一批红机砖。11月1日，《北京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我国最大的砖瓦厂——窦店砖瓦厂建厂工程基本完成，第一批烧出的砖已运到石景山钢铁厂。”到1954年5月，相继建成了10座制坯机房、机修车间、变电站、铁路专用线、工人宿舍等配套工程。对此，一位苏联专家看了之后感到非

常惊奇，他耸耸肩膀说：“真是了不起，太快了！真是不可思议！”



窰店砖瓦厂厂部（宋宝元 提供）

饮水思源，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农民兄弟“舍小家，为国家”的奉献精神，要在如此广阔肥沃的良田上建起浩大的厂房是不可能想象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数十年来厂历届领导班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约法三章”：一是强化工农联盟，定期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改进工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请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徐庆文、仇振亮到厂为职工作报告，进行工农联盟教育。每年春节前召开迎新春座谈会，记得 1985 年邀请时任房山县县长王俊起出席会议，他饱含深情地说：“在我每年一度参加的同类座谈会中，今天这个会规模是最大的，组织工作是最周密的，同时会议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二是不与农村争利，一旦发生矛盾主动让利。厂内铁路专用线物资装卸，马车短途运输和基建工程均交给周围农村去干。三是对房山各机关单位和附近农村所求助之事，只要条件允许尽量给予满足。在昔日计划经济时期，产品一律由市计委调拨，企业无权销售。对于各单位建楼房上门求购红机砖，厂里基本上做到了有求必应，千方百计由增产指标解决。在筹建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房山游子促进会基地时，当房山老领导张成基、马文舫同志登门说明情况后，砖瓦厂积极应允，无偿赠送。久而久之，形成了融洽和谐的周边环境。

窰店砖瓦厂是原市建材局“四大支柱企业”之一，现在隶属北京金隅集团。企业党的关系于1958年由丰台区委划归房山县委管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厂内土源枯竭，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末期，砖瓦生产逐步限产、停产。在这里我想结合本厂的实际情况，对如何正确评价全市乃至全国的砖瓦企业，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当前社会上有人在谈到砖瓦企业时往往是一言蔽之——“毁田烧砖”，这种论点是欠考虑、不公道、不科学的。应该用发展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在过去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砖瓦企业对加速城镇建设，积累资金，改善生活，发展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时至今日，全国经济形势根本好转，建筑材料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人类赖以生存的、非常有限的土地资源，市府率先出台政策，三令五申坚决禁止生产、使用粘土砖，这是非常必要的。

建厂四十年来，窰店砖瓦厂实现了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积累资金，为首都城市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春节大年初一，国家建材局主要领导林汉雄(后任建设部长)、张人为、杨志元和市建材集团唐澄、张毅(现任市人大城建卫生委主任)、孙乐新(现任燃气集团董事长)等同志，都亲临本厂慰问职工群众。

窰店砖瓦厂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点：

首先，提供优质产品，支援首都重点工程建设。截止1990年底共生产红机砖80亿块，竖向排列可绕地球赤道48周。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等新老“十大工程”都有窰店砖瓦厂的产品。

其次，实现了砖瓦生产技术革命，推动了全国砖瓦行业的发展。过去砖瓦生产工艺十分落后，经过本厂科技人员的辛勤努力，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从季节性生产到常年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制坯码烧一次完成。为了普及先进生产工艺技术，砖瓦厂通过联营、提供设备、技术指导等多种形式，为兄弟单位“雪中送炭”。从黑龙江、新疆、内蒙到广东、海南岛等与30多个省市的砖瓦企业，都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房山作为“建材之乡”、“建筑之乡”，当时社、队经办的小砖厂上百家，最高年产砖突破15亿块。对“社队企业”从筹建、设备改造到技术咨询，砖瓦厂的原则是：“有求必应、服务上门、一切从优”，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果。并且斥巨资远程“削丘取土”，为于庄村造良田10余亩。

为了教育职工，总结交流经验，从历年新闻报道、通讯和报刊公开发表的

有关经验体会方面的文章中，精选汇编成《开拓前进》一书。由笔者主编，请著名书法家苏适先生题写书名，国家建材局常务副局长杨志元题词，《中国建材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颂甲先生作序，申办出版书号，共印刷 6000 册，免费赠送关系单位和来厂参观学习人员，反映良好。

第三，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企业一向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曾获得北京市“文明单位”、“花园式工厂”，含金量比较高的是 1988 年被誉为“北京市第一家无偿献血制度化单位”。历届厂领导班子特别是在老厂长江明波(后任市建材局副局长、已故)、党委书记王一桢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输送厂处级以上干部 50 余人，科技干部 120 余人。

最后，积累了资金，为企业转轨变型创造了条件。建厂以来，国家先后多次投资不足 3 千万元，截止 1990 年企业为国家上缴利税 1.34 亿元，并且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社区；有中小学、幼儿园、职工医院、商店和功能齐全的影剧院。为了方便职工生活，引进了邮政支局和工商银行办事处。

1993 年企业更名为“北京市亚新特种建材公司”，与法国合资总投入 1.5 亿元人民币，兴办了“北京圣戈班维特克斯玻璃纤维有限公司”，产品销往东南亚，其规模在国际同行业名列第三位。由韩国引进一条聚苯泡板生产线，研制开发了高级耐火保温材料——陶纤制品，以及塑钢门窗、建材节能保温系列产品等，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潘庄皮记草纸厂

唐占忠

房山区韩村河镇潘庄村(原属河北省房山县五侯第四管区)造纸厂前身是皮记草纸厂。它在房山区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振兴房山工业和繁荣城乡人民生活起到了重大作用。

据皮记草纸厂第五代传人皮富森介绍,该厂发展历经两个阶段:在兴起阶段,由其祖父皮进才、父亲皮振声操办;在发展壮大阶段,由其本人推动。皮氏家族祖籍河北省徐水县谢坊营村,清朝末年那里发生大旱,庄稼颗粒不收,人们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为求生存,皮氏先人皮修带儿子皮兴国一家老小,挑着一担破烂家什离开徐水逃荒来到如今的潘庄村。刚到时举目无亲,只好寄身破庙,终日四处奔波,以讨食充饥。后来父子俩到本村大户人家打短工扛长活,以保家人苟安度日。这样年复一年生活有了好转,在此盖起几间土坯房,定居潘庄。

潘庄村地处平原,农业以小麦为主产,每年夏收前村子四周麦浪滚滚,一望无垠。收割后各家场院上堆满了小麦,尤其是麦秸多似山峰。然而它只作燃料或造肥,别无他用。皮进才深知皮家是造纸世家,上两代老人原在徐水就开过草纸作坊,原料是麦秸。于是同儿子皮兴国商量要继祖业变废为宝,重新操持草纸作坊。于是曾三去徐水:一去是了解那里造纸情况,二去是学习造纸技术和经验,三去是聘请徐水巩各庄村造纸技术人员来潘庄合股兴办草纸厂。经过半年的筹备,皮记草纸厂于1890年在潘庄村正式开业。刚开始时,设备简单,规模不大,仅七八个人干活,每年产量1500刀(每刀100张)。

操作程序为九个字,即:蒸、碾、洗、漂、晒、压、揭、叠、裁。

**蒸:**将麦秸用石灰水浸泡后,放进用砖砌的装有大号铁锅炉灶上边池子里,经过加火蒸煮使麦秸软化。

**碾:**将池子里软化的麦秸取出,放在用人力或牲口拉的碾子上碾轧粉碎,使其成粥状。

**洗:**用砖砌的方形池槽,底部装有苇子或竹子杆用麻绳捆成的帘板,上边



再铺有吸收或渗透性强的席子，将粥状麦秸放进池槽，同时加进水和一定数量蒲棒毛，用棍棒搅匀，使麦秸和蒲棒毛成为融混一体的纸浆。

**漂：**用长方形竹帘(竹蔑子和马尾编织而成长 1 米宽 40 公分)，在池槽里轻快、灵巧、均匀地漂移成纸。一个竹帘上的纸相当成品纸的三张之多。

**晒：**将一个个漂抄成纸的竹帘，摆放在凉台或架杆上，使其经日照晒去纸中水分至干化。

**压：**将干化的纸用石板压挤使纸张成型。

**揭：**将竹帘上压挤成型的纸精心揭下来。

**叠：**将揭下的纸一张张重叠整齐，使数量够刀数(100 张为一刀)。

**裁：**将成刀的纸用尺子量好卡住，再用刀裁齐后放在固定地方存好，以便出售。

以上是制造草纸的全部过程。销售地区重点是房山、良乡、涿州等县城内的各商铺，也有销给山区走驴客(用驴驮运货物的商人)。抗日战争期间，配合地下党组织，密密穿过日寇封锁线，将草纸送往山区，解决八路军和当地群众物资短缺之困，为民族独立和抵御日寇作出了贡献。1938 年皮进才去世，皮振声携子皮富森继续经营草纸生产，1945 年皮振声又离世而去，子承父业之重担便落在皮富森肩上，他仍和徐水人合股经营，规模、效益同从前一般。

1954 年，农村掀起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高潮，农户纷纷加入初级社。皮富森主动将祖传的草纸厂全部设备投入农业社，徐水的合股人撤走了，厂子仍由皮富森任副股长，主管全面工作。1955 年入高级社，草纸厂的经营权由高级社主管，皮富森在厂内做一般劳动兼推销员。1962 年人民公化后，又把管理权又放回生产队。这时皮富森正当第三生产小队长，再度抓起草纸厂工作，为使草纸厂壮大发展，他采取边生产边改革的办法，首先是工具设备改革，将人工畜力碾浆改为粉碎机制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次是产品改革，将以生产草纸为主改为生产纸浆为主。这样，在 1963 年产品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销路畅通情况下，生产队收入猛增，成了社员年终分红主要来源。

1965 年，皮富森入党并当了大队长，他把造纸厂纳为大队副业机构，扩大经营范围把四个小队联合起来定指标定任务。同时他多次去北京找销路，得知各钢铁公司在冶炼或铸造构件过程中，都用石棉绳做铺垫，购价每吨上千元，而草纸销给钢铁厂每吨 400 元，草纸代替石棉绳经试验效果良好，于是通过赵各庄供销合作社收购站和北京首钢技术科长周津敬的帮助，与首钢、北钢、特钢三家公司订立了每月 20 吨草纸的生产合同。潘庄大队在大量生产纸浆的基础

上，又把草纸生产改为工业用纸，经济效益日渐上升，社员生活水平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造纸厂的经营一直发展到 1965 年，“文革”期间，生产走向滑坡。

1978 年，皮富森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开始决心再度振兴造纸厂。首先从各小队选拔有文化的年轻人到涿州、通县、北京等先进造纸厂学习技术；其次，加大投资力度，从信用社贷款和各小队集资，更新生产设备，健全竞争机制。1984 年，皮富森多次去北京海淀区大型国营造纸厂联系，经过对纸浆测试质量合格后，双方订立了每年供求 3000 吨纸浆，每吨售价 200 元的合同。为了长期合作，海淀造纸厂预付 1 万元支援潘庄造纸厂扩大再生产。1985 年，又从河南省惠阳县太行造纸机械厂购进 1 台年产 2500 吨的联合造纸机。经过半年试生产，造纸厂呈现了新面貌，除大量生产纸浆供应海淀造纸厂外，还能生产社会上需用性能较好的各种纸，如挂面纸、瓦棱纸、办公纸、包装纸等。从此，潘庄造纸厂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 燕化化工一厂乙烯装置的安装与改造

王 岗

1972年2月5日，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后，并将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向国务院报告。12月，编制了《扩建工程任务书》。规划引进年产30万吨乙烯等六套装置。

1973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任务书，新中国引进了第一套30万吨乙烯装置，地址选在燕山北庄地区，并组织了2.5万人誓师大会。8月29日，以30吨乙烯为主体的新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并完成了设备基础砼，等待国外设备到货后立即安装。

从国外引进的乙烯大件——精馏塔高83.4米，直径4.5米，吊装重量565吨。由于运输吊装等工作难度极大，国外公司在运输、吊装上乘机勒索，要价过高。可是我们中国工人是难不倒的，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筑路。以前去东炼都是从周口店经胜利桥。现在为了运装置，便从迎风坡、北庄到闫村，修建了一条又宽又平整、跨河有桥、负重荷载的路，人们称为“大件路”，成为燕化对外的大通道。

运输。给大件托盘上安装了约一百条汽车轮胎做“脚”，两台大马力柴油车做“头”，这个庞然大物象“百足虫”一样爬行。由于永定河新桥荷载不够，改从卢沟桥上通过。这座经历过八年抗日战火洗礼的石桥，而今又为新中国建设负重，平安渡过后，“大件车”缓缓通向北庄。

吊装。大件运抵施工现场后，1975年3月31日，参加会战的北京化工建筑安装工人们用自制的600吨“金属枪杆”吊装机械整体吊装就位。仅用67分钟，塔起、灯亮、管线通。“火炬嘴”由海军直升飞机吊装，这一吊技术使在场的外国专家翘手叫好，并获得国家科学大会成果奖，大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

1976年5月8日，乙烯装置正式投产，该装置于1974年5月开工建设，设计规模为年产30万吨乙烯。

1976年6月7日，高压聚乙烯装置建成，一次投料试车成功，该装置于1974年9月动工，设计年产高压聚乙烯18万吨。

1978年7月28日,乙二醇装置建成投产,一次开车成功。该装置于1975年10月开工,年产6万吨。

1978年8月3日,制苯装置建成,一次开车成功。但因部分设备问题,只能半负荷运转。后经外商重制设备,从1980年1月19日起满负荷运转。该装置于1977年3月动工,年产纯苯10万吨。

1980年11月25日,对二甲苯装置建成投产,该装置于1978年3月开工,年产2.7万吨。

1983年4月,丙烷精制装置建成投产,该装置于1981年3月动工,年产5000吨。

1988年11月,苯乙烯装置投产,该装置于1987年3月动工兴建,年产苯乙烯6万吨。

1989年10月17日,从美国引进的聚苯乙烯装置建成,在建设过程中,克服美国一些厂家不信守合同、供货混乱、美国专家不到现场等困难,在12月8日一次投料试车成功。年产聚苯乙烯5万吨(该装置于1988年5月开工建设)

1991年6月,化工一厂与树脂研究所合作研制开发的耐候棚膜专用料,通过有关部门联合鉴定,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

在诸多设备基础建设中,空压机设备基础负荷很重,需浇灌毛石(花岗岩)砣100立方米。材料采购员从白水寺山坡上,选择了采石、运石能够后翻卸料的马车50辆。由材料员负责编车号,验质量,计数量,开料单,投料后盖章结算。现场设砣搅拌机1台,推土机1台。在向坑底摊平一层砣后,排队进场的马车第一批5辆从不同方向往坑内倒毛石,然后再用推土机将搅拌好的砣摊平。如此,经过十次浇灌,顺利地完成了马车参战任务。

1990年,燕化公司借鉴国家在制定“八五”规划时,坚持走科技效益型内涵挖潜发展道路。在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支持下,借鉴国外的经验,经过反复思考、论证,果断决策:依托老装置把30万吨乙烯装置改造,扩建成45万吨经济规模的装置。通过改造扩建,解决阻碍燕化公司自身发展的原料(丙烯、碳四、液化气等)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乙烯联产物,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市场要求。公司职工把改扩建称为“希望工程”。

1992年1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扩建工程。

1992年9月5日,乙烯裂解炉新区基础开挖第一铲,改扩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并召开了决战动员大会。

从 1992 年 6 月 27 日扩建报告批准之日起, 到 1994 年 9 月 27 日止, 历时 27 个月零 18 天提前 13 天实现了国务院领导提出的“投资不超过 28 亿元、工期不超过两年半”的目标。达到了“三个样板”: 全国乙烯发展的样板, 老企业改造的样板, 投资省、速度快、效益高的样板。完成了一期改造工程, 完成了燕化公司第二次创业。

从建厂至改扩建成功, 化工一厂一直保持着我国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的位置, 成为燕化化工企业的“龙头”。

# 房良地区的驮运

刘树霖

驮运就是利用骡、马、驴、骆驼等牲畜进行运输。解放前和解放初，房良两县的山区和广大平原大量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靠驮运的。

那时，不论平原还是山区，一般一家人都要养头毛驴，也有养二三头驴子或骡子的。大宗或长途运输，要几头牲口组成“一把儿”，由一个“掌鞭的”赶着，或“多把儿”牲畜由多个“掌鞭的”赶着运输。一些有钱人家，往往要买“几把儿”牲畜或“多把儿”牲畜专门搞运输挣钱。人们对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评价，也往往是以其养多少“把儿”牲畜来衡量。

除骡子、马、驴子以外，骆驼也是一种重要的驮运工具。几头或更多的骆驼连成一串，由一个人牵着运货。骆驼个头大，驮得多，运输能力是比较强的。春、秋、冬三季是骆驼运输旺季(骆驼不服夏，夏天要到口外去避夏、养膘)。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大冷的天，一串串驮着物品的骆驼，由一个人牵着，慢悠悠地从村边走过，还挺有气派的。

回想当时驮运的方法，觉得很是有意思。驮运时，骡子、驴要先扣上鞍子。这种鞍子是由两个鞍桥、两块木板做成的。做好后再“吊”(装)上鞍屉(毡子或布袋装上谷糠做成)，拴上防止上下坡鞍子前后窜、左右滚的“绌棍”(兜在牲口屁股下的木棍)、“裨胸”(兜住牲口脖子的皮条)、“肚带”(兜紧牲口肚子的两根皮条)。驮末煤、小块煤、石灰、粮食时，要用厚布口袋装好，由人扛着放到牲口身上。运粪、运土、运石灰等时，要用“拢驮”(这里“驮”读 duò，是用两根弯成“入”字形的长木棍，穿上两个荆编筐做成)，把“拢驮”扣到鞍子上，再由人把粪、土、石灰等装到“拢驮”里；运水果等怕压易碎货物时，要先把货装好，再由二人抬着放到牲口身上；运木柴、庄稼、秸秆等时，要用“揽架”(犹如上边连着的两个小木梯，左右下方各有一木翅，用时打开，不用时合上)，把“揽架”扣到鞍子上后，打开两翅，往两翅上装货，装好后要用“揽架”上的两根“刹绳”把货物捆紧。驮运时常用的还有一种小木件叫“木拘子”，这是由指头粗分两叉的小榆树等砍下来乘湿弯成菱型，开口一头用铁

丝拴住，另一头削光，去皮晒干。使用时，在需拴紧的物品两边各拴一根绳子，其中一根拴一个“木杓子”，另一根从“木杓子”中间穿过来，往回使动拉紧后挽一个“来回扣”，扣到“木杓子”尖上。构件虽简单，但特别实用。

卸货时，用口袋装的煤、粮食等，人用力从一边一掀一推就可卸下。卸“拢驮”装的粪、土、石灰等时，人站在牲口脖子一边，一手握住一根从“拢驮”下露出的木棍头，用力往上掀的同时，再往怀里一扭，就扣在地上了。卸怕压怕碎物品时，还需两人往下抬；卸“揽架”驮的物品时，松开刹绳往下卸。在用骆驼驮运时，装卸都得让骆驼趴下。运猪的办法是在鞍子上扣上“拢驮”后，在上面捆绑一块木板，然后把猪放到木板上捆牢运走。这种生产生活靠驮运的情况到解放后的上世纪 50 年代初都是如此。

驮运为什么成为房良地区解放前和解放初重要的运输方式，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分不开的。那时，房良两县还没有柏油路和水泥路，连能走马车的大道都很少。大多是乡间狭窄、弯曲、高低不平的土路。在山区更多是上上下下、左拐右拐、坡度很大的小路。这样的路只能靠牲畜驮运，车辆难以出行。在当时的农村买得起马车的也算不多，能养上几头或“几把儿”牲口的已经是富户了。这种情况也使大量运输靠驮运。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时都是私有小农经济，在平原地区，一家一块或几块地，各家土地互相穿插着，耕种收割途中都要从别人家地里穿过。土地珍贵、留路都不宽，走车就要多轧别人家的地，容易引起纠纷，这种情况也使耕种、收割运输主要靠驮运。

解放以后，特别是到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新的交通工具逐步增多，牲畜驮运的情况才越来越少了，逐步为车辆运输所代替了。

# 大石河畔的捕鱼习俗

孙玉江

大石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河水中水生生物资源极为丰富，主要生活着以鲤科、鳅科为主的三十多种野生鱼类，主要有鲤鱼、鲢鱼、鲫鱼、草鱼、鲶鱼、马口鱼、棒花鱼、麦穗鱼、花鳅、条鳅、河虾等，历史上沿河农民利用多种方法在河中捕鱼，河北镇一带曾经有以捕鱼为业的农民，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还用网、叉、粘、淘、摸、罩、震、炸、圈等方法在河流里捕鱼。1997 年，北京市实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中规定：禁止毒鱼、炸鱼和使用密眼箔、鱼叉、鱼鹰以及滥用电力等严重损害水产资源的渔具和捕捞方法，现电、药、地龙、炸、震、毒等捕鱼方法被明令禁止。

捕鱼，当地又称逮鱼、拿鱼、摸鱼，历史上主要方法有：

**活网捕鱼**，又称为散网捕鱼。网一般为 10 余米长，在夏、秋三季，于河水中清澈水浅有鱼的地方张网捕鱼。

**死网捕鱼**，又称为**固网捕鱼**。在春、夏、秋三季，将网固定在河道中，一般是 2 张网以上至五六张网同时放，然后用竹竿在河水中击水，向网中赶鱼。

**抓网捕鱼**，用于在深水中捕鱼。用尼龙线织成面积五六平方米的网，网下坠铅块。在河面上撒网后，网沉入河底，再拉起网，鱼被兜在网内。

**粘网挂鱼**，又称**粘鱼**。网长 30 至 50 米，宽 0.5 至 1.5 米，一般为 2 至 3 层，也有单层，一层网眼大，二层比一层网眼小，三层比二层网眼小，大鱼、小鱼均能粘住。用于春、夏、秋三季，横放网于浅河道中，一般早上放网，晚上起网；晚上放网，早上起网。

**筏子捕鱼**，又称**混水筏鱼**。以木或竹筏子配合网使用，在春、夏、秋三季，于河水中水深及水混处，先下网，然后乘筏子在河道中用竹竿向网中赶鱼。

**震鱼**，又称**冬季捞鱼**。一般在冬季或早春，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石块或铁锤敲打河道中的石块，将栖息在石块下的鱼震昏，然后翻起石块，震昏的鱼漂浮起来，一个人用笊篱将鱼捞起。此种方法是当地留传最悠久的捕鱼方法。

**扒沟捕鱼**，又称**捕夜鱼**。在河道水浅处挖一道沟，使流水通过，鱼随水流



进入沟道，夜晚时鱼便停息在沟道内，然后将沟道上下口堵住，在沟道中捕鱼。

**呛鱼。**在河道中选一处较长的水道岔，将上游堵住使水势减小后，用适量的石灰散入河水中，水中的鱼被呛昏或呛死，就可以在河中捞鱼了。此种方法捕到的鱼，食用时要将鱼鳃去掉。

**摸鱼。**在夏季于河水中浅水处摸鱼，小心翼翼从石块两侧摸向石块底部，将鱼抓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一般用半天时间可以摸到十几斤鱼。

**掏鱼。**春季枯水季节，河道中水量减少，形成诸多小水坑，河中的鱼便向水坑聚集，此时将水坑内的水掏净，能捕到很多鱼，多为小杂鱼。

**抬鱼。**将尼龙窗纱两边栓木棍做成抬网，在丰水季节，两个人抬着网在河里逆流而上，蹲下时两个人从两边向网内赶鱼，抬起时一个人用笊篱捞起网中被抬上的鱼。

**打夜鱼，又称打梢，夏季捕鱼的一种方法。**人穿水裤，带照明用具及铁棒或竹竿等，在河边来回走，看见到鱼就打，此种方法多捕获大鱼。

**炸鱼，又称震鱼。**用炸药将鱼震昏，鱼浮在水面，然后捞鱼。

**下地龙网捕鱼，**用尼龙窗纱做成长圆桶状或方形的网，一般长 10 多米，直径 70 公分左右，四周有孔口，口内设机关，鱼进去出不来。地龙网长期放在河道中。地龙网既可捕鱼，又可捕河虾，一般在冬季以捕虾为主，晚上将地龙网放入不封冻的河段中，早晨起网，20 世纪 60 年代时期，一般能捕到五六斤河虾。

**鳖鱼，又称垒庵鳖鱼。**用几块大的石头在河中垒成圈，上游留道口，圈里再放些小石块形成小石堆，圈里的小石堆便成了鱼的栖息之地，一两天后，用鱼鳖子接在道口上，用杂草将石缝堵住，将小石块捡出，再入河趟水，鱼便通过庵口进入鱼鳖子。

**滚草把子。**用杂草捆成草把子，将几个草把子连起来，两三个人在河岔沟里滚动草把子，同时将河里的水草一起卷起，河里的鱼便随草一起卷入。

**叉鱼。**用鱼叉叉鱼，一般在晚上，用手电照着水面，鱼有趋光性。看准了鱼再用鱼叉叉，此种方法捕到的鱼一般较大。

**接鱼。**在河道中选水流较缓的河段，扒好挡水堰，留下水口，用铁丝筛子固定在水口子下，常常可接到很多鱼。

**下蜜。**多在秋末采用，在河水中挖一个直径 2 米大坑，坑内置羊骨头做诱饵，坑上置荆条梢子，再用石块压上。经过一冬时间，鱼在蜜坑内大量繁殖，一般在春节前或清明时节出坑，出坑时四周以石块挡住，留一出口接上荆条编

制的鱼抽子逮鱼，人们常常用此方法捕到几十斤至几百斤的鱼。

**下鱼梁子。**用高粱秆、玉米秸或柳条编成长1平方米排子，在河道中用石块垒堰，留下出口接上排子，排子用石块压住。鱼顺流而上遇到石堰阻挡就跳过去，正好落入排子上，即可收获。也可直接将梁子放在河道中水流处，顺水而来的鱼被挡在梁子上。

**挂鱼抽子。**用荆条或柳条编制成篓状，二层，外层口小肚大似葫芦形的，中部留方口，里层上部与外层相连，下部空，鱼从口进入后，到底只能进入外层，再从外层口倒出。将抽子放在河道中，顺水流过来的鱼进入后跑不掉。有的是里层单制作，放进篓内。

**钓鱼。**鱼杆、鱼钩、鱼饵都是自己制作的，鱼杆有苇子杆、木杆，鱼线有铁丝、缝衣线、树貔子等，鱼钩有大头针作的、有缝衣针作的；鱼饵有蚯蚓、蚂蚱、蟋蟀、河虾、小鱼、草等。一般一天能钓到三五斤鱼。

**推河虾。**用尼龙线织成口袋状的网，网口用木棍作框，以竹竿或木杆钉在网口上，在河里顺水流（逆水流）推着网走，河虾便进入网内。

**笨篱捞河虾。**用长把笨篱在河边捞虾，一般半天可捞二三斤河虾。

# 百花山名产

梁明战 刘守东 董祥勤

## 花椒籽油

百花山山区种植花椒历史悠久，种植普遍，据考证，在北魏时期已有栽植花椒的记载，明代已开始大量栽植，之后常种不衰。主要栽植品种有：香椒子、大红袍、小红袍、青皮椒、大花椒等。蒲洼、十渡、霞云岭、雁翅、清水、斋堂等地所产花椒具有果穗紧密、粒大、果实出干皮率高、椒皮厚实、色泽鲜艳、香味浓郁等特点。蒲洼是全国优质花椒生产基地之一，所产的“大红袍”花椒享有“中华名椒”之美誉，历来商贾争购，岁岁无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山区百姓创造了用花椒籽制作食用油的方法。花椒种子含油量高达 30%，可加工成食用油、工业用油、保健油和医药制剂。提炼的花椒籽油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并有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脑血管血栓形成，促智健脑的作用。

采摘花椒多在“处暑”、“白露”节。采摘下树后捡去杂物，在充足的阳光下晒 1 至 2 天，将花椒籽与花椒皮晒散，俗称晒散了，再用刀轻轻捣，使籽与壳分离（也有用石碾碾或用电磨压成粉末）。然后用筛子把花椒籽筛出，壳留做佐料。椒籽扬去其中小枝叶等杂物，而后将其放入烧烫的铁锅内（锅的大小可根据花椒籽的多少而定），用小火烘炒。炒时用铁铲左右方向加以搅拌，待花椒籽手抓略感于烫时，将其取出，并在钢磨上搅烂（也可用石磨推烂）成浆，在磨籽的同时，准备 60℃至 70℃温水。锅根据花椒籽浆的多少而用，一般为多用铁锅，铁锅不能留有油腻或杂物水与花椒浆比例为 1 : 7.5，调均匀。将花椒籽浆放入锅内，用大火进行烘烧，当锅内开始冒泡时，用净勺顺时针方向加以搅拌，防止油浆外溢糊锅底。当锅内泛起层层略微发黄的浆沫时，减至中火，待浆沫淡淡消失时，银光闪闪的油星便上浮，此时减至小火，撇油。当地还有这样的风俗：在熬油过程中，如有陌生人至此，千万请他们用铁勺子在锅内搅拌几下，否则他会将油带走，使出油率大大降低。撇出的油再用铁锅煎至不冒蒸汽为止，水分蒸发后便是浓香的花椒籽油。花椒籽油再次煎熬，要加微量盐，

熬到油透亮了熄火。将油倒出，余下油渣可做酱，也可拌凉菜。花椒籽油味道鲜美、浓厚、醇香，一般 2 公斤干花椒出 1 公斤籽，10 公斤花椒籽炼 1 公斤油，所以花椒籽油很稀有，山区农民炼出的花椒籽油自己舍不得吃，多在待客时才用，也常常作为珍贵的礼物。

## 杏仁油

百花山山区村村种杏树，杏仁是百花山特产之一，当地称杏板、大扁、杏扁。其中霞云岭、史家营乡杏核产量占房山区全区的 70% 以上。至目前，莲花庵村发展仁用杏 62.3 公顷；金鸡台村发展仁用杏 23.5 公顷；东村发展 66 公顷；四马台村到 2003 年共有仁用杏面积 373.33 公顷。仁用杏树种有龙王帽、一窝蜂、柏峪扁、马套扁等品种。龙王帽杏又名大扁，果实扁圆形，仁扁平肥大，仁肉味香而脆；一窝蜂杏又名次扁、小龙王帽，极丰产。杏仁味香甜，含粗脂肪 50.1%，蛋白质 25.48%，可鲜食、炒食、拌凉菜、榨油、做饮料、做杏仁粥、辅料等。

《齐家司志略》载：“故岁有四秋，西山祇有一秋。惟杏子成熟可当一秋。当春三清明，杏花开放，满山遍野，迷离天路。晨起四望，芳香袭人。”可见百花山上杏树之多。

《齐家司志略》成书于光绪年间，该书记载了齐家司的舆地、城廓、辖村、物产、田赋、风俗、名胜古迹、自然景观等。齐家司包括今房山区的大安山乡的宝地洼村和史家营乡金鸡台、史家营、莲花庵、楸林铺、柳林水、鸳鸯水、曹家房、青土涧、西岳台、青林台、大村涧、扬林水村。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勤劳的山民创造了用杏仁制造品质极佳的杏仁油（甜仁、苦仁均可制油）。

当有二分之一以上果实外果皮由绿变黄便可采收，脱去杏皮的杏核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砸核取仁，杏仁平铺在火炕上炕至干燥，上铺苇席和被褥，使杏仁继续蒸发水分。炕好的杏仁放在干净的碾子上推碎，留少量内皮防滑（用干木棍儿顺碾盘纹理划动，以原料不沾棍儿为好）。根据原料的多少，确定使用五印锅或七印锅。锅内放入清水烧至 80~100℃ 时放入杏仁原料，不停搅动，搅成稀粥状，烧约 1 个小时左右杏核油便浮在水面，将浮在上面的油用勺撇出，放入干净的磁坛里阴凉，称干油。干油撇出后重新加入干净的凉水，不停搅动，再用小火熬，直至开锅，把浮在上面的油用勺子

撇出，放入干净的磁坛里，阴凉，称捂水油。把干油和捂水油放入小锅，用小火煎，使水分充分蒸发，油浮在上面，渣沉锅底，称煎油。将油撇出装坛，阴凉后封好，即可食用。将杏仁渣加少许盐，开锅后即可食用，称杏仁酱。将杏仁渣加入洗净的玉米糝，煮熟称杏仁粥。也可连硬核一起上碾子碾碎，撇出油后渣子废弃。杏仁油还有一种加工方法：杏核去硬皮后，将杏仁火炕上炕干，再上石碾子碾碎。将铁锅用微火烧热待用。将碾碎的杏仁末攥成小条，一般长 10 至 15 厘米，径 4 至 5 厘米，然后将杏仁条放进热锅内用手挤压，挤压过程放水，每公斤杏仁加六两水，挤压 20 分钟后即可出油。余下的杏仁渣子可做杏仁玉米粥。一般 20 公斤杏仁出 0.5 斤油。

## 核 桃 油

百花山山区各村都有数量较多的核桃树。人们很早就利用核桃资源进行选育、改良，长期的精心栽培培育了许多优质核桃新品种。以原产地分有新疆核桃、本地核桃；以果壳光滑程度分有光核桃、麻核桃；以果壳厚度分主要有薄壳核桃和厚壳核桃。自 2000 年开始，陆续引进薄壳香、礼品 1、礼品 2、辽 1、辽 2、辽 3 等选育的新品种达 60 多万株，沿 108 国道栽植，形成了“百亩核桃带”。其中蒲洼一带的核桃品质最为优良，其特点为纹细、皮薄、内隔膜纸质、果实饱满口味香甜，出仁率在 50% 左右，出油率高达 75%。核桃作为中草药使用已有上千年历史，有“长寿果”的美誉。每 100 克核桃中，含脂肪 40 至 50 克，蛋白质 15 克，糖类 10 克，还含有钙、磷、铁、锌、镁、锰和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尼克酸、胡萝卡素等成分。核桃仁含油量平均为 65.08 ~ 68.88%，可鲜食、做干果外，山区人们还用核桃加工高档的核桃油。

核桃外果皮由绿变黄，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果实青皮自然开裂时采收。采收后脱去青皮，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砸开取仁。核桃仁在火炕上炕 3 ~ 5 天，上铺苇席和被褥，使核桃蒸发水分（水分大不易出油）。炕好后可小炒，既可继续蒸发水份又增加核桃油的香味儿。炒好后的核桃仁放在干净的碾子上推碎，留少量小皮防滑，用干木棍儿顺碾盘纹理划动，以原料不沾棍儿为好。根据原料的多少，确定使用铁锅的大小，一般使用五印锅或七印锅。锅内清水烧到 50℃ 左右时放入核桃原料，不停搅动，搅成稀粥状，开锅后烧约 1 个小时水面上浮起核桃油。将浮在上面的油用勺子撇出来，

放入干净的磁坛里，阴凉，称为干油。然后重新加入干净的凉水，用小火熬，不停搅动，开锅后把浮在上面的油用勺子撇出，放入干净的磁坛里，阴凉称为捂水油。将两种油（干油和捂水油）放入小锅用小火煎，使水分充分蒸发，油浮在上面，渣子沉在锅底，称煎油，将油撇出，装坛，阴凉后封好。将核桃渣子加少许盐，继续煮至开锅即可即食用，称核桃酱。将核桃渣子加水预热后，加入洗净的玉米糝煮熟称核桃粥。一般 2 至 3 公斤核桃仁出 1 公斤油。

# 房山核桃

王绍清

核桃，又名胡桃、羌桃、差桃，是干果中的硬果，中医称为“长寿果”。品种主要有山西汾阳“天骄红”，云南大姚“纸皮”，京西土生“薄壳香”等。“薄壳香”产于山区丘陵地带，按其质量分为煤山核桃与灰山核桃，房山煤山“薄壳香”驰名中外。据史料载，清末民初便有小宗出口，经琉璃河水运天津，销往日本。

“薄壳香”壳薄易剥，核桃仁口感香、脆、松、酥，老少皆宜，除直接食用外，可榨油。“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对平西根据地实行严密经济封锁，核桃仁是边区“出口”（出边区为“出口”）换取重要物资的商品。1941年日军在其统区开展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心是统治物资，实行困笼政策，企图把八路军困在山上。

当时，晋察冀边区房涞涿抗日民主政府急需食盐、煤油、火柴等物资。县合作社在北渠道被日军破坏的情况下，经几次侦察，开辟了地下商品流通线——南渠道。绕过封锁壕，经南拒马河，过十几里水路，在我通商人员的指引下，通过没有埋地雷的路段上岸后，再绕行到涿县冯村。经包装巧运到长辛店，用核桃换取食盐、煤油、火柴、油印机、纸张、西药、针头、染料等军政急需物资，解决了政府燃眉之急。

当时，核桃除出口外，农民还运用土法加工榨取核桃油，除自食，还供给八路军驻蒲洼供给处及当地区县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合作社把收购核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史家营、霞云岭、十渡、蒲洼、张坊、河北、长操等地供销社为主要收购单位。其次，坨里、长沟、岳各庄、南尚乐、周口店供销社也有一定数量的收购任务。1951年，河北省通县专区油脂公司专程到霞云岭供销社龙门台收购站蹲点采购核桃，单装单运。1954年，实行统购统销，国家计委规定，核桃属油料范围，由供销社管理，1962年为奖励农民出售核桃，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粮食、外贸、副食局联合通知：农民出售一百斤核桃，奖励粮食16.5斤（或3斤食油），

并按收购金额 40%奖售工业品。因此收购量大幅上升，保证了首都市场供给和出口任务的完成。据不完全统计，自 1949 年至 1990 年收购核桃总额为 4265.9 万斤，核桃仁 1780.9 万斤，除供应首都和少量的销外，大部分经市供销社组织出口前苏联、日本、新加坡、及欧洲部分国家，薄壳香深受国外客户欢迎。

核桃仁有丰富的营养价值，1 斤核桃相当于 5 斤鸡蛋或 9 斤牛奶的营养价值。核桃主要含有蛋白质、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有较好的医药价值，可补肾健脑，补中益气，润肌肤，乌须发。据健康资料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生前每天吃核桃粥，皮肤舒展细嫩，面色光润。

把核桃打开，核桃仁的形状很似人的大脑，中医学叫做“同类相求”，及“以类取名胜”。实践总结出：核桃有补脑之功效，含有亚硝酸、亚麻酸，对强化脑血管弹力，促进神经细胞的活力，提高大脑生理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有的营养学家倡导，学龄前儿童每天吃二三个核桃，对焦躁不安、厌恶学习和反映迟钝的孩子很有好处。

核桃是个宝疙瘩，但其火力大，吃多了会上火恶心，最好的食用方法是把核桃仁与红枣、大米一起熬成粥喝，因核桃可补先天之本，红枣、大米可补后天之本，这样保健效果会更好。



# 刘家鞍子铺的绝技

刘树楦



房山地区在解放前及解放初,生产生活主要运输靠驮运,而驮运离不开一件重要工具就是牲口鞍子。

不要小看这个搭在牲口背上的不起眼的木鞍子,在制做(习惯称“插”)上有着许多奥秘。用两块硬木鞍桥和两块

鞍板开公、母簧“插”成鞍子,不论鞍桥是否歪扭,放在地上四“爪儿”着地,不歪不扭,敲起来咚咚响。吊(装)上鞍屉(鞍子下的毛毡),扣在牲口身上,系上配件,驮上东西,不论是上坡下坡、路程远近,鞍子不前后窜,不左右滚,牲口背不压疮。这就是河北村刘家鞍子铺的独门绝技,在家传男不传女,不传外姓人。关于其历史,已不好考查。笔者父亲对鞍子的制做工艺十分熟悉。他从不到十岁就跟本家学徒,十几岁就完全能独立制做,后来他又教会了我哥哥,我家成为远近闻名的刘家鞍子铺。粗算起来,这项技术在我家流传也已近百年了。后来河北刘家鞍子铺分了不少支,除河北村外,还有周口店、张坊、良乡东沿村、崇各庄小苑村等处,都是从河北村搬出去的。我家在抗日战争前也从河北搬到现在的吴庄。当时不仅房良两地,涞水、涿鹿、怀来等地也都到我家“插”鞍子。我哥哥也曾到涿鹿、怀来等许多地方干过好几年。这项手艺在那个时期是比较受欢迎的。解放前到解放初,做一盘鞍子的价格一直是三斗小米,两个鞍桥二斗小米,一“膛”(两块)鞍板一斗小米,做骡子和马的鞍子价格还要高些。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改为收现金。一盘鞍子45元,两个鞍桥30元,一“膛”鞍板15元。因此,曾有不少外人想掌握这套手艺。

有的也曾下很大功夫，以各种名义常到我家，看着我父亲“插”鞍子，想看懂学会。我家“插”鞍子时也不背人，别人可以随便看。可外人就是看不到里面窍门，学不会。有的以为看会了，“插”出来的鞍子，不是四“爪儿”不平不好使，就是用起来牲口压疮没法使。

鞍子的制做过程是这样：

首先是原料。鞍桥以桦木为多，鞍板主要是杨柳木和椴木。多是以涿鹿、涑水、怀来等山区用牲口驮着送来的，也有的是我家在当地收购来的硬质弯树根和杨柳树，再用锯加工成的。鞍桥鞍板都要烤干，办法是把锯好的鞍桥、鞍板放在烤木坑里铺上锯末，点着锯末不能冒火苗，只能焖着烤。烤出来的鞍桥、鞍板呈金黄色。然后经初加工，鞍桥加工成大样，鞍板要对(拼)起来。一膛板，两大块，各由四小块拼成。对板的办法是在小块板上用木钻打眼，楔上木钉，对在一起，对出来的鞍板成弧形。然后用刨子刨光。

其次是工具。“插”鞍子除一般木匠所用的锯、斧子、刨子、木锉外，还有几种特殊的工具。一是“搂锯子”，上面有一弯的木把儿，顶头装一片三寸左右的锯片，用来“搂”鞍板上母簧锯口的；另一种是“捅凿”，凿身是矩形，长二尺许，头上底面开刃，另一头是圆木把儿，专门用来捅掉已用“搂锯子”开好鞍板母簧里的木碴儿的；还有一种是“簧旁子”；状似手掌，有些弧度，底有一厘米左右斜坎，竖向有斜槽，里面装斜刨刃，专门用来在鞍桥下口两边开公簧槽的。还有一种是木钻，钻杆是一根尺许硬质圆木，下头用铁片固定一铁钻头，上头加工成蘑菇头，装进分两半内有比蘑菇头稍大的木窝里，用皮线(用细的牛筋做成的，用前先需热水泡软)扎紧，中间插一根琴弓似的钻把；远头有孔，穿一根皮条折回来绕至钻杆上，一拉钻把就灵活地转起来，用于在鞍桥、鞍板上钻眼。还有一种叫“样棚”，状如鞍桥，两块组成，中间有轴，可开合转动，是专门用来量牲口身长、肥瘦的；还有一种是弯刨子，是用来为鞍桥、鞍板刨光的。

最主要的是制作。方法是先量出牲口的身长肥瘦，选好鞍桥、鞍板，进行必要的加工。在鞍桥上用“簧旁子”开好公簧槽，再比着开好公簧槽的鞍桥在鞍板上用墨尺画出母簧线。用“搂锯子”按线搂出母簧锯口，用“捅簧”把母簧内木碴儿捅掉、捅光，然后把开好公簧的两个鞍桥，分别插入两块开好母簧的鞍板里，直到到位和插紧为止。四个鞍桥头叫“鞍爪儿”，对不够长的“鞍爪儿”还要接上一段。四个“鞍爪儿”都要用皮线或铁丝拴紧。“插”好鞍桥、鞍板后，要在前后桥和鞍板上用木钻钻出拴“绶棍”(用两根皮条或麻绳拴住兜在牲口屁股下的横木棍)、“袷胸”(兜着牲口脖子的皮条或麻绳)、肚带、“滚

梁木” (贴着两块鞍桥上的圆木)和吊屉的孔。用铁钉钉好“滚梁木”和拴“绌棍”、“袷胸”的“屈曲儿”(铅丝、铁条弯成状如衣服扣袷的小铁件)。用木锉和刨子把鞍桥、鞍板锉光,刨光后,根据用户需要吊上“鞍屉”,一盘鞍子就算最后“插”完了。

解放后,房良地区的驮运逐步消失,“插”鞍子这项手艺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曾经闻名远近的刘家鞍子铺正在逐步被人们忘记,但其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还是值得后人回忆的。

# 房山煤炭业的变迁

刘文江

地方煤炭业曾是房山的支柱产业，为北京、房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现在，房山区为了建设北京西南生态绿色屏障，让北京的天更蓝，山更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展开了异常艰巨的煤矿关闭整顿工作。

## 旧中国的房山煤炭业

房山盛产煤炭，是北京市的煤炭主产地。房山北部史家营、大安山等乡镇的产煤村，盖房挖炉坑都能挖出煤来。

房山煤炭开采历史久远。据《房山区志》记载，“房山煤炭开采，发轫于辽金之前，渐兴于元明之后。明万历年间，因督管西山窑太监酷索煤税，迫使民窑业主和窑工示威京都，‘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明神宗实录》）”。清顺治年间，‘煤税累民，概予豁免’（《大清会典事例》）。尔后煤业渐兴。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统计，房山开采煤窑 140 座，停业及尚未开采煤窑 80 座。其间大多为民窑，亦有少数官窑。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直隶总督方观承于奏折中称：仅房山一县即产煤 94900 斤左右。民国初，政府颁发《矿业条例》，准予私人开采矿产 3 类 62 种，引来各地资本家到房山投资开采煤炭。清末及民国初，官僚资本业已渗透于房山煤炭业中。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十四年（1915），相继登记领取矿照开业的民族资本矿业有伟业煤矿、大丰公司等近 50 家，不少矿区在千亩以上。1902 年日本商人三木、宫本、太田等向清政府外部秉请在门头沟开矿采煤，日本人开始觊觎房山的煤矿。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房山的大小煤矿，煤炭资源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察哈尔省北岳区振兴实业公司接管了协中煤矿（房山煤矿前身），改名振兴煤矿。平原区则为国民党政府军占据。因处于战争状态，房山煤炭业处于萧条状态。

新中国建立前，房山多数小窑基本沿用土法开采，逢煤即采，无煤弃之，

一般采地表下数十米内藏煤。自元至明、清，采煤靠手镐刨煤，斧斫支柱。井筒分平斜二种：平巷铺短木为‘轨’，以筐曳煤；斜筒只能人背。背或曳每人每趟百斤上下，每工日出十筐左右。房山煤炭输运从始至清光绪年间，主要以驴骡及骆驼等牲畜驮运为主。驴每驮约百余斤，骡每驮 200 斤至 400 斤，骆驼每驮 300 斤至 500 斤。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商会总办王贤宾联合津地十几位营盐巨贾，以直隶、河南二省六十三县盐业专卖许可权为抵押，向其驻津之“德华”、“道胜”等外国银行借银 300 万两，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批办，始勘修坨里运煤高线。光绪三十三年，坨里运煤高线路兴工，宣统二年（1910）路成。全长 74 里，途径坨里至南窖清港沟的 27 个村。沿线各窑煤经高线运输至坨里煤栈，而后销往京津等地。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军阀混战，运煤高线路权数易。至卢沟桥事变前，房山、良乡煤窑计 140 座，日产多至 500 余万斤。至 1948 年底房山、良乡解放时，房山仅有私营小煤窑 80 座，产量十几万吨。

### 房山区地方煤炭产业新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房山区的地方煤炭产业从解放初的十几万吨，发展到四百多万吨。不但为房山提供了民用燃料，还为京津地区提供了民用和工业用燃料，成为房山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1949 年 5 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建立平西煤矿公司，在房山接管了振兴煤矿。1949 年 9 月 29 日，平西煤矿公司改名为京西煤矿公司。1950 年 10 月，燃料工业部决定将京西煤矿公司改名为京西矿务局，归燃料工业部直接领导。1952 年，原房山县河北、周口店一带 50 个村，原良乡县北车营等 3 个村划归京西矿区。在房山地域的大型煤矿大安山矿、中型煤矿长沟峪、房山矿等始终归京西矿务局管辖。1981 年至 1994 年间，房山区地处国矿地域范围的 5 个乡镇及 5 个村划归北京矿务局工农区管辖。

在大力恢复国营煤矿同时，人民政府对私营小煤窑采取了加强管理、扶植生产的方针，房山煤炭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发展。1950 年 12 月，燃料工业部颁布《煤矿技术保安试行规程（草案）》，房山煤矿的安全生产法规初步建立起来，安全生产有章可循，安全作业条件有了改变。“一五”期间，坚持“安全第一”思想，逐步建立健全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措施。为了保护国家煤炭资源不受破坏，北平市人民政府于 1949 年 9 月制定了《北平市平西区煤矿业

开采管理暂行条例》，对严重破坏国营矿井煤田的小煤窑，进行了封闭。为保障国营房山煤矿生产，房山县人民政府决定“停开矿区内小窑以防灾患”，并采取措施。同时加强规划管理，对小煤窑整顿合并，私营煤窑数略减。1956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时，房山的20家私营小煤窑有的因经营亏损，有的不利于大矿的开采等原因，奉煤炭工业部指示，予以封闭，工人大部分转为国营煤矿的工人，少数年老体弱的工人也做了妥善安置，矿主经过短期学习后，成为在工作和劳动中自食其力的人。至此，历经数百年的私营小煤窑开采暂告结束；有的归为集体，为村办、社办。

人民公社成立后，特别是1962年以后，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在国营煤矿外围或大矿的残煤区开始兴办了一些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小煤窑。与以前私人开办的小煤窑有着本质的不同，地方小煤窑的所有制不同，生产手段、生产管理方法不同，使用了一些机械（虽然比较简陋）和机具，劳动和安全条件有很大改善和保障。1974年初，房山县小煤窑管理办公室成立，为地方煤矿行业管理专门机构。据1974年统计，房山县地方小煤窑（矿）86座，其中县办3个，社办15个，村办66个，房山驻军办矿2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鼓励集体采矿业发展同时，允许个体矿业发展。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煤炭工业部《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八项措施的报告》，鼓励各行各业办矿，乡办、村办、少数人集资合办以及个体办的小煤窑发展很快。为适应地方煤炭发展，房山县相继制订出《个体集资煤矿审批办法》、《个体煤矿管理办法》及《房山县乡镇煤矿管理办法》等文件，加强了煤炭企业管理。据1985年底统计，房山地方煤矿（窑）总数138个，其中县办矿2个，乡办矿14个，村办矿28个。1987年，经国家煤炭部地方煤矿管理局认定，房山区为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煤炭供应紧张，为确保向北京调煤任务的完成，房山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加强煤炭运销管理的通知，并制订8项措施整顿煤炭市场秩序。20世纪80年代，房山地方煤炭除极个别年份低于百万吨外，多数年份产量稳定在100万吨至200万吨之间。1989年，房山地方煤炭产量达20世纪80年代高峰，为296.6万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房山区煤炭产量不断提高。1950年，房山地方煤矿年产煤15万吨。1953年，房山矿试用风镐电钻采掘立槽煤成功。国营矿支援地方煤矿，至20世纪60年代初，属于房山矿采区各村集体煤矿在采掘、提升、排水、照明诸方面设备均得到更新，普遍用上电钻、风

锤和卷扬机。1958年，年产量为29.9万吨。因20世纪50年代末盲目“跃进”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地方煤矿出现萎缩，煤矿数量减少，煤炭产量跌入低谷。1965年，房山煤炭产量仅6万吨，为历年来最低点。1968年，房山地方煤炭产量开始得到大幅度提高。1968年3月26日至4月26日，北京矿务局对房山县所属小煤窑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房山县小煤窑113座，日产煤888吨。

70年代，房山地方煤炭产量稳步上升。1974年，房山煤炭产量62.3万吨。1978年，地方煤炭产量突破百万吨大关，达110万吨。至80年代中期，房山的县营煤矿均为半机械化开采，年生产能力12万吨至15万吨；乡办矿多为半机械化开采，部分仍土法开采，年生产能力2万吨至20万吨不等；村办矿多配有简单机械；个体煤窑基本仍土法开采。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地方煤炭产业的规范化管理，特别是煤炭行业的巨大利润，地方煤炭产业投资规模迅速加大。1992年，全区原煤产量达到171.5万吨。截至1998年底，房山区地方煤矿达到563个，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年产量400万吨以上，占全市煤炭总量的60%以上，煤炭经济在几个产煤乡镇的比重不断加大。煤炭行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尤其是史家营乡、大安山乡被称为“煤炭之乡”，煤炭工业收入占全乡财政收入的70%以上，成为支柱产业。

根据中央和市政府要求，1990年，房山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若干规定》，对全区个体煤窑进行了整顿。1991年，房山区人民政府下发了《房山区乡镇煤矿矿井安全生产条件合格证试行办法》，对办理矿井安全生产条件合格证的条件等进行了规定。房山区煤炭工业公司制定了《标准化矿井的若干规定》，规定了向标准化矿井迈进的目标。1993年，房山区各级煤矿贯彻“安全、稳产、高效、长久”的办矿方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全区煤矿全年死亡7人，百万吨死亡率2.5人，创全国地方煤矿最低水平，名列全国地方煤矿安全生产先进行列。1995年5月，房山区人民政府颁布了《房山区地方煤矿管理办法》，建立房山区人民政府地方煤矿管理办公室，加强了对地方煤矿的管理。到1995年，房山区批准开采井口220个，其中地方国营煤矿1个，集体所属煤矿119个，其余为私营矿。

### 房山区地方煤炭产业的整顿关闭

煤炭产业为房山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盲目发展,破坏和资源浪费及伤亡事故问题,为保护北京生态环境,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和北京市发展战略,房山区进行了艰难的地方煤炭产业整顿关闭工作。

按房山区国土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分析,房山区煤炭还可开采 35 至 40 年左右,但为了新北京的建设和发展,房山必须从首都北京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调整产业结构。为此,房山区从 1998 年就开始了关井压产工作。1999 年,房山区煤炭业本着安全、高效的原则,抓好关井压产工作,当年,年产量控制在 300 万吨左右。2000 年,全区关闭年产万吨以下小煤窑 272 个,压缩产量 200 万吨。2001 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关闭国有煤炭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精神,为遏制煤矿事故,扭转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所有乡镇煤矿一律停产整顿。2001 年 6 月 20 日,房山区下发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成立了房山区乡镇煤矿停产整顿领导小组。2001 年 12 月底,全区乡镇煤矿整顿工作通过市政府验收,2002 年初,关闭 205 座矿井,保留 140 座,其中重组 65 座。

2005 年 1 月 24 日,开始整顿关闭地方煤矿。房山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和市政府要求,制定《关于关闭和整顿小煤矿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自 2005 年 2 月 16 日开始,国矿井田范围内采矿许可证已到期的小煤矿必须停止一切生产活动,做好关闭矿井的工作;国矿井田范围外采矿许可证已到期的小煤矿,在未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前,停止生产。”截至 2005 年 8 月底,房山区有原煤生产的乡镇 8 个,土地面积 842 平方公里,辖 111 个行政村,涉及本区 3.7 万户 9.8 万人的生产就业等生活问题。全区地方煤矿 139 家,分布在 45 个村,涉及人口 67921 人,其中本区 38531 人。139 家煤矿分三种情况:一是长沟峪、大安山国矿范围内必须关闭的 53 家;二是原房山矿范围内待市国土局批复后再做处理的 22 家;三是在国矿范围外的 64 家。房山区以煤矿整顿关闭为重点,开展了矿区整治、人民群众生活安置、劳动力再就业、替代产业扶植等一系列工作。

2005 年 9 月 9 日,房山区煤矿关闭工作会,就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全区煤矿关闭和整顿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即日起至 2005 年 9 月 15 日为宣传动员 制定方案和准备阶段,在全区发布禁止在国矿范围内采煤的公告。2005 年 9 月 16 日至 2005 年 12 月底为具体实施阶段,公布关闭煤矿实



施方案，签定责任书，完成 53 个矿拆除设备、辞退人员、清仓等工作。2005 年 12 月底前全部完成矿井的封堵、断路、封山等工作。从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主要工作为结合养山护林、生态恢复，建立专群结合的防范体系，同时按照发展规划，启动矿区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和发展替代产业工作。

2005 年 9 月 16 日，房山区召开矿产资源规范整顿大会。区领导与大安山乡、史家营乡、南窖乡、周口店镇、河北镇 5 个乡镇领导签订了煤矿关闭责任书，部分乡镇领导做了表态发言。大会重申国务院和北京市文件要求。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祁红要求各级干部、党员，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煤矿关闭整顿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上来；要统筹协调，把握关键，打好煤矿关闭整顿工作总体战。区委书记聂玉藻要求全区干部群众要承认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依法实施整顿关闭，要坚持属地负责，层层建立责任制，共同承担起整顿关闭的责任；要坚持调查研究，着力解决整顿关闭过程和滞后影响的若干问题。区政府发布了《关于重申我区国矿范围内 75 家煤矿立即停产关闭的紧急通知》。

2005 年 9 月 22 日，房山区就煤矿关闭工作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乡镇要掌握好煤矿的基本情况，查清债权、债务积累状况，要在近期内就矿井评估、工人和村民补偿、人员就业、发展项目等问题提出合理方案。要求各有关部门、乡镇必须认真对待，要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带着责任和感情进行工作；要加快基础情况的调查研究和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加快相关政策的研究，继续坚持区里指导、乡镇自主的原则，努力解决就业问题，保证村民基本生活。2005 年 9 月 30 日，房山区煤矿关闭和整顿总指挥部成立。区委书记聂玉藻任政委，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祁红任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设 6 个组。总指挥部下设派驻大安山乡、史家营乡、周口店镇、南窖乡 4 个工作组，负责指导和督查乡镇开展关闭和整顿煤矿工作，了解和掌握乡镇的工作动态，并及时向党委、政府反馈情况。

截至 2005 年 9 月 30 日，在 53 家煤矿直接从业的有 15228 人，其中本地劳动力 5156 人，外地务工人员 10072 人。本区劳动力直接供养的人口为 14701 人。53 家煤矿 2004 年全年共生产原煤 377.9 万吨，实现收入 7.7 亿元，生产投入 4.2 亿元，上缴各种款项 15527.1 万元，其中国家税金 1853.7 万元。关闭 53 家煤矿，减少收入为次，首要的问题是产业替代和矿区人员就业。

2005 年 10 月 9 日，房山区召开煤矿关闭整顿工作座谈会，市、区相关

部门领导共同研讨房山区煤矿关闭与整顿工作实施方案及相关政策。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永详细介绍了全区煤矿关闭与整顿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就补偿、保障、发展等问题与市相关部门领导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区委书记聂玉藻希望市领导充分考虑房山区的实际困难，帮助研究实施方案，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2005年10月20日，房山区进入国矿区地方煤矿集中关闭的实施阶段，关闭工作首先在大安山乡展开。10月24至25日，每天出动350余人，组成8个封堵小组，全面展开关闭工作。截至25日晚，该乡共封闭各类井口69个，其中，主井6个，采区38个，安全出口25个，劝返工人300余人。截至2005年11月21日，房山地方煤矿关闭工作全部完成，在史家营乡、大安山乡、南窖乡、周口店镇、河北镇5个乡镇，21个行政村共封闭井口239个，其中主井53个，采区（水平井）123个，安全出口和风井63个。

房山区成立了700人的矿产资源巡查执法队伍，派驻大安山和史家营各200人，周口店、南窖乡各40人。各村还组成15至20人不等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动态巡查，发现一处，严肃处理一处。2005年以来，全区直接投入资金1500万元用于打击非法开采，截至目前，已累计炸封私挖盗采坑点282个，全区组织大规模打非行动10次，反复炸毁非法盗采点407个次，共出动力9000余人次，车辆1200余辆次，没收非法开采设备30余件，没收非法原煤1120吨，收缴设备300多件，刑事、行政拘留72人，遣返外来人员7815人，至2005年12月14日，共拆除房屋2008间，拆除设备2307件，拆除电缆12万米，拆除轨道8.7万米，清理存煤63.1万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05年11月20日之后，煤矿关闭工作进入“清理存煤、拆除房屋、设立标志、恢复地貌”阶段。截至到12月31日，大安山乡、史家营乡、南窖乡、周口店镇4个乡镇共拆除房屋2217间，拆除设备2307件，拆除电缆120030米，拆除轨道87380米，清理剩余存煤631027吨。为了让矿区群众铭记被关闭的矿井在经济建设、山区发展和人民生活中曾发挥的作用，为53个矿井竖立了标志碑。

2005年12月6日，房山区召开关闭煤矿现场工作会，要求各相关乡镇要严格把关，严格掌握关闭标准，确实做好关闭工作；今后平整土地、生态环境恢复等工作不要等，要利用农闲时间，抓紧安排，开展生态环境整治，高质量做好生态恢复工作；要进一步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关心群众，切实解决群众

实际困难；严厉打击和处理非法盗采行为，加大监督和排查的力度，对非法行为绝不能手软；要培育发展好替代产业项目。

房山区在关闭煤矿工作中，区委区政府各职能部门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各乡镇党委、政府各司其职，各村党组织、村委会各负其责。5个乡镇22个行政村的干部、党员、群众，煤矿的承包人、投资入股者，服从国家命令，无条件关闭了煤矿。区长祁红不止一次地讲：房山，特别是矿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命令的理解和执行，让人从内心深受感动，“我们的人民群众真好”。

2005年以来，房山区始终紧紧抓住两点，一是该关的坚决关闭，不讲任何条件。二是千方百计抓好替代产业，解决矿区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

在2005年集中关闭煤矿的前期，房山区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矿区人员现状、矿井基本情况、经济利益分配等26.7万多个基础数据，归纳出群众生活、就业安置、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产业发展、人口搬迁、政策扶持、法律支持等8个方面50个问题，针对其中矿井关闭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房山区制定了5项措施：一是解决群众用煤问题。今冬的群众用煤责成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落实。今后按照每人每年5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二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将原计划三年的山区引水工程缩短一年，确保矿区人畜饮水，不因矿井关闭而受到影响。三是生活补贴问题。对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全体人员和老党员、老干部，财政给予补贴，对煤矿企业工伤致残、职业病人员以及遗属，按现行标准予以补贴。四是学生上学问题。关闭范围内的寄宿制小学生免交教科书和住宿费，并每人补助150元，山外就学的初、高中生实行助学金制度。五是就业安置问题。采取扩大生态林补偿面积、降低人均管护面积、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启动矿山环境生态恢复以及小流域治理工程等方法增加就业容量。同时以区内新引进的企业为载体，安置部分劳动力就业。

房山区不断拓宽煤矿区人员就业渠道。2005年11月7日，召开安置山区劳动力就业工作会。区委、区政府推出了房山区关于将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政策向农村延伸，解决农村劳动力安置、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问题的办法。确定了大华天坛服装等10家大型企业1217个就业岗位，面向8个产煤乡镇招工。2005年12月16日，又举办第一期煤矿关闭后劳动力就业招聘会，为关闭煤矿乡镇解决富余劳动力安置问题，请北京北一良工等5家企业提供了180个就业岗位，各乡镇按照用工要求组织了百余人前去应聘。

房山区的煤矿关闭整顿工作，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指

导。2006年1月10日上午,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到南窖乡检查煤矿关闭工作,对房山区煤矿关闭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强调煤矿关闭必须要做好劳动力就业安置等工作。2005年12月15日,副市长陆昊到房山区就煤矿关闭工作进行调研,对房山区煤矿关闭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陆昊强调,煤矿关闭和整顿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严惩非法盗采者,要优先照顾因关矿而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的百姓,为群众谋求实利。2006年3月8日,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带领市有关部门领导再次到房山调研,要求市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积极支持房山的此项工作。

2006年6月7日,房山区召开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公开逮捕大会。经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房山公安分局对涉嫌非法采矿造成邹银等3人被埋井下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董某,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的嫌犯,犯罪嫌疑人董某、谭某依法逮捕。仅2006年上半年,房山区就进行大规模打击煤炭资源非法开采整治行动3次,共出动车辆464台次、人员4412人次、使用炸药2275.8公斤、雷管1328合支、拆除偷盖房屋4391间、填封非法井口127个。房山区的地方煤炭产业发展将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2006年12月18日,在房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房山区区长祁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到2011年,房山区要关闭所有的煤矿。同时,房山区将建大型农民培训基地,培训以前靠煤矿产业为生的农民,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 建国后房山粮食机构的建立及发展

康 富

1949年房良两县相继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接管敌伪粮库的基础上，设立了县粮库。县粮库当时隶属县财政科领导。

1950年，房良两县由原隶属察哈尔省十四分区改划为河北省人民政府通县区专员公署领导。该年下半年，房良两县粮库改由通县区粮库管辖，当时称通县区区粮库房山县分库和良乡县分库。房山分库负责人袁德印，良乡分库负责人许亮。专区粮库和县分库为国库，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接收公粮、粮食运输、储藏和军供等。其时，除国库外，房良两县还设有地方粮库，又称地方税收粮库，隶属县财政领导。

1951年7月，河北省通县区粮库改称为河北省通县区专员公署粮食局。房良两县分库也分别改为房山县粮食局和良乡县粮食局。与此同时，为贯彻国务院《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运的决定》，河北省政府决定：自7月1日起，国家公粮入中央粮库，县地方粮入地方粮库，明确公、地两库的职责范围。1952年3月27日，通县专署财经委根据省财委指示，通知地方粮库取消，所有地方财政粮及地方事业粮一律交粮食公司收购，凡地方存粮即交当地粮食局代为管理。

说到粮食公司，那是为了由国家掌握粮食市场，抑制私商，控制粮价，稳定人民生活。1949年9月13日，成立了华北粮食公司。1950年4月，国家在原华北粮食公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国营企业性质的中国粮食公司。省地设有分支公司。1951年，中粮公司通县分公司派出人员，在良乡县所辖的琉璃河镇设立粮食小组，负责人为严正国。同年4月，建立良乡粮站（亦称粮食公司），主任王毓华。

为了加强和统一粮食工作，逐步向粮食专卖发展，1952年7月，河北省政府决定，将粮食局与粮食公司合并，暂用联合办公名义，合署办公机构直属同级政府首长领导，日常工作事务由同级财委负责。根据这一指示，良乡县粮食局与良乡粮站合并。粮食局与粮食公司合并经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后，1952

年9月11日,河北省政府宣布,各级合并机构名称为“粮食管理局”。粮食管理局属人民政府领导,业务由上级局领导。根据这一指示,房山县人民政府粮食管理局成立,负责人梅廷章。局址设在城关北街。下辖城关、霞云岭两库和两个临时租赁粮库。良乡县也同时成立人民政府粮食管理局,局长许亮。

1952年9月,琉璃河粮食小组开始征地,筹建琉璃河粮库。1953年初,琉璃河粮库建成。经通县专署管理局批准,将琉璃河粮库划归为房山县粮食局直属粮库。

1953年10月,中央决定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0月以后,房良两县粮管局分别强化了粮食网点建设。良乡县在原有基础上,新增设了交道、魏各庄和葫芦垡粮库。房山则新增了赵各庄和张坊两粮库。

自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供应工作主要依靠基层供销社代销。到1955年上半年,良乡县粮食代销点已发展到25个,房山也设立了15个代销点。

1955年5月1日,经河北省粮食厅和供销合作社决定:基层供销社粮食代销点全部移交粮食部门,包括全部财产及工作人员。房山接收了15个,良乡接收了25个。移交后,基层粮点直属区粮库领导。自此,两县粮食机构得到了壮大,基本上能够承担起全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任务。

为了健全和加强基层粮食业务机构,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于1955年8月11日下达了关于整顿和健全基层粮食机构的指示,规定县辖区设立粮食管理所(撤销区者不设);粮食供销点改为粮食购销站。依据点与点之间不超过15华里的原则进行调整。选择适当的购销站作为中心购销站。中心站的任务是:除办好本站业务外,还要负责汇总本区各站的销售数字、财务手续,直接向县局报帐。房山县鉴于当时已经撤区,故未设粮管所,而是将当时的6个中心库改为6个中心购销站。包括霞云岭、张坊、赵各庄、南尚乐、城关、长沟中心站,另保留琉璃河直属库。良乡县设立了4个粮食管理所,包括魏各庄、葫芦垡、琉璃河、城厢中心站。

1956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河北省粮食厅和商业厅联合发出通知,将油脂公司划归粮食部门领导。1957年6月,饲料、油脂和粮食企业合并,统一经营,分别计算盈亏。当时良乡县分别将油脂公司和饲料公司全部并入粮食部门。

1958年1月,房山县和良乡县划归北京市。同年,两县合并成立周口店区。房良两县粮食局合并建立周口店区粮食局。局址设在房山城南,京周公路北侧,局长王毓华。区局机关下设8个股室,包括秘书室、人事股、保管股、

业务股、财会股、工业股、计划统计股、农村购销股（即政府粮食办公室）。建区粮食局之初，全区基层单位 33 个，包括草站、油库、良乡直属库、琉璃河库及 27 个中心粮站、购销站。1958 年 6 月，原京西矿区坨里粮食管理小组及坨里、周口店、柳林水三个中心库划归周口店区粮食局。

1960 年 2 月，随着撤区建县，周口店区粮食局又改成房山县粮食局。1969 年 7 月 18 日，房山县粮食局撤销，与供销社合并成立商业局。1971 年 5 月恢复房山县粮食局建制。1987 年 1 月，房山县、燕山区撤销，成立房山区，合并建立房山区粮食局。房山区粮食局下辖燕山粮油管理处，16 个粮管所，3 个直属库，2 个公司和 1 个油脂厂。

回顾粮食部门半个世纪所走过的路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合到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经营到多种经营，从粮食小组、粮站到粮库粮食局，从简单的公粮接收到粮食的购、销、调、存、加一条龙经营，从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三千余人，无论机构如何变化，无论名称的叫法有何不同，无论职工人数的多少，无论职能科室的合、分，总而言之，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把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管理好。

2002 年，随着粮食系统机构改革的步伐，房山区粮食局已转制为房山粮油贸易总公司，下辖 3 个中央和市储备粮专储库，1 个经营库，1 个批发市场，职工精减到 412 人。目前，总公司正在团结奋进，通过现代化管理手段，完成新时期的粮食工作新目标。

# 房山的副食品供应溯源

王绍清

—

建国后，首都人口增长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肉、蛋、禽、菜等副食品需求量迅速增长。这些产品的特点是“鲜嫩易腐”，不易长途贩运，北京是大城市、小郊区，副食品大部分来自京郊的河北省邻县。1954年猪肉销售量猛增，比1949年上升168.4%，粮食统购统销后，饲料缺乏，农业减产，生猪饲养量下降，国家为稳定猪肉市场，对生猪实行派购政策，由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1956年首都猪肉市场供应吃紧，1957年3月城市服务部召开首都生猪生产基地会议，决定成立由北京市、河北省通县专区和城市服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五人小组。下设办事机构，要求郊区各乡成立生猪生产委员会，确定收购生猪实行“按斤定等、毛斤记价”的方法。同年9月28日，北京市颁布《北京市生猪统一收购暂行办法》。12月1日，北京市猪肉实行凭证供应。

1958年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研究取消部长以上高级干部食品供应问题的会议纪要》，取消北京市食品供应处以前发给的购肉本，规定部长以上干部一律在户口所在地区领取市民购肉证。为保证副总理、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国防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日常需用的食物安全，所需食品由供应处按照市民的定量标准供应。明确规定今后供应处主要对象是驻华使馆、外国专家、六大饭店和医院。195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管辖的通县、大兴、顺义、房山、良乡五县划归北京市领导，房良两县合并为周口店区，两县供销合作社合并后统称商业局。当时，周口店区委遵照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的“郊区为首都服务”的方针，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本着“服务首都，富余农民”的原则，修订原来生产建设规划，大搞副食品生产，迅速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



## 二

周口店区委为加快副食品生产步伐，为首都提供大量猪、蛋、禽、菜缓解首都市场供应的燃眉之急，首先成立畜牧生产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商业局，主任由副区长刘增勤担任，统一指导全区畜牧业生产，重点放在养猪上。商业部门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文件，扭转过去单纯业务观点，把扶植副食品生产，采购猪、羊、禽、蛋、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商业局党委从基层单位选拔41名既有业务水平，又有群众观点的优秀干部，做为“畜牧指导员”分别派驻各公社。主要任务是帮助解决优良种猪，种鸡、仔猪、雏鸡的供应，互通有无，调剂社会余缺，指导种蛋孵化，提供信息，组织交流，帮助解决购进种猪、种蛋饲料资金不足问题，定期到圈，配合收购，检查指导。

商业局还建立了二部、四厂、一窖、一园、十六处收购站。即，农产品采购经理部、食品副食品经理部；田各庄万头养猪厂、水头畜牧厂、黄土坡养鸭厂、良乡屠宰厂及冷库；房山菜窖（后为蔬菜经理部）；焦庄花果园；房山、良乡、南尚乐、长沟、张坊、十渡、霞云岭、琉璃河、豆店、交道等十六处收购站。据不完全统计，从事农副业食品生产的达824人，奔波在副食生产经营战线上。

## 三

房良两县有传统养猪的习俗，多是自然繁衍，品种低劣。据河北省30年代调查统计，房山县户均养猪1.47头，超出河北省平均数0.87头，良乡户均养猪0.67头，略高河北省平均数。农民饲养的生猪，大部分在春节和红白喜事自宰自食，交完割头税后，均可到市场销售。解放前房良两县城内仅有肉杠（铺）四处，基本是当日或隔日宰猪，即时出售，剩余猪肉放入地窖，次日出卖。

解放后，猪、牛、羊肉为自由购销。1955年购买力上升，国家将生猪列为二类物资，取消商贩下乡收购，由供销合作社统购。北京市于1956年12月、1957年3月两次调整生猪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18.7%，1958年底周口店区养猪达到14万头，交售商品猪2.9万头，比1957年交售商品猪上升

58%。人民公社化时，提倡集体办养猪厂，加之自然灾害，粮食减收，饲料严重不足，造成大量猪死亡。因收购生猪以出肉率定等级，肉眼观察不准，出现了压级压价，养猪大幅度下降，1960年比1958年下降14.3%，首都猪肉市场供应更为紧张。1961年起，北京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生猪收购政策实行重大调整，将留肉改为留猪，社员饲养生猪交售实行“购六留四”。农村社队食堂养猪“购一留九”，生产队集体养猪实行“购九留一”（1962年改为购七留三）。同年4月，收购每头毛重生猪120斤以上补助饲料粮40斤；同年11月改为120斤以上者奖售饲料粮100斤；1962年11月调整为收购每头毛重生猪120斤以上者，奖售粮食80斤，每10元发购货券5张，1964年改为140斤以上者，在奖励粮食100斤基础上，每增重一斤奖励粮食一斤，生猪毛重100斤，出肉率58%以上奖售棉布5尺。1964年全县养猪达22.3万头，交售商品猪7.6万头。1965年养猪达到万头以上的公社有6个，即石楼、琉璃河、紫草务、城关、南尚乐、长阳公社。

“文革”期间，大砍副业生产，养猪大幅度下降。1966年比1965年下降7.7%。1973年北京市在国务院发出大力发展副业的通知后，再次提高奖售的标准，增加特级生猪收购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农副产品购销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79年11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确定，在国家拨给饲料粮减少后，对收购每头超重肥猪应得补助粮改为付给加价款，每超5斤为一杠，每杠补助0.6元。1980年后，全县养猪达44.3万头，交售商品猪20万头，养猪达到2万头的公社有四个：计石楼公社2.9万头、紫草务公社2.2万头、城关公社2.5万头、南尚乐公社3.4万头。1985年再次调整生猪收购价格，收购生猪每斤由0.65元提高到0.88元，上升35.4%，鲜肉价格上调，房山县政府为不影响居民生活，实行暗补的方法，对经营肉食造成亏损的单位由财政给予补贴。根据食品公司的统计，1986年肉食补贴额209.42万元，1988年为802.57万元，1992年，房山区政府遵照北京市政府指示，全面放开肉蛋禽菜及饲料购销价格，取消各项补贴。房山农民自1949年至1990年为首都市场提供商品猪244万头，居郊区县之首。肉牛自1952年至1965年交售0.5万头，肉兔自1965年至1986年交售285万只，为首都肉食品供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五十年代房山县畜牧工作的一面红旗

魏志华

上世纪 50 年代，房县长沟人民公社石窝管理区畜牧工作，特别是发展大牲畜，搞得比较突出，曾出席过房山县、北京市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1958 年底，又被评为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长沟人民公社石窝工作站，又叫管理区。原来是石窝乡，是 1957 年底由南尚乐、石窝两个乡合并而成，即现在的大石窝镇的范围（当时拒马河西边下滩等几个村还没有并入石窝乡）。1958 年 9 月初公社化时，并入长沟人民公社。当时全乡共有 4464 户，20181 人，42266 亩耕地。当时的生产条件相当落后。农村没有电，没有农业机械，完全靠人和牲畜耕地。当时唯一的、也是先进的农机具就是七寸步犁和双轮双铧犁。这些农机具也要靠人和牲畜来拉，所以大牲畜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当时的大牲畜比较少。当时全乡共有牲畜 2725 头，其中，马 103 头，骡 40 头，牛 558 头，驴 1924 头。平均 25 亩地 1 头牲畜。驴马大牲畜仅占总牲畜的 8.9%，远不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

鉴于以上情况，1958 年初，石窝乡党委、乡政府根据现有牲畜和其他条件进行了研究，要求在原有基础上，1958 年底牲畜发展到 3660 头。经过大力发动群众，发展计划基本完成。经过三周突击，一周扫尾的配种突击活动，把大牲畜配种工作推向高潮。全乡适繁母畜 731 头，到 6 月份就完成了 661 头，占母畜的 90%，准驹率 426 头，占配种数的 60%多，已生幼驹 227 头。到 1958 年底，全乡大牲畜增加了 500 多头，主要是马和驴骡，使骡马大牲畜增加两倍。

石窝乡发展大牲畜所以能够取得以上成绩，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加强领导，深入宣传。为了实现发展大牲畜的计划，乡党委把发展畜牧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并确定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振欧重点抓这一工作（当时石窝乡党委书记是马向凤、乡长王振欧，我当时是副乡长）。乡里建立畜牧生产委员会，各村的农业社社长为委员。具体工作由两名乡畜牧指导员



负责。当时的乡畜牧指导员是高福春、王俊云。各村建立畜牧生产专业队，有专人掌握放牧、配种、饲料、使役等，为配种工作打下基础。乡干部到哪个村下乡，也要检查和了解畜牧工作情况，乡干部集中时要进行汇报。同时，对干部、群众进行深入宣传。在开展配种初期，部分干部、群众有顾虑，认为驴不能生骡子、驴让马配架不住，就是配了也生不下来，等着憋死。针对这种思想，一方面向干部、群众宣传教育，讲清道理，一方面用下滩村村民郑德福家的一头驴两年生两头骡子的事实进行教育，改变一些人的错误认识，使配种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部长王震、水  
长罗玉川向先

挑选种畜，解决种畜不足的问题。为完成配种，提高牲畜体质，采取了就地选优的做法，在现有公畜中挑选好的当种畜。另外还从外地购买了公马 7 匹，荷兰牛 1 头，本地公牛 16 头。为解决种畜不足，还建立了人工授精站。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人工授精的就有 166 头，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个乡发展大牲畜，特别是建立人工授精站，县里给了很大的支持。派了畜牧技术干部齐仲庆、陈宝文、孙作珍 3 人长期到石窝乡蹲点。齐仲庆是 50 年代初河北农大畜牧系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县里畜牧工作的技术权威。同时，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王孝鑫教授，也和县畜牧局的同志一起到石窝蹲点，亲自在配种站抓配种，帮助培训畜牧技术干部，对石窝乡的大牧畜配种是个很大的帮助和推动。

掌握发情期，提高怀驹率。各村主管畜牧工作的干部、技术员，经常注意母畜的发情期。以便“赶热窝”配种。一般母畜发情期在 7 至 8 天左右，多的到 12 天。掌握在发情末期配种，在发情期的第 8 天和 12 天配 2 次，怀驹率有很大提高。

饲养好种畜，制定奖励制度。养好种畜是搞好配种，发展畜牧的重要一环，乡和各村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和奖励制度。种畜一天喂两次。早上 4 至 7 点，下午 6 至 10 点。每头种畜每天除喂饲草外，还喂 7 斤黑豆。饮水 4 次。配种前不饮冷水，不过河。饮过冷水或过河后，等撒尿后再配种。在配种期每头牲畜每天加小米 1 斤。为合理使用种畜，划定地区，送种畜上门配种。对饲养员、使役员规定奖励制度，开展了“五好”、“三省”、“四包”、“三奖”活动。

“五好”：即吃好、喝好、休息好、睡好、繁殖好；“三省”：即省料、省药、省开支；“四包”：即包配、包准、包生、包活；“三奖”：即配1头奖1元，准1头奖3元，生1头（驴、骡、马驹）奖6元。对违反制度、发生差错的要进行批评教育、适当处分。这种奖惩制度在当时对完成配种任务起了很大作用。

石窝乡的畜牧工作比较突出，几次被评为县、市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1958年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在石窝乡召开了全市畜牧工作现场会。市农业有关部门、各郊区、县主管农业的副区长、副县长、农业局长和部分乡、镇领导参加。王振欧在会上介绍经验，与会者参观了石窝乡的配种站，市领导对石窝乡很抓大牧畜配种的做法和效果给予充分肯定。1958年底，石窝乡被评为周口店区和北京市及全国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于1958年12月25日至1959年1月初在北京举行，房山县（当时是周口店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5名：有张革夫（周口店区委副书记，代表全区农业先进单位），高福春（长沟人民公社石窝管理站副站长，代表石窝管理站畜牧先进单位），杨文辉（长沟人民公社下滩管理站总支书记，代表下滩管理站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宋希儒（良乡人民公社坨里管理站副站长，代表坨里管理站林果畜牧先进单位），李秀荣（马安人民公社十渡村社员，代表十渡村养蚕先进单位）。这次会议开了8天。会上，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农业部长廖鲁言、林业部副部长张庆浮作了报告，20多个先进单位发了言，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致闭幕词。国务院向先进单位代表颁发了奖状、纪念章。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会后，组织全体代表参观了北京一些大的工厂和新的建筑。

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使全体代表受到很大鼓舞，对农村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长沟公社参加会议的两名代表，回来后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公社党委对巩固现有成果，进一步发展农业、畜牧业作了进一步地研究。为了发展全公社的大牲畜，经过长沟公社党委和石窝管理区的领导反复研究，决定在石窝管理区的后石门村西沟，建立驴骡繁殖场。这个地方条件较好，两山之间有较大的山场，离村、离公路较远，不易发生传染病。经过积极筹备，于1960年初建成。牧场占地13亩，饲料地200亩，饲养和管理人员8人，兽医1人，配种员5人，加上行政人员共计20多人。原石窝乡后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复员军人王文思任畜牧场场长。畜牧场由长沟公社直接领导，开支由公社负责。以繁殖马驹、驴骡为主，多种经营。畜牧场计划种畜200头，除原

公社配种站的种畜以外，从石窝乡各村选购，合理作价。计前石门村 10 头、石窝 25 头、岩上 13 头、独树 9 头、下营 6 头、辛庄 20 头、三岔 8 头、水头 6 头、下庄 8 头、北尚乐 5 头、塔照 20 头、后石门 15 头、高庄 20 头、南尚乐 20 头、王庄 10 头、南河 10 头。畜牧场除原配种站技术人员外，县农业局在石窝蹲点的技术干部齐仲庆、陈宝文、孙作珍和中国农科院的王孝鑫老师也搬到了畜牧场，具体帮助、指导大牲畜的配种工作。畜牧场除本身搞牲畜配种繁殖外，也对外经营。各村的母畜可以到畜牧场配种，有时畜牧场也到各村去搞配种，实行有偿服务。不仅对各村的大牲畜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增加了畜牧场的收入。

公社畜牧场建立以后，由于饲养条件好，管理得当，技术力量强，大牲畜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仅畜牧场每年繁殖马驹、驴骡 100 多头，对公社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1961 年以后，由于公社体制的变化，原长沟大公社撤销，划为 6 个小公社，畜牧场的经济遇到了困难，使畜牧场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于 1963 年撤销。虽然畜牧场撤销，但石窝乡的畜牧工作已打下良好的基础，大牲畜一直在稳定地发展。

# 建国初期房良两地的粮食市场

康 富

解放初期的房良两地的粮食市场，从自由市场开始向市场管理转变；由私商操纵向政府干预转变，起到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的作用。

良乡县城解放后，为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县城周边的小集市曾一度取消，仅存城内集市，且开集时间间隔较长。1949年10月30日，良乡县政府发出工商字第1号通知指出：秋收将尽，农民的粮食、棉花正是到市场出售以换回必需品之时，为了物资交流便利，达到市场繁荣之目的，决定县城内的集市由本月15日起，改成十天五集，即一、三、五、七、九为集市日期。

政府在加强市场管理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建立集市管理委员会，配备市场成交员。此项工作，良乡县早在四九年上半年便开始了。刚开始时缺乏经验，全县各集市管理委员会从组织上不太统一，机构不太健全，步调上不太一致，管理措施不太完善，整个市场管理还处于松散型的初级管理阶段。1949年10月17日，良乡县政府就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作了指示，要求进一步健全集市管理委员会（简称集管会），由区长、派出所所长、税务所所长、银行供销社工商科各派一人参加，还吸收工商联联合会一至二人，交易员二至三人，共计七至十一人组成。区长任主任，派出所、税务所所长任副主任。集管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集市管理的方针政策，以达到城乡交流、繁荣市场的目的。集管会一般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是根据行情，物价波动，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县政府报告情况。县政府对集管会的工作和集市管理明确地作了指示：

一是加强商业业务管理。本着正当营业，贸易自由的政策，对合法经营者给予保护和鼓励，对不法经营者要加强限制。大力扶助合作社，减轻中间环节的剥削，有效打击投机者的活动。市场交易一律通过货币（包括商号门市），禁止以粮代币，防止和制止商号、面铺和粮栈等投机囤积粮食。

加强市场管理。凡是粮食交易，都要到市场过斗。如农民一斗以下，只几升者需换必需品，可听其自便，原则上一律通过货币进行交易。商号如遇有少



数以粮交换的，每天到税务部门报请纳税，一斗以上者一律到市场出卖。

加强牙纪管理教育。这一工作是对管好市场，打击投机倒把，减少农民吃亏的关键环节。对牙纪人员要组织经常性的教育，建立会议汇报制度，促其掌握好政策，通过他们管好集市。

进行耐心的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商人座谈会，讲明党和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对新币发行讲明其意义，免除商民怀疑。

二是规定统一市场粮价。当时市场物价，由专署评价委员会评定，由政府逐级下达。

粮价评定以后，在市场掌握上，一般不采取行政办法强制执行，而是通过经济手段，即用吞吐方法加以平抑。如 1949 年 10 月中旬，新棉上市而新粮尚未入市，市场出现了米贵棉贱棉农吃亏现象。10 月 15 日，良乡县政府下达指示，要求加强各专营业务部门之间以及和供销社之间的相互联系，切实负起市场的领导作用。用吸收和抛售物资去平抑物价。在粮棉价格掌握上，要求在棉价特高地区，采取赎物办法，每斤好皮棉换给十斤米。这样既可以减少私商投机钻空子，压价收购；又可免于大量投放货币引起物价波动。在粮价平稳或下降地区，可将棉价提至九至十斤米的标准。在粮价一般上涨地区，主要从出售粮食，平稳粮价中适当调整棉价，缩小米棉交换差额。

三是限制粮商粮贩，打击粮食投机行为。1950 年后，“中粮公司”作为国营粮经营机构，占领粮食市场，担负起稳定市场，平抑粮价，保证粮食供应之重责。开始，由于粮食公司力量不足，农村粮食市场和粮食经营，很大程度借助于供销社的代购代销。

粮食公司在粮食市场上，主要依靠竞争手段与私人粮商粮贩展开斗争。政府则采取行政手段对个体粮商粮贩进行限制，对不法粮商粮贩进行打击。

1953 年 6 月小麦上市后，为保证国家市场收购任务的完成，房良两地政府都对私人粮商粮贩进行了严格限制。房山县政府规定：停止私商贩运，更不允许私商囤积。具体做法上还规定：国营运输部门不给私商运小麦；银行不贷给私商小麦款；外地私商一律不准收购。当地不经营粮食的私商不准收购小麦。当地粮商小贩及面粉加工户不准在市场上抬价搞黑市收购或到农村收购。如当地粮商小贩及加工户需购小麦时，首先要做出实际计划，向当地政府登记。为了掌握公私收购比重，县城加工户由工商科直接审批，发给其收购证，按指定市场和数量，由集市成交员给予成交。但必须按国家牌价收购，收购总量不得超过当日上市数量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不得以货换粮。

良乡县政府为解决粮食黑市暗购问题,规定本地加工户、大车户、豆腐房、豆丝房等,在保证其正常营业的原则下,限量购买,不得囤积、抢购和高价诱售。责成乡、街政府给予监督。对私商偷购积存严重者,从严处理,打一儆百。1953年11月,为适应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需要,良乡县政府在取缔私人粮商粮贩前,对他们采取了紧急措施。规定:对本地粮商和加工户用联购办法给予数字上的限制。外地粮商粮贩和自买自食者,不问有无证明,一律不准购买。教育一切购粮户,不准一人联购和多人套购。对运输部门规定:一律不准给私商运送粮食。私营交通运输须凭证明托运,其运往地点与营业性质不相符者,即以跨行跨业论处。

1953年11月23日,中央政务院颁布了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就是建国后执行了四十年的统购统销政策,从而粮食市场走向了正轨和稳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繁荣经济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

# 韩营村“唐记土碱”老字号

唐占忠

琉璃河镇韩营村是原属河北（直隶）省良乡县，地处永定河西堤下，距金门闸 2.5 公里的一个自然村。据说早年该村有十几户人家，由两个姓氏组成，一姓韩，宋朝时辽人入侵中原遗落的几户游牧人，以姓定村韩家营（解放后土改时去掉家字为韩营村至今）。二姓唐，明朝末年由山西洪洞县逃荒迁徙到此落户。这里人少地多而瘠（盐、碱、沙荒），人们生活来源一部分是牧养，一部分是靠经商。随着时代进展，人类的繁衍，到清朝时姓唐的占村民总数九成以上，其中唐玉森家人丁兴旺有四子（唐珍、珂、碧、琦），成了村里有名能人。唐珍唐珂以牧养为主，每年秋后去口外（内蒙）贩马、牛、羊回到周边集市销售，财运亨通。老三唐碧办事公道，有感召力，当村长。道光年间永定河夏季常闹水灾，为防水患官府每年春、秋都向沿岸村庄征民工挑土加固大堤。韩营村离堤最近，每次出工都有，在唐碧带领下总是出色完成任务，卢沟桥水务道台看中他有组织和管理能力，收用并任命为金门闸防汛处伯宗，负责北起葫芦堡，南至固安县北村大闸的防汛工作。老四唐琦从事柳编和苇编生意，一年冬天去天津宝坻县卖簸箕、斗、升、苇席等农副产品，在那里发现有些人扫碱土熬碱，经察询其生产制作简单，销售快，收益好。想到家乡也是盐碱地，有取之不尽的熬碱材料，于是决定放弃柳苇生意，从宝坻请了有熬碱经验的人回到家里搞起土碱营生。

土碱的生产设备及制作主要过程是：

一、土碱的原材料。

冬天碱地上泛起的白色碱土。

二、生产工具。

(1) 碱刷子：用长 30 公分、直径 4.5 公分的柳木棒从一头锯开长 15 公分宽 4 公分的槽口，将长 20 公分秫秸皮（硬而有弹性），束成篋子用麻绳勒紧。

(2) 簸箕：用竹篾、木、柳条等编成。

(3) 土筐：用竹篾、柳条编成。

(4) 泥盆：用粘土或黄土加工制作成坯，经盆窑烧成。

(5) 草簾：用麻绳将稻草勒成，每块大小不等。

(6) 秫秸簾：用麻绳将高粱杆拴成的簾子，大小依碱池而定。

(7) 木格：用厚 2 公分高 10 公分长约 80 公分木板 4 块钉成的木格子。

(8) 葫芦瓢：将老、干葫芦锯开两瓣而成。

(9) 大铁铲：用熟铁打制似铁掀状。

(10) 碱锅：生铁铸造，最大口径为 1.5 米。

(11) 碱池子：挖长 2 米、宽 1.2 米、深 0.4 米的大坑底呈半圆弧状，一头高一头低，在低头外侧正中心挖一个口径 35 公分的小圆坑，出的积存池底流用于碱水，在大坑上放几根粗木棍，其上放秫秸簾，沿四周用砖砌成 35 公分高的围墙，内壁用麻刀白灰膏抹好以防渗水，池槽旁立几根木棍支草簾。

### 三、生产过程。

(1) 碱土倒进池底铺的秫秸簾上，厚度为 20 公分，夯实。

(2) 池内放温开水，浸泡碱土使其溶解，碱水慢慢从簾缝间渗入弧形池底，再流进池外盆形小圆坑，呈黑紫红色。

(3) 用瓢将积存的碱水舀进盆中净化，使碱质沉积凝固在盆底；当碱土过滤至尽时，将池内泥土用铁铲清除干净，再装入新碱土过滤。

(4) 将浮在凝固盆底碱坨上的黄色碱水倒进碱锅里，加温后，入池中继续过滤。

(5) 将盆里晶体碱坨取出待熬。

(6) 把干碱坨放进碱锅里，加热融化，用大铁铲不断翻腾让水蒸发，呈粥状时铲出放进木格中抹平凝固后表面泛白物，便是土碱了。

以上过程循环往复。

唐琦生产的土碱，有的卖给布店染坊，有的卖给民众食用，生意红火。引得本村及附近农民也从事土碱生产。所以，每年冬天金门闸一带广阔的碱地上，到处是一座座碱铺，一排排碱池子，一片片锅台，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熬碱场景。

一年冬天，道光皇帝出游直隶天津杨柳青地区“年画、剪纸”博览展销，回京时沿永定河西堤北上，到金门闸防汛处休息，看到堤下热气腾腾，烟雾缭绕，命大臣问伯宗唐碧咋回事，唐碧将胞弟从事土碱生产及利国利民情况敬禀转递于皇帝，道光龙颜悦，命侍从取匾一块，御笔书上“唐记土碱”四字，首赐唐琦以示嘉勉。韩营村“唐记土碱”字号由此产生。在码头、涿州、新城、官村、庞各庄、坨里、丰台等城镇开设了“唐记土碱”分号，将家乡生产和

收购的土碱运到各分号销售，真可谓货物通达，财源茂盛。到了清朝末年，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洋货大量涌入，民族工商业遭到极大摧残，象韩营村“唐记土碱”老字号个体经济更不堪一击，很快完结使命而销声匿迹。但它的历史业绩，土碱生产方法却留传民间，在历史上发挥过利国利民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当时永定河沿岸到韩营一带，在涿、良、宛联合县党委领导下，开展生产自救和支援革命运动，与敌人的经济封锁作殊死斗争。这时，“唐记土碱”的土碱制作方法，再现了雄风。村村户户熬碱，一方面穿过，一方面冲破敌人封锁线将碱、盐等物资送往山区支援八路军革命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贡献。

上世纪 60 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必需品相当紧缺，人们以瓜果野菜充饥，永定河沿岸民众穷则思变，将从河床里刨得蒲根以及玉米轴粉碎制成淀粉而成食，为使其易软化用碱水浸泡极为奏效，但凭国家计划供应那点碱面难解燃眉之急。此时，各生产队利用“唐记土碱”老字号传下来的制碱方法扫碱土熬碱，用它作代食品的添加剂，为社员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又做出了贡献。

# 房山的烧灰业

李德贵

百花山山区烧制石灰历史悠久，在门头沟区永定中学发现的辽代墓葬中，发现用石灰做粘合剂砌筑的石块矮墙。民国十七年(1928)《房山县志》记载：“灰之种类有青灰、白灰二种，白者其原为石质，以火煨之然后成白色之石块，以水沃之即溶为粉末，极细。用以砌砖石为墙屋，干后坚固异常，虽经河水冲刷，不易损坏。凡有大工程必须之品。”又记载：“灰之产地，周口店、韩继……自河套至大灰厂数十村皆有之。”灰窑业曾是灰岩资源丰富山村的主要产业和经济来源，民国时期，仅磁家务村就有灰窑二十余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石灰烧制业基本为私人合股经营，一般入股有十余户，多者可达二三十户。入股形式有地皮、资金、工具、劳力等。烧灰业的兴盛，带动了采煤、驮运、小洪炉、荆编、麻绳、磨房、服务等行业的发展。

烧制石灰，首先要选矿山，然后采石。开采的矿石有白羊角、白盖子、高粱花、大砂石等名称，石质不同，烧制的石灰质量也不相同。其中以大砂石烧制的石灰质量最好，烧好的灰块白中泛微绿色，化开后石灰灰质细腻，粘性极佳。

烧灰行称采石为“坑里的”，又被称为“拆山改石”。选择好灰岩矿山后，先揭去山皮，初采表层松动的石块。遇到坚硬的石块，用钎子、大锤将石块凿出缝，再用撬棍撬，有时用柴火将大石块烧裂，再采掘。至1931年时，用手工钢钎打眼，装黑色炸药爆破开采。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64年，开始使用手工打眼，雷管引爆炸药开采。上世纪70年代始，采用风锤打眼，雷管引爆炸药开采。

烧灰行称烧灰为“坑外的”。烧灰的主要设备是灰窑，灰窑选址一般在路畅、依山、傍水的地方。路畅便于运输燃料、石料、灰料；依山即指离采石场近；傍水即指窑址离水源地近。历史上烧制石灰使用的窑炉有土筒窑、盆窑、固体窑、立窑。

**土筒窑** 设立在靠近矿山的土坡上。窑筒垂直，深3.5余米，直径2.7米至3米，窑底有火道和通风孔。火道上依层放干柴、焦砑、煤、灰石块，在装

第一层灰石块时即点火。然后层层交替放煤、灰石块，同时在窑口之上一层煤、一层石块加高约 1.6 米封顶。

**盆窑** 设立在靠近矿山的土坡上。窑底呈盆形，窑体有大有小，盆深 1 米多，直径 3 米至 5 米。窑底设 4 条至 6 条通风道，通风道上设长条石，俗称“铺炕石”，条石上依次放干柴、焦砑、煤、灰石块。在装第一层灰石块时即开始点火，然后再层层交替放煤、灰石块，一共码 5 层至 10 层。烧灰部分称窑黄，为使石灰烧透，窑黄外面贴湿煤饼，然后在外面用石块垒墙，称窑皮。为防止漏火，湿煤饼与窑皮之间填土或灰末。为防止窑塌或被烧裂，用大绳捆绑加固。至民国期间，有的用钢丝打 3 道至 5 道箍，将窑体捆起来。盆窑顶上封碎石块和焦砑。盆窑出灰时，随拆随出，出灰后再重建，所以有民谚说：“拆了垒，垒了拆，不拆不垒没买卖。”盆窑在民国期间已经普遍使用。该窑的效益为每吨煤烧灰 3 吨，灰的成熟度 80%至 85%。

**定窑** 出现于 1959 年，当时称“固体窑”。窑址设立在离矿山较近的山坡，窑体面贴近山体，三面用砖石块砌垒一排几个窑口。窑体高 12 米，窑底下设高约 2 米的掏灰坑。内窑壁砌耐火砖，耐火砖外砌砖，砖外填土并夯实，外皮用砖石砌筑。固定窑烧灰先“壮窑”，即窑底装柴，柴上层层交替放煤和灰石块，一直装满至口。在装第一层灰石块时即开始点火。四五日后出灰，随出灰随填煤、灰石块，实现了烧灰连续生产。该窑的效益为每吨煤烧灰 4 吨至 4.5 吨，灰的成熟度 80%至 85%。

**立窑** 也称节能立窑。窑高 18 米，窑体底部设伞状炉盘，炉盘下装置鼓风机。窑壁设燃烧层、保温层、冷却层，窑体顶部设循环烟道。点火后使用鼓风机助燃。该窑的效益为每吨煤烧灰 6 吨至 6.5 吨，灰的成熟度 90%至 95%。烧制的石灰除用于当地及附近民间建筑外，大部分运到今北京广安门集市转销各地，自从良乡和坨里建火车站以后，大部分石灰运到火车站转销各地，民国七年（1918），仅坨里站运出的灰达 5000 余车。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烧灰业多为集体经营，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

# 房山区第一次飞机防治麦蚜

张广文

麦蚜是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害虫。据调查，北京郊区麦田以麦长管蚜为优势种。上世纪 80 年代的十年中曾经两年大发生，六年中等偏重程度发生，多数年份需要开展大面积防治。房山区 80 年代夏粮作物以小麦为主，每年播种面积都在 33 至 34 万亩，由于 5 月中旬小麦抽穗后还有大量有翅蚜从外地随风迁入，田间麦蚜数量剧增。蚜虫吸食麦株的养份和麦粒浆液，影响小麦长势和灌浆速度，若不及时防治就会造成严重减产。在开展飞机防治麦蚜（以下简称飞防）之前，一般都是人工喷药或用喷药车防治，作业速度慢，耽误农时。

1987 年，北京市植保站和房山区政府第一次在房山区进行飞机防治麦蚜作业，使房山区的农业向现代化进了一步，并为以后开展农业、林业的飞防飞播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飞机防治麦蚜，是一种大面积立体作业。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这次飞防的技术指导由北京市植保站负责，选用的农药是复果乳剂，按每亩 75 至 100 毫升兑水一倍稀释，进行超低容量喷雾。实施飞防作业的是经过改装的运五型飞机，华北工业航空公司的 8044 机组。房山区政府成立了飞防指挥部，由主管农业的副区长李炳田任总指挥，农林办主任赵振隆任副总指挥，由农业局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良乡飞机场，主要是飞机的起降调度、装药，由副局长韩国瑞及机场陈副参谋长负责，工作人员有机场作训股于参谋，农科所张书立、张广文。另一部分是地面指挥及防治效果测报由副局长彭清泉、侯长伯负责。

根据麦蚜发生情况的观测和预测，市植保站确定 5 月 15 日进入最佳防治期，开始飞防作业。为此，各项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

首要的工作是发布飞防的通告。通告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飞防作业区要做好各项准备，二是飞防作业喷药会杀死蜜蜂等有益昆虫，养蜂户必须在飞防开始前撤离喷药区域。通告以广播和张贴形式发布，虽然也通知了有飞防作业乡镇毗邻的河北省涿县有关单位，还是出了意外。一个外地的蜂农流动放蜂到了



南尚乐附近河北省一个村庄，赶上飞防作业，死了不少蜜蜂，因此到区政府告状。我们发了布告，他不注意了解情况，当然不能追究我们的责任。

其次是训练各乡镇地面指示标志。这次飞防是以乡为单位按飞防面积收费。飞机每次喷药幅宽为 50 米，在飞机进入作业麦田时，有十多人手执彩旗按 50 米宽度在航线出入的两端站成两排，飞机从中间穿过就喷药。扛旗的人在飞机过去后立即在二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要平行移动 50 米，再指示下一个航线。飞防开始后，这部分人，扛着红旗在麦田里奔跑，还要受农药污染，现代化作业也给他们带来从未有过的辛苦。

另一个有趣的是各乡镇派一名领航员，在飞机上给飞机驾驶员指示航向，指示哪里是本乡的麦田，以便进入航线喷药。一听说当领航员坐飞机，不少人都争着当。飞防开始前载着 13 个领航员到各乡镇上空转了一圈，大家也很高兴。哪知到开始作业时就没那么惬意了。运五飞机舱内装一个 450 公斤容量的大药罐，驾驶室只有正副两名驾驶员的座位，领航员只能手扶驾驶室门站在驾驶员身后。飞机每次出入航线都要拐弯、侧飞，每天平均起降六七次，平均每天要出入航线 100 多次。这可苦了领航员们，药味熏着，飞机一次次左右摇摆，有的人晕机、呕吐，一下飞机脸色都绿了，只好赶紧换人。

第一次飞防作业没有经验，还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在配药的环节上就出了事故。负责配药的是机场场务连的战士，每次要打开复果铁桶，把原液兑水稀释后装上飞机药罐。第一天开始时很顺利。到了下午，因为气温升高，铁桶经太阳晒后内部膨胀压力加大，桶盖一旋开，药液就喷了出来。溅到战士的身上还问题不大，严重的是还溅进一个战士的眼睛里，刺痛难忍，把在场的人都吓呆了，赶紧送到机场卫生队采取措施治疗。机场指挥组也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买了一批防护眼镜给战士们配戴，避免了类似事故。

本次飞防，机场指挥部 5 月 13 日进场，5 月 29 日结束，共工作 17 天，飞机作业 5 月 15 日至 5 月 24 日共 10 天。13 个乡飞行 66 架次（其中有 2.5 架次因天气原因属无效飞行）。按顺序各乡飞防面积如下：长沟 16355 亩，岳各庄 7000 亩，东营 19314 亩，琉璃河 31400 亩，东南召 17800 亩，交道 20000 亩，官道 19540 亩，窦店 22177 亩，石楼 29550 亩，周口店 12000 亩，城关 16090 亩，紫草坞 16000 亩，良乡 16200 亩，合计 243426 亩。

北京市植保站综合调查显示，99.5%的地块飞防后有效地控制了虫害，防治效果在 90%以上的地块占到麦田的 97%。

第一次进行麦蚜飞防作业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以后继续开展此项工作取得

了经验,也得到一些启发。当时我在区农科所任农艺师,在收集全部飞防资料并与良乡机场一些飞行员座谈后,对这次飞防作了一次全面技术分析,尤其针对这次飞防中存在的组织工作影响效率进行深刻分析,并送交有关部门。《提高飞防作业效率的途径》一文后来参加了1990年3月北京昆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论文交流,并收入《北京昆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

论文重点指出,飞防的分乡作业,无论是各乡怕自己吃亏,还是组织水平低怕工作麻烦,归根结底是落后的小农经济思想和经营管理方式与现代化作业手段不适应,因而影响了先进技术水平的发挥。这是北京郊区乃至全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分析指出:

1、每架次飞行,喷药时间占27.3%,路途往返占22.4%,出入航线(即田间拐弯调头)占50.3%,因而减少出入航线次数是缩短飞行时间的关键。

2、运五飞机以最小半径出入航线一次需1.32分钟,平均飞行距离3500米。这次采取分乡作业形式,喷药作业最长距离10200米,最短只有800米就要拐弯调头,即26至81%的飞行距离用于调头。13个乡出入航线约1280次,飞行距离达到6246千米。如果采取统一组织,连乡连片作业,同样麦田,最长喷药作业可达17600米,最短也有4000米,仅需出入航线350次,即可完成飞防任务,可减少飞行距离3255千米(即减少52%),共节省20.46飞行小时,在使飞防时间缩短2.6天同时,还节省飞行费用26.4%,因而是提高飞防作业效率和效益的根本途径。

这些观点,得到市植保站等有关部门认同,在以后的飞防作业中得到了应用,使农业现代化水平又进了一步。

# 房山粮仓史话

康 富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说明，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那么粮仓，则是保护粮食的第一道屏障。多少年来，那些大小、各式各样的粮仓，不管它们的历史作用大小，都是不应忘记的。

## 历史上房良两县的粮仓概述

历史上建仓储粮以备凶荒，被称为善政。自明代开始，房良两县都不乏建仓储粮的记载。

明中叶房山县即建有预备仓。嘉靖年间，知县李琮在预备仓中积粮四十余石。春季散给农民，秋季敛回，加二利息。后该仓积粮增至一百石。



长沟粮库席穴囤

明万历年间，知县陈庭训增建预备仓六间。积谷一千六百一十八石十斗九升；黑豆六十石；粟米三百五十六石九斗五升，同时还在学社北建造社仓。

清康熙二十九年，预备仓实存米一千二百零七石一斗，谷三千五百八十五石八斗。每年折耗极多，州府虽减价，但因乡民困苦，买者寥寥。为出陈易新，于是春借于民，秋收回。

清光绪年间，良乡知县范福履在琉璃河地区添设仓房，劝民捐谷粮以贮之，以备凶荒之年。

民国十三年，良乡城内罗府街有义仓名为常平仓。县东有预备仓。琉璃河地区只有空仓尚存。丰济仓、五里店仓、大十三里仓、石羊村、庄头村仓俱废圮。

民国十七年，房山县早年废圮的社仓地址也已不明座落，乡间义仓也有仓

无谷。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房良两县的解放区均位于山区。地域常有扩展和收缩，也常有变迁。所征粮食多用于战事，所以粮食储存无固定的粮仓和设施。

在国民党统治区，良乡县有两处较大的粮仓，即西仓库和北烧锅仓库。北烧锅仓库共有仓房 60 余间，仓形为民俗式。西仓库亦叫后海仓库，仓房两栋，为古式仓房。该仓为日本人建造，钢筋水泥结构，砖打圈梁，长度约 15 米，跨度约 6 米。



曾当粮库使用的长沟教堂

房山县有仓库一处，库址在城东关（原城关粮管所所在地），无仓房，粮食露天存放。

至房良两县解放时，上述几处粮仓库场均被我新政府所接管。

### 解放后的仓房建设及发展

房良两县解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仓的建设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解放初期，因粮仓很少，大多数粮食都是露天存放。1950 年，房山县地方粮库（包括办公室在内）只有民房 41 间，且房子低矮陈旧，不易储存粮食。1951 年，该县在县城东关（即原城关粮管所院内）建古式仓房一栋，土石木料结构，上出檐，下隔层，能储粮 200 万斤，是当时一流的粮仓，被当时的粮食保管员称为“让人放心的仓库”。此仓房直至 2005 年才被拆除。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良乡县良乡库内建苏式仓两栋。面积 2000 余平方米，可以储粮 1000 万斤。与此同时，西仓库不再储粮，移交县百货公司。至 1956 年，房山县粮仓已发展到 54 间，其中简易仓 9 间，民俗仓 36 间，民房 9 间，可储粮 400 万斤。

1958 年，房良两县合并成立周口店区（后改为房山县），于上世纪 60 年代建房式仓 43 栋，面积 5805 平方米，容量 1526 万斤。建仓地点分布在南窖、窦店、南观、上石堡、周口店、河北、磁家务 7 个粮库。在长操、大安山、班各庄、张坊、三岔、南尚乐、房山库、长沟、琉璃河 9 个库建简易仓房 52 栋，面积 6429 平方米，容量 2013 万斤。

上世纪 70 年代初，为全面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指示，房山县开展了

大搞土圆仓建设活动。1969年，首先在城关粮管站试搞，然后在全县铺开。

所谓土圆仓，即以土、泥、草为主要建筑材料，木杆或苇把封顶，呈圆形。有的用砖从外部加固仓围。一般仓底直径7米，高4米，容量可达十几万斤或二十万斤左右。此类型粮仓构造简单，成本低，利于操作，但耐久性差。到1973年，全县共建土圆仓606个，可储粮7000万斤，为备战备荒、储粮于民的战略任务做出了积极贡献。

除了推广建造土圆仓外，从长远目标考虑，粮食部门还根据备战备荒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的开展了更为坚固的具有防水、防火、防潮、防虫功能更强的其它粮仓建设活动。如在龙门台、周口店、官道三个库点建基建房式仓4栋，面积295平方米，容量73万斤。在紫草坞、赵各庄、石楼、官道、房山库、岳各庄、琉璃河、十渡、宝水、蒲洼、六渡11个库点建砖石圆仓135个，容量7736万斤。建简易仓房30栋，面积4913平方米，容量1295万斤。

1980年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形势的发展，原有的土圆仓大部老化，粮仓呈现紧张状态。全县又陆续新建砖圆仓144栋，容量6692万斤；新建简易仓房7栋，容量458万斤；新建基建房式仓1栋，容量18万斤；建钢板筒仓4个，容量240万斤。

至上世纪80年代末，房山全县还在使用的土圆仓只剩82个，可储粮919万斤；共建砖石圆仓279个，容量14428万斤；苏式仓两栋，容量1000万斤；基建房式仓49栋，容量1617万斤；简易仓90栋，容量3846万斤；共计建仓房（包括圆仓）502栋，总容量21810万斤。

在粮仓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粮仓的数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粮仓的仓型和粮囤的囤式也在不断地演变及发展。这里笔者想选几种曾经用过或现在仍在使用的粮仓粮囤作扼要介绍：

### 粮囤的演变

解放初期，房良两县均因储粮的仓房有限，因此广泛采取了做露天囤储粮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容易遭狂风暴雨的侵袭，给粮食职工保粮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它作业方便，只要库场大，可多做囤多储粮，能有效地缓解储粮难问题。所以，露天做囤储粮一直是粮食部门一种重要的储粮形式。至上世纪80年代末，全县仍有席茭囤521个，容量13775吨。

主要囤式有荆条囤、竹板（杆）囤、席茭囤。

**荆条囤：**主要是用山荆条编制而成的。山区荆条资源丰富，且山荆条结实耐用。把荆条泡软后，先编成囤状，然后再抹上黄土泥，晾干后即可储粮。一般每个荆条囤可存粮三四万斤。

**竹板(杆)囤：**解放初期，因仓库特少，需要做大量的露天囤储粮。当时房良两地席茺又极为匮乏，因此便学习外地用竹板或竹杆以及苇席等为原料做囤存粮。房山长沟地区稻草多，把稻草编成帘子，围在竹板囤的顶部，效果很好。后来，房山广泛推广长沟这种做囤方法，长沟、琉璃河、城关、南尚乐的露天囤 70%以上用的是这种方法。这种竹板囤造价低，但做起来难度较大，且寿命短，一般使用两年。

**席茺囤：**此种粮囤是解放后几十年里露天储粮的主要囤形。几十年来，席茺囤的制囤技术数经创新、改进，积累了丰富的制囤经验。席，即是通常见到的“炕席”(老百姓铺炕用)。茺，即苇子杆编成的帘，一捆展开数米。席一般做囤梆，茺一般做囤顶。1954年，又对囤顶又加以改进。把囤顶做成鱼鳞形，加大了坡度，增强了防水性能，每个囤还可以节省苇席 25 片。这种囤的主要缺点是有漏雨处不容易发现。

后又创出一种腾空式席茺囤，即在囤的顶部，用竹杆支撑起平来，做成清朝官员的帽子形状。这种囤易检查粮情，不易漏雨，有利于粮食散温，降低温度，对保粮益处极多。但制做起来费时费事。

做囤储粮，虽说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但做起来也并非容易。囤快要做成时，一旦发生倒塌，再重新做就极为困难。要是做的不细，一旦漏雨，那就更麻烦。所以做囤一是要有责任心，二是要十分细心。无论是打底、圈席，还是做“帽顶”，都要一环扣一环，环环扣紧。笔者曾经走访过全县上百个储粮点，目睹过职工做囤的情缘，那里边不但装满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同时也浸透着粮食系统干部职工的汗水与智慧。

## 房式仓的演变

解放后，房良两县所建造的房式仓有民俗式、苏(仿苏联粮仓)式、基建房式、简易式、土圆仓、石圆仓、砖圆仓、钢板仓等几种形式。另外，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还租赁过一部分民房、祠堂庙宇作过粮仓。

**民房、祠庙仓：**这类仓房容量小、防潮、防热、通风、密闭性能差。当时房少粮多，又没有其它储粮办法，只得租民房、庙宇解燃眉之急。用祠庙储粮

的粮站有羊耳峪粮站、十渡东村粮站、长沟粮站、歇息岗粮站和南窖粮站。

租用民房和公房储粮，在 60 年代以前也很普通。1960 年，霞云岭粮管所在霞云岭村购房 10 间，租占民房 11 间；所属下石堡购销部租占民房 7 间，龙门台购销站租占民房 3 间。河北粮管站下属的佛子庄粮站租民房 13 间；史家营粮站租民房 4 间；金鸡台粮站租民房 3 间；长操粮站租民房 2 间；磁家务粮站租民房 6 间、生产队公房 4 间；班各庄粮站租民房 5 间；马安粮管所租民房 5 间，下属六渡粮站租生产队公房 3 间、民房 2 间；蒲洼粮站租占民房 5 间；东村粮站租民房 7 间。良乡粮管站紫草坞粮站租生产队公房 5 间，官道粮站租生产队公房 5 间，长阳粮站生产队公房 11 间，窦店粮站租生产队公房 11 间。琉璃河粮管站下属的窑上粮站租民房 20 间。长沟粮管站在太和庄租民房 9 间，下属赵各庄粮站租占民房 24 间，天开粮站租民房 9 间，张坊粮站租民房 5 间、生产队公房 3 间。城关粮管站下属 5 个粮站，除周口店拥有自己的房地产（房子 29 间）外，其余皆属租占。

**民俗式仓房：**外形极似民房。四不露，出檐，木架结构，顶铺苇席，防潮好，通风差，容量低，进出粮不便。1953 年至 1956 年间，房山县曾造此类仓房 26 间。

**苏式仓房：**砖木结构，跨度大，墙身低，墙壁厚，檐口低，门口宽，房内有柱，沥青地面，防潮性能好，便于粮食进出。良乡县在良乡库内曾建苏式仓两栋，面积 2000 平米，容量 1000 万斤。

**基建房式仓：**其建筑结构在房山县内曾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另一类是木架或钢架结构。屋内无柱，跨度大，檐口高，容量大，易于机械操作，通风密闭性能也较好。此类共建仓房 49 栋，6171 平方米，容量 1617 万斤。

**简易仓：**这种仓从外形上看，基本上与房式仓相同。建造比较简单，仓壁较薄，顶部比较简陋，砖木结构，仓内无防潮设施。跨度一般约 8 米。后跨度近一步加大，一般为 10 米或 13 米。这种仓一般不做长期保粮用，而是做应急时用。

**土圆仓：**上文已介绍。

**石圆仓：**主要以花岗岩石块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圆形粮仓。一般仓底直径为 10 米、高 8 米。房山始建石圆仓在 70 年代中前期。这种仓坚固耐用，共建 45 个。分布在周口店、上石堡、磁家务、长操、南窖、南尚乐、张坊、三岔、紫草坞、岳各庄、蒲洼、十渡和宝水等 13 个储粮点。

砖圆仓：主要以砖为建筑材料。建造此类粮仓所节省大批木料和钢筋。这种仓也可分为两类。一是普通砖圆仓。仓底直径一般为 7 至 8 米，容量在 50 万斤上下；另一种属高大型砖圆仓，亦叫砖筒仓或立筒仓。仓底直径 10 米，高 12 至 13 米，容量约 100 万斤。1987 年底以前，房山共建普通砖圆仓 188 个，高大砖圆仓（立筒仓）45 个。

**钢板仓：**底座为砖座，仓壁用钢板焊接而成的圆筒仓。这种仓虽然美观，但造价高，不太实用。房山只有油脂厂于 1987 年建成 4 个钢板圆筒仓，可储粮食 60 万斤。

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山地区星罗棋布的粮站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它们的任务。



# 房山县粮食种植制度和种植方式的演变

张广文

1987年，房山县撤县建区前，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郊区县，至1988年仍有农业人口50.4万，占总人口的70%。解决农业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农业科技人员的首要任务，曾提出“无粮不稳”的警句。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粮食亩产量是解决吃粮问题的根本途径。上世纪50年代末，还确定了粮食亩产上“纲要”（亩产超过200公斤）、“过黄河”（亩产超过250公斤）、“过长江”（亩产超过400公斤）的奋斗目标。经过全县人民的努力，1964年，粮食亩产212公斤。1970年，粮食亩产达到280公斤。1978年，粮食亩产达到404公斤，总产量达到21848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453公斤。按当时的粮食定量水平，除山区五十多个大队仍吃返销粮外，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其中体现综合技术和实力的种植方式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种植制度也称为耕作制度，指的是在同一块地里一年耕种收获几次庄稼，一年收一次叫一熟制，收二次叫二熟制。不同作物或同一作物不同品种的种植方式决定了熟制。种植方式受到水、肥、土壤条件，以及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制约，尤其是取决于当地的有效积温能否满足作物按时成熟的需要。粮食生产中历来春争日、夏争时、龙口夺粮等“抢农时”的做法，实质上是为作物生长争取到足够的积温条件。房山县种植制度存在着一年一熟和一年两熟两种。上世纪70年代以前，并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直到1980年前后，房山县农科所彭清泉和房山县气象站张广文密切协作，潜心研究，从理论上确定了房山县积温分布规律以及冬小麦、夏玉米生长期积温特点。根据理论计算，80%保证率积温山区只能一年一熟，而平原丘陵地区则可以一年两熟。但用什么种植方式实现一年两熟，又能达到增产粮食的目的，则经历了从50年代到90年代几十年的探索和艰苦努力。

在粮食生产中，主要品种是玉米和冬小麦。这两个品种1970年占粮食总产量58%，1980占78%，1995年增加到92%。因此，房山县的种植制度和

种植方式是围绕玉米和冬小麦进行的。即夏收以小麦为主，秋收以玉米为主。

1949年至1961年，由于小麦和玉米品种是当地中晚熟品种，生产力水平低，基本是靠天吃饭。以一年一熟为主，(冬小麦秋种夏收或玉米春种秋收)，并逐步增加一年两熟面积，一年两熟的地方是麦收前在麦垄中套种玉米，或麦收后抢播麦茬玉米。还有一些地块春天种玉米，秋收后种小麦第二年收麦后再种一茬麦茬玉米形成二年三熟。到1961年全县的复种指数已从1952年的104.5%上升到148.3%。

1962年至1970年，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加，机耕机播的发展，为适时播种和按时出苗争取了时间，优良品种的推广使得可选择的中早熟品种增加。平原地区一年一熟的面积进一步缩小，由1962年占耕地的55%下降到1970年的32%。一年两熟的面积则占到耕地面积的55%。一年两熟中除了两茬套种外，还出现了“三种三收”的种植方式。

两茬套种主要是推广周口店公社南韩继大队创造的“小对垄”种植方式，即在畜播情况下，在3尺畦内播两行小麦，行距3至4寸，小麦间留1.2尺左右空档，在麦收前套种一行玉米。玉米间距2.2尺。

“三种三收”也属于一年两熟制，夏收小麦，秋收玉米，是当时的副市长刘仁以及主抓农业生产的王宪同志蹲点总结并大力推广的，为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种植方式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推广平谷县许家务“三密一稀”种植方式：即三尺畦内播三行小麦，占地1.8尺，1.2尺畦埂上在收麦前套种一行玉米，玉米行距3尺。与“小对垄”相比，小麦播种面积增加了50%。1970年前后，逐步推广新的“三种三收”种植方式，即在7.5尺畦内播14行小麦为一种；1.2尺畦埂上套种中茬玉米，为二种；麦收后在畦内播早熟玉米或高粱，为三种。秋天一次性收获后播种冬小麦。这种畦式田埂占地减少，对夏粮生产有利，实际上是一种重夏轻秋的生产安排。1970年这种三种三收的种植方式已经占耕地面积的5%。

1970年的复种指数达到了167%，粮食的总产和亩产有了很大提高。

1971至1980年，全县大抓平整土地兴修水利，“三种三收”的种植方式得到更大面积推广，1975年曾达到31万亩，占粮田面积的59%。但这一时期粮食产量很不稳定，虽然1978年粮食亩产“过长江”，1980年出现了周口店、城关、石楼三个亩产过500公斤的公社，但也有10年中5年比上一年减产的现象。除自然灾害因素外，“三种三收”的夏玉米产量不稳定也成为重要原因。这种种植方式能充分利用光温和地力，但不看各地的综合生产条件和管

理水平，不是因地制宜而是普遍推广，就不能保证持续增产了。这主要取决于玉米的出苗和长势。农业科技人员把这三茬作物描述为“上茬铺天盖地，中茬有天没地，下茬有地没天”。即：上茬小麦尽享水、肥、光、温，长势良好，产量有保障；中茬玉米因为是套种在麦垄间，受麦株遮挡缺乏光照，如遇墒情不好出苗困难，或小苗长势不好。到麦收以后，肥水光照充足起来，中茬玉米快速生长；三茬玉米出苗以后，肥水光照都争不过二茬玉米，形成了大欺小的生长形势。

农谚常说“麦打齐”，是说小麦长势齐整，水、肥、光照均衡就产量高。玉米也是一样道理，如果水、肥管理跟不上，就会“大欺小，长不好”。和两茬套种相比，“三种三收”劳力和成本投入多，产量又不稳定，于是出现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争论。“三种三收”的面积到 1979 年仅占粮田面积的 17%，随着新的种植方式的产生，这种种植方式就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期间，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生长期 100 天以内的玉米早熟杂交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应用，一种新的种植方式——两茬平播应运而生。即冬小麦收获后平播一茬夏玉米，夏玉米收获后再播种下茬冬小麦。

从农业气候资源看，房山县山前暖区在农耗积温不超过 200 度的情况下，80%保证率积温可以满足早熟玉米品种两茬平播的热量需求。但能否实施两茬平播，则对土地的平整连片程度，机耕、机播、机收的水平，土壤肥力，品种选择，灌溉条件，管理水平等提出了不同以往的高要求。1976 年，房山县农科所在彭清泉带领下，开始在坨头、窦店村进行两茬平播试验。1977 年北京市农科院又在窦店进行了 41 项对比试验，证实了两茬平播比现有的种植方式效果更佳。1978 年开始在符合条件的地方推广小麦玉米两茬平播种植方式，至 1980 年即达 8 万多亩，1990 年以后推广至 28 万亩，占到冬小麦播种面积的 81%，占到玉米播种面积的 68%，从此基本上确定了房山县平原地区一年两熟的种植方式，并取得了稳产高产的粮食生产大好形势。

两茬平播的种植方式可以说对光、温、水、土等自然条件利用到了极致，但其增产的效果也是随着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善不断增加的。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有了喷灌，取消了田埂，小麦的密度增加了，夏粮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两茬平播推广初期，使用的玉米品种是京早 6 号、京早 7 号、京早 8 号等品种，由于叶型发散，每亩只能保留 4000 至 4500 株。虽然比两茬套种玉米株数增

加近一倍,比“三种三收”增加50%。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但在80年代中后期引进了株型紧凑叶片上冲的掖单4号优良品种后,每亩株数可达5000至5500株,取得了更大的增产效果。1995年房山全区粮食总产3.18亿公斤,平均亩产超千斤,达到649公斤。1996年和1997年房山区两个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最好的产粮村——窦店村和南韩继村先后成为亩产超过1000公斤的“吨粮村”,成为科学种田的典范,给北京郊区的粮食生产树立了新的旗帜。

# 解放前房良两县的粮行油号

康 富

历史上的房良两县，地处京畿，交通方便。两县境内，既有高山又有平原，农副业物产极为丰富。另外，煤矿、灰矿、石料、山货及土特产种类繁多，品质优良。因此，历史上房良两县商业较为发达。在商业活动中，粮油交易形式主要是私营粮行油号和集市。

民国元年（1912），良乡县建立商会。次年，琉璃河、窦店两镇相继建立了商会。当时，良乡县拥有县城、窦店、琉璃河、交道四个集市。县城每月逢一、三、六、八日为集；窦店每月逢五、十日为集；琉璃河每月逢二、四、七、九日为集；交道集每月一、四、六、九日为集。据民国十二年调查，当时全县拥有粮油商号 60 家。其中县城内粮商 15 家，面粉油商 10 家；琉璃河粮商 18 家，油商 5 家；窦店粮商 4 家，面粉油商 5 家，油酒面商 3 家。

民国十七年，经房山县商业调查，全县拥有粮油商号 46 家。分布在县城、石楼、灰厂、长沟、张坊等地。其中县城内有粮行 24 家，油酒行 5 家；石楼有粮行 1 家；灰厂有杂粮行 6 家；长沟有粮行 5 家；张坊有杂粮行 5 家。县城内每旬四集：初二在北街，初四在西街，初七在东街，初九在南街。集市粮食交易以小麦、谷子、高粱、黑豆和玉米最多。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火车每天往返数次到坨里运煤，促进了良乡县城商业发展。县城工商业达 60 余户。其中米面铺达 8 户。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据良乡，大搞强化统治和经济封锁。加上 1939 年发大水，祸及良乡，种种天灾人祸，导致了良乡市场萧条，商业萎缩，很多商号关张停业。当时把持市面的只有日伪组织的一个合作社和由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开办的专营粮棉的“信义成”商号。勉强维持者不过十几户。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良乡县城沦为国民党政府之手。由于革命武装占据山庄、游击平原，对敌人构成严重威胁。盘踞在县城的敌人十分恐慌，惧怕解放军混入，经常搞戒严，城内虽有集市，老百姓却不敢进城，造成不少店铺倒闭，一般坐商纷纷改行为摊贩。

房山县的河套地区是有名的矿产区。其中煤窑最多时达 80 多个。磁家务村有石灰窑 23 个。另外还有石板、阶条石、缸盖、桌面、滑石板、砚台、磨刀石等石料业，最多时从业人员达 600 多人。仅滑石板一项，高峰期日产可达 2000 箱。除工矿业之外，河套沟还富产林果。柿子、核桃、栗子、杏、梨、苹果等干鲜果品都非常有名。河套沟的运输业亦比较发达。1937 年以前，就已有骆驼千只以上。日本占领房良两地后，为掠夺煤炭资源之需要，修建了公路。抗日战争以前，南窖地区有杂货铺 30 余家，规模较大的有 9 家。这 9 家中，代兼红炉（烧饼炉）5 家，代兼酱醋坊 2 家，代兼银号 1 家。据 1945 年调查，河北村拥有各类工商户 30 余家，包括杂货铺 7 家，粮店 4 家。

日本投降后和内战爆发前，河套沟的商业曾再度兴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并占领了坨里，与以佛子庄地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对峙和拉锯局面，再度导致河套沟的商业萎缩。

1948 年 3 月，良乡县民主政府建立了贸易管理站，大量采购粮食和食盐供销内地，同时利用我军事上的胜利和敌人实力不足，对内地经济封锁有所放松之机，于 5 月在东港促成一个自然小集市。时隔不久，我军打下了坨里据点，随之恢复和发展了坨里集市。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开集时，只有二三十人，粮食三四斗。经过宣传党的贸易政策，集市一天经一天兴旺起来，每集人数多达上千人，粮食上市五六十石。群众用苦杏仁、杏干、荆条、花椒等山货换回粮食和食盐等，缓解了生活困境。

1948 年下半年，良乡县民主政府对贸易工作越来越重视，结合整党纠偏工作，对没收的财产、货物予以退回，并由政府拨出部分货物，帮助恢复营业。

1948 年 12 月，房良两县相继解放。当时，部分私商因不了解我工商政策，一是怕金元券废止，大量购买货物；二是有的商人急于抛售货物，准备携款逃跑，故形成了良乡县城解放初期的一个商业小高潮。

1949 年 1 月，北平解放。我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其中包括商业人员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工商政策，商民情绪得到稳定。逃亡北平的商人随北平解放也陆续返回。房良两县的商业店铺又重新开张，开始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

# 房山的禽蛋生产与购销

王绍清

—

房山地区家庭养鸡，始于商周时期。辽定都后，为发展畜牧业，曾禁令燕京母畜出境。鼓励当地百姓种菜，饲养畜禽，以供京师。据《契丹国志》载：京师菜蔬“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

唐宋年间，集镇发达，市场繁荣，当时“草市”（集市）对主要物品进行分类设市，但鸡鸭鹅仍属牛羊猪市场内。

至元代，沿运河两岸以及江南禽蛋进入京师，在商业中心市场上单独设有鸡鸭市。

清康熙二年，《房山县志》已将鸡纂入“物产”栏中。

民国河北省调查报告载：当时房山县养鸡户均养鸡 7.14 只，良乡县户均养鸡 0.45 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鸡蛋为四大土特产商品出口之一（蚕丝、猪鬃、鸡蛋、皮毛）。1955 年，为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号召收购鸡蛋出口，换回肥田粉。进行“少吃一个鸡蛋，可为国家增加一斤化肥”的宣传。1959 年 2 月，国务院将鸡蛋列为农副产品二类物资，要求工商部门加强鲜蛋市场管理，禁止小商小贩自由购销贩运。1960 年，农业减产，鸡饲料难以解决，禽蛋收购量大幅下降。北京市对农村生产队和社员饲养产蛋母鸡实行“派购”政策，每年每只母鸡派购 0.75 公斤鸡蛋。1985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取消“派购”鸡蛋的规定。

二

鸡为传统的家庭养殖，户养三五只、数十只不等。牝生蛋，牡司晨，日间散在房前屋后场院饲养，夜间归埽入舍，自然繁衍，俗称“柴鸡”，其肉嫩，

蛋大，“清儿”厚，“黄儿”沙，味香。

清末民初，禽蛋生产兴旺不衰。每逢房山、长沟、张坊集期，商贩上市收购。为便利长途运输，将鸡蛋放入荆编“拢驮”（用荆条编成鸡蛋型筐，底小口大，中间用两根木棍弯成弓字形，串上两个筐放在驴鞍子上）里，用茅草或锯末添入空隙，以防碰破。活鸡装入荆编长方形小筐内，每筐可装十几只。为了驮运，在驴鞍子上放上“揽斤”（用小方条木做成人字形的架子，上小底大，放在驴鞍子上，下部与驴肚皮平，驴仍行动自如），“揽斤”两侧各放三四筐，驮入京城广安门、菜市口等地销售。

房山产红雄鸡，有“三把毛”之说。这种鸡颈为“项毛”，翅膀为“尖毛”，尾部为“泳尾毛”，经加工可制成“掸帚”。毛峰光泽，富有弹性，美观大方。

1958年以前，房山鸡蛋市场为多种经营，自由购销，小商小贩可贩运经营，机关厂矿伙食单位可下乡采购。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强调集体办鸡场，因缺乏经验，造成大批鸡只死亡。商业部门为完成收购任务，强硬突击收购，挫伤了农民饲养家禽积极性。1959年，房山鲜蛋收购量比1958年下降40%。2月，国务院将鸡蛋列为农副产品的二类物资，加强鲜蛋市场管理，小商小贩不准自由购销和贩运。鲜蛋收购价格由每斤由0.56元调为0.59元。虽加强市场管理，调高收购价格，收购量仍继续下降。三年困难时期，农业减产，吃粮指标降低，实行“瓜菜代”，加之养鸡饲料难以解决，收购量再次下降，外埠鸡蛋又调不进京城，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首都禽蛋市场告急。1961年4月，北京市在执行“派购”政策基础上，制定了收购鲜蛋奖励粮食的办法，同年9月，将每斤鸡蛋收购价格又上调29.6%。但农民饲养积极性仍不高，蛋源日益匮乏，市民凭证供应的鸡蛋时有时无。北京市商业部门为保障重点，采取特需供应，除大使馆、外宾外，对特殊行业工种人员、高级脑力劳动者、少数民族、宗教人士、产妇、病幼人员实行特需供应的办法。具体情况是：自1959年10月起，对产妇实行一次性补助供应鸡蛋2斤；确诊为需要营养补助的病人每人每天补助一个鸡蛋；住院病人每床每月补助鸡蛋1斤，托儿所每人补助0.25斤。

房山作为京郊收购鲜蛋大县，为保障首都重点禽蛋供应，县供销合作社党委对十四个收购站、160个代购点业务员提出“收猪到圈，收鸡到院，收购鸡蛋家家串”的口号。各基层供销合作社为及时运送鲜蛋，雇一名社员骑自行车日夜兼程送往市区。有时来不及入库就送往特需供应点。采用上述措施后，1962年收购鲜蛋36万多斤。1963年8月，为调动农民饲养积极性，凡农民交售1



斤鸡蛋，奖励粮食 1 斤，食糖 0.5 斤，购货券 0.5 张。岳各庄供销社为发展养鸡，及时供应社员雏鸡，在孵化机底部搭上火炕，提高孵化率，超额完成分配任务 30%，县政府曾在此召开现场会。全县 12 个孵化点完成孵化雏鸡 713000 只。

1979 年，全县收购鲜蛋达 300 多万斤。1983 年，商业部授予房山县供销合作社经营鲜蛋一等奖。房山县自 1952 年至 1989 年共为首都提供鲜蛋 38272200 斤。

### 三

鸡蛋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蛋白质含量达 14.7%，含有人体必需八种氨基酸，其组成比例适合人体的需要，其营养价值高，并有健脑、护肤的功能，故被人们称为“理想的营养库”。

在民间，鸡蛋还有医药作用，流传着许多养生药膳。例如首乌煮鸡蛋、鸡蛋煮猪脑、鸡蛋粥等，可延缓衰老。鸡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二脂、胆固醇和卵黄素，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作用。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还能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和微量元素如硒、锌等，对防癌有一定价值。

# 新街村的手工业

魏志华

1958年公社化以后，房山县周口店公社新街村采取自己培训手艺人、自己筹措资金的办法，发展为生产、生活服务的手工业，深受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人民公社化以前，在新街村480多户社员中，只有两个木匠和一个皮匠。社员们要理发、做衣裳、修鞋都得到外村去，十分不便。公社化以后，根据群众的意见，大队很快组织起16名手艺人，陆续创办了缝纫、理发、修鞋、张罗、农具修理、粮食加工、木器等8个手工业。虽说人数不多，但对支持农业生产、便利群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过去村里的大车、农具坏了，都要到邻村大韩继村甚至房山县城去修理，有的还要靠涿县来人修理。路途远，费时间，很不方便。自从办了农具修理组后，一般的农具都能自己修理和制造了。1961年夏天，地里急需锄刀，到处买不到，农具修理组就自己动手打了40多把，保证了生产的需要。

大队办了8个手工业组，不只是支持了集体生产，方便了社员，还给生产队和社员节省了不少钱。过去到外村买一个套缨得两、三块钱，而在本村自己卷的只要一块钱就够了。过去到外村理发要花三毛钱，而在本村理发只要一毛五分钱。

新街大队的手工业是怎么办起来的呢？

要办手工业，首先得有手艺人。新街大队初办手工业时遇到的头一个困难就是缺手艺人。对于这个困难，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

培养“钻师傅”，是克服缺手艺人的第一个办法。社员马祥、沙云朋等几个庄稼人。虽说没学过什么手艺，可是都有一股钻劲，自己琢磨着就能修水桶、焊水壶，被群众称为“钻师傅”。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修配组。他们边干边学，时间不长，他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几种小手艺。

请师傅来带徒弟，是第二个办法。缝纫技术自己不容易钻，他们就从龙宝峪村请来一位师傅，带两个徒弟。不久这两个徒弟就掌握了基本的缝纫技术。

派人出去“留学”，是第三个办法。大队要建立理发组，而本村没有一个会理发的。他们就派了两个社员到大韩继村理发组去“留学”。三个月后，两个“留学生”掌握了技术，回村后就开了业。

新街村办手工业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缺工具，少原料。大队的几个手工业都是新办的，一开始什么工具也没有，如果全都购买，村里又筹不出钱。于是他们采取了能做的自己做，能代替的就找东西代替，实在做不了和代替不了的再买。就这样终于把工具问题解决了。像修配组的烙具、扳子、剃子就都是自己造的。

有些手工业，如修配组、张罗铺、木器作坊，不只要有工具，还要有原材料。原料不足也是大问题。他们除请县里和公社调拨一些铁板、皮子、罗底、铁丝等必需的物资外，主要是靠搜集利用旧铁板、旧皮子、旧零件来解决原材料问题。

由于手工业都创办不久，从业人员都是从社员当中抽调来的，村里对手工业者的报酬，试行着几种办法：一是按钱记分。像理发员、缝纫工，收入一元记6分；二是不易实行定额管理的（如修配组），就实行固定工分制，每人一天8分到8分5，稍高于农业上的同等劳力；三是手工业者所得的收入全部交大队，按标准记分。他们所得的劳动工分，全部参加他们原来所在生产队的分配。无论分粮、分钱、分菜，都和农业上的社员一样。这样，从事手工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的收入，没有太大的差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社员都比较满意。

1961年以前，因为产值、利润都不太高，新街村的手工业并不出名，知道的人并不多。1961年10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委、房山县三级组成调查组，到新街村搞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调查，为中央制定《六十条》做准备。带队的领导有华北局的张处长，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浦、房山县委副书记张革夫。笔者也是调查组成员之一。在调查工作中，我们发现新街村的手工业搞得很有特色，便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并给《北京日报》投了稿。

1961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以近半版的篇幅介绍了新街村手工业生产的经验。消息发表后，影响很大。新街村干部群众，特别是小企业的人员更是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加倍努力，把工作干得更好。不久，一些公社大队就派人到新街来参观学习，按照新街的经验建起了自己的小企业。新街村连续几年被评为北京市和县农业先进集体。

1964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新街村修配组负责人马祥因为工作突出，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受到彭真、刘仁、万里等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会后，马祥把中央领导与代表合影的大照片挂在家中。并经常对群众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农民，没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国家就给了这么大的荣誉，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好。

# 焦若愚到房山县视察流水养鱼

张 珍

1984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顾问委员会主任、原北京市委书记焦若愚一行，来房山县视察山区半山区流水养鱼的生产情况。笔者时任县畜牧水产局党委书记，当时曾与县长邢春华陪同焦若愚同志行程三百多华里、历时两天视察了南尚乐乡下营村冷泉水养殖虹鳟鱼、河北沟大石河水资源情况。

这年冬天，房山县经济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农业生产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着渔业、畜牧业等多种经营模式转变。房山县地域广阔，可利用的荒废坑塘、自然河流水资源较多。当时为了鼓励农民发展渔业生产，市、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如平原地区农民，不论集体和农民个人，利用低洼荒地、荒废坑塘发展池塘养鱼，政府财政都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仅1983年和1984年两年的时间，平原乡镇和村队就发展池塘养鱼水面达2290多亩，商品鱼基地达到20多处（场）。

为鼓励山区、半山区利用自然河流发展流水养鱼，也出台了资金鼓励政策。1983年，南尚乐乡下营村和六渡乡七渡村在市县及乡镇的扶植下，利用河水自然落差，建起了流水养鱼场，均获试养成功。

焦若愚这次来房山视察流水养鱼生产情况，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邢春华县长亲自陪同并组织县畜牧水产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和科技人员参加。视察的第一站是到南尚乐乡下营村富民泉虹鳟鱼流水养鱼场。下营村党支部书记佟君兴、鱼场场长佟振兴汇报了建场经过和虹鳟鱼的试养情况：1983年7月1日至2日，由市农办、市水产研究所及县畜牧水产局等组成调查组，对南尚乐乡的下营村富民泉、高庄村的高庄泉、水头村的杖引泉、长沟乡的甘池村轩辕寺泉、南水河泉、将军庙泉等二十几处



焦若愚（左一）在视察流水养鱼

泉水进行了全面测量分析。调查结果,下营和高庄两处泉水的水温、水量、水质属于低温冷性水,地势也好,泉水流程短,有利保持低温,很适合养虹鳟鱼,可就泉水附近开池。为了取得经验,决定先在下营村进行试养。在市水产研究所曲莹、黄燕平和县畜牧水产局梁振源、陈润举等科技人员的帮助下,在1983年7月28日引进个体重0.5至1.5公斤共73条虹鳟鱼,在新建成的流水鱼池试养。同年9月,又放养了个体25至50克的虹鳟鱼种试养。同年10月,又在已收获的稻田加以修整,建成水面54平方米、水深0.5至0.6米、水温14至16℃进行试验。共投放个体重60克左右的鱼种1620尾,全场试养到1984年4月26日结束。总计产出商品鱼598.6公斤。折合年亩产成鱼7882.6公斤,经投入与产出比较,经济效益明显。随后,下营村党支部书记又重点汇报了该村今后的发展计划:成鱼池发展到水面2.5亩,并建起了75平米孵化室,为自繁自养,并积极供应兄弟村队所需鱼种苗创造条件。明年成鱼池要发展750平方米。同建国、京伦、香格里拉等市内大饭店达成协议,负责供应鲜活虹鳟鱼。使虹鳟鱼生产成为村里的一项支柱产业,让富民泉真正富裕农民。

视察中,县畜牧水产局副局长杜振铎简要汇报了六渡乡七渡村从1983年利用拒马河水发展流水养鱼情况。七渡村集体开发引拒马河水建流水养鱼池5个,共有水面540平方米,从1983年至1984年两年试养鲤鱼3802尾。为山区半山区农民发展流水养鱼生产树立了榜样。

视察的第二站,是考察大石河及史家营地区的水资源情况。我们经坨里、河北、佛子庄、长操等乡镇,一路察看了大石河的自然流水资源。史家营乡党委书记于克富汇报了全乡主要自然山泉河水的资源情况。当晚,焦老一行人住在了史家营乡政府。

第二天,焦若愚一行又到史家营乡秋林铺村视察。在察看秋林铺村山泉水资源的情况后,焦若愚向邢春华县长讲了这次视察的印象和意见。他认为,房山县发展流水养鱼生产抓得好,已经抓出了下营、七渡等很好的成功典型。不管是集体承包搞的,还是农民个体搞的流水养鱼池,都要一视同仁,而且更应重视农民个人开发的流水鱼池的经验,要发展多种模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要因地制宜,先易后难,不要强制。有条件的地区,要充分利用和开发荒水、荒塘和荒废的低洼地。条件好的小型地段,要鼓励农民个体开发,这是加快发展流水养鱼,提高效益的好方法。流水养鱼不仅是解决市民吃鱼难的问题,而且养鱼要与旅游业结合,发展垂钓,应当大力提倡。养虹鳟鱼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事业,必须有畅通的销售渠道。与市内大饭店

挂钩，直接为大都市服务，应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各个商品鱼基地，在提高生产品质的基础上，应当把下营经验学到手。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加大扶植力度。房山县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走在了全市郊区的前头。通过政府在经济上扶持，在技术上指导，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水产业务部门要加强流水养鱼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保证群众性的流水养鱼生产有规模、有效益，促进健康发展。

# 百花山地区历史上的狩猎活动

董祥勤 梁明战

百花山地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场广阔，山上乔木、灌木及草本类植物繁多，生长旺盛，山地中还分布着众多的泉水，为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历史上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直至抗日战争之前，盛行狩猎，深山区村村有专业狩猎户。野猪、山羊、狍子、狐狸、狼、野兔、獾、山鸡、鼯鼠等均是狩猎对象。当地俗语说：“八月狐狸九月狼，腊月打黄羊。”狩猎曾经是当地一项经济活动，猎取的狐狸、黄羊、獾、野兔、狍子主要获取其毛皮，獾还可以炼制獾油；猎取野兔黄羊主要获其肉；捕鸟类则笼养观赏；掏鼯鼠是采集其干涸在岩石上的粪便即五灵脂（名贵药材）。也有时因为狼、豹猫、狐狸等偷袭家畜而采取捕猎行动。

历史上狩猎的工具具有猎枪、夹子、套子、钢叉、弓箭、粘网、毒饵、炸药、猎犬，方法有套、叉、掏窝、陷阱、挖洞、火烧、烟熏、打围等。

猎枪是自制的铁枪，使用的是硝、硫磺炭末自制的黑色火药及铁砂。使用药量根据猎物而定，打野猪、山羊等较大猎物时，装“四指”药，再安装一个子弹，俗称“独子儿”；如打山鸡、野兔等小动物，装“三指”药，再装铁砂。

“夹子”俗称“虎夹”，自制，以弹簧钢片为主要机关，浅埋于地下或粗壮树木下，野兽至此触及机关即被夹住，一般用于捕捉野猪、黄羊、狼、狐狸、獾等。弓箭主要用于猎取鸟类、野兔。粘网主要用于捕捉鸟类。套子有榆树皮拧成的绳，也有钢丝绳，一般用于捕捉山羊、狍子、野兔等。套子以猎物能钻进头而不能过身体为宜，一般直径 5 至 40 厘米。套子安放在猎物常走过的地方或山溪边，其一端固定在坚实之处，猎物被套住后，越挣扎套越紧。陷阱设置在猎物常走过的地方或山溪边，一般用于捕捉野猪、狐狸、狼、山羊等。熏烟、火烧主要是捕捉野兔、黄鼬等，在猎物逃离火场时将其捕获。挖洞、掏窝主要用于捕捉獾、鸟类、鼠类。狩猎时一般带着猎犬，帮助主人将猎物从草丛中驱赶出或将打中猎物叼回。

“打围”是合作行动，一般两三个人，也有十几个人的打围，称为“打大



围”。“打大围”范围较大，需要几天的时间，一般在深秋或冬季进行，几个人有“赶杖”、“等杖”、“守路口”等分工。“赶杖”也称“哄坡”，主要负责将猎物驱赶入围；“等杖”是在猎物顺风方向隐蔽，等猎物迎面逃跑相距 10 米左右时开枪；“守路口”一般在路口隐蔽守候，将等杖的人没有打准时补枪将猎物击中。如果是打野山羊，则头一天晚上就要到野山羊活动较近的山上，找隐蔽又安全的山洞住下，翌日凌晨待野山羊在山上吃草时靠近将其捕捉。百花山地区的猎人认为山中的野生动物属于山神庙中的山神管理，山村几乎村村有山神庙，山神庙建立在村边。百花山地区的猎人外出打猎时须先到山神庙上香，祷告“身上无衣，家中无粮，迫不得已……”，每到初一、十五，要向山神上香祈祷，冬季打猎进入旺季时，要在山神庙摆放供品。

1989 年 6 月 1 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后，野猪、狼、赤狐、狸子、豹猫等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刺猬、蝙蝠、黄鼬、猪獾、野兔、狍子、环境雉、石鸡、岩鸽、角百灵等被列为一般保护野生动物。由于《保护法》的实施，山区狩猎被禁止。

# 解放前房良两县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

王绍清

## 中国合作社的起源

中国合作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始于五四运动前后，距今有近百年的历史。当时，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由一批知识分子把西方国家的合作思想和合作制度传入中国。

1918年3月30日，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在景山东街42号成立。1919年10月，上海复旦大学合作储蓄银行成立，在上海徐家汇地区设有分行。1920年，长沙笔业工人合作社成立。这三种类型的合作社，后来在中国各地相继出现。但成立不久，便相继失败。农村曾组织过公益、互助、救济、自卫、改良习俗等类似合作性质的结社。如：房山县石楼村建立“公仓”，以备荒年；良乡县石羊村建立改造习俗等结社组织，但这些民间群众组织，最后因无公正和约及法律保障而懈怠解散。事实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用合作主义的思想组织合作社办社宗旨都有历史局限性，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其合作思想却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 中国华洋义赈会组织的合作社

1920年春，北方五省发生大旱灾。当时，待赈济者有三千余万人，单靠国人奔走呼号，募捐就恤是不够的，有些外国人要尽互助本能，开展联合募捐活动。1921年，赈灾基本结束，将赈灾余款作为救济基金，在北平成立华洋义赈总会，各省设分会。

1923年12月，由河北省分会在涞水县娄村镇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1925年3月，经娄村信用社主席李××推荐，由总社派合作指导员××与河北分会在房山县西白岱村建立信用合作社。此社刚成立，谢华臣又在良乡县琉璃河镇创办了信用合作社，除农民参加外，当地商号均有参加，故此为房、良两县合作

运动之始。

华洋义赈会为推行合作事业，先从信贷入手，当合作社建成后，按民众之需，即开展供给、运输、消费、生产之业务及各类型合作社。

### 国民党组织的合作社

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把发展合作社运动列为“训政时期”七项运动之一，由国民党领导的合作社运动从此开始。

1930年，国民党政府为把合作社完全控制起来，设立了合作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实业部负责合作社的推行。是年春，河北省政府颁布“合作社暂行条例”，将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地区组织的合作社，统由河北省合作指导委员会领导，具体事项由省农矿两厅负责。

1932年，国民政府第三百二十五次政治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合作社法”。房、良两县政府奉省政府指示，在建设科内设合作指导员，其官衔俸给按督学待遇。房山县政府为推进本县合作事业，成立民众教育传习所（原址在今房山中学科技楼处），由韩、济、李三名教师授课。1932年底，一区夏村办社较快、较好，政府组织九个区领导人员参观学习。据史料载：自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房、良两县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河北省67个县有合作社903个，占全国之首。其中房山县有合作社23个，占全省第十二位。河北省有县级合作社联合会13处，其中房山县占第十位。良乡县有合作社4个，占全省42位。

1936年，河北省合作指导委员会指示，将良乡县所属的合作社全部移交给“华北农业合作委员会”。日军侵占房、良两县后，各地合作社财产和商品被日军及当地土匪抢劫一空。

### 日本组织的新民合作社

1937年9月17日，良乡县城被日军占领。当时警团解体，社会混乱，盗匪抢劫，商号倒闭，民生愈困，金融吃紧，物资奇缺。第二年春，日军以稳定民心，整顿社会秩序为名，确定良乡为河北省“新民实验县”，并开设新民合作指导部，办有实验县月刊。在政治上，宣扬中日亲善，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殖民化教育；在军事上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实行三光政



良乡县合作联合会组织全县合作社人员训练班集体合影

策；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将大批粮食、棉花、煤炭运往日本，部分物资运往兵站，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939年4月，日伪华北合作委员会以恢复农村生产为名推行合作社运动，良乡县新民会组建县合作社联合会（1937年12月，抗日战争时期敌伪组织在北

平成立新民会，并在华北各省、市、县沦陷区设分会，宣扬中日亲善，毒化沦陷区人民，并从事间谍活动），并由合作指导部举办合作传习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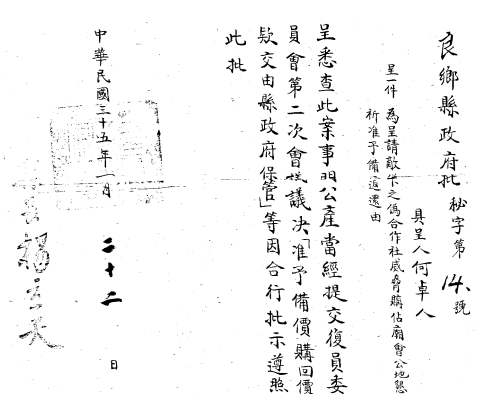
良乡县93个乡建农村合作社76处，社员近千名，并有合作社规约，计三十二条。规约第七条规定，设理事长1名，理事4名，监事长1名，监事4名。县级合作社人事由合作指导部任免（理事长、常务理事由日本人担任）。

1941年11月1日，日军开展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中心是强力统治物资，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经济封锁，企图把八路军困在山上。在统治区对食盐、煤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强化粮食组合，动员合作社集聚物资的配给，筑成巩固的经济封锁圈，使一粒谷、一颗棉都不能流入抗日根据地。良乡县合作社联合会为配合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威胁强购城隍庙土地二十亩零二分建筑仓库囤积粮食及重要物资，给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造成严重经济困难。日军投降后，国民党良乡县政府将此地收回，原件附下。

1941年3月，房山县合作社联合会成立，未设理事长，副理事长由日本人中小洛道田担任，常务理事由日本人田口多喜雄担任。理事3名，监事2名，下设总务、业务、信贷三科。

1943年3月9日，日本为了贯彻“以华制华”的政策，日本公使监泽清宣给华

北合作总会副理事长长山根穗九十二号极密件称“凡日本人担任县合作社联合



会正副理事长、常务理事者，“克速废止”，由华人充之”，日籍正、副常务理事及各科科长，均改为两县中国人担任，重要事项均由日本顾问决定。副理事长可担任顾问（日文翻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5日，蒋介石令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抢占平津要地。国民党军队来到北平不久，孙连仲将原房山伪军稍加整编，授予“先遣军”称号，任命张德祥为房山保安团团长。同时委任原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长李仲三为房山县县长兼六县剿共联防司令。委任黄侃为良乡县县党部书记杨立天为良乡县县长，高定甫为良乡县保安团团长。这样，抗日战争时期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为非作歹的一大批汉奸特务和敌伪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的急先锋。房良两县日伪合作社人员同样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接管人员。

### 国民党在收复区组织的合作社

1946年10月16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促进合作运动办法》中指出，凡主持各级行政工作之党团员，要重视合作事业之发展，对有成绩者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给予奖励。

国民党房、良两县党部按照国民党行政院颁布的建立县、乡、保（村）三级合作社，一户一社员的强制政策，并要求合作社要与保甲制度联合起来，与反共联合起来。良乡县党部组成县合作社联合社，设有理监事会，理事××任联社经理，理事××任副经理，理事××任会计，理事××任出纳，监事会由党

政有关单位领导兼任。县联社在县政府建设科领导下，社务由经理负责。1948年12月初，良乡县联社令将主要商品布匹、小麦运往京城广安货栈。12月14日，良乡县城解放，国民党合作社由中共良乡县生产推进社入城接管。

1947年3月，国民党房山县合作社联合社成立。社址在县城内福音堂院内，理事会由十个大乡长组成，理事会主席由王星三兼任。是年八月，改为主管业务的××为经理，调夏村中心社主任，××为副经理。1948年12月14日房山全境解放，国民党房山县合作联合社副经理××将其财产、账

單		報		聯		乙	
登記證字號	核准登記日期	舉行創立會日期	業務區域	社員人數	社址	業務	名稱
普魯字第一〇五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	房山縣新縣城	三二名	房山縣新縣城	房山縣新縣城	房山縣新縣城
考	備	事	監	理	股	社	名
主席姓名	人數	主席姓名	人數	主席姓名	人數	已繳金額	繳納方法
王三	三名	王三	三名	王三	三名	四萬九千元	二次

城关镇册保合作社证书

目交给房山县人民政府实业科。

国民党时期，房良两县组织的合作社，除县城附近村庄的合作社有零星商品外，大多数合作社是入股无社，有社无货，敷衍度日。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当时中心工作是发展工人运动，为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解决工人生活上的困难，组织消费合作社。1922年9月，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年十一月，毛泽东派毛泽民到安源组织消费合作社，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街成立，设有门市对外营业。1925年9月21日，该合作社被军阀摧毁，但其创办及章程规则为今后工人、农民组织合作社取得了初步经验。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1933年12月5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成立。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为名誉主席。当时革命根据地合作社已达1140个，社员29.6万人。合作社种类不仅限于消费、生产和信用三种形式，还有犁牛合作社、医药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粮食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等。

抗日战争期间，合作社担负着边区经济建设重任，通过合作社团结各革命阶层人民进行的统一战线。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大会决议，改良原有合作社，使之成为全体农民真正的合作社机关，这是边区合作运动之始。1940年8月，房良县二区农民合作社成立。是年冬，在二区合作社基础上，成立房涿涿联合县合作社，房山县政府设合作指导股。1945年3月，房山县一区合作社办事处成立，设医药合作社。

解放战争时期，良乡县五区北窖、长操等村农民合作社成立。1948年5月房山县生产推进社在西庄成立；10月良乡县生产推进社在班各庄成立。



1949年11月29日，河北省良乡县供销社全体人员合影（张玉泉提供）

房、良两县全境解放后，两县生产推进社分别迁入县城。1949年6月，两县生产推进社奉上级指示改为供销合作总社。建国后，房、良两县供销合作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 民国时期良乡城的店铺商号

张广明

良乡古属幽州，置县于西汉。五代时赵德钧建盐沟城后，良乡县治迁此，始有良乡城。自明朝在北京建都，做为京都西南之门户，农、商及手工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清代从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北京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东南13省有事到北京来的人，都取道良乡，良乡城逐渐繁华起来。

清末民初，修建了平汉铁路。经良乡、窦店、琉璃河，贯通南北。良乡至坨里的支线沟通了山区与平原。另外一条“京易御路”自东北向西南经良乡，虽为朝廷所用，但平时百姓可以自由行走。这大大的改善了良乡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了物资交流。良乡逐渐成为北京西南物资集散地，商贸中心。各地客商纷纷云集良乡，特别是山西、山东、河北、江苏、湖广、天津、青岛等地工商资本家，或办厂、或开店，引进丝绸、洋货、茶叶及土特产，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地百姓亦农亦商或弃农经商。一时良乡城内店铺、商号和作坊云集。服务业、饭店、酒馆、澡堂、理发以及修理业接踵而起。应当说，这一时期是良乡工商业发展的兴旺时期。

按照一些老人的回忆和亲历，良乡城内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商店布局是这样的：

## 南大街西侧

**麻绳店。**店主姓魏，河北人。经营原麻、粗细麻绳及绳编织品。

**茶叶店。**店主姓刘，河北人。经营各种茉莉花茶，

**黑白铁铺。**店主姓屈，山东人。加工制作黑白铁活，出售水壶、水桶、水盆、水杓、烟筒等。

**公记杂货铺。**经营肥皂、火柴、牙刷、牙粉、调料等杂品。

**仁和永中药店。**经营中成药、草药，包括丸、散、膏、丹。

**公泰记糕点铺。**良乡食品老字号。以蓼花、江米条、缸炉饼、蛋糕、蜜排



又闻名，其主要原、辅料均从南方产区进货。品质精良，制作考究。

**中和茶庄。**良乡地区有名的茶叶店。以一斤茶叶分装 32 小包（老秤 16 两 1 斤，每包 5 钱）的包装技巧（方便顾客）和进店先品茶的优良服务赢得顾客光顾。

**义和恒山货店。**经营山货、瓷器、杂品等。

**戴菜床。**店主姓戴，“菜床”即菜店。经营时令蔬菜，尤以冬季经销温室鲜货为特色。

**皮子铺。**经营车马用具，如鞭子、龙套、缨头、鞍子等。

**广记隆。**

**东兴蔗店。**经营大小炕席、囤圈及蔗制品。

**王记绒线铺。**经营各色花线，如绒线、毛线、丝线及绒花饰品等。

**董记自行车铺。**

**范记理发店。**

**韩记成衣铺（缝纫店）。**

**修表店。**

**赵兴元诊所。**

**绒线铺。**

**罗圈铺。**经营各式罗圈，如笼屉、罗筛等。

**福祥药店。**

**信来生。**百货，布匹。

**敏兴斋。**文具，杂货。

**烟馆。**

**零食店。**经营花生、瓜子、五香豆等炒货。

**冯记修车铺。**

**义星厚绸缎庄。**经营绸缎，棉纱，布匹，棉纺织品。

**玉泉涌烧锅。**前店后厂烧酒店。

**赵记小吃店。**经营炸丸子（汤），炸豆腐（炖），芝麻烧饼夹炖炸豆腐，是良乡人最爱吃的小吃之一。

**金源涌。**

**仲三元。**食宿店。

南大街东侧

**同义轩饭店。**以干炸丸子，溜肉片为特色菜，是良乡有名的饭店。

**薛记电料行。**经营各种电料，器材，修理收音机，留声机等。

**王记菜床。**经营四季蔬菜。

**狄记香果局。**经营时鲜果品。

**胡记杂货铺。**

**张记修车铺。**

**益和祥布店。**

**义和升。**

**文具店。**店主人姓王，经营纸、墨、笔、砚和学生文具用具。

**有容泉。**经营白酒、黄酒、陈醋、黄酱、酱菜等。

**德胜公、醋酱房。**

**曹记文具店。**

**沈记皮子铺。**

**麻店。**

**茶叶店。**

**马记黑白铁店，**

**杨茶馆。**城内有名的大众茶馆，供应茶水，兼营烧饼等小吃。

**宋记修车铺。**

**中医诊所**（坐堂医生胡大夫）。

**同济堂药店**（坐堂医生张大夫）

**中药店**（坐堂医生崔大夫）。

**白铁铺。**

**修车铺。**

**万顺兴。**城内有名的食品杂货店，位于南十字路口，又名“窖伙”，品种齐全服务好。

**万丰号茶叶店。**

**魁元馆。**饭店，以精制小豆包闻名。

## 北大街西侧

**聋子面馆：**以经营物美价廉的面食出名，据传说此店系八路军地下联络站。

**春华茂食品店。**与聋子面馆并排于十字大街西北口，位置优越，生意兴隆，属良乡老字号。

**同义祥。**

**老烧锅酿酒作坊。**

**仁继永。**

**褚饭铺：**以经营香酥芝麻小烧饼闻名。

**六合公。**

**德昌永。**副食杂品。

## 北大街东侧

**李菜床。**

**刘记烧饼店。**

**面铺。**

**麻店。**

**中兴盐店。**

**菜床。**

## 西大街南北两侧

**东兴蔗店。**

**老孟理发店。**除理发剃头，店主老孟还有推拿按摩技术，很受顾客欢迎，后子承父业。

**纸糊店。**店主姓郭，做各种纸活，技术精，质量好，交活及时。

**兽医桩子（畜牧兽医站）。**良乡为大牲畜治病的唯一诊所。医生姓郭，医术高超，细致耐心，服务热情周到，有很高的信誉。

**翁林酒铺：**一个环境和气氛都不错的小酒馆。

**贾记糖炒栗子：**良乡栗子，蜚声中外。城内以贾、何、张三家糖炒栗子最负盛名。

**小吃店。**

**沙记绗鞋局。**

**澡堂。**

## 东大街

**酒铺。**

**皮子铺。**

**电话局。**

**济安堂药店。**

**面铺。**

**棚铺** (杠房)。良乡原有南、北棚铺两家，为婚丧嫁娶、喜庆寿宴专业搭棚 (分“凉棚”和“暖棚”两种) 的商号。出租杠照、花轿、执事、鼓乐、桌椅、茶炉等一切红白喜事用品。

**屠宰场。**

**威振照相馆。** 在饮马井街。

**文化阁：**在罗府街。主要经营文化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复写纸、钢板、算盘等。

**福元药局：**城南较大药行，多半药材自购自销。

此外，良乡城里还有粮行、煤行、烟馆、当铺等等。由于年代久远，又经战乱和行业之间竞争，有的店铺倒闭，有的又重新开张，还不断出现新行业，所以，这个统计是不完全的。个别的店铺名称和经营范围记忆的不太准确，其中大多数店铺一直经营到良乡解放之时。

# 民国至建国初期的顾册村商业

顾梦红

顾册村地处房山城南郊，东通良乡、南通涿州，西南通涑水、易县，历来是物资交流的理想集散地，清末民初，这里商铺林立，商业十分繁荣。

顾册的商业发展由来已久，明清时期已比较兴隆旺盛。“顾册三李”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商家。清康熙三年（1664）志书记载：房山城每月四集，四街伦市。逢四东街；逢七西街；逢九南街。附近数十村都来赴市。顾册与城关咫尺之遥，对获知商业信息，商人往来、商品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的商人之中多为晋商即山西商人，后晋商日落，本地商人日起。交易中的大宗商品以粮为主，次为杂货。顾册商人，不但每月参与房山四集，本村也有商品集散之地，村里人称为“小集”的胡同位置在今村中小亭的南边，商品居多，小作坊居多，非常热闹。

民国时期及解放初期的顾册小集商号由顾册街心小亭向南，有一条长约三四百米的小集。民国年间直到解放初期，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商家多达三四十户，由北向南依次是：路西王家杠罩房，张家杂货铺，德裕生李家铺子，石家小面馆，“邸润斋”染房，王家小吃店，北杂货铺，裕荣堂布铺，张家小铺，赵家杠罩房，李家麻绳铺，段家药铺，段家杂货店等。路东自北向南是：王家药铺、济生堂药店，永泰公商店，李家粮行，侯家豆腐房，永兴布庄，段家商店。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和购物的百姓，把本来就不宽敞的大街拥挤得水泄不通，由此，村里人便自然而然地把这条热闹的大街叫“小集”了。后街由东向西依次是：肖家机织铺子，王家棺材铺，李家典当铺，“裕贤堂”百货店，“黎明村”杂货店，徐家手饰楼，王家肉铺，田家麻绳铺，赵家杠罩房，老谷家豆腐房，理发馆，姜家纸活铺。1952年，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限制，私营商号逐渐减少。1955年后，公私合营成立供销社，个体商号停止营业。

**当铺李** 据传是晋人，名号不详，其典当行始于明末，兴于清。当时铺面极为气派，名贵房山。顾册前街两侧均为其经营地盘。经营项目繁多，无所不有，无所不当。民国年间，一场天火，整个当铺烧得荡然无存，当铺也随之败

业。

**斗子李** 乃是房山、北京一带经营土地和粮食的乡绅巨商。家族拥有土地4000余亩；房产1600余间；马车30多辆；骡马上百匹；长工百余人，短工无其数。相传，北京、房山、琉璃河，顾册本村以及顾册周边的双孝、支楼、东坟、北市、南关、云峰寺、下坡子、夏村等都有“斗子李”的土地，其中琉璃河的李庄村就有斗子李的良田500余亩。北京广安门外有十八家粮店，牛街整条街的店面都归李家经管。

**烧锅李** 为顾册酿酒和经营酒业的著名老字号商户，兴于民国初，酒业批发零售至良乡、琉璃河、码头一带，七七事变后败落。

黎明村、同意兴 为村中两家杂货店，生意也很兴隆，黎明村的店主张金明，同意兴店主为关霖，两家商铺主要经营些群众生活需要的烟酒茶糖、针线杂货，学生用品；还有绿豆糕、蛋糕、月饼、缸炉、江米条等点心。段广泽也开过小商店。1955以后公私合营，村里有了供销合作社，个体商号随之消失。

**寿春堂 药房。** 掌柜胡荣颜，坐堂大夫有张振清、李维平、张荣、邸润斋、赵利民等。

**济生堂 药房。** 掌柜和坐堂大夫是人称小王先生的王振刚。

以上两个药房都是中西医兼俱，既会中医把脉，也可以打针输液，做简单的外科手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村里有了合作医疗，私人医生和药房逐渐退出。

**粮行** 李汉章开的德润升是专门经营粮食的粮行。李雅怀开的裕生堂既卖粮食也卖其他杂货。

**牙行** 所谓牙行，就是经纪人。这种经纪人主要是在大牲畜交易中，在各种粮食交易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在买卖双方不太熟悉市场行情的情况下，伸出手在双方的袖筒里变换着手指，不停的摸来摸去，暗示出价格；经过讨价还价，直到最后成交。他们赚取之间的差价。段永瑞是比较有名的经纪人，人称“段一刀”。

**脚行** 即用牲口搞运输。蔡老二兄弟俩家里养着些毛驴、骡子，赶牲口从长沟峪往县城附近驮煤，挣些辛苦钱养家过日子。

**粉坊** 即凉粉。白文广家做凉粉，是夏季最受欢迎的吃食，可以降温败火，孩子大人都爱吃。

**油坊** 王学余、王金魁父子做小磨芝麻香油，名声波及十里八村。

**醋酱坊** 李福臣家开过醋酱坊，用黄豆、小米做醋和酱油。

**杂面铺** 白土豪家用机器做杂面。

**豆腐房** 前街老侯家，小集的侯九江，后街老谷家是有名的三家豆腐房。做豆腐历史长，质量好。曾供应县城里的饭店和政府机关。解放后，侯景风家也做过很长时间的豆腐。

**磨面房** 一般老百姓吃的米面都是自己家推碾子或者磨磨，白文广、彭俊凯、洪书元家开的磨面房专供灰窑、煤窑用面，有时也供应县里机关食堂。1984年村里有了面粉厂。

**布行、染坊** 斗子李在村里开过布行，从外地购进各种布匹在村里经销，规模比较大，有五间门市，五间库房，还把买来的素布染成黑、白、蓝等各种颜色出售，据说原销到山西河北等地。

**首饰铺** 徐万生的首饰楼名为“荣华楼”，还有胡荣颜的“寿春堂”也兼营首饰。主要做些手镯、戒指、耳环之类的饰物。

**黑白铁** 彭珍手巧，用黑白铁作的水桶、水杵子，铁壶十分受村民的欢迎。

**打麻绳** 王恩荣、王恩元、王福家打的麻绳结实耐用，很受欢迎。

**编席篓** 编席和编篓是两码事。张二、张三（张来顺的父亲）兄弟擅长用秫秸（高粱杆）破成细篾，编席篓，供农民家里盛粮食或杂物。而来自白洋淀的李长明的父亲则擅长用芦苇杆破成席篾，编成炕席，那是每家老百姓的必需用品。

**作花炮** 顾册村做花炮有很长的历史，在京津地区都很有名气。后街的彭钧、彭江、彭富三兄弟的花炮制作有规模，有水平；前街的彭林、彭奇也是做花炮的高手。每年春节前后，到顾册村买花炮的人络绎不绝。八卦九莲灯、菊花吐艳、猴儿捅马蜂窝、天女散花等焰火把夜空映照得火树银花，更让顾册人出尽了风头。

**刻图章** 肖志刻章远近有名气。他会用楷、隶、篆各种书体给人刻章。他后来在县城钟表刻字社工作，是当时房山县唯一有资格刻公章的人，因为那是需要公安局批准的。

**修钟表** 专业修钟表的是米万钧。此人多才多艺，曾经在村评剧团演出的《刘巧儿》中扮演王寿昌，惟妙惟肖。公司合营后到房山县城钟表刻字社工作。

**瓦匠** 顾册村里瓦匠很多，名气比较大的有武祥、肖振荣、姜振荣、崔振河、刘才、武国铨、肖真、肖月等人。武祥，因为承建了房山北关的贸易公司而出名。崔振河，因为在周口店“地质部”盖房子而名声在外；村东的大部分民房都是他担纲建盖的。武祥曾带出了很多徒弟。董顺也是瓦匠，后来当了大

队长，就不当瓦匠了。武国铨，因为承建瓦井化工厂而出名。姜振荣，曾为县政府机关盖房子。还有陈兴、陈贵等人。这些瓦匠还因此带动了村里的副业生产，增加了集体和社员的经济收入。

**木匠** 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有杜茂华(段汝济的师傅)，直到60年代初去世。任永茂和任永平兄弟，还有任凤山，他们盖房做大木件、为村民打家具手艺都很好。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是“枣儿糕”，本姓张，住在顾册西沟，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住了他的外号。据说“枣儿糕”心灵手巧，手艺精湛，曾为长育小学和县政府盖房。五六十年代的木匠还有石秀、王贵，合作化之后比较有名的木匠有王振清，何金梁，段汝济，彭俊生，任凤桐、何金臣等。

**铁匠** 小集郑宝华郑宝山的父亲是郑德明，人称小郑子。家里有红炉，打造镰刀、三齿镐等农具，还带了一些徒弟。东头炉灰坡李文斌的父亲李生，专钉马掌，有时也修打农具。铁匠还有杨迷糊等人。

**鞋匠** 肖宽、王希禄为著名的鞋匠。肖宽的反正绗鞋远近闻名。

**棚匠** 即糊顶棚的。那时候日子穷苦，不讲究装修房子，躺在炕上数椽子是很常见的事情。日子稍微富裕一些的人家或者结婚娶媳妇要布置新房，就要请人糊顶棚。姜士忠就是专门为农家糊顶棚的。

**小炉匠** 那时候生活穷苦，锅碗瓢盆坏了舍不得扔掉，小炉匠的主要业务有两类，一是铜锅。谁家的铁锅裂口了，小炉匠用火补的办法使其修复再用；二是铜盆铜碗，用特殊的细钻在盆碗的裂缝处，打两个眼，钉上铜子。张国忠就是专门修理破旧的锅碗瓢盆的手艺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众人服务，为自己谋生。

**厨师** 民以食为天，所以厨师又称为大师傅。老百姓婚丧嫁娶办大事，都要请厨师。郑德海、唐四爷、王景山、李肥子(李顺)是有名的厨师。郑德海还曾经到县城里的“北海居饭庄”、“鸿顺栈”、“东来顺”当过厨师，他抻的“一根面”远近闻名。

**裁缝** 陈金科，陈金贵兄弟，还有肖有财。会裁剪男女老少各种衣服，用缝纫机做的“制服”，在当时很是时尚。陈金科曾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专门做裁剪工作。

**理发** 最有名的要说尹大尹二兄弟，即尹玉山、尹玉旺。他们不但理发的手艺好，还会按摩、推拿、甚至会脱臼接骨。尹大有一个女徒弟石玉兰，她后来在村东头开了理发店。

**杀猪** 上个世纪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猪，一是为了到腊月过年时宰杀，全家



人可以饱餐解馋，二是卖了猪肉，也是一笔收入；三是猪粪可以作为上好的肥料，使庄稼丰收。因此哪个村都少不了杀猪的，有的人是业余的，有的则是专业的。顾册村的张德海，刘贵，赵二爷都是杀猪的好手。他们支起大锅，抄起家伙，手脚麻利，把猪里外都收拾得干净利落。

**炸麻花** 谢立富做的炸麻花又香又脆，前街后街都愿意到这来买。

**豆腐脑** 周瑞的父亲，崔印的父母都卖过豆腐脑。

**炸豆腐、炸丸子** 孟财家的炸豆腐、炸丸子可以放三天不散不坏。

**熏田鸡** 即熏烤青蛙，下酒的美味，村里有人好这口儿，陆德才用熏得焦黄的田鸡满足了“市场”需要。

**做冰糖水** 夏季炎热，那时候没有什么雪糕、汽水等冷饮，张福增能做出五颜六色的冰糖水，惹得孩子大人都喜欢。

**冰糖葫芦** 高金成，高金山兄弟常年做冰糖葫芦，孩子大人都喜欢，他们还兼卖柿子、梨等水果。

**棺材铺** 王贵家（王振清、王振海的父亲）专门作棺材。按照薄厚不同分为四五六、三四五等几种类型，最差的一二三叫“狗碰头”，形容棺材板很薄。买什么规格的棺材，就要看买主的财力了。

**杠房、吹鼓手** 过去，农村有大办红白喜（丧事亦称白事）的风俗。杠房和吹鼓手就是为红白喜事服务的。结婚喜庆要抬花轿，花轿也分为很多种，有八人抬的，16人抬的；办白事也同样热闹，棺材外面还有棺罩，最多的要24人、甚至32人抬着。尤其是老丧，大办几天以后，许多当事人也没有了悲戚的神色。杠房与吹鼓手往往是一块牌子，两套人马。杠房里备有各种花轿、棺罩；乐器的种类也很多，笙管笛箫，唢呐云锣，一应俱全。吹鼓手演奏起来，十分卖力，半个村子的老街坊旧邻居都来看热闹。赵瑞家的杠房远近有名，张亮、张才是搭灵棚的好手；张廷福的唢呐吹得最好。

**做纸活** 这纯粹是为办丧事服务的行业，至今不衰。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到西天后能够生活得更舒心顺畅，子女亲朋都要在一些主要的日子糊一些纸的物品以寄托哀思。比如下葬的时候要有童男童女，陪伴老人不寂寞。还要有车、马、牛等代步工具，因为黄泉路途遥远；还要有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还有糊电视、冰箱、小轿车、麻将牌的。下葬五个星期那天要糊伞，六十日要糊船，顾册村子大，几乎每个月都有人驾鹤西游，所以，糊纸活的生意也不错。姜义、李江两家不但会糊纸活，还画影壁，画挑檐，甚至到庙里画壁画。

**大车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京周公路尚未修通，汽车很少，交通运

输主要以牲畜为主。顾册村地处县城附近的交通要道，开设车马旅店是很自然的事情。村里的大车店主要有两家。后街王度的大车店以养骆驼为主，那时候从“口外”（张家口以外）运煤多是骆驼，往返要好几天。村东于仲江的大车店规模较大些，往来车马客商在这里住宿的比较多。他的店里卖的豆腐脑也挺受客人欢迎。

**拉洋片** 这是今天已经绝迹的一种民间娱乐艺术，类似幻灯。艺人把各种风光或者人物画片装进一个箱形的装置里，箱外面有几个小孔，孩子们把眼睛对准那个小孔，就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画面，如桂林山水、黄河长江，如孙悟空、猪八戒等，那艺人手中敲打着锣鼓，口中念念有词。吸引了许多儿童前来观看。刘二就是靠拉洋片挣点孩子们的小钱，养家糊口。

**货郎** 俗称卖花的，柳某最为有名。以自行车为载货工具，用播浪鼓招揽生意，主要买针头线脑，小孩儿玩具等家庭日用小商品，主要活动在本村及附近村子。

**张麻衣箩**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名词是啥玩意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农民要把粗糙的粮食经过碾子或者石磨，碾磨成面或者玉米糝子，再用面箩筛过之后，才能做成各种食物。面箩一般是圆形网状，分为好多种，有白面箩、豆面箩、二细子等。麻衣箩是比较粗的一种箩。杜珍是张箩的手艺人，张麻衣箩是统称，其实他会张各种各样的箩。

**作木轮马车** 1937年七七事变前，农村很少有胶皮轱辘马车，多是用木头制的车轮和辐条，外面钉一圈铁皮铁钉。韩广银、刘海周两家做的木轮马车享誉十里八村。

**修自行车** 四十年代以后，自行车在农村逐渐多了起来，修自行车也成为这个行业。石楼的杜老石在后街开的修车铺专门为附近有自行车的人服务。

当年，还有一些有名的村商小贩儿，如：曹毛儿冰窖，曹家宅东是一个大坑，冬天结冰，曹毛儿凿冰藏于冰窖，来年盛夏出售。大坑西北角的龙王庙即为此人出资兴建。前街武秃儿，子然一身，会作风车，集市上或沿街叫卖，孩子们非常喜欢。

# 房山区引种推广猕猴桃

张广文 李学文

猕猴桃是一种多年野生藤木落叶植物，果实属浆果，因果实成熟后猕猴桃竞相抢食而得名。猕猴桃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 715—770 年），诗人岑参在《太白东谿张老舍即事寄舍弟侄等》一诗中曾有“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的描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猕猴桃每百克鲜果肉内平均含维生素 C146.3 毫克以上，最高可达 420 毫克，是柑橘的 5 至 10 倍，是苹果、梨、葡萄的 30 至 100 倍；还含有 17 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和磷、钙、铁、镁等营养成分，因此被誉为“VC 之冠”、“水果之王”。除此之外，它的药用价值也很高。据临床试验证明，食用猕猴桃鲜果汁，可阻断致癌物亚硝胺在体内的合成，有效率达 95%，同时对肝炎、消化不良、便秘、高血压、心血管病、麻风病也有疗效。

猕猴桃在全世界有 61 个品种，在我国有 57 个品种。但作为商品生产的，主要是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对外统称为中华猕猴桃）。

—

根据自然生长条件，我国猕猴桃原产地在长江流域。改革开放前，猕猴桃主要是全国各地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对象，并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直至 1978 年以后，才逐步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1978 至 1984 年间，全国召开过 4 次科研生产座谈会，并于 1982 年在各地出现大面积猕猴桃园的基础上，组织重点协作攻关。北京地区引种猕猴桃的工作则是从 1984 年开始的，而率先引进试种的则是当时的房山县。

1984 年，市政府农业区划办公室从陕西省长安县引进 5000 株猕猴桃原生苗，市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曹庶民为此召开区县区划办公室主任会议，希望在北京地区试种。因为过去有人引进试种失败过，一下子接收 5000 株苗，风险太大，多数人不愿接任务。只有县规划办公室主任李学文在主管农业的副县长

李炳田的支持下接受了试种任务。当然也不是盲目接受,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这要归功于前几年开展的农业区划工作。因为在1980年房山县野生经济作物普查时,曾在蒲洼、十渡、长操地区发现过500余株野生猕猴桃。农业气候区划成果显示的房山县山前暖区与陕西长安县气候条件相似,通过一定的栽培措施,成功引种还是有可能的。

谁知事与愿违,真是“猕猴桃好吃树难栽”,忙活了一年,5000株实生苗一颗也没有成活。失败压得工作人员吃不下睡不香。后来大家想到与实生苗同时带来的还有2斤种籽,于是开始第二次试验。经过一冬一春的温床育苗,终于获得成功。大家把这些寄托着希望的幼苗试种在准备好的果园里,土生土长的幼苗终于在西白岱、娄子水、交道三街等地栽种成活了。

成活归成活,能不能结果,还有很多工作。因为没有现成的技术人员,要摸索出一套栽培技术让果农掌握,区划办的全体人员都忙活起来。一方面请专家来指导,另一方面带人去学习取经。曾七次到北京植物园,三上长安县,四次到外省市学习。这期间,尤其应该感谢的是陕西省专家马兴运,他多次来房山,到各种种植基地现场讲课,教嫁接,教管理。还有长安县的农民技术员刘瑞平,曾长年住在西白岱。经过五、六年辛勤工作,终于建成了高标准示范园,用于指导全区种植。

当时的县领导非常重视这一新生事物,把猕猴桃当成心头肉。一遇到刮风下雨都会打电话询问园内情况,经常到地里视察长势。房山县改区后,区政府拨款25万元作为猕猴桃专项发展资金,用于大面积推广。

## 二

由于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区划办工作人员和有关乡镇的种植热情高涨。经过10余年的努力,1996年猕猴桃在房山大面积开花结果,种植面积发展到3000多亩。分布在张坊、周口店、窦店、交道、阎村、崇各庄等乡镇十余个村。达到亩产350公斤,亩收益4000多元,成为农民致富的一个新门路。

房山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好,又不使用化肥农药和生长剂,生产的猕猴桃果实品质相当高。1992年农业部召开的全国猕猴桃基地品种鉴定会,房山区的样品被评为第一名。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赞扬说:“房山区在多数专家认为不宜种植猕猴桃的北寒带交界处试种成功,是个创举。”时值中共十四大召开之际,房山供应的猕猴桃还以个大、味香博得了代表的好评。之后,在1993至

1996 年专家评审会上又连续四年获得全国质量第一的美誉。在此之前，北京市场的猕猴桃主要从美国、新西兰进口，当时燕莎商城进口品种约 1 美元一个，而一些国产品种是 1 元人民币一个。房山的猕猴桃打入市场后，每 500 克可以卖到 60 元，而且供不应求。

房山区成功引种猕猴桃，吸引了不少国内外专家前来参观考察。日本和新西兰专家看过后，认为我们能在地球最北纬度种植成功是个奇迹，而在同纬度上种植，日本就不能结果，因此曾多次表示愿与我区交流合作。

1996 年，房山区猕猴桃种植区被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命名为“猕猴桃商品生产基地”。相重阳、陈耀邦、洪绂增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基地命名和揭牌仪式。房山区的猕猴桃事业发展到了顶峰。

# 房山地区畜禽的饲养

刘树霖

早在新石器时期，豕已成为一般家庭的主要饲养。商周时期燕地居民已普遍饲养马、牛、羊、豕、鸡等。

辽定都“南京”后，鼓励居民种菜和饲养畜禽以供给京师。清康熙三年《房山县志》“物产”栏中家养畜禽种类有马、牛、驴、骡、鹅、鸽等。因煤业和石灰业的发展，以驮运为主的大牲畜随之发展起来。马在古时主要用于驾车和骑用，清及民国年间渐渐以拉车运输为主，上世纪30年代，房良两县养驴6000余头，骡8000余头。

房山地区的骆驼始养于清代。因其体形高大，善于负重，主要用于驮运。1937年前，河北、河南、陈家台等村即养千余头。牛以耕牛为主，多为坡麓散养，房良两县户均养牛0.076头。据河北省统计，当时房山县户均养猪1.47头，良乡户均养猪0.67头。羊的饲养以山区和丘陵区为主，当时房山县户均养羊1.29只，良乡县户均养羊0.02只。鸡为传统饲养，日间撒于街头、场院，夜间入舍，当时房山县户均养鸡7.14只，良乡县户均0.45只。

房山地区境域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自商周以来到解放初，长时间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畜家禽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一是造肥。过去农村有句谚语叫“种地不上粪，一年瞎胡混”。但是那时肥料从哪里来，主要是畜禽粪便与铡碎的庄稼秸秆的混合物。那时，在农村多数家庭都有牲畜棚和猪圈，主要作用除了养牲畜就是造粪。那时牲畜以及人的粪便是当做宝贝似的对待，一点也不舍得丢弃的。人们把铡碎的庄稼秸秆与土、树叶、草叶之类垫到牲畜和猪圈里，经牲畜踩踏和与粪便混合就成了很好的肥料。

二是驮运。由于受交通条件、经济水平和农村生产方式的限制，当时车辆极少，山区运送煤炭、石灰、干鲜果品、庄稼收割、粪土主要靠驮运。有钱人把养牲畜搞驮运当作重要行业，穷人家把替人家赶牲畜搞驮运当作重要职业。驮运是家养骡马、驴和骆驼的主要用途。

三是唤用。那时车辆少，但也有一些，驾车的主要是骡马这种大牲畜。驴子和牛有的也驾车，但多是体形大、壮实的驴和牛。除了驾车，还有犁地、拉楼、打场以及推碾子、拉磨等不少用途。耕牛的主要用途是犁地。每到大麦二秋种地时，养有骡马、耕牛的人家都会为别人家犁地挣钱。犁地时一般都是两个骡子和牛拉一张犁，壮一点的牲畜一天可犁地六、七亩，差一点的可犁地四、五亩。没有骡马耕牛的人家有的是几家联手，把驴子凑在一起互助犁地。大麦二秋收割时，小麦和谷子运到场里，要先铡去麦根麦秸，掐下谷穗，在场里晒干，把轧场的轱辘套上牲畜碾轧脱粒。豆类运回场里也要晒干用这种办法碾轧。脱过粒的豆秸还要反复碾轧成用来当饲料喂牲畜。那时没有机磨，人们吃的东西都要用碾子和磨来加工，推碾子、拉磨、磨豆腐都是套上牲畜来拉。

四是骑用。古时马匹多是供军队骑兵，官方驿站和达官显贵们骑用。在农村专门当坐骑的牲畜很少，只是少数有钱人家或特殊行业，如医生才骑马或驴。一般人家是在驮运和使用之余作骑用，而且以骑驴为多。那时，多数农家以养草驴（母驴）和骟驴为主，这两种驴子温顺老实，不爱跑闹，老人、妇女、小孩骑用安全。骑用时要扣上驮运的鞍子，铺上厚布袋或被褥之类，上去时要借助木凳、台阶之类。那时代，外出骑驴是常有的事。

五是换钱、食用和司晨。猪和羊主要是供食用的。由于那时生活水平低，一般一个家庭只能养一二头猪，一年只能长一二百斤。平时是很少吃肉的，只有在婚丧大事和过春节时，才杀猪宰羊吃肉。不要看一年养一二头猪卖不了多少钱，那可是一般家庭一年的重要收入。鸡也是一样，平时很少吃鸡蛋。只有生病或需要保养的老人、小孩有时才给个鸡蛋吃，平时换油、换盐和其它日用消费要靠鸡蛋来解决。那时，在农村有钟表的人家极少。掌握时间白天是看太阳，夜间一个是看星星，再一个是听鸡叫。公鸡叫的时间一般是很准的，鸡叫没叫和叫了几遍了，是掌握时间的重要方法。

正因为畜禽在那时农村生产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那个年代差不多每个农家都要饲养畜禽。平原地区主要养猪、鸡驴子以及骡马，山区不少家庭都要养羊养牛和驮运的驴子、骡马以及骆驼。

因为饲养的历史很长，又很普遍，饲养技术又比较简单，一般家庭都会饲养。只是骡马这样的大牲畜饲养要精心。驴子虽体小，力不是很大。但好养耐用，养驴子的最多。这几种牲畜每天都要饮水，最好是从井里新打来的水，这种水冬暖夏凉，牲畜喝了不中病。还要注意刚干完活的牲畜最好不要立即饮水。到一定时间要给牲畜喂点盐吃，这叫“淡牲口”。平时主要是准备充足的饲料，

骡马、驴等主要吃谷草，素有俗语叫“干草”，以及轧碎的豆秸、花生秧等。精饲料有料豆（黑豆）、麦麸、玉米等。料豆要煮熟，麸子要加些水和谷草拌在一起，叫“拌草”。民间有句谚语叫“马不吃夜草不肥”。骡马、驴子等牲畜夜间还需有人起来加草加料。在犁地、长途驮运等重活时，要加精饲料。除干饲料，夏秋之季，还要喂青草，多吃青草的牲畜会毛色发亮。

猪的饲养多是由妇女来做。主要喂刷锅的泔水加米糠。到需要壮膘时要加些料豆、玉米、麦麸、红薯等。除这些饲料，也要喂一些青饲料。夏季秋季要打些野草。除多数农家养肥猪外，也有少数家庭养母猪和公猪。养猪多的也会去放猪。那时鸡的喂养很简单。各家都有鸡舍，白天放出去在场院街头自己找食吃，晚上入窝。有时也用剩粥、剩饭和谷糠、麦麸等拌成鸡食喂鸡，有时也喂些玉米之类。

解放以后，直到普遍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前，畜禽在农村仍由各家私养。合作化后，骡马、驴、耕牛等作为生产资料入了集体，和农民家庭脱离了关系。在平原地区，主要用于驮运的驴子作用很快被淘汰。耕牛由于拖拉机的迅速推广也很快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骡马由于驾车的需要，存在了好长时间。在山区由于驮运的需要，驴子在农村集体中存在着较长时间，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逐渐消失。而作为生活资料的猪和鸡，由于饲养习惯和为了保市场供应，国家鼓励家庭私养。解放后曾有很大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农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卫生意识的增强，以及现代饲养技术的推广，猪和鸡的家庭私养迅速减小了。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户养畜禽在我区境域农村存在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对我区境域农村生产生活发生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对此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 我区平原历史上对秸秆的利用

刘树霖

近些年来，庄稼秸秆在人们的意识和实践中已成为废物甚至是公害。例如，有的地方麦收后焚烧麦秸污染空气和引起火灾，甚至影响了飞机的飞行；有的在秋后把玉米秸堆在路边引起火灾烧毁林木。对秸秆如何处理已经成为颇伤脑筋的问题。然而，六七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在我区平原地区，解放前直到解放初，农家是把秸秆当成宝贝，不仅作为生活资料，而且作为生产资料加以充分利用的。

一是做燃料。那时，农村并没有电，也没有液化气等燃料。煤虽然有，但也只有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产，才常年生煤火做饭和取暖，相当多的农户或在冬季太冷时才买些煤生火做饭带取暖，或常年不买煤，大部分时间或常年靠烧柴做饭和取暖。而烧的柴主要是庄稼秸秆，大量的是玉米秸以及麦根、麦秸、棉花秸、芝麻秸等。夏天或天气暖和时在屋外搭灶台烧柴做饭，冬季或天冷是就在屋内烧火做饭。那时屋内的灶台都和火炕连着，做饭时顺便也烧了炕取了暖，在不做饭的屋子就要专门烧炕取暖。

为了解决秸秆燃料的不足，连庄稼的根也要利用上。那时，有一种活儿叫“打爹头儿”，就是用一种木把上按二个铁钩子叫“搞钊子”的工具，到翻过的地里，把高粱根、玉米根、谷根等刨出来打掉土拾回来当柴烧。

二是做肥料。那时，并没有化肥，肥料都是农家肥。在那年代，差不多每个农产都养猪，多数农户都养驴子或骡子，有的还养牛，除了役使和卖钱以及食用，重要的目的是造肥。每到大麦二秋后，各家除留一部分玉米秸、麦秸、麦根当燃料外，余下部分要用铡刀铡碎压上土，叫“压垫脚”。这些垫脚随时垫到猪圈，牲畜棚里，即可解决牲畜拉尿造成的太脏太湿，通过牲畜的踩踏和混合也造了肥，这叫厩肥，也叫槽家粪。这是那时的主要肥料。

三是做饲料。那时，谷子是重要农作物，人的主食是小米。而骡子驴等的主要饲料就是谷草，也叫干草。那时，每到秋收收谷子后，都要把谷草专门晒干捆好，垛成垛，牲畜随吃随铡碎。一季的谷子的谷草差不多也够自家的驴子

或骡子吃一年了。如果不够,就得去买,那时的街上和集市上有专门卖谷草的。除了谷草,豆秸、花生秧也是喂驴子、骡子的好饲料。

四是做建筑材料。在《房山区志》中,关于长阳镇篱笆房村有这样的文字:“明以前成村,因原来村民贫穷,房子多用秫秸、蒲草、苇箔建造。以篱笆为墙垣,因称‘篱笆房’”。其实,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我区平原地区不少村子都存在类似情况。只是离小青河和永定河远的村子并没有蒲草和苇子,墙垣和房顶的箔都是用秫秸来做,不少农家的院墙是用高粱秸(秫秸)或玉米秸扎成篱笆来代替。还有的穷家,盖房时在檩条上不钉椽子,铺上一层厚厚的秫秸。还有的人家院门和屋门也是用秫秸来做,院门叫“稍门”,屋门叫“风门子”,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装修房子叫“糊顶棚”,也是用秫秸来绑股架。除了高粱秆麦秸更是在建筑和泥时必不可少的,可以说,用秫秸当建筑材料在解放前和解放初在我区平原区的农村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解放以后,直到实行农业合作社,我区平原地区对秸秆的利用也一如以前。合作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耕作技术的不断改善,这种状况才逐步发生了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煤当燃料日益普及,用秸秆当燃料的日益减少,直至消失。由于汽车拖拉机的逐渐使用,骡、马、驴、耕牛的使用和饲养逐渐减少,加之谷子产量低种植量逐渐减少,秸秆当饲料的情况不断减少;由于牲畜的减少,不用秸秆垫棚和化肥的逐渐推广,秸秆造肥随之日益减少;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型建材的出现,用秸秆当建材的当然逐渐少了。由于以上一些原因,我区平原地区农村对秸秆的依赖日益减少,以至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但新的科研证明秸秆是一种宝贵的潜在资源,在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当今社会,如何利用秸秆,变废为宝,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历史上我区平原区农村对秸秆的利用是很值得回忆和借鉴的。

# 修建崇青水库的岁月

白全永

刺猬河是小清河的支流，在房山境内流长 16 公里，流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旧社会河道经常发生洪水灾害，威胁良乡、官道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房山人民为了控制刺猬河的洪水，减绝水患，并变害为益，利用蓄水灌溉农业。分别于 1957 年和 1959 年在该河上游兴修了青龙头水库和崇各庄水库。水库竣工后，又废除了青龙头水库副坝，使两库连通改称崇青水库。库区共占耕地 5500 亩，迁移 4100 人，总计完成土石方 154 万立方米，混凝土 2.5 万立方米，投资总额 1400 余万元，水库总容量达到 2900 万立方米。时光荏苒，崇青水库建成已经 50 余年了，但参加过水库修建的人们永远也忘却不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 青龙头水库的建设

1957 年，良乡县按照河北省通县专区决定，兴修青龙头水库。工程于 11 月 21 日动工，由通县专区水利局设计，良乡县统一指挥，全县各受益单位都参加了修建。当时岗上村高级社由岗上村、西庄户、果各庄、小马村、大马村五村组成（即五村联合办的大社），属于豆各庄乡。岗上村高级社选出近 200 余名壮劳力参加水库建设，在 1957 年秋天左右进入工地。水库工地设有指挥部，下设营连排，崇各庄管理区（当时属于魏各庄二区）为一个营部。一连是豆各庄高级社，二连是岗上村高级社，三连是大苑村高级社，四连是焦各庄村高级社，五连是晓幼营村高级社。豆各庄乡总负责人是于振德，他是西庄户村人。岗上村高级社领队负责人是武凤。营部人员有豆各庄村的万保军、大苑村的白金乌、晓幼营村的江春等人。营部设在崇各庄村，参加修水库的民工离家近的每天晚上散工后回家居住，自带干粮；离家远的民工就住在水库周边邻村的农户家中，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因为地处河滩上，所以必须挖到硬底，槽有两房高，少说也有 10 多米深，

都是民工一锹一镐挖出来的。当时生产条件跟不上，没有什么大型机械，筑大坝完全靠人力，用扁担和篮子挑砂石。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争先多挑土石。工地上设有医务室，小病都在工地上医治。那时修水库调动了全县的人力和物力，建大坝时小董村运输社和良乡运输社等单位的大车也被调到大坝运沙砾石。工地上挖土挑土、填土夯土、运送石料井然有序，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昼夜不停。当时可说是人欢马叫，红旗招展，广播室的大喇叭中传出嘹亮的革命歌曲，一派热闹的劳动场景。

最艰苦的要数隆冬时节，为了赶在来年雨季前完成工程建设，民工们一天三班倒，每班8个小时。晚上工地上灯火通明，起初工地上只有汽灯，后来才有了电灯。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夜里挖节水槽，因为槽深，经常有泉水涌出。当时条件又简陋，抽水起初用烧煤油的锅头机，后来又运来几台柴油机抽水。因为槽内总有水，每天夜里都要下水挖节水槽，光着脚冬天水又凉，很是刺骨。两个钟头一换人，出水后风一吹浑身直打哆嗦，光脚踩在地上“咯咯”直响，赶紧跑入工棚用棉被包上双脚，围在火堆旁方觉暖和一些。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十分艰苦，女民工也同样下节水槽，一点也不比男人们差。

在劳动中，总是党员和干部走在前面，起带头作用。县领导张令德、曹庶民、罗玉源等常到工地一线调查，慰问民工，保障后勤供给。在大坝下的截槽排水合龙时，县公安局的一名领导第一个跳入水中搅拌石灰。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人都争先光着脚下水搅灰。另一边抽水倒石灰料填槽，使工程顺利合龙。修完大坝后又修建了副坝和坝两边的护坡。各单位分段运石头砌护坡，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任务。工地上各单位还展开了争红旗的活动，大坝上的大喇叭中广播表扬的好人好事不断。在大家的努力下，青龙头水库于1958年6月顺利竣工。这是北京地区最早兴建的一座中型水库，总用工45万工日，完成土石方约42万立方米，主坝高18米，长350米，副坝为均质坝长约1100米。控制流域面积70余平方公里，总库容1490多万立方米。

### 崇各庄水库的建设

青龙头水库修完后，全区兴建水利工程掀起了热潮。房山县决定在青龙头水库南侧建设崇各庄水库。1959年12月16日，工程开始。本工程由北京市政设计院设计，边设计边施工。全县各单位参加，岗上村出民工也参加了建设，其中最多时全村劳动力只剩下7人看家，其余劳动力都到水库工地参加建设。

当时民工们吃住都在工地邻村。岗上村的民工住在土洞村，岗上村住的是二合庄、葫芦堡等村的民工。那时社员各户几乎都住着修水库的人，霞云岭公社的男青年王永明和岗上村的女青年刘秀芹后来还结了婚，这也算是修崇各庄水库的一段佳话吧。

岗上村民工记忆最深的是在小苑上桥西打引水渠，以便从漫水河往库内引水。这个任务战线长，由崇各庄公社的几个单位完成，营部驻地在焦各庄村。修引水渠因为途中有山阻拦，所以要打通涵洞。首先测洞位，然后上人挖掘。硬的地方还要放炮崩，炮药由指挥部统一管理。劳动时也是几班倒，轮流打洞。每班工作最后都要打眼放一茬炮再下班，另一班民工上班前先用抽风机抽烟，再向涵洞外运石渣。随着涵洞的深入，洞内要铺设轨道用大斗的铁皮车将碎石运出洞外，再用卷扬机导到地面运走。涵洞有几里地长，采取双向施工，这需要勘测数字的精确性。当时测洞位的勘测员是豆各庄村的青年王宏志，他每天都长在工地上，生怕出现意外。后来涵洞工程顺利双方交接上，他才松了一口气。由于他勘测的准确，王宏志在工地上还出了名。限于当时的条件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民工吃的也很简单。每天基本上是窝头和熬青菜，但每月都会为修水库的劳动者改善一下伙食。有时还能享受到白面油饼和肉食的特殊待遇，这在村里参加农业劳动是吃不上的稀罕东西，所以大家都很满意，奋力劳动。

修崇各庄水库比青龙头水库就先进多了，大坝不完全是人力挑的，已经半机械化了。是人们用小车和推土机推出来的，大坝修完后两边的里外护坡完全是人力垒的。为了防止库内向外漏水，节水槽采取了定点打洞灌混凝土的先进技术。当时工地上经常展开争红旗、放卫星的活动，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例如岗上村的民工吴友、崔凤鸣等人挑土卖力受到表扬，扁担上被挂上了写有“劳动模范”的红字条。车桂兰、郑凤茹、郜淑兰等女民工家中一有老人二有孩子，但她们也在工地上奋力劳动，不愧“女中豪杰”的称号。1960年7月，崇各庄水库正式竣工，这座水库共用了68万多个工日，完成土石方59.77万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3.5平方公里，蓄水1050万立方米。与此同时废除了青龙头水库副坝，使青龙头水库和崇各庄水库两库相连，水库总容量达到2900万立方米。库名改称“崇青水库”。水库完工时召开了竣工总结表彰会，为先进单位颁发了锦旗，为评选出的劳动模范颁发了奖状，为先进个人还发放了手巾、笔、本等纪念品。

## 崇青水库发挥的作用

崇青水库建成后，于1967年又建设了附属设施溢洪道和弧形闸门，闸底高程70.5米，起到了防洪作用。为了使广大农村受益，又先后修建了东干渠、中干渠和西干渠等水利工程。

西干渠是1968年9月动工兴建的，参加施工的单位有崇各庄、长阳、坨里、南召、良乡、大紫草坞、窦店、交道、官道9个公社。当时工程指挥是县里的领导张成基和李炳田，岗上村社员在马家坟段参加灌渠的施工建设。此工程全长10.85公里，完工后可控制灌溉面积达到4.6万亩。东、西、中3道干渠总长度为38.9公里，各级建筑物有286座，总投资143.45万元。崇青灌区当时控制着房山县良乡、大紫草坞等及丰台区王佐乡等7个公社近7万亩的耕地。崇青水库的建设使其下游许多丘陵和平原地带的村庄受益，原来的旱地都变成了水浇田，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岗上村还尝试着种植水稻，吃上了自己种出来的大米，同时扩大了小麦的种植面积。遇到旱年头，水库一开闸放水，农民也不用发愁了，真正实现了旱涝保收。

改革开放后，崇各庄乡政府为了使崇青水库这盆净水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和价值，于1995年对水库进行了开发，并正式更名为“青龙湖”。2000年3月，崇各庄乡撤乡建镇，改为青龙湖镇。2002年1月24日，原青龙湖镇与原坨里镇两乡镇合并成为新的青龙湖镇。两乡镇合并后，继续围绕青龙湖做文章，制定了旅游兴镇的发展战略。现在青龙湖水上乐园已经建成，环湖周边先后还建起了天湖国际会议酒店、京辉高尔夫球场、锦绣山庄等项目。每年都有无数的游客来此旅游观光，青龙湖也被人们称为“北京的小海滨”和“北京西南的一颗明珠”。

注：本文根据岗上村曾经参加过崇青水库建设的武凤、吴友等人回忆的口碑资料综合整理而成。为了精确，相关数字参考了《房山区志》(北京出版社)和《中国共产党北京房山区历史大事记1928—2000》(北京出版社)。

# 房山县玉米品种的演变

张广文 彭清泉

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房山县一直是京郊的产粮大县之一，夏粮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玉米为主。上世纪 80 年代，玉米的播种面积维持在 35 万亩左右，占秋粮面积 70% 以上。玉米总产量约占秋粮总产量 80%，占全年总产的 45% 左右。为了获得玉米的丰产丰收，当时的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农业科技人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艰苦的工作，终于使玉米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里面，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京早 7” 的推广更是功不可没。

## 房山县玉米品种的演变

从解放前到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房山当地有两个自繁自育的玉米品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是“小八趟”，一个是“白马牙”。这两个品种食用口感好，按老百姓说法，叫“有油性”；适应性好，山区平原都能种植，也比较抗病。但都没有专门的制种田，靠自然选育，同期播种却生长发育有别，高矮不一，产量不高。尤其“白马牙”，植株高大，生长期长，肥水不济时秃尖严重，籽粒不饱，产量更不稳定。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为了提高产量，推出了一种名为“金皇后”的品种，但口感不好，也没有推开。

为了使房山有品质好的玉米品种和提纯复壮小八趟，克服自然选育的缺点，不少农业科技人员到海南岛去繁育种子。彭清泉作为技术负责人曾在 1970 至 1972 年三次带人去海南岛。一般是前一年的 9 月份去播种，第二年 3 至 4 月份收获，每次育种 1500 公斤左右。制种田都选在偏僻的农村，自己搭帐篷自己做饭，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过春节也回不了家，非常辛苦。

优良的杂交品种比自繁自育的农家品种或退化不纯的杂交种一般能增产 20%~30%。因为杂交种具有杂交优势，生育期一致，可密植，产量高，所以选用表现好的杂交种再加上良法配套就成为增产的主要途径。70 至 80 年代，

房山县的农业科技人员经多方努力引进和试种了不少玉米杂交品种,配合各种种植方式,为秋粮的增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品种有郑单 2、豫农 704、丹育 6、中单 2、中单 4、黄白 1、良单 5、唐单 11、烟单 4、京单 403、京白 10、京白 107、京杂 6、京黄 113、京早 7、京早 8、掖单 4 等 10 多种。但是,最终成为良种良法栽培学标志的是 70 年代末开始引进试种到全县大面积推广,实现两茬平播种植方式的为“京早 7”玉米。

### “京早 7”的试种研究和推广

“京早 7”是北京市农科院及中国农科院 1975 年育成的玉米杂交种,组合是黄早 4×罗系 3,属于中早熟单交种,生育期 95 至 100 天,夏播平均亩产 300 至 400 公斤,最高亩产曾达到 650 公斤。上世纪 80 年代,最高种植面积达到 28 万亩,为房山县的粮食生产立了大功。

1977 年,北京农科院在窦店大队进行夏平播玉米耕作制度改革试验。品种对比试验表明,夏平播“京早 7”产量最高。1979 年扩大到 2990 亩(占总面积的 75%),平均亩产达到 362.5 公斤,比其他品种增产 28%~40%。同年,时任农科所副所长的彭清泉也带领一些科技人员开始在农科所的 4 亩试验田里进行了“京早 7”的繁育制种。制种约 600 公斤。

1978 年,安排在坨头大队、南尚乐大队扩大试种范围,并开始对“京早 7”玉米的生长发育特性进行系统观察研究,并联合其他学科为推广两茬平播的“京早 7”玉米品种摸索出一套栽培管理方法。

通过对“京早 7”全生育期的生态学特性的观察对比,确定了一套以苗期、穗期和花粒期为关键,以叶龄叶序为标志的栽培管理方法。如:苗期(8 叶以前)的管理重点是保苗促根,肥水效应最佳是 6 至 8 叶时。穗期(8 至 13 叶)管理重点是在壮苗基础上促穗大粒多,延长营养器官的功能期。穗轴长在 13 叶处,当 13 叶展开时雌穗进入小花分化期,对水分反应敏感,在 13 叶时追肥浇水效果最佳。因此,如何认定叶序就成为技术关键。彭清泉对此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终于开创性地从叶片形态结构上找到“六光、八毛、七过渡”、“六叶七层根同位”、“七层根伸长对应 13 叶”等生长规律,为适时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对“京早 7”灌浆速度的测定研究,授粉后 20 至 30 天内粒重增加最多,成熟的形态标志是籽粒与穗轴连接处出现黑层。在此前,房山农村不少地



区为了适时种麦，不等玉米正常成熟就收获，有的采取去尖打叶“促早熟”。试验证明这是不科学的。经测定，在籽粒形成的灌浆期，每早收一天，每亩减产达 16.5 公斤，临近黑层出现前，每早收一天，每亩减产 8 公斤。

为了达到适时收获不误农时，彭清泉与房山气象站的张广文、朱文治共同研究了气温变化对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得出了“京早 7”不同播种期对应成熟期的规律，即 6 月 15 日播，9 月 18 日成熟；6 月 20 日播，9 月 23 日成熟；6 月 30 日播，9 月 28 日成熟。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房山县“京早 7”玉米得到大面积推广，栽培管理技术也日臻成熟和规范，良种良法的科学种植方式从此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 房山区的印刷业

侯敬德

印刷物资供销，是印刷工业的物质基础，是印刷厂与印刷物资生产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对印刷工业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0多年的建设，北京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到1998年底，北京地区已有大、中、小型印刷厂1800余家。

印刷企业由各部门分散管理，除历史原因外，最根本的还是由这个行业的性质决定。首先，印刷是一个服务性加工行业。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谁需要长期大量印制书籍刊物，谁就投资建印刷厂，该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印制方便。这就形成了“谁用谁建”的特点。其次，某些印刷品是特殊产品，如钞票、油票、有价证券等，有的则属高度机密，如军队、科研院所、国家机关印刷厂的某些印刷品。这些印刷厂由使用部门创建，其产品也离不开使用部门的管理，只能实行“谁有谁管”。改革开放后涌现了大批印刷厂，大多数是二三十人的小厂，分散在机关、学校、农村、乡镇，既有全民所有制，也有集体所有制，更多的是私营个体企业。

房山区印刷业发展较早较快，印刷业已成为区工业经济产值的重要项目。

1998年底，全区共有印刷企业82个，其中书刊定点厂14个（其中国家级书刊定点厂1个，省市级6个，临时级7个），非书刊印刷装订厂68个，职工5320人，完成工业总产值3.1亿元，创利税5272万元。

**北京市房山东营乡燕南印刷厂** 该厂建于1984年8月15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厂址在东营乡西营村，占地面积8737平方米，建筑面积3390平方米。该厂有制版、印刷、装订3个车间，承印书刊杂志及各种商标、彩色艺术印刷等。主要业务有制版、印刷、装订、压膜等，是省市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

1998年底，该厂有职工108人，固定资产总值222万元，主要设备5台（套）；年生产能力：排字30万千字，印刷3万令，装订1万令；工业总产值260万元，利税21.2万元。

**北京市宏伟印刷厂** 该厂建于1980年5月1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厂址在韩村河镇郑庄村,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该厂有排版、印刷、装订3个车间,以胶印为主,主要承接书刊印刷、装订及各种表格、信封、纸袋、商标、证券等,是临时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

1998年底,该厂有职工60人,固定资产总值91.8万元,主要生产设备14台(套);年生产能力:排字70千字,印刷5千令,装订5千令;工业总产值111万元,利税35万元。

**北京市房山印刷厂** 该厂建于1956年1月15日,其前身是1956年由私营华记印刷厂改建成的公私合营良乡印刷厂。1960年12月由良乡迁至房山,改名房山县印刷厂,全民所有制企业,1987年定名为北京市房山印刷厂。厂址在房山区南关外矿机南路3号,占地面积10506平方米,建筑面积8934平方米。该厂有胶印、彩印、装订3个车间,主要承印人教、卫生、机工等出版社的书刊杂志、商标和社会零星印件,是国家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

1998年年底,该厂有职工232人,固定资产总值854万元,主要生产设备15台(套);年生产能力:书刊印刷143千令,装订4万令;工业总产值285万元,利税63.5万元。

**北京市房山龙华印刷厂** 该厂建于1985年2月17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厂址在周口店村南路,占地面积22667平方米,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该厂有照排、照相制版、胶印印刷、装订4个车间,以书刊印刷为主,主要承印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书刊和社会印件,是省市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

1998年年底,该厂有职工152人,固定资产404万元,主要生产设备28台(套);年生产能力:排字3002千字,印刷48615令,装订15936令;工业总产值422.6万元,利税12.4万元。

**北京市房山琉璃河印刷厂** 琉璃河印刷厂建于1976年7月26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厂址在琉璃河镇南大街,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该厂有排版、印刷、装订、热合4个车间,主要承印书刊、商标、信封、信纸和零星印刷,1983年被房山区工商局制定为商标印刷定点单位。

1998年年底,该厂有职工40人,固定资产总值70万元,主要设备6台(套);年生产能力:排字20000千字,印刷7千令,装订5000令;工业总产值120万元,利税10.6万元。

**北京崇民防伪印刷厂** 该集团组建于1996年3月20日,其前身是1983

年4月成立的北京崇民防伪印刷厂,集体所有制企业,厂址在崇各庄乡窦各庄村,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该厂集团有印刷分厂、装订分厂、油墨分厂三个分厂,具有生产各种防伪油墨及各种防伪商标、票证、彩色印刷、装订等综合能力,是市防伪商标定点企业,1988-1990年被市政府农办评为市优秀企业,1990年被评为星火示范企业。1996年被国家农业部批准为全国乡镇企业集团,同时被列为大一型企业。1996至1998年被市政府评为十大利税企业和京郊十佳乡镇企业。

1998年底,该厂有职工1060人,固定资产总值6580万元,主要设备28台(套);年生产能力:印刷360万令,装订书刊及票证1.1亿册,生产油墨800吨;年集团实现总收入1.8亿元,利税总额2659万元。

**北京市房山先锋印刷厂** 该厂建于1983年1月1日,村办集体企业,厂址在窦店镇苏村,占地面积85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该厂有照相制版、印刷、装订5个车间,以书刊印刷为主,是省市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

1998年年底,该厂有职工150人,固定资产总值1150万元,主要设备10台(套);年生产能力:排字4万千字,印刷120千令,装订2万令;工业总产值500万元,利税56万元。

**北京市房山腾龙印刷厂** 该厂建于1980年3月8日,是股份制(合作)企业,厂址在岳各庄乡南河桥,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该厂有激光照排、彩色印刷、装订3个车间,以彩色印刷为主,主要承印试验教材、书刊杂志、商标广告社会零星印件,是省市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

1998年年底,该厂有职工80人,固定资产总值288万元,主要设备15台(套);年生产能力:排字1万千字,印刷20千令。装订20千令;工业总产值290万元,利税50万元。

按传统印刷工艺,印刷物资除了生产印刷产品必备的机械设备外,房山地区部分印刷厂通常还有三大类:一是构成印刷产品主体的原材料——各种张纸;二是印刷产品生产过程中必须耗用的各种材料——油墨及化工产品等辅助材料;三是采用不同印刷工艺生产所需耗用的版材、器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印刷应用领域的扩大,印刷工业耗用的各种印刷物资也相应地在不断变化。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由于激光照排、电子分色、电子印前系统、告诉多色彩印、联动装订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在印刷工业上的应用,印刷工艺有了根

本性的变革，手工排字、手工制版、铅印、手工装订等基本被淘汰，因而印刷生产所需物资无论数量、质量、品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部分印刷厂的印刷产品也从单一的书刊、社会零件印刷，发展到包装装潢、纺织等许多领域，所需印刷物资就更为丰富了。

# 房山的池塘养鱼

张 珍 陈润举 刘志刚

我们曾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先后在房山县（区）农林及畜牧水产部门工作，对全区水产资源及渔业发展情况有些了解。其中有些具体工作是我们亲自参与的。现将一些难忘的记忆回顾如下：

房山地区的自然环境、光照、气温及水资源条件比较适合发展渔业生产。全区有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小清河等十几条较大河流，流经部分地区或全程穿过山区和平原。我区的东南平原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许多村还有常年废弃的大小坑塘、低洼易涝耕地和湿地。这些有利于渔业的资源，在解放前的历朝历代以及民国时期，当权者根本不加过问，长时期以来，根本没有经济效益可言。1948 年房山、良乡两县解放，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都把带领人民群众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为了扩大生产项目，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始引导农民利用自然水面学习和推广人工养鱼。尤其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以后，市领导特别重视发展养鱼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全区养鱼生产出现了群众性的快速发展，人工池塘养鱼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粗养到精养的发展过程。纵观我区养鱼生产近六十年来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58 年到 1974 年。

1949 年到 1958 年，是非人工养殖时期。自然河流及荒水坑塘的鱼类靠天生长，农民无序捕捞。1957 年是全县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的第二年。当时房山、良乡两县都属河北省通县专署管辖。由于农业高级合作化发展的需要，1957 年 9 月，河北省政府在保定市召开“河北省水产工作大会”。房山县农林局派负责水产技术工作的陈润举参加了大会。根据大会精神，县农林局决定在长沟乡西长沟村利用二亩自然坑塘，放养两万尾草鱼苗，并具体指导养鱼生产。这样，西长沟村的养鱼生产，就成了房山淡水鱼人工养殖的第一家，为发展人工水产养殖起到了破天荒的带头作用。

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房山、良乡两县与燕化、北京市京西矿区的河北、坨里及周口店等三个小区合并，建成北京市周口店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是李明，区长是曹庶民。全区广大群众为划归北京市管辖无不欢欣鼓舞，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农口各部门领导，对郊区农业生产和副食品生产特别重视。当年，我区在北京市水产局的帮助下，从湖南省长沙地区引进鱼种4万尾，并帮助指导投放到城关镇丁家洼水库、石楼乡坨头村、双柳树村、南庄村和窦店乡望楚村的自然水塘。从此，房山开创了初具规模的人工养鱼的历史。1958年10月，市水产研究所举办“池塘养鱼技术培训班”。周口店区政府畜牧办公室指派陈润举参加了市养鱼技术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他按照自己的记录，整理成《池塘养鱼》的小册子，印刷了五百份，以区政府畜牧办公室的名义，发放到有关公社和各大队。这是我区以政府名义把“池塘养鱼”第一次提到宣传动员的日程上来。

1958年的8、9月间，周口店区也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从8月下旬开始学习、宣传及组建公社活动，到9月5日，全县建成六个大公社，即良乡、琉璃河、城关、长沟、马安、百花山人民公社。实现公社化后，又掀起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大跃进运动。据1958年底统计：全区六七千亩荒水坑塘，只利用了2421亩，当年放养的10万尾鱼种，总产量只有3.25万公斤，亩平均17.5至20公斤。1959年冬季，在“大跃进”运动中，区政府拨款8万元，以建重点渔场的名义，由史广居任场长，在琉璃河大公社芦村占用耕地，人工挖建渔池。上百亩水面的渔场建成后，由于水源不足，缺乏饲料，又缺乏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池塘养鱼未获成功，后来把池塘恢复成粮田耕地。1971年，市政府和县革委会为支持养鱼生产，在崇各庄公社大苑村建立起县鱼种场。翟洪儒任场长，当年建场当年繁殖鱼苗135万尾，结束了我县往年到南方购运鱼苗的历史。各公社、大队的养鱼，由县鱼种场供应鱼苗，全县实现了自繁自养，但由于管理粗放，成鱼产量没有明显提高，多数都是在亩产20公斤上下徘徊。一直延续到1972年。

1973年，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市民吃鱼难问题，推动池塘养鱼，提出凡通过修整加深成形、水深在2米以上的人工渔池，每亩水面由国家补助60元。我县积极贯彻市政府鼓励发展池塘养鱼精神，琉璃河公社率先行动，他们组织祖村等七个大队，改造自然坑塘200亩，建成标准渔池。加上其他公社、大队修建的池塘，全区池塘水面达到546亩。全区鲜鱼总产达到1.31万公斤，平

均亩产 24.9 公斤。祖村大队养鱼获得好收成，被市水产局评为先进单位。由于市、县的鼓励政策，又有祖村先进典型的带动，1974 年全县大部分平原社队都把养鱼作为一项看好的副业，纷纷建立专业队，学习养鱼技术，使养鱼池塘面积有了发展，成鱼单产也有明显提高。如大紫草坞公社吴庄等七个村修建 37 亩池塘，亩产成鱼达到 150 公斤。在市水产局的表彰大会上，作为全市的高产典型向大会介绍了吴庄经验。

第二阶段：从 1975 年至 1995 年。

1975 年 9 月，窑上公社首次用机械作业，在大陶村建起全县第一家商品鱼基地，池塘水面达 102 亩，受到市、县的表彰。从此以后，全县每年都有计划的建设标准化的商品鱼基地。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县累计建设池塘养鱼水面 1146 亩。

为了适应全县养鱼生产发展的需要，1978 年下半年，成立房山县畜牧水产局。在市、县委的领导下，为加快养鱼生产的发展，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发展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县畜牧水产局为取得养鱼生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以窑上公社渔场为试点，由局水产科负责，帮助渔场制订了“三定一奖”的联产承包管理办法。“三定”是以人定塘、以塘定产、以产定饲料；“一奖”是超产归承包人。县政府畜牧办公室将窑上公社渔场的“三定一奖”联产承包办法印发到各公社渔场，号召学习窑上公社渔场的经验。1981 年，市水产局与县畜牧水产局合作搞技术下乡，与交道二街渔场签定技术承包合同，提高了养鱼的技术水平，获得了好收成。县委宣传部以“技术下乡搞承包获得鱼产丰收”为题，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上刊登了交道二街的科技养鱼的高产经验。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养鱼生产加快发展，1983 年 2 月，市政府批转《市财贸办、市农林办关于加快北京市渔业生产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要求各区县要加强领导，加快养鱼生产的发展。要认真做到五点：一是要解放思想，坚持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以扶植集体、重点户、专业户为主，鼓励群众投入养鱼生产。二是大力推动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打破单一集体经营的保守观念，确定现有水面及新开水面的使用权。三是调整购销政策，放开水产市场。四是水产主管部门要大力普及养鱼的科学技术，区畜牧水产局水产科每年春季为各渔场的饲养管理人员举办一次学习班。落实精养、高产的技术措施。加强科研攻关。五是加强领导，各部门密切配合，大力支持渔业生产，为解决市民吃鱼难贡献力量。



为了深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1983年3月，北京市撤销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建制，实行乡、镇和村建制。全县撤销32个公社的名称后，设置3镇29乡。3镇是：城关、良乡、新镇。29乡是：石楼、窦店、琉璃河、东南召、交道、官道、长阳、葫芦堡、窑上、大紫草坞、东营、崇各庄、坨里、周口店、黄山店、岳各庄、长沟、南尚乐、张坊、六渡、十渡、蒲洼、霞云岭、史家营、长操、大安山、班各庄、南窖、河北。为了加快修建新的鱼场，1983年4月，市委召开区委书记参加的水产会议。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出席会议，市委农委王宪主持并讲话。他指出：各区县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渔业生产；各区县要作出规划，限期消灭荒滩荒水，加快建设池塘、发展养鱼；普及科技知识。池塘养鱼中心任务是提高单产；要搞包产到户、到劳，大力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原来公社的水产员，要专职专责做好养鱼技术的宣传推广工作。调离做其他工作的，要限期调回。水产技术人员可以联产承包养鱼。

由于市委、市政府及县领导反复深入的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以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政策支持，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全县掀起大规模的修建商品鱼基地的热潮。1983年，吉羊、芦村、城关、长沟等10个村或乡、镇分别建成百亩以上的标准化渔场、渔池达1044亩。1984年，又有立教、西南吕、东南召、后十三里等14个村，建成百亩以上商品鱼基地共1247亩。两年高潮以后，每年都有少数乡、村经请示批准，主动修建商品鱼基地。到1986年，田各庄、东瓜地、二站三个村，是全县最后一批经市验收的商品鱼基地。从1975年到1986年，历时10余年，全县先后修建五十亩以上的商品渔场共38处，池塘水面共3437亩。其中200亩以上的渔场有两处，即东南召乡的西南吕村和石楼乡的吉羊村。另外，全县商品鱼基地中，东南召村、夏村、庄头村、瓦窑头村等8个村鱼场，水面690亩，是自筹资金修建的。因起步较晚，经市县验收，池塘质量合格，列入了市县的商品鱼基地，未受到市县的资金补贴。

在抓基地建设的同时，市、县水产部门明确要求：要边建池、边放养，抓精养、攻高产，全面落实八字精养法的技术措施。精养法的“八字”是：“水、种、饵、混、密、轮、防、管”。“八字精养法”的贯彻落实，推动我县养鱼不仅建池快速发展。还运用科学技术养鱼，使养鱼单位产量也进入了快速提高时期，建池过程中，涌现了许多高产典型，成为全市的先进单位。如1983年的吉羊渔场，就是当年建场当年盈利的典型。全场200亩池塘，获纯利3100元。成为全市的先进，1984年芦村大队渔场，百亩渔场，当年获纯利18345元。

窑上乡渔场, 1975 年建场, 由于管理好, 产量高, 效益显著, 被县革委会及市水产局树为全县和全市的学习榜样。1982 年交道二街渔场, 被评为北京市水产局的先进单位后, 1983 年《北京日报》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刊登和播报了二街的先进经验。1987 年西南吕渔场有 200 亩水面, 总产达到 9.45 万公斤, 平均亩产 422.5 公斤, 获纯利 2.5 万元, 全县、全市推广了他们的高产经验。

1988 年 1 月 1 日, 房山区畜牧水产局水产技术推广站建立。为了保护全区河塘渔业资源, 依法发展渔业生产, 1989 年 1 月 1 日, 房山区畜牧水产局建立北京市房山区渔政监督管理站。

房山区兴建商品鱼基地截止到 1988 年, 池塘水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1147 亩, 发展到 4250 亩; 成鱼年产量从 3.51 万公斤, 发展到 129.89 万公斤; 成鱼亩产从 30.6 公斤, 发展到 305.6 公斤。全区渔场单产最高的是房山城关镇兴华渔场, 它的精养鲤鱼池亩产达到 1800 公斤, 居北京市领先水平。全区成鱼年总产量最高的年份是 1995 年, 这年池塘成鱼亩产平均 378.4 公斤, 总产量达到 160.65 万公斤, 单产、总产均创历史新高。

第三阶段: 从 1996 年到 2003 年。

房山区的养鱼业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市民吃鱼难的问题, 彻底得到解决, 水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养鱼生产受到冲击, 养鱼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促使渔业生产者从单纯追求产量, 转向抓优种优质、面向社会需要、力争高效上来。经营结构由单纯养鱼生产向旅游服务型渔业发展。十几年来, 全区的池塘渔业呈现出以下新模式:

一是发展垂钓性渔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全区商品鱼基地有百分之九十的渔场, 采取以生产为主、以垂钓为辅的经营方式。靠近公路、交通方便的小渔场, 把池塘全部转化为专业垂钓。长阳镇的张家场渔场, 改建成设施完备的专业垂钓园, 称“碧溪垂钓园”。已成为垂钓为主, 集娱乐、休闲、住宿、会议服务、餐饮为一体的休闲渔业。据 2001 年统计, 全区 4088 亩池塘水面, 改造成垂钓池塘水面有 1686 亩, 建垂钓大棚 40 亩。年垂钓商品鱼达 60 万公斤, 占全区成鱼产量的三分之一, 年垂钓收入 800 余万元。比单纯养鱼生产收入大幅度增加。

二是利用老化池塘, 发展种稻养鱼型生态渔业。1996 年东南召渔场, 采取池塘底种稻, 稻田水中养鱼, 池坡种黄豆。据 2001 年官道、东南召等五个乡镇的部分鱼塘改藕塘, 共 480 亩, 最高亩获利 1150 元。2002 年全区鱼塘

种藕 800 亩。

三是发展鱼、畜立体渔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果各庄、芦村、田各庄等十几家渔场，在以鱼为主的同时，兼养鸭、养猪、养牛、羊、兔等。大高舍村迈志新采取水上养鸭，水下养鱼，也取得了好收成。

四是发展名、优、特、新的精品渔业。1996 年，全区池塘小品种放养水面达 1100 亩，其中精养 300 亩。1999 年西南召村张志国经营 120 多亩水面的渔场，其中发展名、优、特、新小品种达 64 亩。2001 年全区池塘成鱼产量中，名、优、特、新品种产量占 45%。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总之，随着水产市场结构的调整，全区水产经营方式、养殖的品种及经济效益都呈现出可喜可贺的社会进步的新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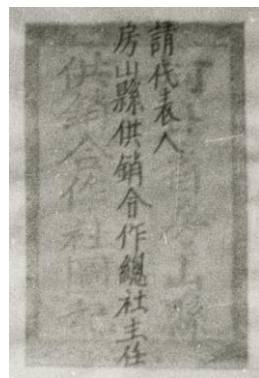
# 房良两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

王绍清

1948年12月14日，房山、良乡两县解放，两县生产推进社分别入城。房山生产推进社由张坊迁入县城西大街；良乡生产推进社随政府入城。两县生产推进社按照入城接管委员会（工作队）安排部署，全面接管了国民党所组织的合作社及全部财产，并留用了部分人员。

解放前，房山城内当时有大小私营店铺125户，良乡城内有私营店铺104户，因交通受阻，货源断绝，生产停顿，市场萧条，经济瘫痪。城内四街四关及县城附近村庄，由于苛捐杂税繁多，国民党整日抓兵，年轻人东躲西藏，生产衰落，民不聊生，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房良两县县委入城后，首先听取了入城接管委员会关于社会秩序及市面经济情况汇报后，当即提出两点：一是在稳定民心、安定秩序前提下，尽快恢复经济，由政府工商科负责，召开工商业主座谈会，宣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动员企业主投资再兴业，歇业的商号，动员重新登记，开板营业，并宣布废止一切苛捐杂税。房山工商科长方锡智，背着一个旧皮包亲自到南关给歇业户办理开业登记。据良乡县1949年4月份调查统计，私营商业184户，比1月份增加80户，从业人员291人，资金8867.38元，占全城工商业资金85.5%。二是生产推进社工作重心放在两县城关地区，进行“三贷”（贷粮、贷款、贷籽种），据不完全统计，春耕贷粮461356斤；农业、手工业、副业贷款4470万元（旧币），深受各界群众赞扬。



河北省房山县供销合作社第一枚印章

## 生产推进社和供销合作总社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确立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

乡村转入城市。毛泽东曾对发展新中国合作事业的重要性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一精辟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合作社地位和作用，为全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9年6月，河北省通县专署召开各县生产推进社主任会议，传达河北省委决定，把生产推进社更名为供销合作总社。房、良两县根据专署指示，信贷业务分别交给两县人民银行。两县供销合作总社是首家“官办商业”，房山县供销合作总社国拨资金570000000元（旧币），其职责一身二任，即承担国家任务，又为农民办事。按照两县政府人员编制，房山县供销合作总社设干部15名，良乡县供销合作总社设干部8名。生活待遇仍按供给制。正副主任、正副科长配备个人使用的手枪不动（公安特派员的手枪由公安局配给），冲锋枪、三八大枪、手榴弹均由单位保管。1950年冬，三八大枪由经济警察个人保管。县总社正主任配有警卫员1名，木套手枪1支，子弹袋1副，自行车1辆。1951年下半年，两县合作社干部实行低薪制，主任薪米440斤，副主任350斤，正副科长270至320斤，一般干部200斤以下。1952年7月，河北省民政厅通知，供销合作社长期脱产工作人员，免服代耕勤务，家属享受干部家属优待的规定后，调动了合作社人员的积极性，为合作社事业大发展奠定了人员基础。

### 组建区供销社

1949年，房良两县共有445个村，半老区129个村已作过土改，新解放区尚有316村未进行土改，1949年3月底第一批134个村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广大贫苦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分得了土地，对救灾、发展生产情绪高涨。然而在买卖商品中仍受私商剥削。翻身的农民为减轻商人剥削，部分村庄把祠堂、庙宇改作办公用地，自发办起街、村、消费生产合作社。合作社人员由贫农团推荐，房山南关、南街、北街合作社建立后，私商利用群众购买商品之机，挑拨社群关系。又用经济手段，扼杀初建的合作社。掌柜的利用伙计打听合作社火柴、煤油、食盐价格后，利用降低价格的方法，与合作社争夺客户。合作社得知此情，不计成本，降低商品价格，月底盘账亏损，有的因此歇业。

房、良两县供销合作总社针对当时经济斗争状况，确定以行政区兼集镇的建社原则，先后建立了九个区供销社。房山县包括一区域关社，二区张坊社，三区长沟社，四区五侯社，周口店地区包括总社货栈，五区河北社，六区霞云岭社。良乡县包括一区域关社，二区魏各庄社，三区琉璃河社，四区葫芦堡社。区社主任均由总社委派，基本是“民办官管”，区供销合作社的建立，对稳定物价，加强对单村社的指导起到重要作用。

### 优惠政策

区社建立后，得到国家和上级社的大力支持，供销社向国营公司进货，可享受低于批发价 2%至 5%的优惠；向银行贷款利息低于国营商业 10%；物资运输，火车降低一级标准收费，合作社输出的土特产品，在周口店、琉璃河、良乡火车站即时运出。邮电局汇总按公费优待，税务部门在建社一年内免缴所得税，营业税减征 20%，区社资金不足，县总社供应科给予赊销，调拨商品。

为促进合作事业的发展，完善基层社各项制度，激发农民入社，中央贸易部、全国总社对七种生活必需品即食盐、煤油、红白糖、碱面、面粉、布等，按低于市价 20%的优惠，向社员实行定量配售。良乡县 10 个基层社定量配售总额 27000 元，社员享受优惠计 5400 元；房山县 17 个基层社有 12 个社符合条件，定量配售总额 14235 元，社员享受优惠 2899 元。1951 年，两县供销社接受国家委托，为国家代征、代购棉花，代销粮食、油料。为方便农民售棉，建收购站 8 处，轧花厂 6 处。代购籽棉 647378 斤，皮棉 10756 斤，供应居民絮棉 20000 斤，建粮食、油料收购站 16 处，代征花生仁 181999 斤，代购花生 400639 斤。代购小麦 351759 斤，代销粮食 1212035 斤。

通过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及代购、代销业务，促进了合作事业的发展，同时支援了城市建设，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工农之间桥梁作用。

### 占领经济阵地

1951 年，随着调整工商业政策，私营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获得了丰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私商不满足国家给予的地位和利益，采取“派过来，拉过去”方式，内外勾结，进行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同时，部分工商业不择手段地向国营公司、

合作社争夺原料和市场，破坏合作社购销计划和价格政策，从中牟取非法利润。面对这种形势，房、良县委遵照河北省委指示，在县直机关开展“三反”，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

两县供销合作总社决定，要求各集镇社“追集赶庙”，出摊售货。坚决击退私商以各种形式公开向合作社的进攻。房山城关社在县城五月庙会期间，搭起大棚，展出商品，将山鹿牌白布堆成垛，按市场价 10% 给社员优惠、逛庙会的妇女围在摊前，三环布店老板见此情景，用胳膊挑起花布登在凳子上，大声喊“高阳花布，布美价廉，美观大方。”一群妇女挤在摊前购买。三环老板洋洋得意地说，合作社没这花布，这句话提醒了售货员，土改后翻身的妇女想做件花衣服的心理。主任带着两名售货员来到县总社库房，说明情况，打条赊销三卷苏联花布，由三人扛着花布摆在摊前，售货员大声喊“苏联老大哥为支援中国经济建设，请老乡们购买苏联花布。今天按进价不加利润卖给社员，对机关厂矿人员实行赊销，每人 10 尺。”话音未落，一群人跑过来购买。1951 年至 1952 年，在房山城内大街，均可见到男同志也穿着一件苏联花布上衣。

1954 年，市场发生根本变化，供销社零售额 1952 年仅占社会零售额 25%，1954 年上升到 73%，私营商业由 55% 下降到 21.3%。在主要集镇一度出现“合作社业务忙死，群众购货挤死，私商闲死”的现象。房良两县供销社遵照全国总社及河北省社指示，为维持私商生活，在零售业务上退让商品，缓解了私营商业急剧下降局面，为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

房良两县供销合作社的建立，对稳定物价，开展生产救灾，组织副业生产，对私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 1949 年至 1957 年，供销合作社基本是独立自主，自负盈亏集体企业。从 1958 年起，多次进行国合分合，大并大撤，起落与变迁。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农村财贸体制实行“二放、三统、一包”，即放人员、放资产；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资金管理；收支包干差额，包干上交，人民公社成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 房山县国营商业的组织结构

刘树霖

上世纪 80 年代初，是房山县行政区划发生变化时期。当时我刚从外地调回到县财贸办公室工作，为尽快进入角色，我曾对当时的国营和供销合作社的情况进行了一些基本了解，至今留有较深印象。

## 组织结构

当时房山县分为房山县、燕山区和小矿区三部分，商业也是按行政区划分为三部分。

房山县部分的情况是：由县直管的单位有粮食局、供销社、工业品管理处、副食品管理处、服务公司和外贸公司。在这六个单位下边又分了较多单位。

粮食局下边有：房山、良乡两个直属库（加工厂），二十几个粮食管理所，一个饲料加工厂，一个汽车队和五十几个粮站。饲料公司下边还有大石河、窦店、石楼和南尚乐四个饲料厂。由于粮食的特殊性，燕山区、小矿区的粮食仍归房山粮食局负责。

**供销社：**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基层供销社，共 30 几个基层社，在各村又有其门市部、分销店、代销店、回收站等门店，在一些重点供销社还建有食品加工厂；有农业生产资料、物资回收、日用杂品三个直属公司；有房山城关、良乡、田各庄三个食品厂；在大石河有一个汽车队。

**药材公司：**是市属单位，在房山归口县供销社。当时还没有零售药店。只在房山城关和良乡各有一个批发部。

**工业品管理处：**有百货、五金两个直属三级批发公司，在房山城关和良乡两个城镇地区有人民商场、房山百货商场、良乡百货商场等一批零售企业。

**石油公司：**是市属单位，在房山归口工业品管理处，其下边有公司机关、修造厂路口、房山饶乐府三个加油站。

**副食品管理处：**在良乡有一个批发部，在城关和良乡各有一批零售副食店、



零售店、规模都较小，只良乡商场规模大一点。另外还有琉璃河水泥厂、窦店砖瓦厂、良乡修造厂和化四四个厂办商店。归口管理的还有食品公司、糖烟酒公司和菜蔬公司。食品公司财务、业务都归市公司管，在房山归口副食处。其下边有一个良乡肉联厂和二十几个基层食品站。糖烟酒公司财务也都归市公司管，在房山归口副食处。只批发，没有零售点。菜蔬公司归副食处直管。其下边在房山城关和良乡各有一个菜窖，在房山有一个豆制品加工厂，在房山城关、良乡和琉璃河水泥厂各有零售菜店。

**外贸公司：**负责外贸产品收购、加工和外销，有一个零售点，在大石河有一个仓库。

除国营商业外，还有物资局主要经营钢材、水泥、木料、化工等产品，煤建公司是搞煤炭供应，都归口县计委，煤建公司还是市属单位。负责农机服务的农机公司归口县农委。

**燕山区的情况是：**国营商业有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两个公司，下属有一些零售店和一个食品厂，供销部门只有一个回收公司，有几个回收点。

**小矿区的情况是：**国营商业归矿务局商管处管，下边有房山矿、大安山矿、长沟峪矿几个矿区商店。供销社系统有河北、班各庄、南窖、大安山和黄山店五个供销社，河北有个食品加工厂。

除以上部分外，四〇一商店归四〇一管，房山矿机商店归矿机管，一些部队的军人服务社归部队管，与房山没有所属关系。

## 运行回顾

上世纪 80 年代初，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仍处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国营商业运行计划经济的特点仍然非常明显。

一是国营商业独家经营仍较严重存在。日用工业品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专营仍不同程度存在。零售企业大量日用工业品还只能从百货公司和五金公司进货，粮食购销由粮食局控制，生猪、鸡蛋仍实行统购派销，蔬菜实行统购包销。国营副食批发仍控制副食主要货源。大量商品购销数量也有较严格控制，各单位的食品加工厂和饮食业的原料如面粉、食油、糖等都是有计划供应。不少产品是按一定数量供应给居民。

二是票证大量存在。最严格的是粮油，一户一个购粮本，不仅有定量，还分粮票、面票、米票、油票，什么票买什么。除了粮食，一些副食品也是凭本

供应，居民一家一个副食本，麻酱、粉丝、碱面等都是按数量供应。工业品中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以及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都是凭票供应。

三是关系到群众基本生活的商品实行价格倒挂。那时我国还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一些关系到群众基本生活的商品还比较紧缺。为了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一些商品是实行价格倒挂的。如粮油、猪肉、蔬菜等都是如此。这些商品的收购价加上正常费用都高于其销售价，这叫价格倒挂。价格倒挂必然产生亏损，这叫政策性亏损，由政府给补贴。粮食局 1981 年的政策性亏损是 326 万元，1982 年是 348 万元，1985 年达到 1186 万元，食品公司良乡肉联厂 1981 年政策性亏损是 56.9 万元，1982 年是 196.2 万元，1985 年上升到 286.8 万元，菜蔬公司从 1981 年到 1984 年每年都是 40 万元多一点，1985 年有所下降是 36.84 万元。

四是条块分割，地域分割。为了便于计划分配，计划供应，商品是按条条，从二级批发到三级批发最后到零售门店，层层往下分配供应，零售单位是不允许直接到二级批发进货的。商业单位是按商品设立的，工业品管理处主要管工业品，副食品管理处主要管副食品，食品公司只经营肉、蛋、禽，分工明确。在地域上也有严格划分，国营单位的工业、副食品处和服务公司负责房良两个城镇商品供应和服务。供销社负责广大农村。国营不能到农村开店，供销社不能在城镇建大商场。只是副食品管理处因一些副食品的计划供应问题，把厂办商店划给了他们，不仅在商品供应和单位设置上条块分割严重，在商品分配上城镇和农村也是有区别的。比如，那时燕山区和四〇一的商店供应按城区对待，比房山就有所优惠，数量质量上都有所不同。

五是企业是行政机关和党组织的附属物。那时政企不分，甚至党企不分相当程度存在。实际是把企业看做行政机关和党组织的一部分，看做行政机关和党组织的后勤机关和物资分配工具。领导由行政机关和党组织任命；工作任务由行政单位和党组织下达；人员由行政人员分配调动；物价由物价部门制定。商业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按党政机关意志行事的。

六是国合企业在市场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国合商业以外的社会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力量 and 影响仍然相当微弱，国合和供销社商业仍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据有关资料，1981 年房山县社会商品零售额是 19279.4 万元，国合商业是 15866 万元，国合商业社会商品零售额占了全县的 80.23%。1984 年房山全县的社会商品零售额是 30450.6 万元，国合商业是 21027 万元，占了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69.05%。关系群众基本生活的粮

食、油品的收购和销售仍由县粮食局牢牢控制，生猪收购和销售仍由食品公司独占。化肥、农药、农膜等仍归供销社的生产资料公司独家经营。县百货公司、五金公司和副食批发部仍是主要批发企业，掌握住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进货命脉，社会商业大多是一些个体和集体小企业，对市场的作用还相当小。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产品的逐步丰富和群众生活的逐步改善，以上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变，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 房山地区几种农副产品经营之道

王绍清

一项商品一路货，一家商店一帮客。不分“夫妻小店”、“手艺作坊”、“南北货店”及粮行，各自有独特牟利积财经营之道。

农村小镇小本经营的“夫妻店”，他们往往前店后家，经营灵活，不受时间限制，随到随买，以时间、方便顾客而盈利。

糖房、炒货场、酱园、油烛，多为前点后场，自制自售，商品适应四时，以劳动手艺而盈利。城镇南北货店及粮行，在招徕客商牟利的招数各有不同，这里列举一二。

## 蒲包大果匣

“蒲包”（是用河北安新白洋淀产的一种水草，编织成二尺长、一尺八宽的小蒲席，柔软而有韧性，用麻绳捆好，抽出四角，上大底小的一种器具），始于清，民国时期盛行，是房山城内广泰公（晋商）南味主营产品，前店后场，以本堂货打牌子，凭师傅技艺，制出十二个品种糕点，白（丧）事包“蒲包”，蒲包上放蓝色标签，用白麻绳系捆。红（喜）事包“果匣”，用鲜艳红色标签，红绳系捆，手提蒲包、果匣美观大方气派。因此，蒲包、果匣是婚丧嫁娶馈赠亲友之佳品。蒲包现已绝迹，果匣以扁平纸匣替代。

大蒲包装有十二种图案四十八块糕点，俗称“十二围碟”，十二种“图案”（是用硬木制成，头大后窄长形模具，头如小碗，内刻各样图案，将糕点胚子放在模具里，用手一压，图形出现，将胚子摆在桃盘里烘烤。）有福、禄、寿、鹤、楼阁、亭、花、才子佳人等。本堂有“买一代十”的经营传统，对蒲包的附带品，香、烛、纸码，略高同行。大果匣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娘出嫁，压箱点心，图案有麒麟送子等。点心馅有三种与其他店不同，“老婆饼”用枣泥馅，“桂芙蓉”用板栗馅，“萨琪玛”放上瓜子仁故称“早立子”。另一种为老人祝寿，有寿桃、寿面。八月十五的月饼不装果匣，用两层纸包好，放上红色标签，

当月饼湿透了包装纸，说明油大酥脆。

农村大年三十晚上，供上家堂，摆好贡品。贡品有的用点心，大部分自制八个大碗，碗上插上神态百态的八仙人，前四碗：一是蓬头卷须身背宝葫芦铁拐李，二是手持大扇的汉钟离，三是身背宝剑的吕洞宾，四是肩扛荷叶何仙姑，后四碗：立吹横笛韩湘子，四海为家蓝采和，手拿玉板的曹国舅，抱着鱼鼓倒骑毛驴的张国老。有的人家在贡品上放点红萝卜，或菠菜、剪纸画点缀。

广泰公多年以民俗包装新颖，图案吉利而闻名十里八村，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未任掌柜王某，因经营有方，建国后被选为房山县工商联会委员，公私合营私方经理。

### “拉山客，钓水客”

房山福源勇为晋商老店，粮行兼营杂货，“酱醋驰名”，自磨白面，质量纯正，凡购买者，给予“老秤加一”优惠，顾客盈门。对北山（河套沟）、西山（长沟峪）的客商远迎近接，让进账房，烟茶招待，再问所需，学徒打店，午间留客用餐。走时伙计牵驴搬车，掌柜出店恭揖送行，多年拉着西山北山客商，盈利胜于同行。

琉璃河绵福隆（晋商）杂货行，兼营批发，白天派伙计到码头笑迎客商，主动卸货，晚上打着绵记灯笼，把客商接到店，热情接待，安排食宿，次日将货备好，把客商送上船只。绵福隆以殷勤钓着一批来自白沟河、天津等地客商，运走土特产，收购了海产品，当时商界有句顺口溜，如能“钓”（吸引的意思）着水客，就会“生意兴隆通四海，铜子洋钱满柜流”。

### 看苗贷款

张坊乃出山之口，是房、涞、易山货集散中心。几家店铺单靠经营日杂百货，销量小利润低，采取靠山吃山，当柿树开花，核桃坐果，店铺伙计及当地运输商，到村看柿花借贷，不给现金，以土白、青布等商品高于市价 10%付给借贷者，霜降柿子下树低于市价 20%将柿装筐归还借款。高价卖、低价收里外挣钱。

房山北街隆福居（晋商）粮行，资金雄厚，四月农民正处青黄不接，有的

户断粮，只好到隆福居借粮，此时老板派伙计到田间看过麦苗之后，以卖青苗为条件借给粗粮（玉米谷子）。麦秋归还小麦，借一石还一石二小麦。1949年，供销社采取以粗换细双方找价，解决了历史上麦贱伤农的问题。

# 官庄村集市

唐占忠

官庄村原属直隶（河北）省良乡县，地处永定河右侧小清河左岸边。该村集市的建立发产历经几度兴衰，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繁荣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官庄原来称袁庄，是明朝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时随其迁徙过来的一些许姓人家落户于此，达官贵人起村名为袁庄。到了清朝，许氏家族官运亨通，出了不少富豪和文人墨客又改村名为大官庄和小官庄，后统称官庄。乾隆年间，官庄开始设立集市。乾隆时期是清朝鼎盛阶段，无内忧外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稳定，商品流通，这是天时条件。其次，官庄那时是良乡县以南较大的村庄，又是周围村庄的中心点，它距离有集市的码头、窦店、官村等村有 30 里地之远，百姓赶集困难，于是官庄设立集市是众望所致，这是地利条件。第三，乾隆年间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大力整治永定河，疏浚小清河，从各地征来大批民工，他们需要日用品，盼着附近有集市。因为官庄紧靠小清河村，一些有名望的人磋商并报奏良乡县，征得同意后决定成立集市，这是人和条件。

官庄集市随街道东西走向约长 2 里，摊位布满大小官庄。集市日期定为农历每月十天四个集日（二、七、四、九日）。开始每逢集日仅有一些小商贩卖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市场发展壮大了，一些大的商家在此租房开设门铺。如酿造白酒的烧锅、当铺、中药铺、棺材铺、寿衣店、纸糊店、大车店、柳苇编店、五金建筑材料日杂店、土布店（家织布）、麻绳铺、染坊、肉铺、饭馆、点心铺、茶叶店、盐店、酱坊、香油坊、铁匠铺、手饰店等。大街两侧占满临时出卖各种农副产品的小贩。真是货物丰实，琳琅满目。

村外大户人家场院开设了牲口市、猪羊市、粮食市。这三户市场开始交易是买卖双方协商价格，随着市场的红火，买卖双方通过中间人调解裁定，交易才能达成。每当集日，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络绎不绝，人流如织，呈现一派盛世景象。

清朝同治十年（1872），永定河发大水，赵营段大堤决口，翻滚的洪水直

扑小清河。沿岸村庄遭到不同程度水患，特别是大陶村西头老君庙和小官庄被洪水冲得荡无踪影，只剩下如今的官庄村。洪水过后，官庄集市随之告终。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踏进中原。当时在窑上一带开展地下工作的共产党根据冀中军分区指示：挽救民族危亡，号召革命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保存实力，支援革命斗争，群众积极响应。由于敌人经常在此清户扫荡，生产出来的产品除自用外，要想出售换钱或购其它商品就困难了。此地区各村赶集得到周围30华里外的窰店、码头等集市去。官庄村地下党的“堡垒户”郜成林串联窑上村尹宝山、朝营村张玲等“堡垒户”商议立集事宜。后经过鼓动各村保长宣传出告示，定为每月“二、七、四、九、日”为官庄集日，民众得知喜出望外，积极从事商贸活动，官庄集市又复兴起来。

这时官庄市场规模比过去小了，只局限在东西走向的街面和几户大场院里。经营范围及品种也少了，交易的东西多为民众急需物品，如铁匠铺、日杂铺、盐碱铺、麻绳铺、药铺、牲口市、粮食市、猪羊市等较为兴隆。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政府发放的金圆券，因通货膨胀，贬值得厉害。如一斗高粱今天集上卖一万元，下次赶集时可能卖到十万或二十万元；另一种是共产党发行的边区票，它保值，但质地是草纸，油印的也不好，携带易磨损。老百姓也不愿使用这两种货币，后来索性就以粮食为等价物，进行物物交换。如一斗高粱可以分别换成八升玉米、五升小麦、二尺土布、三斤盐、四两花椒、一把小镐、三根缰绳等。

那时官庄集市不仅是百姓维持生活的物资交流场所，而且成了革命物资的地下集散地。因为日伪勾结在长沟和周口店一线挖封锁沟，严密控制山区与平原物资交流，以此扼杀革命根据地。当时窑上一带是盐碱地，杨柳丛生，各村群众每年冬天多数从事熬盐、碱、硝和烧炭活计，生产的东西在官庄集市交换生活用品。因此地下党经过秘密联系，组织发动群众把枣、核桃、花椒、柿子等山货运到官庄集市进行交流，把急需的盐、碱、硝、木炭等物资运回山里。所以，官庄集市的成立对粉碎敌人阴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50年，官庄归河北省通县专区良乡县第四区管辖。区委书记顾宪图、区长姜永刚从全区经济发展考虑，决定把官庄集移到该区的中心村公议庄，从此官庄集市又告终结。不到半年，公议庄集市因宣传力度不够，赶集人不多，又因当时是全国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农村里较大而且集中的村子都有了供销合作社，因此集市被供销社取代。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百姓生活蒸蒸日上。1995年，窑上乡



党委为发展本地区经济，决定在窑上村设立集市。集市建起后，由于该村有些人对外来商客欺行霸市，外地客商怕影响生意渐而离去，没有多长时间窑上集市便停止了。官庄村许金镛、梅傲雪、潘建安等人积极向村党支部提出立集建议，经村委会讨论，于1997年春再次建立了官庄集市。

官庄集日仍延用过去每月十天四个集日，地点也是在南北约一华里长的街道。

为使集市健康地长久发展下去，成立了集市委员会，并定下纪律：不论男女老少不许欺负外乡人，不准欺行霸市。同时征得工商局、供电局、税务局、卫生监管所等单位支持；宣传发动周围15里地以内各村百姓来集做商贸交易；到有集市的村如码头、义和庄、里渠、窰店、交道、官村招揽客商；制定了集市管理制度，保证买卖人合法经营权利，做到公平交易；组织了市场监管人员维护市场治安，保证社会和谐；开集后凡来此经商的人半月内中午管饭不收钱，摊位费和管理费不收税；从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请来评剧团演出三天文艺节目，为开集庆祝，扩大宣传力度。

十多年来，由于领导有方，官庄集市兴旺发达，村里经济收入大幅增加。用村民的话说：集市就是摇钱树，是聚宝盆。如今官庄集市已移到村北路西，面积已达到1.2万平方米。各种物品应有尽有，集日人山人海，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官庄村将于近年内在市场对面马路东，从南到北接连小陶村盖起商用楼以引商入驻。另外，在市场北隔一条小路，再开辟一个2万平方米的农贸批发交易市场，这将为本地区经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 房山境内的几条铁路线

侯敬德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至1995年，北京铁道运输由恢复、初步发展走向蓬勃发展：管理体制稳定；干线铁路不断兴建，并形成现代化大型铁路；运输设备不断更新，电气化程度日益提高；客货运量大幅度增长，铁路运输一直在各种运输方式中占有首要地位。同时因设备老化，运能与运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所以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在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由于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

铁路修筑干线同时，官方、商家根据经济发展，商运需要及外国侵略者侵华出于资源掠夺、军事目的均修建有铁路支线。1949年建国前，北京铁路有周口店、通州、坨里、南苑、京门、柳西（原西广）6条支线。建国后建有和平里、101房山3条支线，截至1995年末，北京铁路在北京市辖区有铁路支线9条，总长169.88公里。

## 周口店铁路支线

周口店支线由京广线琉璃河站32号道岔岔尖出，向西转向西北，经石楼达周口店8号道岔岔尖，全长16.004公里。属北京枢纽范围。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向比利时借款修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时，决定修建周口店临时便线，运送筑路所需大量石料，发现附近长沟峪一带有丰富的煤矿，故在定测时改为永久性线路。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9月开始初测，10月定测完毕，津榆铁路公司承修卢保线时一并施工，12月完成路基土方，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4月铺轨通车。该支线用款约3万英镑，由卢保段费用内支付。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6月26日清政府与比利时正式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及行车合同，周口店支线随同卢保段一并交由比利时公司接管经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周口店支线被破坏。是年八国联军入侵，比利时国公

司雇用法国侵略军于12月修复通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底清政府还清全部借款后，清宣统元年（1909）周口店支线随同卢汉铁路收归国有。

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钢轨、枕木更换不足，失于养护、枕木失效率达20%至50%，线路质量偏低，行车速度不高，民国六年（1917）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间共换钢轨9812根、平均每年更换545根，每公里换枕木157根。民国二十六年（1937）平津间线路允许时速为65公里，是京山线速度最高的区段，日本侵略军侵华时期，最高行车速度，客车每小时85公里，货车45公里。民国三十四年（1945）国民政府管理铁路，由于财力拮据，枕木奇缺，将沿线枕木集中平津铁路线使用。

1949年6月11日，平津铁路管理局北平铁路办事处成立，负责对外联系指导北平地区原局属各单位铁路运输业务及应急处理紧急事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平铁路办事处改为北京铁路办事处，为职能办事机构，对管理局所辖各基层单位进行监督指导。1950年3月1日，北京铁路办事处改组为北京铁路分局，实行区域管理体制。铁路分局为一定区域内既管运输又管经营的一级综合性管理机构，对辖区内各站、段实行直接领导。此后，曾几度短时间改为运输分局、办事处及车务段，自1963年1月1日恢复北京铁路分局后，分局一级机构稳定下来，直至1995年机构没有变化。

1949年建国前使用的枕木皆为素枕，正线为每公里1526根，站线为每公里1440根，失效率高达20%至50%。

建国后枕木使用发生了两次较大变化。

第一次，1952年至1956年通过大修，正线由每公里1526根增加到1840至1920根，到发线也由每公里1440根增加到每公里1760根，全部改用防腐枕木。

第二次，1972年至1988年将木枕换为钢筋混凝土枕，正线共更换47.8万根。

周口店支线正线路基宽5.5米；最大坡度13.2‰；最小曲线半径琉璃河石楼间300米，石楼周口店间280米；钢轨为每米37公斤；木枕；桥梁荷载L-18级。全线原设南韩继、周口店两站。南韩继位于12公里附近为会让站，不售客票，日本侵略军侵华时将其拆除，现为旅客乘降所。周口店站除正线外，有到发线2股，有效长261米，牵出线1条，货物线2条。沿线岔线及工业企业线专用线7处（包括：周琉璃联络线；房山支线；原油转运站专用线；东方红炼油厂专用线；油库专用线；采石场及51207专用线；塑料厂及长沟峪矿

专用线)。

为配合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建设, 1968年9月, 北京勘测设计所提出在周口店支线8.065公里处新建石楼原油转运工业站及罐车车辆段。石楼站为一级二级横列式共14股道, 到发线有效长686至803米, 东端设牵出线一股, 西端设机务折返点及油库区专用线。在站场北侧新建罐车车辆段(现石楼车辆段)及站修所、整备线等。线路总长25.862公里, 道岔74组。设计运量近期1971年450万吨, 远期650万吨。

1977年4月15日, 新建的琉璃河南站及琉璃河南站至周口店的周琉璃联络线竣工投产。由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投资修建的房山支线(石楼至房山)8.63公里, 亦于1977年竣工。全部工程由北京局北京工程处施工, 1979年竣工, 使用投资452万元。

1986年铁道部批准修建周口店至京原线良各庄站的周良联络线。北京局设计院设计, 铁三局四处施工, 1989年10月开工, 1993年8月17日北京分局接管运营。

结合周良支线的修建, 对周口店进行改造。北京局勘测设计院设计, 铁三局四处施工, 1991年9月开工, 1993年7月20日竣工。站场改造主要任务: 原线间距3.5米, 拨改后改为4.6米; 改造后股道有效长Ⅰ道425米, Ⅱ道470米, Ⅲ道505米。主要工程量: 站Ⅱ道正线更换为每米50公斤钢轨, 站内线路钢轨由每米49公斤更换为每米50公斤, 各种杂型轨更换为每米43公斤钢轨; 到发线更换为钢筋混凝土轨枕; 挖填土1150立方米; 道岔8组; 桥涵2座, 连续梁1座。周支正线改造1.156公里。

周支线开通后, 经多年运营维修, 1969年将原铺设的每米37公斤钢轨, 换为每米43公斤, 长6.3公里, 1983年、1986年两次大修, 又将其余线路更换为每米50公斤旧轨, 每公里铺设木枕1760根。至1995年末, 线路铺设每米50公斤钢轨平均重量为每米49.7公斤; 铺设道岔22组; 铺设木枕14.194公里, 占延展长度的88.7%, 余为钢筋混凝土轨枕0.991公里; 最小曲线半径200米; 最大坡度23‰。现有桥涵共15处总延长224米, 其中中桥2座延长83米。

### 铁路良陈支线

良陈支线属北京枢纽范围。由京广线良乡站4号道岔岔尖起, 经阎村、北

坊、坨里、磁家务、河南村至百草洼车站 18 号道岔岔尖止，全长 34.744 公里（不含陈家坟矿方专用线 639 米），原称良百支线。

良陈线在 2.6 公里以前平行于京广复线西侧，后转向西北，至 15 公里（坨里附近）前地势平坦，后逐渐升高，进入盛产煤炭的山区。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坨里煤业资本家请求京汉铁路局修筑坨里支线，此时京汉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已建成复线，为节约投资，决定在良乡站外保定方向 2.6 公里处，京汉复线区间出岔，向西直达坨里，是京汉铁路专为运煤而修建的一条支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4 月开工，翌年 7 月完工通车。民国九年（1920）12 月京汉铁路卢沟桥至琉璃河复线拆除，该支线出岔点移至良乡站，正线全长 16.312 公里，民国三十三年（1944）坨里支线拆除。

1953 年，应京西矿务局委托，由北京局设计提出坨里专用线修复工程设计文件。将坨里支线修复为矿方运煤专用线，并由矿方投资。为节约投资，确定利用原地里支线桥涵设备，不改变原线路的平、纵断面。设计的主要技术条件：限制坡度上行 5‰，下行 11‰；最小曲线半径 270 米，不设缓和曲线；铺设钢轨每米 38 公斤；铺设木枕每公里 1600 根；到发线有效长 460 米；桥梁荷载中—18 级；重车方向（上行）牵引 1490 吨。设计主要内容：良乡站增加 2 股道；坨里站设到发线一股，装车线 2 股，站内设灰坑、水鹤等设备；新建桥涵 3 座，修复 6 座，架设扣轨梁 20 座；良乡、坨里间设通信线一对。由北京局线桥工程队施工，1954 年建成使用。

1956 年京汉线修建复线时，刺猬河至良乡站一段线路改为复线一部分，坨里专用线的起点又改回刺猬河桥南信号所区间出岔。1959 年矿务局投资 7.2 万元，由长辛店工务段将修复时利用的 25 座小桥墩台进行加固改建，并将其中 20 座小桥扣轨梁更换为钢筋混凝土梁。

1957 年 11 月，京西矿务局为解决房山煤炭运输，提出将坨里专用线延长到磁家务的设计任务书。1958 年 3 月，铁三院提出初步设计，是年 5 月提出修改后的线路及磁家务站场施工图，线路采用沿大石河北岸绕行方案。设计运量：1962 年为 150 万吨。

主要技术条件：1 级专用线；限制坡度上行 4‰，下行 11‰；到发线有效长 400 米；最小曲线半径 300 米，特殊困难地段 200 米；钢轨每米 43 公斤工业轨；铺设木枕每公里 1440 根；桥梁荷载中—18 级；隧道净高 6 米；牵引重量上行 1350 吨，下行 650 吨；行车联络采用电话。设计主要内容：正线 5.8 公里，磁家务装车线 2 股，小桥涵 11 座，隧道 1 座长 206 米。

路基及桥涵由北京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第六工程队施工，隧道由京西矿务局分担部分施工。1958年5月开工，12月完工，1959年1月验收。铺轨由北京局广安门工程队施工，1959年5月验收，6月1日开通使用。使用投资119.1万元。

京西矿务局为解决大安山煤矿运输问题，1958年7月提出将良磁铁路专用线由磁家务再延长到陈家坟的设计任务书。1960年，铁三院提出部分图纸、资料，京西矿务局组织施工。完成2座小桥涵及2座隧道的部分工程，使用投资约200万元，1962年调整计划停工。1964年底大安山矿区复工，铁路改由矿方自行设计，1965年提出扩大初步设计，1965年至1971年由京西矿务局设计组和北京煤矿研究设计院陆续提出施工图。主要设计条件，年运量大安山矿区第5年150万吨，第10年300万吨；线路等级2级专用线；限制坡度上行6‰，下行18‰；钢轨每米43公斤；木枕；到发线有效长560米，磁家务站有效长850米；最小曲线半径250米；桥梁荷载中—22级；隧道限界为遂限Ⅰ甲，JF1（解放1）型机车；牵引定数下行750吨，上行2450吨。设计主要内容：正线15公里，站线7.5公里，包括磁家务、河南村、白草洼3个车站及陈家坟装车点；隧道5座延长2708米；桥涵53座；房屋1995平方米；通信线路5×14.6公里；信号设备3个站。由北京矿务局施工，1960年开工，1962年停工下马，1965年复工，1973年6月竣工。

根据交通部与燃料化学工业部1972年12月会议精神，大安山铁路专用线磁陈段由矿务局配套建成，良磁段由北京局进行技术改造，并移交北京局统一管理。北京局于1973年、1974年对良磁段进行技术改造，自1956年良线一直在良乡站外信号所区间出岔，现信号所至良乡间新建三线，平行京汉复线西侧，即将良陈支线引入良乡站内。主要技术条件：与大安山专用线相同，最小曲线半径300米；铺设钢轨每米43公斤；铺设木枕每公里1600根。主要工程内容：正线3公里，桥梁5座。线路部分由北京分局工程队设计施工，桥梁由天津桥隧大修队设计施工，1973年11月提出桥梁设计图，1973年12月施工。同时，对既有线路进行换轨大修，将原每米38公斤钢轨更换为每米43公斤。

1973年6月，对磁陈段工程验收。6月30日，磁陈段除陈家坟装车线外，正式移交北京分局接管，固定资产无偿移交，7月1日开通使用。1974年，磁家务至良乡段亦移交北京分局接管。从此，良乡至白草洼全部为路产，改称良陈支线。

良陈支线经 1974 年技术改造，全线铺设钢轨为每米 43 公斤，铺设木枕。以后陆续更换部分钢轨、木枕，至 1995 年末全线铺设每米 3 公斤钢轨 34.444 公里，占延展长度的 99.9%，余为每米 50 公斤钢轨 0.039 公里；铺设道岔 19 组；铺设木枕 19.981 公里，占延展长度的 57.9%，余为钢筋混凝土轨枕；线路最小曲线半径 247 米；最大坡度 17.8‰；桥梁 37 座延长 955 米，其中大桥 2 座延长 527 米；涵渠 64 座延长 1600 米；隧道 6 座延长 2891 米。

### 房山支线

房山支线自周口店石楼原油转运工业站 10 号道岔岔尖接轨，至房山县城东关外房山站 2 号道岔岔尖，全长 8.630 公里。为配合燕山石化公司新建化工厂而修建，该线与周口店支线相连。由北京石油化工厂总厂投资，北京局设计，燕山石化公司组织施工，1974 年开工，1977 年竣工，交北京分局接管运营。运营以来，线路未进行大中修，设备无变化。

房山支线铺设每米 45 公斤钢轨 6.711 公里，占延展长度的 77.7%，余为每米 43 公斤钢轨 1.839 公里，每米 50 公斤钢轨 0.080 公里，钢轨平均重量为每米 44.6 公斤；铺设道岔 9 组；全线铺设木枕；最小曲线半径 250 米；最大坡度 9‰；桥梁 5 座延长 233 米，其中中桥 4 座延长 220 米；涵渠 23 座延长 400 米。

### 周琉联络线

周琉联络线由周口店支线 201 号道岔岔尖至京广琉璃河南站 207 号道岔岔尖，全长 1.475 公里。该联络线将周口店支线与京广线相连接。由北京局勘测设计所设计，北京局北京工程处施工，1976 年开工，1977 年 4 月竣工，北京分局接管运营。

周琉联络线铺设每米 50 公斤钢轨 1.289 公里，占延展长度的 87.4%，余为每米 43 公斤钢轨 0.138 公里，每米 60 公斤钢轨 0.048 公里；该线钢轨平均重量每米 49.7 公斤；铺设道岔 2 组；铺设钢筋混凝土轨枕 1.142 公里，占延展长度的 77.4%，余为木枕；最小曲线半径 700 米；最大坡度 2‰。

### 周良联络线

周良联络线由周口店支线周口店站8号道岔岔尖至京原线良各庄站2号道岔岔尖,全长2.192公里。为解决良广线、京原线间部分车流绕石景山南站运行,1986年铁道部批准修建周良联络线。由北京局设计院设计,铁三局四处施工,1989年10月开工,1993年6月10日竣工,1993年8月17日北京分局接管运营。

周良联络线铺设每米50公斤钢轨2.154公里,占延展长度98.3%,余为每米43公斤钢轨0.038公里;该线钢轨平均重量为每米49.9公斤;铺设道岔2组;铺设钢筋混凝土轨枕1.794公里,占延展长度的81.8%,余为木枕;最小曲线半径300米;最大坡度20‰;桥梁2座延长187米;涵渠2座延长32米。



# 山区交通六十年

姜玉卉

百花山麓，大石河畔，虽不上“蜀道难”，却也是峰壑险峻，百步九折，交通闭塞，步履艰难。说起山区的路，有两种：

一是山上的路。如北窖村到房山城的古道，中途要越过千米高的大南山。这是条捷径路，免去走河套沟之险，出坨里、绕大董村之苦。战争年代，敌我双方都利用其优势，展开拉锯战。

二是河套沟的河滩路，实际是季节路。到夏季，发河涨水，木、石搭的桥冲毁，路冲成了乱石滩。正常进出受阻。遇有急事，或爬山迈岭，或冒被洪水冲走之险，凫水过河。到农历八月十五左右，各村开始修路搭桥。根据河床宽窄，石桥设二、三孔，每孔用 20 至 30 根桥木并排搭上，覆盖荆梢，再铺土。搭桥是力气活，在齐腰深的急流中，搬滚大石头；筑桥基，搭桥木，由壮劳力来干。老弱妇幼修河滩路，大石头捡到两旁，高岗铲平，坑洼填土。集体化前，每户都要出若干义务工。

佛子庄村边有四座桥，但本村只搭村西那座桥。村南两座，由英水沟五个自然村合搭一座；另一座由北窖村搭建。村东一座由黑龙关村搭建。

有了桥、路，人畜一路畅通。1953 年，曾有一辆私家铁皮篷、玻璃窗的小客车，是烧木柴，靠蒸汽做动力。从天桥来到佛子庄村，为使车能进前街，将街中央一棵三人合抱的大槐树砍倒。当客车停在街西头等客时，一位赶毛驴的过路人，见了汽车，站在车门往里看了一眼，感慨地说：“这么大的牛？要吃多少草呢？”引得周围人捧腹大笑。因山区路难行，半路常出故障，车主挣不上钱，半年后停运。此后，若干年没有客运。百姓进出山，步行或骑驴。

记得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去离家 20 里的杏园村姥姥家。母亲坐在毛驴的鞍子上，我骑驴屁股。驴太瘦，坐不牢实，双手抓住后鞍桥。父亲在驴后步行。当行程一半，在陈家台村口井旁停歇。父亲从井里打来水，我边喝边吃煮鸡蛋，人畜喝足了水，继续赶路。当时，住娘家有驴骑是很风光的事了。

第二次出远门，没有第一次幸运了。非但没有驴骑，还要像驴一样负重步

行。读小学四年级时，秋后的一个星期日，父亲让我给嫁到离本村 16 里的长操村堂姐家，送一只木箱。长操村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不敢去。恰巧后院的伯母去长操村住娘家，随其一同前往。将木箱牢牢捆在篓沿上，与伯母一路说笑，河谷虽是空旷，偶尔有来往驮煤的毛驴，或伴着驼铃的骆驼队。说着、看着，不显得寂寞，也没有了徒步的劳累感。

伯母要小住几日，我第二天还要上学，须当日返回。我很有心计，怕回来时不好问路。出发前在衣兜里装一支画石条，每当在路旁稍作休息时，取出画石，在岩壁或石上画个白色箭头，作为回路标迹。午后，告别堂姐和伯母，按箭头所指，一路顺畅安全到家，并记下长操到佛子庄有 7 个大拐弯，确认了南窖沟和大安山沟的位置，收获很大。我把这次经历写成一篇作文，老师让在班上当范文念给同学。

第三次出远门，是 1963 年，初中毕业考上了通县师范。因发洪水，通知书晚到半个月。我认为考学没戏了，于是报名参军，体检合格，批准参军，还差三天就入伍了。此时来了通师录取通知书、征求多方意见，认为还是读书深造好。那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压缩招生，考上不容易。9 月 1 日，全村一百多人为我送行。父亲举着简单行李，我举一个书包，在亲人的目送下，我们父子下水凫过对岸。然后步行 10 里，在陈家台坐上去房山的帆布篷客运大卡车。第二天教育局派专车，将我们 40 人送到通县师范学校。这是我第一次出山。以后几年，因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差，只半年回一次家。每次返校都要步行 10 里，多则 30 里赶车。等车次数最多是磁家务煤仓办公楼西侧的土路边，还有中转站阎村站。

从小在山区长大的我，出门受点苦算不得什么，经得摔打。那些在山区教书的老师们多数是城里人，往返山区、城里就不容易了。每月回一次家，如果发洪水，也许两三个月回一次。星期六中午离校，步行 40 里，从坨里坐进城的末班车，到天桥已是星光闪烁了。第二天中午启程进山，一路劳顿，夜幕降临回到学校。回家一次，满打满算，在家只待一夜半天。他们之中，有很多大龄男女青年，成家困难，个别人与当地姑娘结婚，至今还扎根山区。

过去山区教师艰苦，那学子读书如何呢？中学生大多数都要出村迈岭，最远往返要走 30 多里地。冬天，顶风踏雪，早晚披星戴月；夏天，冒险涉水，曝晒雨淋。因洪水、暴雪停课是常事。秋季，未搭桥之前，往返要趟河。就英水沟到佛子庄村这个渡口，河床窄，落差大，水流急。每年都有学生被冲倒，还有冲走几十米的险事发生。所以家长、老师早晚都顾不得吃饭，先到河边组

织学生过河。秋节河水清凉，很多学生患腰腿疼病。尤其女生，受凉造成经期紊乱，再加上当时经济困难，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使个别女生闭经，或终生不孕不育。

1959年9月1日开学了，因发洪水，课本运不进来。上级领导与房山矿协商，用高线索道，先将课本从坨里运到房山矿西区的潘楼，再由工人背到上英水小学。我所在的佛子庄小学，由10名会水的老师和30名会水的男生组成背书队伍，趟过村前齐胸深的急流，再走三里被水冲过的烂石沟，爬5里山路，过下英水村、中英水村，气喘吁吁奔向上英水小学。装好课本，按原路返回。中途又下起小雨，我们取出事先准备的油布，又脱下小褂儿苫上书。老师招呼我们走快些，怕上游雨大，河里涨水回不去。每个学生都是雨水、汗水从身上往下流，身体弱的有些透支，加上心急，腿脚不利索，被烂石绊倒，书捆掉到水里浸湿。过河时，水真的上涨了，去时齐胸深，现在已到肩头。老师挑选高个子扛书，小个子左右护驾过河。当时，我们心里恐惧不安，岸上的师生也为我们捏一把汗。往返几次，终于完成运书任务。上岸后，紧绷的心松下来，马上感到又累又饿，瘫坐在地上。

山区肆虐的洪水经常造成路毁、桥垮、车受阻。百姓遇有急事，真是急上加急。北窖村一个人病危，用担架从8里山路抬到佛子庄，一看，因上游雨大，河里涨水，浑浊的河水卷着浪花，拍打着石崖，发出骇人的山响。十几个人护着担架，下水试了几次，还是退了回来。对岸的佛子庄村民，也向他们摆手，示意不能过，只能往回抬。病者不幸在夜里就去世了。

解放前和解放后若干年，山区人民出门难，货物运输更难。落后的交通工具，道路闭塞、拥堵，制约着山区经济的发展。

山区的运输工具，主要靠人背、畜驮，马车很少。水果成熟后，大部分要运出山，卖到城市里。山区的水果成熟时节，也正是发洪水的时候。洪水冲毁路和桥，牲口、马车都不能过河。不能眼看水果烂掉，一年的收获泡了汤。唯一的办法，靠人力背。这就有了手拄歇脚拐、肩背篓筐、爬山涉水的“山背子”队伍。

负重涉水，是险事。我也有多次背东西冒险过河的体会。心情紧张，水流急，脚不稳，会被石头绊倒，被青苔滑倒，不会凫水的人，站在急流中眼晕易倒……一旦倒身，背有篓子坠着，绝对爬不起来的。我亲眼见过几十次人过河被冲倒，所幸渡口就在村边，有险情，村边的人马上去救助。轻者吓得色变语塞，重者淹个半死，头朝下吐水，有的吐出是血，那惨状，令人胆寒。

“山背子”们，首先要走几十里的烂河滩，过十几道河，到三福村。有几道河水深没人头，须屏口气潜水过。篓子是空的，篓沿放一筐八、九十斤重的水果，上重下轻，潜水易上浮，脚不着河底。因此在篓底放十斤左右的石头，才好潜水过河。

爬过三福村对面的煤岭，过北车营、上万、南北四位、王佐、云岗、赵辛店，日落到长辛店住宿。第二天，顶晨星赶路，踏上卢沟桥、过大、小井，进章仪门（今广安门），过报国寺、牛街，直奔果子巷。俗话说：“快马赶不上果子市。”此话两层意思。一是赶市的人多，一个比一个去得早；二是水果价码变化大。背夫们，吃尽千辛万苦，也许一筐水果卖不了几个铜子。午后赶回长辛店。第二天清晨按原路进山，最好结伴走。云岗、王佐野地阡陌，常有歹人劫道敛财。翻过煤岭，进入河套地界，心虽坦然，而身倦神疲，举步维艰。当月爬东山顶，过了家门口最后一道河，才大出一口气。直起酸痛的腰板，蹒跚入村，拐进胡同，迎着犬叫，推门进了已掌灯的家。

不仅如此。解放后，矿山的恢复也受到交通落后的制约。房山矿西区，要把日本时期在北窖村高线站一个锅炉，运到西区使用。当时的搬运工作，现在人都不可想象。在锅炉前30米处，钢丝绳一头绕在绞盘上，一头拴在锅炉上，人力推绞盘。锅炉如巨大的蜗牛向前蠕动。锅炉到绞盘跟前，绞盘拆掉，再向前30米重新安绞盘，如此重复前行。这个仅半吨容量的锅炉，每天只前进200多米。运到房山矿西区，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

百花山下，煤的储量有3亿吨，有千年的采煤史，但落后的一镐一筐的采煤工艺和落后的运输工具，极差的交通条件影响着采煤业的发展。1965年以前，煤炭下山、出山都是靠人背、畜驮，河滩路上有少数的马车。山路坡陡，牲畜拥挤，为煤场抢装煤，驭手间常发生口角。

1964年，京太公路（108国道）动工，几年后竣工通车。路面高于河床几十米，过河建钢筋水泥永固桥。洪水在桥下畅流，人马车辆在平坦的沥青路面上畅行。这在山区交通史上，是历史性的大转折，给山区人民最大的实惠。

交通的便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靠牲畜运输远远满足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集体开始置办手扶拖拉机、小四轮。优胜劣汰，大牲畜被淘汰，结束了人背、畜驮的运输史。集体的经济实力有限，几辆拖拉机的运力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国家运输公司的车队进山了。有的车还增加挂斗，提高运力。站在山顶往下看，公路如一条白带，路面繁忙，车水马龙，穿流不息。水果、山货、石灰、煤炭源源不断运出大山。过去，佛子庄村产上百万斤大柿子。柿子运不出，曾

在当地有用柿子做酒的历史。现在是有多多少运走多少。

改革开放后，山区煤业空前兴旺。108 国道原设计承载力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因车多路窄，出现大量车辆拥堵，成百上千辆车排成十几里车队，滞留山谷。因此政府从辛庄至贾峪口最繁忙路段开辟了复线。

为进一步方便山区人民出行，通往山区的公交线路不断扩展。原市公交线路北京莲花池发往河北的，改成从天桥发往河北支线 917；原门头沟河滩至大安山矿公交线路，改成从苹果园发往大安山矿 948 线。从良乡、房山发往北部山区的线路有 8 条。过去是乡乡通公交，现在是村村有公交。山区百姓当天打个来回去县城、去北京是很轻松的事。

# 焦庄子石子厂

刘树霖 白玉

1954年，为保障京周公路的建设，河北省良乡县生产救灾办公室建立了焦庄子石子厂。后归当时的县供销社加工企业科管理，石子厂位置在今焦庄村西的消防厂一带。

焦庄子石子厂的石子是在大石河河床上筛好后，用马车运到吴庄，在吴庄装火车运走。该厂的一些情况，我不仅亲眼所见，还亲自到这个石子厂筛过石子，当过装卸工，和我哥哥一起抬大筐往火车上装过石子。去年10月，笔者到当时的小高舍村任保明家，听曾任石子厂副书记的任保明介绍了一些有关石子厂的情况。

焦庄子石子厂虽然叫厂，但非常简陋，管理人员只十来个人。主要工作是量方、收方、发货、算帐等。生产人员主要是当地农民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管理的一些社会盲流人员，实行计件制。生产过程是人工在大石河滩把石子挖出来，用铁锹扬到斜支的约1米宽2米高的铁丝筛子上。筛去土，分出大小规格，在附近堆成方堆，由管理人员量方验收。然后用马车运到吴庄村铁路旁的货场里，火车来了，要在石子堆和车皮之间搭起跳板，由装卸人员用大筐抬上火车。装卸队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火车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干活。不管是天气好坏，刮风、下雪、下雨，都是如此。在生产量最大时，阎村镇吴庄村有两个货场，南边的小董村还有一个货场，每个货场都占几十亩地。石子经常堆集成山。为了马车运输方便，还从吴庄村北往石子厂修了一条公路。后来，又从吴庄村修了铁路分支，往焦庄子石子厂修了一条铁路。因为当地马车有限，还从其他县调来一个马车队，驻在吴庄村，专门运输石子。

生产方式虽然简单，但它确实是当时县里的重要经济项目。当时北京附近只有大石河石子厂的质量好，其他地区的石子经抗压实验都不合格。所以京周公路以及后来的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都主要由焦庄石子厂供应石子。可见其对京周公路和当时的十大建筑建设的重要性。在人员最多时，共有一千多人。运石子的火车最多时一天达八“勾”，一“勾”最少六个车皮，一个车皮可装

石子四五十吨，可见当时生产量之大。

当时刚刚建国时间不长，国家经济正在恢复期，当地除了农业，其他经济微乎其微，而石子厂的生产运行，使大量农村劳力不仅可以通过到石子厂筛石子增加收入，而且还增加了不少副业项目。一是当地有马车的家庭有了活干，增加了不少收入；二是装卸队用了大量民工，这种活需卖大力气，而且不管天气好坏刮风下雨都得照常干，但收入很高，很多人都争着干；三是除了当地马车，吴庄村还住了一个外地马车队，在谁家住都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肥料是农家的宝贝，在谁家住都可产生大量骡马粪尿，这是农家求之不得的。此外，马车队草料、饮水需要量很大，为马车队铡草、担水用了不少人，是一项很好的收入。当时吴庄村只有两口井，都七丈多深，需用轱辘绞水，是很费力气的。当时担一担水是五分钱，有时一天担个一二十担，挣个块儿八毛，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除了担水，夏天还收鲜草，村里不少人都打草去卖。

1959年，焦庄子石子厂由市建材局接管。1960年以后发生了较大困难。首先是国家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对石子的需求大量减少；二是国家清理“一平二调”（无偿占用农村土地、财产之类），场地与当地农民发生矛盾出现困难；三是筛石子的农民农闲时来，农忙时走，极不稳定，大量人员开始时是干活管饭不发工资，后来通过市劳动局解决了户口问题，但因石子厂工作太苦，大多数调到商业、工业和其他单位，用工发生了困难；四是筛石子是一种很简单的工种，因有利可图，县里其他单位也在大石河办起了石子厂。种种原因使焦庄石子厂发生越来越大的困难，1962年下半年停产，1963年关张。

# 赴大庆油田参观考察

孙奎春

1977年11月上旬，由房山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张成基带队，县农机局副局长陈礼、工业局副局长宋启贵、机修厂书记安锡铭、县工会秘书王亚光和县革委会工交组副组长孙奎春一行六人，前往大庆油田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考察。

当我们乘坐火车进入千里油田之后，只见一望无际的“磕头机”间距统一、整齐有序地布满松辽盆地，形成一道靓丽而宏伟的风景线，堪称全国第一。到大庆之后，根据油田接待处的安排，我们首先参观了大庆展览馆，讲解员热情地为大家讲述了大庆的创业史。

1959年9月，在黑龙江省境内松辽盆地大同镇“松基三井”，发现了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1961年1月，石油部党组决定集中石油系统的力量，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外技术封锁，“大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三年多的石油会战，共探明面积达85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从而抛掉了“贫油国”的帽子，结束了靠“洋油”过日子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石油自给。同时，完成上缴利润10.6亿元，除收回投资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

讲解员还饱含深情地讲述了铁人王进喜的先进模范事迹。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是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的杰出代表。早在1958年9月，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的称号。1960年3月，他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发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结束“洋油”时代而顽强拼搏。当时生产条件十分简陋，可以说白手起家，他们使用“人拉肩挑”、“盆端桶提”等土办法，奋战3天3夜把井架树立在草原上。打第二口井时，突然发生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王进喜即用水泥代替。没有搅拌机，他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泥浆池里



用身体搅拌，经全队工人的奋战，终于将井喷治服了，因此被人们誉为“铁人”。这时，讲解员提高了音量，非常自豪地说：“铁人精神是我们大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讲解员强调指出，大庆油田会战的先进事迹，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等先后多次到大庆视察、指导工作。中共中央于1964年2月5日发出“工业学大庆”的通知。

大庆人艰苦卓绝的创业事迹，对大家启发很大，教育深刻。在大庆生活的日子里，如果稍加注意，大庆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待人接物等方面，处处是那样与众不同，可以从比较中看到差异，受到教育。大庆是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优秀榜样，大庆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庆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太丰富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重点学习了大庆严细管理、岗位责任制和技术练兵等方面的经验。

我们住的招待所等建筑物外墙，都抹了一层厚厚的花秸泥，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从远处望去好像当年的“干打垒”。然而室内却非常明亮、清洁、整齐，被子都叠成“豆腐块”，如同军营一般。服务规范化，细致入微，不亚于五星级酒店。当我们参观回来之后，服务员将开水、洗脸水准备好了；晚饭后陪同参观人员亲自上门问寒问暖，讲解当年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身先士卒带领大家艰苦创业的故事；睡觉前服务员又将洗脚水送到每个人的床边，使人感到如同到了家一样方便舒适，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宾至如归”。大庆的餐厅也很有特点，餐桌、椅子和餐具的摆放整齐有序，从正面或斜角看都成一条线。粗粮细做，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菜蔬还比较丰富。当时室外已飘雪花，然而每天都有四道自制凉拌小菜，清爽可口。

大庆人善于用辩证法解决生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把生产上千万件具体工作落实到成千上万人的身上，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不断完善岗位责任制和规章制度，实行量化考核，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将数以万计的人组成一台动作有序、协调统一的“大机器”。与此同时，大搞技术练兵，掌握过硬本领。我们先后参观了钻探、采油、设备维修和后勤服务操作表演，可以说各有千秋，最令人称奇的是仓库管理员，一个人管一个大仓库，里面整齐有序地摆放上千种材料，每天收发料，检斤过称，记账等十分繁忙。保管员可以不看账本，准确无误地说出各种材料的库存数量，以便及时进料，确保合理储备。他们为了防患于未然，苦练基本功，可以将双眼蒙上走几十米到货架上取出所需物品。此事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连续参观了几个库房，结果同样过硬。

参观学习结束之后，张成基组织大家座谈，研究回县后如何贯彻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大庆油田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两论”起家，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二是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建国的方针；三是学习解放军，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良好作风，造就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过硬职工队伍；四是大搞技术练兵，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临行前，我们与朝夕陪同参观的大庆朋友合影留念，依依惜别。为了争取时间，王亚光不顾疲劳，在返京的列车上赶写汇报提纲。回到县里之后，立即召开了工交系统局、厂矿领导干部和职工代表近千人大会。会议由主管工交财贸的县委副书记梁钧华主持，张成基传达了大庆见闻，他用生动具体的典型事例论证了大庆精神及其基本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部署了深入扎实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与会人员受到很大震动，一个学大庆见行动，学“铁人”做贡献，开展“比学赶帮”，厉行增产节约的活动，在工业、交通、邮电、城建系统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建设和服务工作。

# 解放前的房山浴池

魏志华

解放前，房山县城内有两个小浴池，都建于 1930 年前后。这两个浴池当时是全县仅有的浴池。

这两个浴池，大一点儿的称“庆丰池”，在东街仓房胡同，即后来的房山宾馆锅炉房的西北角，由房山城内北街的索贵所开。院内有房屋 20 多间，洗澡休息的床位有 40 多个。浴室有两大间，内有两个池子。一个是烧水用的热水池，里边有浴池专用的耐高温的大锅，安装在水泥池内。另一个是洗澡用的温水池，有 10 多平方米。因当时房山还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所有的工作都是靠人工操作。在浴池的外边打了一眼大井，安了两把辘轳，两个人同时打水。井台上垒了一个较高的水池，水池上安了一个水管，通到热水池。在热水池外边的大锅下边，垒了一个大灶，长期生火。用的都是上等的煤块，每天用 200 多斤。早晨把火打开，晚上把火封上。生火不仅烧热水，而且洗澡用的温水池下边有地炕，用方砖垒的火道，与烧热水用的大灶相通，保持洗澡用水温度。浴池的管理人员共有五六个人，掌柜的索贵兼管财务。除洗澡外还可以理发、修脚、搓澡。洗澡每人 1 角钱，搓澡、理发各 2 角钱。修脚、搓澡的都是从河北省定兴县请来的。浴池内有一般间和雅间。一般间设备简陋，休息的地方没有床，是木板做的大连铺，上边铺着席，只有木板拖鞋。洗澡间有几条毛巾，大伙儿轮着使。肥皂、毛巾是自己带。雅间比较讲究，有单人床，喝水用的小桌子。浴池内有开水，茶叶可以自己带，也可以从浴池买。浴池内备有“庆和春”（房山县城内较好的茶叶店）的各种茶叶。因为当时洗澡的多数是县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因此浴池到晚上 10 点多钟才关门。如果洗澡的人呆的时间长，需要吃夜宵，浴池的伙计还可以到街上去买，服务很周到。浴池内没有伙房，伙计家在县城附近的，回家吃饭。外地的伙计自己做饭。

由于没有淋浴，洗澡都在一个大池子里。所以洗澡的池子里水很脏，经常飘着肥皂沫。水太脏的时候，浴池的服务人员就用竹板往边上推，再用盆子撇出去。每天晚上关门前再把池子的脏水放出来，第二天早晨再换上新水。

另一个浴池在西街营房胡同北口，原县武装部的对面，规模较小。掌柜的是西街的吴国贤。共有 10 多间房，20 多个洗澡的床位，五六个管理人员。条件和管理办法与东街的“庆丰池”大体相同。

虽然房山城内浴池较少，规模又小，但夏季和秋季天不冷的时候，洗澡的人并不是很多。经常洗澡的主要是当时县里的机关工作人员、军人、工商业人员及城内比较讲究的居民。一般群众洗澡的不多，一是受生活条件的限制，舍不得花钱洗澡。另一个原因是那时雨水多，大部分家里都有井。而且河水也比较多。县城东、西沙河常年有水，县城东边有大石河，南边有马刨泉，水深一米左右，夏季有二三米深。水很干净，清澈见底，随时都可以洗澡、游泳，也比浴池的水干净。

到了冬季，家里太冷，县城附近的居地，农民到浴池洗澡的就多一些。但那时只是男的，没有妇女洗澡的时间。到每年春节前，按照习俗，都要干干净净的过年。县城和县城附近的农民，有条件的都要到城内洗澡，所以春节前洗澡的人特别多。春节前半个月，每天要洗澡的要起五更排队，有时要等一个多钟头。不仅在外边排，到屋里还要排，池子里只能容纳 10 几个人，在池子里人挨着人，非常挤。

解放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浴池洗澡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房山中学的住宿生，每个星期各班都轮流去洗澡，而且每个星期五下午，女同学去洗澡。这一天，浴池由服务人员的家属到浴池去管理。有些学生到浴池洗澡都觉得很新鲜，在浴池里说话回音很大，有点像用麦克风的感觉。所以一到浴池就使劲地唱歌。

1958 年，房山、良乡两县合并，改为周口店区，划归北京市，不久就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区服务公司在南街（现在的冠华商场南侧）建立了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新的房山浴池，有 200 多个床位。不仅有温水池、热水池、淋浴，还设立了搓澡、修脚、盆塘的单间。理发室的规模也扩大了。因此，经营了 30 多年的房山浴池改作别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五十年前的“麻雀战”

姜玉卉

回顾 52 年前那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从中央下指令，到全国总动员，各地逐级实施，其规模、声势不亚于解放战争时的“三大战役”。

1955 年，毛泽东主席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 年 1 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 27 条规定，从 1956 年起分别在 5 年、7 年或 12 年内基本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1956 年秋，在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与会者认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决策，大多数缄口不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会带来农业、林业危害。举例说 1744 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于是下令悬赏消灭麻雀，很快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了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但专家反对消灭麻雀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将麻雀列入“四害”之一，彻底消灭之，依然成为“国策”。

1958 年 3 月至 5 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消灭麻雀。进而在“大跃进”中，要下决心打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从 3 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负责人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准备，万众一心，城乡协力，一场消灭麻雀的特殊战斗在全国各地开始了。

笔者亲身参加了北京全市发起的连续三天的消灭麻雀大战役。在 4 月 19 日、20 日、21 日三天，全市沸腾了。采用了“轰赶、打、毒、掏堵”综合方法向麻雀发起了攻势。

所谓的“轰赶”，就是清晨 5 点钟，男女青壮年、师生、乡村两级干部带上水和干粮，到村庄四周的山梁上，摇旗呐喊，放鞭炮，敲打锣鼓、脸盆、水

桶、铁片等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山涧河谷间回荡，俨然一场巨大的交响乐，震人心魄。妇女、老人、小孩，在各家院落、门口、街旁坚守岗位，同样敲响器轰赶。小孩子更是好奇，用筷子使劲敲着自己吃饭的搪瓷碗，边跳边喊：“老家贼快下来”。当成群的麻雀飞到村中最高的大槐树尖上，“二踢脚”腾地窜上树尖，一个炸响，麻雀吓得四散，有几只滚落地下，小孩子拿着笤帚，荆梢一阵扑打，麻雀成了孩子手上的猎物。很多麻雀就惊魂不定，疲于奔命，喝不上水，吃不到食物，疲惫至极，纷纷坠地身亡。

所谓的“打”，是在离村子稍远处，设置火枪歼灭区，火枪手各有岗区，分散隐蔽，有成群的麻雀来到岗区，枪响雀落。还有中小学的男同学，三、四个人组成弹弓组，这是发挥他们特长，施展本领的机会。自制弹弓，人手一枚，从河滩捡来玉米粒大小的圆石子当弹丸。像打游击似地，行动轻捷，隐蔽在树下，地头的树丛中，饲养场的草垛旁，见到栖息的麻雀张弓飞弹，打死的麻雀用麻绳拴好，到学校统计成果，评选消灭麻雀先进班集体、先进小组和先进个人。在整个消灭麻雀的战斗中，中小學生表现出了空前的积极性，尤其那些平常淘气、学习差些的学生，在灭雀运动中有了成就感、满足感。

所谓的“毒”，是在距村子更远些的“安静”处，放置毒饵。被轰赶到此处的麻雀，认为安全了，又见到有食可吃，没想到这是人类对它们最损的绝招。巡视员发现，除了麻雀被毒死外，还有喜鹊、乌鸦、啄木鸟等野鸟也同时被毒死。又考虑羊吃了也会中毒，后来停止投放毒饵的灭雀方法。

所谓的“掏堵”，到了晚上，白天幸免的麻雀回了窝，村干部组织民兵、团员、中学生，带上手电筒、梯子，到屋檐下、墙洞、树洞、饲养室、牲口棚掏堵麻雀，一晚上掏堵上百只。拿回家用湿泥裹上麻雀，放在炉堂里，等湿泥烧干，里边的雀肉也熟了，蘸上椒盐美餐一顿，香极了。

城里与农村统一行动。市区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公园、机关、工厂、学校、庭院、空地、路旁都布置岗哨。机关干部、工人、市民、师生、部队官兵各守岗位，不停地敲着响器，此起彼伏地呐喊，心惊异常的麻雀乱闯乱飞，无处可栖，累死纷纷落地。有的晕头转向，竟一头撞在楼窗玻璃上，撞个半死，扑啦啦摔到地上，一命呜呼。

据统计，全市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道，文章中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动人的奇迹。”

麻雀经此劫难，几年后，不管城市还是乡村，很少再见到麻雀的身影。

不科学之举，必然付出代价。我们“惩罚”了自然，早晚要受到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天，很多地方的树叶几乎被虫害吃光。这就给生物学家强烈要求给麻雀“平反”有了理由。给麻雀“平反”的建议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法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并随《报告》还附送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至此，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了，也算给麻雀“平反”了。

# 我家六十年住房的变迁

姜玉卉

过去有一句俗语：宁要城里一张床，不住农村三间房。说的是城乡生存、生活的差别。我的父亲年轻时，从山区向城里倒腾核桃、杏仁、花椒等山货，和母亲的日子过得滋润。并在章仪门（广安门）内王子坟胡同（广仪街）置了一间房产。到日伪时期，社会动荡，街面上不消停。母亲也是山里人，过不了不安宁的城里生活，回了山里佛子庄村老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我在抗战胜利的欢庆中，降生在一间7平米的小屋子里。1946年，房良涿联合县政府驻到了佛子庄村，父亲入了党，因有些文化，担任了村支部的宣传委员兼粮秣主任。工作组劝父亲不要再去城里做生意，父亲听从了组织安排，处理了城里的房和生意，安心做村里的工作。

没想到，这一做就是一辈子，直至1990年在老家去逝。如今，我也是60多岁，退休在良乡享受优质生活。2001年，我从河南中学家属院乔迁良乡商品楼房那个夜晚，思绪万千，夜不能寐。

历史的沧桑，不堪回首。当初我家那间小屋7平米，土炕很窄，父亲1.75米的个头，竖躺腿伸不直，只好斜躺。母亲生了两个妹妹后，小炕睡不下了。父亲在炕上紧贴后墙搭了一个木板床，父亲睡在上边。我开始睡地下，用小坐柜和一个土改时分的椅子，锯去靠背和扶手，拼起来当我的床。夏天好对付，冬天，铺的、盖的单薄，地火用湿煤一封，屋里冷得如冰窖。挨窗的水缸都结了冰，身子像虾一样蜷缩着，不敢脱棉衣、袜子。浑身长满虱子，它们也怕冷，一个劲地往大腿根儿、胳膊窝处钻，又冷又痒，手不住地抓挠，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偶尔不小心，就会滚下地掉在木质的炉坑板上。

母亲生了弟弟后，我上了小学，开始在同学泽立家的一间耳房睡。我俩一起上学、背煤、背土，一起写作业，一炕睡觉，形影不离。不久，他家一位四十几岁的亲戚，来村里给人理发，和我俩睡在一起。三人躺在炕上，每人讲一个故事，他家的亲戚故事讲得生动，我俩从中得到很多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

三年级时，本家族的一位老奶奶去世了。老爷爷的视力、听力很差，他的



儿子在大台煤矿工作，每月回来一次，儿媳也是多病缠身，父亲让我跟老爷爷一起睡，帮助他端煤、添火、早晚提夜壶。

四年级下学期，老爷爷也去逝了，我又与泽立在一起睡了一年。快升六年级时，同学兆龙的母亲，让我跟兆龙一起睡，晚上帮他补习功课。不久，同学少安也掺和进来。在兆龙家的小东屋，仨人很少安心学习，搜索枯肠找点子玩花样。兆龙的伯父是木匠，做了一个木猫（长方体的一个倒憋子），我们支好倒插门，轻轻地放在桌下墙角的鼠洞口，然后在大街上玩捉迷藏，大约过了半小时，回屋一看木猫的石板门真的放下了，憋着一只老鼠。

兆龙的父亲当时在县公安部门工作，休假回家手枪也随身带。一天他抱着手枪午睡，兆龙说拿他父亲的手枪让我俩看看。于是悄悄地推开一扇门，蹑手蹑脚地走近炕沿，手刚碰到手枪皮套，其父就机警地醒来，起身。迅速抓起炕边的笤帚，照着兆龙打来。兆龙也机灵，闪电似地转身飞出门槛，笤帚打在门板上。吓得我仨跑出院子，身后传来兆龙父亲的吼声：这是随便动的？

上中学后，我与本族一个单身叔叔在一起睡觉。叔叔有个爱好——结网钓鱼。晚上，叔侄俩坐在炕桌边，一个写作业，一个织鱼网。有时我写完作业，帮叔叔织网，觉得很好玩。织网是个细致活、慢性活，能磨人的性子。我还学会了用竹片做织网的梭子和确定网眼大小的制子板。

一次叔叔去下夜网，走之前总想着用几块网、几指大的网、到哪儿下网等问题，就没想到给我撂下钥匙。结果我背着书包走到他家门前，吃了闭门羹。知道他下夜网去了，到河边转了个够也没见人，我估计他去了黑龙关了。趴在碾盘上写了几笔作业，天就暗下来。于是，枕着书包，仰望天空数星星，打发时间等叔叔，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半夜里，任村支部书记的父亲从大队部散会回家，看到碾盘上躺着一个人，上前扶起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眼泪流下来，滴在我的脸上。他可能是想，我堂堂 600 多户大村的支部书记，整天为村民的生产、生活忙乎，为多少社员盖房操劳，可我的儿子却睡在冰凉的碾盘上，于是流下辛酸的眼泪。我突然醒来，急急地说，书包，我的书包，下雨了。当彻底醒来一看是爸爸，这时，叔叔也提着鱼和网回来，果真是去了黑龙关。叔叔把鱼给父亲拿回去，叔侄俩开门睡觉。第二天晚饭我端上焖酥鱼和两张玉米饼来到叔叔家，饱饱地餐了一顿烙饼裹小鱼，可惜烙饼不是白面的。叔叔说，要想吃白面，要好好学习，考出去，当工人（社员把挣工资的都叫工人）。

1962 年春天，公社党委书记康福权到我家，问我父亲家里有地方盖房吗？父亲说东边两间地基是祖上留下的，残垣断壁，入社前当毛驴棚用，现在是猪

圈。于是，康书记对其他村干部说，你们帮着盖两间房吧，六、七口人一间小房，孩子都起来了，好几个都在外边找地方睡，不是事儿。

在多方帮助下，七凑八凑，一切从简，在1963年暑假前，两间新房盖儿冲下了，还没来得及安门窗。我考上通县老师范学校，离开家去求学，结束了九年串房檐睡觉的历史。半年后，寒假回家，父母们已住进了两间新房，那一间西房成了我的栖息地。虽然在盖新房时，我上山砍椽、背石板、窗台石、装修木料等，很多零碎活是我背背挎挎默默地干，但新房我没住过一天。尤其与两个弟弟，每天一锅吃饭，饭后我上学、回家干活，晚上到外边睡觉，与他俩没在家一炕上睡过觉，又加上年龄差距大，情感交流少，至今之间仍像客人似的。我在通县念书，半年回一次家，工作后，回家也少。

1970年我结婚就在西房里。结婚一个月后，父母考虑我下边弟妹多，让我另起炉灶单过。几年后，有了三个孩子，七平米的小屋又开始重演我童年时的戏了。生产队分了粮食，一个小坐柜只能盛二百斤左右的玉米，余下的分装三条麻包放在炕边，占一个大人睡觉的地方。一半白薯放在我自己编的荆条囤子里，占地下三分之一，另一半没地方放，只好切片晾在房上。冬天，棉被、脱下的棉衣都拥在炕上，几个孩子挣炕，少不了吵嘴，每天晚上吓唬大的，哄小的。小炕窄，我为了能伸直腿，在地下放一个方凳，上边再放一个小板凳，与炕沿水平高，枕头放到小板凳上，勉强伸直腿，这样对付了12年。

1981年春节，我邀几位同事、同学到家聚会。屋子转不开身，只好在东屋父母住的两间屋里。酒过三巡，有人向我提意该盖两间新房了，我说想都不敢想。五口之家，加上两位老人，56元的工资月月光。年底的粮食钱，除去爱人一千多工分，还要差七八十元，东摘西借给生产队补上，咱不能欠集体的，影响农民决算，农民一年见一次钱，更不容易。没有积蓄，盖房谈何容易。

后来决定，先批地基。当跟村干部一说，没想到干部非常支持，并说我早应该盖房了，下边弟妹好几个，都长大了，将来成家没房还行。有了地基，开始备料。求朋告友，东摘西借，通过这次盖房更感到人生之艰难。从小读书，从学校出来又到学校工作，过着半封闭生活，书呆子气，对社会了解甚少。这回是为自己事第一次求人，深知求人之难。

在单位、生产队、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终于凑齐了建房材料，支起了三间“风狗檐”石泥墙、石板压顶的房子。瓦房那天我请了假，心里欣喜，口中说，当房盖儿冲下了，下雨也不怕了。晚上收拾杂物，忽然想起明天应到房山中学参加中文大专函授班最后一科外国文学考试。站在新房前，大脑一片空白。这

些日子，除了到校讲课，下班回来操持建房之事，早把复习、应考忘到脑后了。前五科都考得不错，心想这最后一科非考砸锅不可。于是，叫爱人快做晚饭，饭后看看笔记。衣服上全是泥点子，也没有替换的衣服，洗了明早干不了，只好搓搓泥点子，再用刷子刷一下。吃完饭，一是体累，二来心烦意乱，翻开笔记，内容多，也不知看什么好，索性不看了，等着补考吧。第二天，骑着自行车一头扎到房山中学，草草地应付了考试。出乎意外，得了66分。

房立起来了，活计还多得很。为了省钱，自己就要付出体力。安完门窗，用碎木料拼做了一张床，五口人没法睡，就地取材，在里间屋搭个土炕，又省钱又实用。我从没见过瓦匠搭炕的活，自己利用暑假，边干边想，还画了个图，4天时间，楞把土炕搭起来了。而且地火旺、省煤、炕热，还安了温水缸，发明了不用炉坑架就能铺炉坑板，不下炉坑就能掏煤灰的窍门。

1983年春，是我一生最累的日子。在河南中学，担任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还有党支部宣传委员、语文组长的工作。家里分的七亩地要种上，新房四周100米长、两米高的院墙应垒上。垒院墙的几十方石料，是我利用假日，像愚公移山那样用铁撬棍、8磅大锤从山跟挖出来的。这些力气活，凭我一个书生的筋骨，岂能吃得消，真是腰酸肩膀疼，抡起大锤破石，震得虎口发麻火辣辣地疼。爱人和孩子也动员起来，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将石料背回。有时不小心，脚不稳绊倒，石料从头上滚下，险些砸伤脑袋。划破手流出血是常事，找块布裹上，继续干。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够垒三四层的时候，我自己挂线垒院墙。一年后，院墙大功告成，梁文宝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给我弄来一副栅栏门安上。房后栽上香椿树，西边的厕所、鸡窝、猪圈齐全，有两分地的蔬菜园，大柿子树的横枝上还给孩子栓了个秋千，窗下种植了花草，一派田园景象。看着孩子们在宽敞的院子里跳皮筋、荡秋千，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与老家那七平米的小黑屋比，真是天壤之别。

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但它是1200元债务换来的。学校为解决我家的困难，安排我爱人到学校食堂工作。当时，小女儿只有4岁，只好带着她，爱人与小女跟教师在女集体宿舍住，我在男集体宿舍住。爱人早晨起得早，影响其他教师睡觉，女儿起床也没法照看，领导又把我们三口调到一间宿舍。但家中的两个女儿又成了问题。大的上初一，二的念小学五年级，独门单户，院里栓只狗给她俩壮胆做伴。整天吃煮挂面，放学后炉火熄灭，就只好啃饼干喝冷水。吃水要到房后河滩的大井用轱辘打水，极不安全。我买了一个盛6担水的缸，假

日给挑满水，让她俩用一星期。冬天，把门上的窗户支起半尺宽的缝，千叮咛万嘱咐，决不能放下来，冷点不怕，冻不死，要是中煤气可就见不到爹妈和妹妹了。

我工作不紧时，就骑车回来看看孩子。有几个星期六，我和爱人中午骑车回家，到村口，就见到两个女儿站在马路边，盼望父母归来。进屋一看炉子冒着凉气，两个女儿还没吃午饭。看到这情景，我落了泪，不想让爱人干了。自想，为了什么呢？让孩子受这样的苦。可又想，不干，什么时候还清债务？背债的滋味不好受。

学校领导体会到我的难处，破例在家属院分给我两间房。将家搬到学校，孩子在父母身边，得到了呵护、照顾。这一住就是16年。在此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家也是日新月异。首先，还清了债务，无债一身轻。其次，爱人和孩子转成城市户口，爱人转了正，由临时工变成国家正式职工。我晋升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孩子相继大学、中专毕业、工作。衣食住无忧，迈向了小康生活。

2001年，手头有了3万元积蓄，我大胆贷款买了商品房。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说我真敢干，10万元贷款什么时候能还上？没成想，教师工资涨得快，计划10年还完贷款，提前5年就还完了。文章开头提到过去的俗话，宁要城里一张床，不住乡下三间房，如今我全家在良乡居住一百多平米，三室两厅一卫的楼房了。

2005年，我退休了。回顾几十年在山区执教、生活，三次乔迁的变化，真不容易！我常说，如今享受城市优质生活，足矣！知足常乐。但永远不能忘过去的苦日子。对年轻人来说，吃苦是财富。年轻吃苦不算苦，老了吃苦那真是苦。

# 我区农村的用火

刘树霖

用火在现在已经是平平常常、毫不为人注意的问题，但是在解放前直到解放初却是直接关系农村日常基本生活的事情。对此，我小时候的所见所闻所干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 击石取火

解放初，我区农村做饭、取暖，主要是烧柴。夜晚照明是点煤油灯，不少人还要抽烟，用火是日常生活必需的。那时没有电，没有打火机，火柴虽然有，但非常紧缺，而且就是有，由于群众生活水平低，也舍不得花钱去买。不少人、不少家庭是用击石取火来解决问题的。这种情况会抽烟的尤其如此。

那时，抽烟人身上往往带着三件东西，一个是旱烟袋，二是装烟叶的烟荷包，三是火镰。火镰是一块五六厘米长三四厘米宽的矩形生铁片，上面打几个眼，装一个皮或布的小袋，里面装火石和火绒子。火石是从野外找的带颗粒状闪光的石头。火绒子是用艾蒿和棉花一起捣烂晒干做成。抽烟时，先装好烟叶在嘴上，然后把火绒子放在火石上，用火镰使劲击打，火星碰到火绒子就着了起来，把打着火绒子放到烟锅上就抽了起来。那时，抽烟时往往几个人在一起，一个人抽着了，再把烟锅扣到另一人装满烟的烟锅上。以此类推，几个人打一次火就可以都抽上烟了。

烧柴有时也用这种办法，烧火前要先预备点烂棉花和容易引着的草叶，用火镰打着火绒子后放到烂棉花和草叶上，用嘴使劲吹就可以着了。听起来，这种办法比较原始，但在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是我区农村不少人一直使用的办法，也确实对农村的基本日常生活起过不小的作用。我小时候就经常看着大人这么做，觉得很有意思，也曾学着做过。办法是找块铁锅片或犁铧片当火镰，找些烂棉花，从野地拔些一种叫落落菜的野菜放在一起捣烂，晒干做成火绒子，从野地找来火石，学着大人打火镰的办法使劲击打，有时还真能打着。

## 一火多用

由于取火困难，火柴缺又舍不得花钱买，而每天又必须烧柴做饭或取暖，晚上要点灯。有些人还要抽烟，人们经常采取一火多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前面提到的多人一起抽烟是一种情况，最多的还是用点火棍的办法，冬季不少家里都要生一个煤火炉取暖带做饭。烧火、点灯、抽烟时，就用点火棍从煤火上点着了，拿点火棍去烧火、点灯或抽烟，做到一火多用。点火棍最多的是用玉米秸或麻杆。玉米秸又粗又重又不光溜，麻杆又细、又轻、又光溜还爱着，人们都爱用。那时人们生活用绳子做鞋纳底用的麻，好多是自己家种麻拧绳，搓绳，剥去麻皮的麻杆，人们往往存着当柴烧或做点火棍。那时，人们家里墙角或炕边往往放着这种东西，点火时顺手拿过来就用，很是方便。

## 火种的保存

取火既然困难，人们往往采取保存火种的办法。

农村野地里蒿子很多，到了秋季蒿子打籽成熟后，把其割回家拧成绳挂在房檐下晾干，这种东西叫火绳，点着后就不灭，有的家庭往往利用它这个特点保存火种，把火绳点着后放在家里，什么时候需要火就可以用它点。火绳不仅点着不灭，还有一种香气，很好闻，但蚊子却怕它。那时人们夏天对付蚊子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晚上睡觉时，点上一根火绳放在屋地，对驱蚊很有作用。秋天到野地割蒿子和拧火绳，我小时候就干过。

# 下英水村抗旱的回忆

李志国

1947年6月初，芒种节已过，下英水村久旱不雨。路边刚探头的小草枯黄的趴在地上，山上的荆柯无精打采蔫头耷脑。旱风儿刮起的尘土像条巨大的黄龙飞卷地老高老高。昔日有名的英水河干涸了。百十户人家的喝水仅靠村南虎山岩下一个小山泉排队等水生活。旱灾给这个靠天吃饭的小山村的百姓造成了很大困难。

“民以食为天”。天旱无雨，地不能种，百姓的生活怎么办？不打粮食又怎么支援解放军在前方打胜仗？干部和群众心急如焚。正当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时任良乡五区区长许德民和爱人背着铺盖卷急匆匆的来到下英水村，找到村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抗旱播种对策，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决定：以党员、民兵为骨干，成立变工队，背水抗旱。很快组织起30多人的变工队。然后又发动群众将杀猪用的大锅、盛水的大缸盆，背水用的木桶、水筒等能够利用的所有运装水工具都动员出来，投入抗旱播种之中。

当时的下英水村尚未进行土地改革，一些土质好、产量好的好地，全部在地主家手里，区长许德民与村干部商量，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他指出：节气不等人，不管谁的地，先抢种上，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多打胜仗，解放全中国，这是大事。

抗旱第一天，先从种穷人李久长的地开始，接着就是种富人的牛角大地和于家大地。这些好地都在村西北，距村南有两里多路。背抬水要经过上下陡坡等多处险路。最险的一段路要数名叫“大坎子”的盘崖路了。先辈们为了开垦大台一带的好地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在那十几层楼高的悬崖峭壁上，用河卵石垒砌出四段盘崖路，最陡的一盘坡度约有六七十度，宽度不足一米。路经此处，人们提心吊胆，稍不留意，就有掉下悬崖的危险。攀上一百多米的险路，还要经过约三百多米长，五十厘米宽的羊肠小路，方可达到那些好地。

取水难，路艰险，旱情重，为防止窝工和发生意外，在许德民的亲自指挥和精心安排下，对变工队和参加抗旱的人员做了细致的分工，年轻力壮的男同

志都参加背水，女同志参加抬水。为了不耽搁时间，背抬水的人到地里后，把水倒到事先准备好的大铁锅和大缸盆里，倒完后就再去背抬水。选择有种地经验和体弱者招坑、提端水、浇水、点籽、埋坑。整个抗旱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

那时，解放区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的不发达，又加上敌人在坨里一带的封锁，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只好靠祖辈传下来的木桶背水吃。背水的木桶大小不等，一般装七八十斤水，而桶自身的重量有二三十斤重，一桶水都在百斤左右。可许德民和爱人每天都抢大木桶背，抬重担，不怕苦累，肩膀压红肿了，脚打炮了，干部和群众多次劝他们歇一歇，他们却说：“快点把地种上，军民有饭吃，这是天大的事，等把地种完了再歇着吧。”当时他的爱人已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开始干部安排她干些浇水点籽的活，她婉言谢绝了干部的好意仍和妇女同志一起去抬水。每次走大坎子那段险路时，她都抢重的哪一头抬，把轻的那一头让给群众。群众很受感动和鼓舞。大家的抗旱热情非常高涨，在背抬水往返的路上，有人还高喊着“加油干！加油干！多背快跑是好汉！慢慢腾腾是稀泥软蛋”的口号。

前者呼，后者应，你追我赶相互支持互相鼓励，背水抬水的队伍行进在悬崖峭壁和弯弯曲曲羊肠小道上，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长龙。收工时，人们还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豪迈激昂的革命歌曲，嘹亮的歌声在下英水河谷回荡。

许德民坚持与群众一起共同抗旱，直到把村里的几十亩好地都播种上了玉米，他们才离开下英水村。

不久，政府又派来了土改工作队，七月份土地改革时，把财主的土地大都分给了贫下中农。我家也分得了六亩地。大旱之年，获得了大丰收，我家破天荒第一次收获粮食两千多斤，除了交公粮外，有了余粮，还养了一头大肥猪。从此，我家和解放区的广大贫下中农一样过上了幸福生活。

岁月飞逝，弹指一挥间。许德民在下英水村带领群众抗旱的那一幕，已经过去 63 个年头了，可他们的精神一直留在百姓的心中，也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 清宫御酒“菊花白”的发掘与传承

赵润东

中国白酒，是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它与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金酒、朗姆酒并称为世界著名六大蒸馏酒。每当人们谈起酒的话题时，自然会联想到中国酒文化的历史。中国白酒，酿造历史悠久，所产佳酿，各具特色，沁人心脾，令人陶醉。而北京南城房山区长阳镇的北京仁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所酿造的菊花白酒，则是明、清时期供奉宫廷的御酒之一。作为宫廷御酒，绵爽清冽，香醇宜人，流传至今，深受欢迎。

所谓“御酒”，一是指地方名产，曾经贡奉给宫廷饮用；二是指宫廷御酒房所制，专供帝王独自享受。据考证，明清时期，宫廷内设有“御酒房”，专制各种配制型高档滋补酒，廷外不易得到。其中一种为配制酒，即选用优质白酒，配以中药或花果浸泡、蒸馏而成。菊花白酒，就是明、清时期酿造的一种滋补药酒，也是正宗的宫廷御酒。根据《北京风物散记》和《北京老字号》等书记载，以及仁和酒店后人所述：“道光年间，为精简宫中靡费，遣散了部分宫娥太监。为其生活所计，将宫中部分日常耗用交与他们采办制作，按时进奉，赐予赏银。三个老太监在西什库开办了仁和店，专为宫中酿造御酒，也代办官中所用油盐酱醋，香蜡纸马等物，由此把清宫的御酒工艺带到了民间。慈禧修建颐和园后，仁和店也随之迁往海淀。清亡后，仁和已传给甄氏，专以本钱较小的制酒为业，取名仁和酒店。由于原来的御酒原料成本高昂，又秉承宫内‘秘不示人’的传统，随着贵族文化的衰落，酒店生意也日渐萎缩，仅以莲花白酒勉强维持，1956年公私合营后改作内部食堂，酒店传人下放西山劳动。”

1959年，仁和酒业技师刘文启承袭清宫御酒酿造工艺，做出1000斤莲花白酒向十年大庆献礼，立即引起社会反响。随后，时任北京葡萄酒厂厂长任玉玺按图索骥，取得莲花白酒技术，1962年该酒在广州交易会上隆重推出，引起海内外轰动，被誉为“酒中之冠”。1981年北京长阳酒厂与仁和酒店传人甄富荣先生合作，酿造出菊花白酒，后经市政府批准，长阳酒厂易名为仁和酒厂。”此后，莲花白酒从京城淡出，改由外地生产，档次骤降；而仁和酒厂的

菊花白酒则断断续续、时产时停。值得庆幸的是，2004年，仁和酒厂再次盘活，菊花白酒传统酿造工艺便传承下来。

菊花白酒作为宫廷御用的琼浆佳酿，有什么特点呢？其中的菊花又与白酒有什么关系呢？提起这些，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菊花的药物作用。古人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栽培与应用菊花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以白菊花和黄菊花最为常见。中医学认为菊花性辛，味甘苦，微寒，具有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疏风清窍的作用。以菊花为原料配制的中药和药酒对人体十分有利。菊花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菊的头状花絮，不论作为食品或药用都是应用广泛的植物，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菊花中含有胆碱、氨基酸、维生素及挥发油等多种成分，具有显著扩张冠状动脉，增强冠状动脉血流量，以及抑制肝脏中胆固醇的和成和加快胆固醇的分解代谢、抗炎解热等多种作用。特别是春温乍热、肝火偏盛的春末夏初。

菊花历来被视为孤标亮节、高雅傲霜的象征，代表着名士的斯文与友情。菊花因其在深秋不畏秋寒开放，深受中国古代文人的喜爱。古代名人雅士对菊花多有赞颂，唐代黄巢作《不第后赋菊》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白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代苏轼作《赵昌寒菊》诗：“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宋代范成大曾作《重阳后菊花》：“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屋照泥沙。世情儿女天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

菊花不仅有观赏价值，而且用途非常广泛，可食、可酿、可饮、可药。菊花粥、菊花膏、菊花羹、菊花糕、菊花酒，可谓药食兼优，有良好的保健功效。正因为菊花具有清火疏风、抗炎解热的医药作用，所以被选作酿酒材料。据东晋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的宠妃戚夫人有一侍儿名贾佩兰，在宫中时，每遇“九月九日”，便“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又据南朝梁关均撰《续齐谐记》记载，“九月九日……，饮菊酒，祸可消”。这是旧俗重九为重阳节，需饮菊花酒的开始。茱萸，又名“越椒”，或者称“艾子”，是一种药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利五脏、延年益寿等作用。所以，古人将茱萸作为驱邪的神物，每逢重阳节，人人佩戴，后世称之为“茱萸会”，或称重阳节为“茱萸节”。至于菊花酒，那是用菊花酿制而成的。每当菊花花蕾含苞待放时，人们便采花蕾叶茎，杂以黍米酿制，待到次年九月九日开坛取饮。汉魏时代，无论宗室贵族，还是达官商贾无不喜饮。因此唐代诗人沈佺期在《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中写道：“魏文颂菊蕊，

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日月奉天长。”显然，佩茱萸，饮菊花酒在汉代已成重要的节日习俗了。

按中国古代风俗，重阳节要赏菊花饮菊花酒。寻常百姓多以菊花浸泡酒中，存放一定时日，待到重阳节取出饮用。菊花酒清冽芬芳，滋阴养阳，为民间所推崇。后来，这种风俗传入宫廷，王宫大臣们品尝后也十分喜爱。于是，酿酒艺人不断研发，精心泡制，最后终于酿制出宫廷御用的菊花白酒。据史料记载，从宋朝起，民间有一年一度的菊花盛会。古神话传说中菊花又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菊花凌霜不枯，傲寒而开，气味芬芳，因此用菊花炮制的白酒，古称“长寿酒”，清凉甜美，有养肝明目，健脑延缓衰老之功效，是延年益寿的佳品，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仁和酒厂生产的“菊花白酒”曾以上乘的琼浆御液深受人们的青睐。而今，菊花白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享誉国内外。1982年，溥杰先生曾为菊花白酒题诗：“香媲莲花白，澄邻竹叶青。菊英夸寿世，药佐庆延龄。醇肇新风味，方传旧禁廷。长征携作伴，跃进莫须停。”为莲花白酒题诗：“酿美醇凝露，香幽远益精，秘方传禁苑，寿世归闻名。”

菊花白酒这一传统酿造工艺能够传承下来，确实不易。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位有心的年轻人，他就是名不见经传且活跃在白酒行业中的佼佼者，京郊少壮派实力人物之一王晓伟。

他1978年4月出生在房山区长阳镇大宁村。十岁开始学柔道，1994年至2001年成为北京柔道队专业运动员，在市运会上曾取得第一名，后被安排在宣武区任教练员。然而作为年轻好胜的王晓伟，决不满足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要拼争，要干一番事业，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他没有去宣武区任教练，而是来到北京秀水街销售服装，回到家乡办沙石厂。但经过一段实践之后，都没有让他找到满意的感觉。朗朗乾坤，干点什么呢？正当他一筹莫展处在忧郁与彷徨的时候，曾发生在身边且享誉京城乃至远销东南亚的“菊花白”酒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王晓伟曾讲起过搞菊花白酒的想法，他说他跟菊花白酒有缘分。父亲爱喝菊花白酒，他从小就对‘仁和’这个词感兴趣。听老人讲，同治年间（1862年）有三位出宫的太监在北京西什库西南创办了御酒房。其中酿酒器具与配方都来自庆王府。而菊花白酒是三种有名的宫廷御酒，即莲花白、菊花白酒和竹叶青之一。从酒文化的角度来说，它历史久远，有民族传统，有特色，要发展，有潜力，适合做大品牌，所以他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搞了。

正是这种传统的酿造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启了王晓伟的心扉,使他不但对家乡产生了由衷的热爱,同时也对传承文化瑰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下决心一定要盘活闲置多年的仁和酒业。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年28岁的王晓伟勇敢的盘下了“仁和”酒业。办理经营执照,圈好荒芜的空场,购买酿酒设备,招聘企业人员,一切准备妥当,就等开工生产了。然而,他那里知道,制酒没有秘方怎么能成?秘方在那里?找谁去寻秘方?谁会轻易献出秘方?这一连串不易破解的难题摆在了这位年轻人的面前。当谈起这段艰难的经历时,王晓伟不无感慨,认为困难实在是太多啦了。在王晓伟经营酒厂之前,曾经有不少人因没有秘方望而却步,还有几家拥有相当实力的企业,也因得不到菊花白酒的秘方而放弃经营。而此时的王晓伟已经没有退路,他只有一个信念:“没有干不成的事,只有不想干的事。”于是,他毫不气馁,用意志战胜困难,为了传承和发展菊花白酒业,坚持不懈地努力。

王晓伟四处寻访,费尽周折,千方百计寻找掌握酿酒秘方的老师傅下落。经过整整半年的功夫,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最后终于得知掌握秘方的老师傅及其家庭住址。他无比兴奋和快乐,兴致勃勃来到收藏秘方的老师傅家中。当他说明来意之后,却出乎他预料,初次登门造访,遭到的竟然是冷遇。他那里晓得,一个毛头小伙子,怎能取得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信任?老祖宗传下来的酿酒秘方,那能轻易出手?第一次的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不过他不灰心,不气馁,让他无比欣慰的是,收藏秘方的老人终于找到了,有人有秘方就是希望所在。在后来的接触中,他在说服老师傅的同时也合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寻求酿酒秘方,其目的,就是为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蒸馏工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失传,必须继承和发扬。北京是千年古都,传承了深厚的宫廷文化,外地朋友和国际友人来到北京,应该品尝正宗的宫廷御酒,这才能够彰显老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经过王晓伟二十多次的拜访,老师傅终于被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他认为小伙子有悟性,是块料子,而他多年等待的传人终于出现了。因此十分高兴地说:“咱爷俩有缘分,我帮你办酒厂,就这么定啦!”于是,性格倔强老师傅终于献出了精心收藏了二十年的酿酒秘方。

“仁和”酒厂在短暂的时间内重整旗鼓,再度生产。从2003年看厂,到2004年改制。2005年3月将产权买断进厂,绿化厂区,搞基本建设,9月11日正式点炉,“仁和”酒业重新开工,恢复菊花白酒的生产,2006年5月第一批酒上市。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强烈反应,新老顾客

争相联系，光是电话就应接不暇。菊花白酒是中华的老字号，酒厂围绕宫廷御酒这一独特品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有梯度、有层次、有步骤的进行品牌营造工程，很快获得广大消费者深度认知、认可和认同。

经过三年的艰苦创业，王晓伟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使“仁和”酒业不断发展壮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者，王晓伟深知其中的重要意义。他用文化企业这一新的理念打造着菊花白酒，同时，他又在发展企业文化中铸造着自己的人格，并以人格的魅力作为铺垫企业成功的基石。

目前，北京仁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已投资 6000 万元，占地 25 亩，拥有 1.7 万平米的厂房，全厂职工 78 人，年生产量达 500 吨，产值可达 3 亿元。菊花白酒销往全国各地，北京 20 多家住京办事处以及法国、韩国、美国、日本等国直接到酒厂订购，美酒飘香，驰名中外。2007 年，“北京仁和”主要产品菊花白酒因其品质卓越、酿制技艺独特，被列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8 年 6 月，菊花白酒又荣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菊花白酒从酒的品牌、酒的质量均为白酒之上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宫廷御酒全国独此一家。中国酒业先辈朱梅先生曾寄予“北京名酒，必须有宫廷御酒”的希望也终于成为了现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菊花白酒已成为中国宫廷御酒文化的代表，被商业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北京晚报、晨报、京华时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对菊花白做过详细报道。北京仁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继承和发展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以中华民族优秀酒文化创造着一种和谐社会的形象，并使飘香的美酒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 房山县政府农业技术顾问团的活动

张广文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房山县工农业生产发展虽然较快，但总体来看还是一个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郊区县。1980 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79.4%，其中有 61.6%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农村人口的口粮平均只有 415 斤。因此，如何经营好 65 万亩耕地，并且使粮食获得稳产高产，一直是县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当时的粮食生产是夏秋两收，夏收以冬小麦为主，秋收以玉米水稻为主。1980 年，冬小麦播种面积 33.8 万亩，占夏粮面积 95.5%；玉米播种面积 38.8 万亩，占秋粮 76.2%，加上水稻的 4.5 万亩共占秋粮的 85%。因此，抓好小麦、玉米、水稻的生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关键。

当时，县里抓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县政府农林办公室和农业局（1980 年 12 月之前为农林局）。由于市县两级一直重视农业生产，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陆续分配学农的中专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使房山县有了一批农业技术骨干，科学种田的水平也处于郊区县先进行列。北京市政府 1980 年成立农业技术顾问团时，就选聘了房山县农科所所长彭清泉和副所长侯长伯分别担任玉米组和小麦组的成员。同年，房山县农林局为了配合市政府大抓粮食生产的工作，也在周口店公社进行科学种田试点，成立了以局长黄启才、副局长周学文、张中兴为领导成员，有 7 名技术干部参加的玉米技术顾问团。这就是房山县农业技术顾问团的前身。

1981 年，副县长李炳田主抓农业，赵振隆任农办主任。他们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在总结周口店玉米顾问团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提高规格，成立房山县政府小麦玉米顾问团指导全县工作。顾问团于 1981 年 3 月 28 日正式成立。由黄启才任团长，周学文任副团长。成员有农业局栽培、种子、土肥、植保、地膜各专业的技术人员：彭清泉、侯长伯、韩国瑞、李振权、繆德营、李效，并特别增加了房山县气象站的工程师张广文。一是顾问团领导认识到农业生产与气象的密切关系；二是张广文与顾问团成员一直有技术合

作，并在《房山科技》第一期发表过《气温变化对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论文，在农业气象方面有一定造诣。

虽然名称是小麦玉米顾问团，实际分为两个专业。玉米团以彭清泉为主，兼管水稻，小麦团以侯长伯为主。顾问团每次集中活动，李炳田副县长都参加，黄启才年龄较大，但一再表态要为顾问团服好务，当好后勤。赵振隆主任对顾问团高度信任，其所提生产措施都督促下边认真落实。团员们不叫他赵主任，而称为赵办，这里面还包含对他采纳顾问团意见不打折扣一律“照办”的赞赏。他对团员也很关心，三伏天下田间考察，他都会自掏腰包为大家买西瓜解暑止渴。

顾问团成员平时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搜集农情积累资料。集中活动时，首先对全县农作物长势全面拉练式检查，对重点地区则深入田间地头察看。然后汇总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生产管理意见，由农办发文给各公社贯彻落实。1981年玉米水稻团活动8次，小麦团活动4次。由于顾问团采取多专业综合服务，在农作物各生长关键时期提出具体管理意见，针对性强，又贯彻落实得力，在连续三年大旱的情况下，还实现了小麦、玉米、水稻全面增产。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3.66亿斤，比1980年增产213万斤。

1982年顾问团开展工作时，副县长李炳田提出以技术推广承包合同方式深化服务，以点带面的工作思路。经过讨论，认为周口店公社可作为试点。理由是：第一，周口店公社地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粮食作物品种齐全，代表性好；第二，阎占魁主任等公社领导一贯重视科学种田，又有粮食生产红旗单位南韩继大队，工作基础好，积极性高，各项措施能够落实，对全县可起到示范作用。于是在1982年5月10日与周口店公社正式签定了《科技服务合同》，并增加阎占魁为顾问团成员。还确定由黄启才、韩国瑞抓南韩继大队，侯长伯抓周口村大队，彭清泉抓新街大队，做全公社的示范。经过共同努力，当年周口店粮食总产达到2005万斤，亩产1255斤，总产亩产双超历史。圆满完成承包合同，也给全县起了示范作用。

1983年，邢春华任县长，更加重视科技工作。县长办公会决定正式成立房山县农业技术顾问团。明确顾问团的任务是促进耕作制度改革，优良品种推广，农业科技普及，制定生产管理措施。工作方法改变过去以检查指导为主，变为技术攻关，解决中低产田物产高产的三大作物。重点抓南尚乐、长沟、东营、石楼、琉璃河、官道六个公社，涉及耕地13万亩，占全县40%。并在石楼公社建设一万亩指挥田发挥试点示范作用。顾问团团长周学文，副团长李振权、彭清泉、侯长伯，成员包括韩国瑞、刘聪、史玉功、赵惕、缪德营、陈永

太、宋伯雄、刘志义、阎占魁、张广文。李炳田、赵振隆、黄启才参与行政领导。

经过上下共同努力，1983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四亿斤，达到4.3亿斤；单产首次过长江，达到823斤。石楼公社粮食总产3502万斤，比1982年增加400万斤，单产首次过千斤，达到1052斤。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1983年底，在北京市农业区划委员会领导下，市县两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相继完成，一幅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蓝图逐渐清晰地呈现在领导面前。实现全县范围的综合协调发展，既要抓好种植业、林业、畜牧业，也要抓好水利、农机、土壤、气象的配套服务。农业区划的一系列成果为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工作基础。在新的情况下，房山县政府决定成立更具科学性和综合性的房山县农业区划顾问团引领现代农业发展。顾问团于1984年6月4日正式成立。团长张文东（农委），副团长李振权、李学文（区划办），成员有彭清泉、侯长伯（农业局），潘恒鲁、林功涛（林业局），尹泽州（畜牧局），刘同光（水利局），张广文（气象站），李硕夫（农机局）。原农业技术顾问团解散。



# 记北京市公安局直属造林大队

张 虚

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干警都还记得，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房山县有支市公安局直属的造林大队。造林大队是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20 年中这个大队有上千名干警在荒山秃岭上植树造林。为保护天然资源，绿化首都，以及发展京郊的旅游事业奉献了青春。

造林大队的前身是茶淀清河农场的干部农场。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要求“三门”（即出家门，进校门，入机关门）的干部，接受劳动锻炼。市公安局党组决定由当时的市公安局基建保卫处副处长曹学华主抓此事。同年 10 月，曹学华率领近 500 名“三门”干部奔赴茶淀。清河农场给他们在该场的西部边沿划出 3000 亩地，又派了 3 个干部当统计员。为了与劳改犯农场区别开，定名为“干部农场”。曹学华便以一官一兵组成了高度精干的指挥部，马不停蹄地指挥他的 500 名秀才兵冲向处女地。不久劳改处（即老五处）政治协理员王建斌也调来了，任干部农场政委。曹学华生长在山西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从事耕种、畜牧，10 来岁就放羊，最多时他一人放 100 多只羊，有较为丰富的农牧经验。他根据当时茶淀地区海水逐渐渗透，淡水日趋减少的情况，主张压缩水稻种植面积，种植果树与旱作物，繁殖家畜、家禽，农、林、牧综合开发，这些措施后来在造林大队都用上了。

在 1958 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党中央又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在京的中直机关和市属单位，按行业归口，在京城西北部山区分段、分片包干造林。市局选定房山县城西北部荒山，以茶淀清河干部农场的 500 名下放干部为基础、组建造林的专业机构。于是，曹学华和王建斌又于当年 10 月间移师房山县。从此，北京市公安局造林大队宣告成立。曹学华任大队长，王建斌任政委，市局行政处科长张维新任副大队长。由市局政治部直接领导。自 1958 年建队到 1978 年造林大队正式撤销，常年下放劳动的干警多达 700 多人，加上轮流短期锻炼的超过 1000 人。这些干部下放的原因，除了开始的“三门”干部外，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当时“左”倾路线的尺度，被认定为需要下放劳动的。

这么一大批人马火速开进山村驻扎，困难是很多的。移师之前，经与当地有关部门反复协商，选定在房山县城西周口店附近龙骨山下的娄子水村安营扎寨。选定娄子水村的原因有三：一是村子较大，队员可以暂时分散借居民房。据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记载：“娄子水村距县城 15 里，139 户，1552 人。”当时是仅次于周口店村的第二大村；二是几条主要山沟的汇集点。《房山县志》载：“黄院沟上自龙宝峪下至娄子水长 10 余里；黄山店沟上自蔡树鞍下至娄子水长 20 余里。”这两条山沟及侧旁的荒山，正是延伸造林的重点地带；三是距周口店火车站较近，交通运输方便。娄子水村历史上就小有名气，清末诗人王邦屏曾创作《过娄子水村》“山花多杂色，野草不知名。屋每循崖结，田都累石成”的诗句，咏叹了这座古朴村落的自然美。

队员们在娄子水村西的荒山坡上，开山垒石，建造了 50 多间平房，解决了大队部和直属队的办公和住宿问题。后来又盖了一座 100 多平米的礼堂，供开队员大会和作饭厅用。张维新副大队长，在大队的三人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是位勤俭持家善于理财的老同志。造林队盖房劳动力不必雇，石料就地取材，这已经够节约的了，他还嫌不够，便领着队员们来城里把公安局拆除改建旧房剩下的一砖一瓦运到娄子水再派上用场。曹学华至今还念念不忘他当年的两位老搭档，一再说：“我们配合得很好。”曹学华和王建斌的经历和性格更接近，关于治队的想法很容易统一，曹学华说：“我在造林队任职期间，始终坚持三条原则，王建斌是支持我的。”这三条原则是：一、造林不能与农民争地；二、不能只图经济收入，不顾下放干部的劳动安全；三、正确执行干部下放劳动的政策，反对劳动惩罚。

1960 年和 1962 年，曹学华、王建斌二人相继调离造林大队，张维新继任大队长，邢长生任政委。始终在大队负责人事的乔长煜也是下放干部，曹学华同志说：“乔长煜同志兢兢业业协助大队领导作了很多工作，他很了解下放干部。”

造林大队的植树绿化区域是以娄子水村为起点向西北、西南延伸的，覆盖大金山、宝金山、黄山店、上方山等数百平方公里范围的荒山、秃岭、沟壑、水峪以及河滩。因地制宜，能造梯田的山头就造田，能挖水平条的就开水平条，连水平条都开不出来的就挖鱼鳞坑。无论在什么地块上种树，对树坑都有严格的质量要求，达不到质量标准，不许验收。例如标准树坑深 80 公分，直径 1 米。在石多土薄的荒山上作业，其实是凿坑，壮劳力半天也挖不成 2 坑，有的挖成个石臼，植树时还需从远处背土填进去。大多数队员的任务长年都是挖坑备用，

待雨季到来再突击种树。树种也是按照土壤条件选择的。适合油松生长的山头种油松。宜于洋槐生长的山沟种洋槐，鱼鳞坑就种紫荆花条等灌木，沙河滩挖石垒堰平整后栽种桃、梨、苹果、葡萄等果树。由于在“文革”期间植树造林的统计资料全被销毁了，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造林的成绩。据有关同志的回忆，全大队栽种的果树至少有 1600 亩。育林面积就更大了，仅上方山周边这个作业区就栽种 3000 多亩。此外还建了若干猪场、鸡场、兔场，并且有专人牧羊、放蜂，建队三年以后，队员们的汗水就结了果。1960 年桃树首先挂果，当年就收 10 万多斤，被选定为人民大会堂国宴的特供果品。1962 年以后果树普遍进入成熟期，每年销售出的鲜果均在 30 到 40 万斤以上，还远销到香港。

造林大队对上方山、宝金山等处天然林及古迹的保护，对当今的旅游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人们常说的“南有苏杭，北有上方”，指的就是房山县的上方山。上方山古树参天，绿荫蔽日，名刹庵院棋布，山泉清泓映翠，历代都是京畿名士的旅游胜地。前人曾以“境比桃园信不惠（慚），蒔花种竹似江南”的诗句，描绘其迷人的景色。山上不仅有茂盛的竹子，而且有印度的菩提树以及黄檀树等华北罕见的树种。中科院植物所把她当做天然植物园，派人长年进行观察研究。至于兜率寺、云水洞、云梯、摘星坨等古迹，前人吟咏的诗篇就更多了。有以“万丈悬崖万丈梯”形容云梯险峻；有以“归来携得星双袖，供向香龕做佛灯”抒发对摘星坨举手摘星的豪迈心情的；还有以“千重云气绕，几道水声通”诠释云水洞之命名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建国前战乱频繁，上方山几经劫难，遭受破坏。建国后附近山民缺乏保护国家森林、旅游资源意识，其南部和东部山头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造林大队特派一个中队进驻上方山封山护林，并且植树绿化了光秃的南山头和黄花岭，维修了行将倒塌的禅房、庵堂。在寺庙废墟栽种果树，在柞木林中养蚕。还派专人看守云水洞。队员们在天然林腹地劳动时，从盈尺的落叶层中发现了华北罕见的木本灵芝，大的 15 公分，状如云朵，色似重枣，曾分别送国家自然博物馆和植物研究所，供展览和研究，受到褒奖。

定金山上有净业寺。另有一所俗称老公院的别墅式庭院，据称是清末慈禧太后宠养的太监头子李莲英的避暑去处。造林队员进驻后，尚有一名年迈的老太监在那里苦熬残年。队员们帮老人护理庭院，照料生活，安然相处多年。改革开放后，上方山、定金山均开辟为休闲旅游区。造林大队从建立到撤销，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正是我们国家动荡和困难的历史时期。

在这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特殊意义的重体力劳动，广大造林队员都经受了肉体 and 心灵的磨练。有的同志致伤致残，甚至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

造林大队人才荟萃。能写能画的、会开飞机的、会翻译外国话的、领过兵打过仗的、钻入敌营战斗的等等，要文的有文的，要武的有武的，各类人才都有。有些同志重返工作岗位之后，不少人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如留在市公安局的有原北京市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参与撰写《冯基平传》的于行前、工笔花鸟画家庞斗瞻等等。有的同志调到外交部、外经部工作，均发挥了他们的专业造诣，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

娄子水村是造林大队队部所在地，也是造林大队的大门槛，凡到造林大队下放的干警，第一步必须踏进娄子水村。娄子水村正是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下放劳动植树造林的历史见证。多年来娄子水人与造林队员结下了深情厚谊。据悉有三名干警与娄子水村的姑娘结婚，在山村扎根立业。造林队员不仅用血汗绿化了京西的山川，甚至把血脉扎根在山野，这种奉献精神应该永载公安史册。

# 房山商业的三大变化

刘树霖

2000 年前后，是二十世纪向二十一世纪转变的重要时期，房山商业领域也发生着重大变化。一是在经营主体上以国营和供销社的独家经营或国营商业为主转变为国营商业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为以民营、私企和个体为主；二是在经营环境上以满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主的“小而陋”转变为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的“大而美”；三是在经营方式上以多年的、普遍的封闭式的柜台售货转变为新型的商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敞开式的超市销售。

## 经营主体的转变

从解放初期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仍然较低，为保障我区群众基本生活需要，房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长期担负着保障供应和维护市场稳定的任务。房山城关和良乡两处城镇以及一些重点工矿区买东西和吃饭、理发等只有到国营的工业品公司、副食品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单位去，居民要吃肉、吃菜只能到国营的食品公司和菜蔬公司的肉店、菜店去。农民要卖猪、卖菜也只能卖给食品公司和菜蔬公司。商店要进货还必须到国营的百货公司、五交化公司和副食批发公司，居民要买粮食只有到粮食局分布在全区各处的粮站。农民要卖粮必须卖给粮食局的收购单位。拖拉机、汽车要加油必须到国营的石油加油站，医疗单位要进药必须到国营的医药公司。在广大农村，农民要购买生活用品和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只有到农村供销社。要出售大柿子、花椒等农副产品还必须卖给供销社。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到上世纪 80 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大量社会商业迅速崛起。国营和供销社的一统天下逐渐被打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国家放开物价和取消财政补贴以后，一些靠财政补贴和国家政策扶植的国营和供销社企业不得不逐步退出市场。国营菜蔬公司 1991 年被撤并，国营食品公司则名存实亡。医药公司由于医药市

场放开，2001年被民营的嘉仕堂兼并。到1993年，由于粮食市场放开，靠财政补贴为生的偌大的粮食局除仓储单位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通过精简合并、关闭转产、联营、破产等多种形式发生变革。2002年组建了粮油贸易总公司，从以前的全区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单位转变为少数几个单位的粮食保管企业。广大的粮食市场让给了社会商业。遍布我区农村各地的农村供销社，大量门店以“租壳卖瓢”即职工买断商品租赁供销社门店形式为主，逐步由商品经营转变为资产经营。到2000年前后，除盐业公司外已基本退出商品经营，变为单纯的资产经营。原来我区国营商业的主体工业品公司、副食品公司、服务公司和房山商业大楼变化最大。1997年底，经区委区政府批准这四个单位组建为房山商贸集团。2001年又经区委区政府批准，进行产权改革，12月25日改制为房山商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所属的房山最早的两个国营批发公司百货公司和五金公司以及副食品采购站实行破产，国有资产大量退出。到2002年7月又经区委区政府批准，占公司的25%国有资本300余万元全部由经营者和职工买断，国有资本全部退出。原来房山国有商业的主体退出了房山商品市场，真正变为实实在在的民营或私营企业。该公司所属的华冠公司、房山商业大楼、功德福餐饮公司、永生堂医药公司占据了房山商业市场的主体地位。除这些公司外，大型民营连锁商业企业美廉美、苏宁电器、大中电器等也纷纷进入我区，法国大型零售企业家乐福也在2010年底在良乡开业。如今，除烟草专卖、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外，国有商业经营企业在我区已寥寥无几。民营、私营商业企业已经成为我区商业主体。

### 经营环境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商品短缺时代，消费者的基本需求比较简单，只要有东西就行，对商业经营环境的要求很低。那时的商业经营网点大多都比较小，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区最大的商业网点房山人民商场面积也只五千多平方米。一些重要网点也只一二千、二三千平米，多数是几十平米、百八十平米的小门店。二是内部设施简陋，只要有货架、柜台就行了，夏天有台电扇，冬天有个火炉就不错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消费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为适应这种需求，各地掀起建设大商场的热潮。北京市提出了建设100个万米以上商场的口号。一个个大商场在各区县迅速矗立起来。但房山万米以上商场迟迟没有。1995年，区工业总公司对房

山人民商场进行扩建。但投巨资扩建后的人民商场号称万米，实际并没达到。

到了上世纪末，特别是区委、区政府搬到良乡以后，我区大型商业服务业网点建设速度突然快了起来，打头阵的是 13000 平米的华冠购物中心一期。紧跟着拱辰大街北关环岛几万平米的城建大厦、拱辰南大街近二万平米的国泰百货。超万米的荣鹏花园一二层、嘉瑞通一二层、西路大街的西路大厦一到三层、拱辰星园一二层，以及美廉美、大中瑞祥等等十几个超万米的商业服务业网点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不久几万平米的华冠购物中心二期建成，近二万平米的房山美廉美在房山老政府原址横空出世。去年底法国大型零售企业家乐福 1.5 万平米的良乡店建成开业。短短十年时间我区大型商业服务业网点已比比皆是，这些大型商业服务业设施全部建有步行电梯和中央空调。消费者上下楼方便，冬天暖和，夏天凉快。内部配有卫生间、休息椅、运货车等等各种设施，内外装修上档次，内外环境美观舒适，把消费者购物变成享受。使我区商业从以前的“小而陋”，真正变成当前的“大而美”。

### 经营方式的转变

我区商业和全国各地一样，在计划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都是封闭式的柜台销售。所有商业企业门店都是长长的高高的宽宽的柜台把商品和售货员与消费者隔开。消费者要看看商品，必须请售货员把商品从货架上拿下。消费者购物往往要看售货员的脸子。那时的售货员是社会上很让人羡慕的工作。那时，消费者购物的口头语是“逛商店去、逛商场去”。而现在，消费者购物的说法是“去超市”。消费者购物说法的改变是由我区商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所致。这种转变是由华冠商贸公司一店于 1995 年 10 月开业开始的。自华冠一店于拱辰北大街路西开业一炮打响开始，这种改变旧的封闭式柜台售货方式，不要柜台，商品全部摆到货架上，让消费者直接和商品接触，任意挑选的新的售货方式，立即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迎，一个个的华冠超市迅速建立起来，使这种店很快风靡良乡和房山城关，并向燕山地区发展。其它商业企业也纷纷效仿。到 2000 年前后，超市已经成了商业门店的普遍模式。仅华冠超市在我区已发展到数百家。点点超市仅在良乡就有十来家。美廉美大型超市在城关、良乡和燕山也很受消费者欢迎。苏宁电器。大中电器。国泰百货、法国家乐福良乡店等等，全部采取这种经营方式。老的、封闭式的柜台售货除了医药、珠宝、手表等特殊的、贵重的商品外，已很少有人采用。表明我

区商业经营方式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以上三大变化是房山区商业在 2000 年前后改革和发展的特有表现,也是房山商业自那时以来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典型代表房山商贸集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华冠公司自 1995 年 10 月开办第一家超市,到 2004 年发展到 49 家超市,年销售额近 4 亿元,成为全国零售百强之一。如今其直管店和加盟店已达 600 家。其门店和销售规模都已相当或超过原国有商业和供销社的总和,成为房山商业名符其实的旗舰。



# 三访“背篓商店”

李志国

提起黄山店“背篓商店”，那是我熟悉的地方。这里，曾诞生了全国商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涌现出全国商业战线劳模王砚香，北京市劳模白金海。“背篓商店”的精神，多少感人的故事，也传遍四面八方。

50年了，每当我想起“背篓商店”送货上山下村，全心全意为山区群众服务的情形，都抑制不住心情涌动，仿佛我又成为一名商业职工，参加背篓上山下乡送货队伍的活动了。

## 一访“背篓商店”

1961年元旦刚过，周口店供销社主任郑玉荣和我决定去黄山店分销店了解情况，夜间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晨起后，雪停了，我们蹬上自行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黄山店河谷，进入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河卵石路的大山深处。雪后路滑，又遇西北风，骑车甚是难行，无奈只好推车前进。20多里路，本来一个多小时可以到达，我们却走了两个多钟头。临近中午，我们才到分销店，王砚香和其他职工下乡送货去了。午饭后，我和郑玉荣一边帮助门市部卖货，一边检查商品标价情况，商品陈列，错落有致；明码标价，一目了然；上千种商品与国家定价完全相符。真可谓执行价格政策一丝不苟。

晚上，召开了分销店职工会议，郑主任讲了我们的来意，要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和努力做好春节的市场购销工作。然后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最后，王砚香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物价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要坚决执行，一丝不苟，绝不能马虎。春节快到了，对于统一分配的紧缺商品，我们要及早进货，做好节日市场商品供应工作。在收购工作中，下大力气，尽量较多地收购些羊、猪、鸡、兔等畜禽，供应节日首都市场。我们是郊区，要多为城市人着想。要继续坚持下乡送货。雪大山路难走，住在山上的社员，我们要提前把年货达到社员家中，让他们过个祥和、快乐的新年。明年更

有信心，把生产搞好”。

第二天，郑主任留在店里，我和王砚香一起去下寺村送货。临行前，我跟王砚香说也背些商品，却被王砚香拒绝了，他关切地说：“你新来乍到，走山路不习惯，山路崎岖，雪后路滑，以防意外。”“客随主便，我空手跟他第一次送货下乡。

隆冬十二月，寒风西北吹。一出黄山店，深山峡谷，冷雪森森，满山遍野的白雪，伴随着山梁上的阵阵白毛风，呼啸着扑向山沟，沙拉沙拉，扑打在我们的脸上，如无数的针扎，我甚是吃力，可王砚香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加上荆条篓子，足有百十斤重。他使出全身的劲，绕山嘴，上山梁，走山坳，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地向上爬，艰难地前进。

我空手走山路都感到很吃力，而王砚香还背着沉重的商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几年如一日地不畏高山峻岭阻挡，不怕雨雪风霜的袭击，坚持背篓上山下村，把商品送到社员的手中。他们这种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想方设法满足群众的需求的行为，是由于他们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怀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

当我们走在一个三叉路口时，王砚香把背篓放在路边矮墙上歇歇脚，左边去葫芦棚村，右边去下寺村，此时，我已干渴的很，嗓子快要冒烟了，难以忍受，就捧起路边的雪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好不痛快！接着我们沿着右侧的山路继续向前走，约半个时辰，我们到了下寺村。

进村后，社员们见到王砚香膝盖以下棉裤全湿了，好像凉在他们的心上。有的社员端来热茶水，有的社员伸出大拇指说：“老王，真是好样的！”不大会儿，背去的商品就卖光了。

此次黄山店分销店之行，使我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黄山店分销店职工那种吃大苦，耐大劳，心想群众，身不离背篓，坚持上山下村，为山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使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我感到有责任把黄山店分销店的事迹广泛地进行宣传。

回供销社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结合年终总结表彰先进，向县社写了总结报告县社决定在全供销社开展“店学黄山店分销店，人人学习王砚香”的活动。一店红，带动了周口店供销社店学红。

## 二访“背篓商店”

1962年7月的一天，我陪新华社记者纳一去黄山店分销店采访。我们骑着自行车，边走边聊着黄山店分销店和王砚香的情况，过了茭子水村，沿途两边，山脚下的松树，挺拔翠绿，造化钟神秀的大自然美景真使人久久难以忘怀。

约10点多钟，我们到了分销店，王砚香在等待我们的到来，因事先已电话联系好，我们互相介绍，落坐后，王砚香为我们沏上茶，我们边喝茶，边聊了起来。

纳一问：“你们是怎么想起下乡送货，又坚持下来的？”

王砚香为我们讲述了许多背篓上山下乡的故事。他说：

提起送货上山下乡，还得从1958年春天说起，1958年3月，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社员们一心上山搞生产，顾不上到分销店买东西。分销店一度出现了业务量下降，门市清冷的局面。我想：是社员手里没有钱吗？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黄山店村的社员。通过访问，知道了社员都在争分夺秒地搞生产，没有时间到分销店来买东西。这时，上级领导也指示：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商业工作者要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走出柜台，上山下乡开展购销业务。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背上酱油、醋、日用百货等四十多斤重的商品，爬山越岭，到离店十五里外的长流水大队去售货。在途中，我正爬到半山腰，被几位社员发现了，社员们马上跑了下来，像迎接客人似地迎接我。争着替我背篓子，却都被我谢绝了。我先走进大队办公室，那里正有社员在向队长请假要下山买东西。队长很为难：准假吧，影响生产；不让去吧，确有实际问题。我这一来可给队长解了围。不大功夫，社员们把背去的商品全买光了。队干部高兴地说：“你这一来，给我们背来了多少工呀！”我临走的时候，干部和社员热情地送我出村，还招呼我“以后再带点商品来呀！”回店后，把这次送货的经过情形从头到尾向店里人一说，大伙可高兴啦。接着，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两篇文章。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自己这样做，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送货下乡的劲头也就更足了。从此，每人都添了一件新东西“背篓”。

广大社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生产，有三十五户社员搬到了高山上去住。他们居住在十二座山上，有的地方只住一户人家。住在大巨尺山上的社员距分销店有三十里山路，都是些比较难走的地方。但是，我们仍旧坚持送货上山。有一次，分销店进了线麻，我们想到住在高山上的社员费鞋，便及时地给住在最远的平塔窑、狮子怀山上的社员送去了。途中，翻过九里高的杨家大岭，

正在半山腰，遇上了倾盆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雨越下越大，我们怕商品淋湿了，就把衣服脱下来盖在商品上，光着膀子上山。山高风大，坡陡难行，我们跌倒在地上，一手抓住荆梢，一手扶住岩石，站起来继续前进。当把线麻、火柴、电池等八十多种商品送到社员手里时，社员们感动地说：“你们真像当年的八路军！”

最后，纳一同志举起相机，拍了一幅照片，回单位后，寄给我一张，一直保存至今。

晚上，开了个座谈会，分销店职工都谈了背篓送货下乡的体会。

打这以后，周口店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孙秋林，经常去黄山店分销店蹲点，帮助解决困难，先后将郑春藏、李玉珍，白金海、张志亮等同志调分销店工作。

分销店由原来6名职工，增加到10多人，服务项目也不断扩大，工作也越来越好。

### 三访“背篓商店”

1964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县社孟攀绿的电话，说：“市社要‘背篓商店’的全面系统的材料，并要把王砚香的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也了解清楚，写好后报告县社。”

第二天，我骑车去了黄山店分销店。下午先去了黄山店大队，了解王砚香的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经村党支部介绍：“王砚香的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三面红旗。”我又去了黄山店人民公社，接待我的是公社许主任，我向他说明来意，许主任对分销店和王砚香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说：“背篓商店的精神，应该大力表彰、宣传和推广。”

分销店第二天要去下寺村送货，我想再进一步多听听社员们的意见，我让



王砚香给我找个背篓，也参加他们下乡送货的队伍，他们背较重的酱油醋之类商品，让我背些毛巾、袜子之类较轻的商品。王砚香、杨守林、王梦元和我一行四人向下寺村出发了。

一路上，步步登高，沿着山谷，淌着哗哗的溪水，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下

寺村大队部，我们刚一进村，就被一些社员看到了，有的在招呼同伴，有的去喊家里人，“背篓商店来啦！”有的就跟在我们的后面到了大队部。人们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有的提着瓶买酱油醋，有的男社员挑选镰刀，有的挑选香皂、毛巾。女人们买针头线脑，小学生们买铅笔、本子……不大的院子，顿时欢声笑语，好不热闹。背去的东西卖的差不多了，人也稀少了，我便问了几位中年妇女：“分销店送货，你们感到方便吗？”她们带着满意地笑容，异口同声地说：“挺方便！”。我又问了几位男同志：“你们想买些皮麻绳套什么的都能买到吗？”有的社员说：“老王为我们想的可周到了，只要是我们需要的，他们都提前给我们送来，从不误农时。”我还与村干部们聊了一会儿，几位村干部们也全是赞扬的话。

此行，我每到一处，都没听到不同的意见，看来，王砚香带领他的职工们，真是用辛勤的劳动，热情的服务，温暖了山区社员们的心。

晚上，我与王砚香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又给我讲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他说：

我们为社员服务，不论大小事，只要能办到就尽量帮助社员解决问题。那是五月的一天，我去大巨尺山上给社员许世海家送货。刚到门口，只听夫妇俩正为一件事在拌嘴。进了门，才平静下来。我一问，原来是少个水缸。家里没有水缸，许世海整天在山上放羊没时间下山去买，又因为路险不好意思和售货员说，只好用木桶盛水，吃一桶弄一桶。我马上答应给送一口缸来。回店一看没有合适的，给供销社仓库联系也没有合适的。第二天，听说有个耐火材料厂生产缸，就去买了一口，并用大车拉到了分销店。第三天，我和杨守林两人找了一个大口篓子，轮换背着，把这个近百斤重的大缸给背上了山。背大缸上山可难啦！一边是悬崖陡壁，一边是深沟，只有一尺多宽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背着缸走不过去，只好一人背着、一人扶着吃力地侧身而过。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水缸送到了许家。许世海看到这口缸，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时说不出话来。

大前年春旱缺雨。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小雨。我想到山区社员历来都有种春菜的习惯，春播时随手撒下漫天星的蔓菁籽，三个月就能收一茬杏黄菜。现在下雨了，可是菜籽还没有来到，夜里两点钟我叫醒了睡得正香的杨守林，冒雨赶到周口店供销社库房。保管员刘保巨从梦中醒来，抬头一看，吃惊地说：这么早你们来了！听说是取菜籽来了，他也不怠慢，马上给称了一百八十斤。往返几十多里路，把菜籽取回来了。这时，天刚蒙蒙亮，公社保管

员傅炳志果然叫门来了，傅炳志看着菜籽高兴地说：你们真是比及时雨还及时呀！征得公社党委同意，按各队需要，把菜籽分头背到各生产队，适时地播种了春菜。到六月间，全公社收了十八万斤菜，平均每户分菜三百三十多斤。

我们热心为山区人民服务，山区人民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分销店有什么大小困难，只要和队干部和社员一说，他们就来相助。有个大雪天，我去葫芦棚大队收购生猪，社员东一家西一户，居住分散，有的相隔四五里远，而且都住在高山上，收猪很困难。队干部看到这情形，就主动帮助收购生猪。当天就收购了十三头，还连夜帮着送到分销店。

最后，我请王砚香谈一谈工作背后的动力来自哪里，他意味深长的说：

一是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指明了方向。我们就是照他老人家说的去做的。二是踏着先烈的脚印走。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前，我们这块儿是拉锯地区。1945年时任四区区委书记杨春茂和他的战友杨永生、王世英在这里被敌人包围，因寡不敌众，杨春茂战死。杨永生、王世英坚贞不屈，被敌人活埋在房山马刨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总觉得我们活着的人，就应该把工作干得更好些，更多些。一想起他们，我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力量。三是热爱社会主义，就要苦干实干。提起旧社会不堪回首，反动派拿人不当人，共产党把人当主人。我家人多地少，吃不饱。康菜度日受煎熬，日伪军三天两头抓民夫，征民工，修岗楼。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家贫到上学年龄不能上学。大伯经常为霞云岭解放区秘密买些物资，被敌人抓进大牢，父亲也受牵连，幸亏我先得消息，告诉父亲跑到山里，姥姥每天为他送饭。大伯被乡亲们保出狱后，风声已过，父亲才回家。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我最知。党培养了我，我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一心一意为山区人民服务。

回单位后，我把了解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很快报告了县社。

有关“背篓商店”的事迹，北京日报记者郭中仪写过报道，董善元写过散文。肖青写过歌曲。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宣传。当时我写了《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的售货员》一文，刊登在1964年8月4日《北京支部生活》上，《背篓商店的故事》一文刊登在1964年10月上旬《工人日报》上。

1964年国庆15周年时，王砚香作为全国劳模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出席了国庆招待会。10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5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向全市各区县党委及财贸系统各党支部发出了《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

6月12日，中共华北局向华北各省市区发出关于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的通知。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制了以黄山店分销店和王砚香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红色背篓》。

回顾往事，“背篓商店”职工，上山下乡送货，为山区人民生活服务，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我国商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他们那种奋斗精神，鼓舞着商业战线一代又一代职工，也必将受到人民永远崇敬！

# 房山老城的商铺

张广文

房山县解放初期（1948年至1955年），县城的商业和手工业基本延续了民国时期的格局。作为服务业，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地区的经济特点。

—

说起房山县城的商铺，不能不说房山老城的格局。房山老城是长宽各500米的方正小城，南北、东西大街十字相交，十字街头俗称“大角儿”。北门外几十米处有关帝庙（俗称“老爷庙”），南门外200米处也有关帝庙，关帝庙到城门之间的北关、南关是县城的延长部分。500米东西大街和700多米南北街，两边布满了商铺和手工作坊。当时的街道宽不过5米，两辆马车可以并排行走。不知什么原因，沿街的门脸和大门高矮不一。北街和西街都是一两级的台阶或与大街齐平。而东街、南街、南关的商铺大多是一米多高的高台阶，铺子里的人看路上行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阵势。商铺的门面房从一间到三间不等，但院子进深很大，有的两三层进深，还开有后门。后院有的是居住房 and 库房，有的是加工产品的作坊（如酱醋作坊、点心坊、油坊）。一些小买卖是制作和门面合一（如缝纫、纳鞋铺、罗圈铺、面铺、烧饼铺）。

那时的商铺沿街门都不能向外开，为了亮出铺面，大都是整个沿街面都用活门板，上午摘下，关门时再上好，叫做“上门板”。一个商铺，开业叫做“开张”，做成了头桩买卖也叫“开张”。可是，“关张”不能随便说，因为那指的是停业了。

商铺一般都是常年营业。平时农村城镇需要买卖交换的主要靠集市和庙会。集市最早在城内，后来出城到南关，临近解放几年，国民党害怕八路军进城，把集市赶到南关外的沙岗子去了。集市上以农副产品交换为主。

房山城的庙会，早年有商家赞助一些民间文艺演出活动，后来就以贸易为



主了，相当于时间比较长的集市。阴历四月庙会是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五，以药王庙（现房山中学南部）为中心的南街、东街及各胡同，以卖夏收及夏种农具和夏季用品为主。阴历五月十七至二十一为五月庙会，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西街、北街及各胡同为主，卖盛夏将至用的伞、草帽、棉布、纱绸等凉货为主，也卖一些时鲜果品桃、杏等。

## 二

房山城的商铺包括各种经营性的商店、手工作坊和服务性行业，据 1948 年房山城解放时的统计，四街、两关约有 120 户左右。至今已 60 多年过去了，经过查找资料，并向一些久居城关地区的老人了解，现将这一时期的商铺字号、位置及商业、手工业经营活动特点、趣闻忆述如下。有些因年代久远，名号用字或位置不太准确，还请知情人士提供线索，予以修正。

**1、杂货铺：**昔日的杂货铺相当于现在商业分类的百货、副食、日用杂品的混合体，几乎是所有日常生活用品都卖，大铺子货品全，小铺子只卖小件的日常用品。有的杂货铺也有自己的特色货品。北街的酱醋杂货铺有广泰公、吉顺成、福源涌；南街瓷器杂货店有晋益长，酱醋杂货铺有益和升、三友记、实利合；南关灯罩洋广杂货有协顺成、恒运隆，瓷器杂货有荣福祥、义和升，醋酱坊有祥聚成。

由于当时老百姓大多经济水平低下，买东西时不用不买，够用就行，因此卖货的也都是散装。一般都是柜台上放酒坛子，地下放油篓、醋缸。买主自带容器。当时玻璃瓶也算高档用品，一般老百姓都是用一种陶制的外边挂黑釉或棕黄色釉的大肚小口像葫芦一样的瓶子名叫独碌，大的能装几斤，小的能装半斤。瓶口向外翻，瓶口下的脖子上可以拴绳子提着，瓶塞一般都是用棒子瓢。那时家里吃饭主要是用醋，很少买酱油，吃面条时就用腌咸菜的咸汤。醋分为中醋和高醋，酸度差很多，高醋是有钱人家用，一般老百姓都是用中醋，有点酸味就行了。货品的包装用现在观点看却很环保，一般干品用当地稻草麦秸制造的黄色的纸包，买得多时用蒲草编的蒲包；湿品，如咸菜、酱，则用荷叶。

因为当时的醋几分钱一斤，就有了一句俗语，卖东西时嫌对方给的钱少，就说：“给这点钱还不够一葫芦醋钱。”

除了综合型杂货铺外，还有一些小的专卖店边加工边卖货，以满足当时生产生活的需要。南街有麻绳店、天吉烟袋铺、双合城棉花店、武记嫁妆铺；北

街有罗圈铺(卖笼屉、筛面罗);南关有李家首饰楼等。

干鲜果品以沿街挑担叫卖为主,南街有王记鲜果店;北街有三友干鲜果店、李记鲜果店。冬春季节,山区的老乡不少人背着篓子在街上叫卖核桃、杏仁、大枣、柿子、山楂。

**2、饭铺、烧饼铺、点心铺、肉铺:**饭铺一般都全天营业;烧饼铺、麻花、豆腐脑、炸豆腐摊则多是上午或有集市时营业。大的饭铺有字号,如北街的北海居、隆福居,西街的万年居,南关的三顺馆,两益轩(回民)。小饭店多以店主的姓名称呼,南街有田记饺子馆、李记烧饼铺;北街有谢家饭店(回民)、荣家豆腐脑;西街有肖记炸麻花,禹饭铺;东街有冯饭铺;南关有李文海饭店、周记豆腐脑、毕三爷炸丸子、王九爷炸豆腐、李全烧饼铺。

糕点不是平常吃食,有的杂货铺也卖些缸炉、江米条,但一些细点心,如“八件”(酥皮点心)、“蓼花”等。品种较多的,则要去南关的盛记糕点、周兰坡糕点铺。糕点零买时用纸包,一般是自家食用。凡串亲访友看望老人、病人时就要包果匣(一种长方形的彩色纸盒),或包蒲包(将点心包在纸里,外罩一个蒲草编的方块,上盖一张印有字号的红纸),用手一提,显得庄重气派。

除了集市卖肉,常年在城内卖肉的只有东街的曹文羊肉杠、南街的马家猪肉杠、李家猪肉杠、南关的王永猪肉杠。为什么叫肉杠而不叫肉铺呢?卖肉的摊都没有店铺,只是在沿街的固定地点,前面两条板凳上搭一块木板,上面放一个肉墩子用于切肉。身后靠墙则是埋下两根木柱,在四五尺高处是一根五六尺长的横木,也叫杠子,用大铁钩在上面挂整扇的猪肉或羊肉,因此称为“肉杠”,是肉铺的别称。肉称好后,都是用荷叶包,又干净又环保。春节前不少农户都在村里请屠户杀猪,自己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就到集市上换点钱,再买点其他年货,一般都是冻肉,论块卖,不零售。

**3、粮行、面铺、茶叶店:**买卖粮食的也叫倒粮行。南街有永春栈,东街有德聚隆,南关有宋记南粮店。面铺大都磨面卖面,有毛驴拉磨的磨房,用一个长方形木柜装上面筛,用脚踏筛面,俗称“脚打筛”,以示与家庭中用手筛面的圆圈筛有区别。当地对磨面筛面的人有一个很好听的称呼,叫“磨官”,加上姓氏,就是李磨官、王磨官了。有的面铺还用手摇轧面机轧面条,有卖湿面条的,也有的晒干切短包成卷卖挂面的。当时西街有郑面铺、李面铺,南关有马来泰面铺、王克昌面铺、窦记杂面铺。

常喝茶叶的人,一是有钱人家,二是做买卖的人。农村人平时不敢喝茶,怕“消食”。房山山区有一种山茶叶(实际是中草药黄芩)夏天去火,可以自

采自制茶叶，冬季则把自家人种的红枣去核烤焦，制成枣茶饮用，这叫穷有穷办法。但到了过年的时候，要招待亲友，年前都要买一点茶叶备用。在各种店铺中，茶叶铺最干净，也最讲究。茶叶能吸收各种怪味，尤其不能和调料、有香气的日用品靠近。卖茶叶都是包两层，茶包方方正正。纸绳捆好，手提出门，到家里放在准备好的茶桶里。即使买茶叶送人也多是茶包，买带桶的茶叶则是非常高贵的了。当时茶店叫茶庄，都在南街，有荣昌茶庄、南北庆合春茶庄。

**4、药铺、纸张文具店：**房山城药铺有南永合祥、大生堂、恒隆泰、裕升泰。纸张文具店有的也卖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籍，南街有震中纸店、东文堂纸店、南纸店，北街有庆泰隆纸店。

北街还有一家装裱字画店，东街有一家书店。

**5、其他服务性店铺：**西街有修理钟表铺、肖记刻字铺、王鑫照相馆、石印局；南街南关有染坊；仓房胡同有隆福当铺；南街有白家车行；南关有马金生皮子铺；北街李记裁缝铺，南街黄记裁缝铺。

当时人们出行主要靠两脚走路，有钱人家请人做鞋或买鞋穿，城里北街有邢家纳鞋铺，南关有杨柏纳鞋铺。更多的人家是用家里的旧破布打纳鞋底，自己做鞋穿，穿破了就去修鞋。修鞋都在南关，有张玉山、徐桂荣等三四个摊铺。那时修鞋主要是补洞、包头、打掌，也叫钉鞋的、锥鞋的。一般人鞋底打胶皮掌，有些经常背篓走山路的人鞋底特别费，就钉铁掌，走路当当响，一双鞋能有二斤多重。

现在称为理发馆的，当时叫剃头棚，以男人剃光头为主，极少数城里人留分头。剃头棚的师傅大都有另外一种手艺，就是正骨按摩。北街有赵家、西街有孟家、南关有马家。剃头棚全天营业，逢集市还有在街边摆摊剃头的，挑一个担子，前边一个煤炉上放一个铜盆烧热水，为了把头发闷软了容易剃，后边是工具箱和坐凳。

房山城内有两家澡堂子，现在叫浴池。一家在仓房胡同路南，一家在营房胡同北口，天热季节停业，最忙的是每年腊月。澡堂里两个大池，一温一热，一个小池可以用脸盆舀水冲洗用，毛巾肥皂自带，从早到晚不换水。讲究些的人就早去，洗清水。到了晚上，池水混得变成灰绿色，水面上还飘着一层沫子，就这样的澡堂子，一年洗一次就算不错了。澡堂的拖鞋都是一块木板钉一条帆布或胶皮条，不分大小。房山有句歇后语“澡堂子鞋，没对儿”，就是指这事。

还有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是操办红白喜事，结婚抬轿子，送葬抬棺材，都是抬杠子，当时叫杠房。有北街的王记杠房，西街的杨记杠房。抬轿子现在

还有，抬棺材现在已见不到了。有钱人家发送人，把棺材放在两根两丈来长半尺粗细的大杠上，外罩彩绣的棺罩，前后各八个人从家里抬到墓地。形容一个人说话办事不灵活，钻牛角尖，就说“抬死杠不换肩”。

和丧葬配套的还有纸活。就是先在灵堂摆放，出殡时烧掉的纸人、车、马等物，做这种活的叫画匠，也叫糊纸活的，东关的画匠崔家名气最大。除了糊纸幡、丧棒、灵牌，还能糊几丈长的纸船。拉纸车的牲口是有讲究的，男人死者是马拉车，女人死了是牛拉车，路过门前一看便知。还有的不太富裕人家，糊一头驴或驴拉车。房山嫌一个人说话声音大时，就叫“纸糊驴大嗓门”。

再就是吹鼓手，红白喜事都有人请，都有固定的班子和曲调。有钱人家办事有时会请两个班子，双方比赛谁的曲子多，好听，互相叫板。吹鼓手坐在门外时有两个作用，一方面调节气氛，一方面当亲朋来到门外时奏乐告诉院里来了。吹鼓手走在路上，见有放桌凳、茶水点心的，或者有村民拉一根绳子拦路的，都要停下来演奏曲子，抬杠的人也可以趁机休息一下。

房山的旅店主要在南关，大的有悦来店、万家店、孙家店，南门外往西有陈家店、张家店、李家店、赵家店(回民)。备有牲口棚的店也叫大车店或骡马店。北关有一家专供驮煤骆驼歇脚的骆驼店，也算是房山城旅店的一个特色了。

**6、手工业作坊：**当时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称得起制造业的都是手工作坊，一般是前店后厂，后边加工，前边卖货。酿白酒的不叫酒厂叫烧锅，在南关村东，据说买卖不太好，人们更喜欢琉璃河烧锅的白酒。北街路东有一家专卖黄酒的黄酒馆。

县城及附近人家食用油主要是花生油，城里人买油吃，种地的人用花生换油吃。做油的地方叫油坊，实际是榨油坊。花生仁炒过压碎以后包在麻坯子里，外边套上一个个铁圈，连接成圆柱形，放倒在一个石砌的油槽中，后面一个一个地钉入大木楔，前面就挤出油来。把木楔楔进油槽中叫打油，是个力气活，打油工都是脱光膀子抡起五十斤的大铁锤敲楔子，同时大喊一声“嗨”，喊声、锤声震天动地。当时，南街有福庆隆油坊，西街有曹油坊，南关有二合公油坊。香油(芝麻油)吃得很少，只有北街有一家麻油店，用手压葫芦做香油。

铁匠铺制作各种农具、工具，因为都有化铁炉，又锻造加工，也叫烘炉。南关路西有赵立水铁匠铺，路东有郑德明铁匠铺。郑家铁铺师傅人称“小郑子”，活干得好，铺里还有一台车床，名气比较大。由于当时骡、马、驴为主要运输工具，就有了一个特殊的铁匠专业“打马掌”，吴家马掌有两个店，一个在南关，一个在北关，都在交通要道上。有时为了警告人们有危险或知道自己有多

厉害，就说“让你知道铁烧红了是烫的”。

当铁匠很累，每天拉风箱，抡大锤，满脸汗水黝黑，还被人看不起，说叮叮当的锤声是“辈辈穷”。其实打铁的有打铁的规矩，师傅拿小锤是指挥，徒弟抡大锤。烧红的铁放在砧子上，小锤敲哪里，大锤就砸哪里，如果继续砸，小锤就在砧子旁边轻轻敲两声，小锤“叮叮”大锤“当”，这就是铁匠铺特有的叮叮当的节奏声。

沈家棺材铺位于出南门西拐路南最西边一家。棺材好赖差别很大，柏木三五棺材最好，三寸厚帮五寸厚盖，配上子底子盖，猪血加腻子、油漆（或桐油），埋在土里上百年不塌架。最差的棺材，一寸厚的木板用钉子钉，不上油漆，亮白茬，不结实的程度狗都能给撞坏了，叫“狗碰头”。实际上穷人家死了人，买不起棺材的多得是。有的用家里仅有的盛粮食的柜装殓，有的只能用炕席卷起埋葬。棺材装大车上拉出门也有讲究，人还没死去买棺材，是把棺材脸朝车后，掀开棺材盖大头朝前拉走。人死了去买棺材就是棺材脸朝前，盖子盖着拉走了。

**7、其他行当：**和买卖活动配套，帮双方讲价的，现在叫经纪人。那时，干不同活的人有不同的称呼。帮助买卖牲口的叫“牙行”，因为他们买卖牲口很重视牲口的年龄，年龄是从牲口槽牙的磨损程度看出的，叫看龋。年龄称为“几岁口”，六岁口正当年，八岁口就老了。

那时买卖粮食不是称重量，而是用升和斗量，实际是算体积，十升一斗，十斗一石。拿着标准的升和斗的经纪人称“斗子”，也叫倒粮行的，脖颈后插一根平板尺，一斗装满了，拿出尺子在斗口一刮，算是一斗。

牙行和斗子帮双方讲价都是用手语数字，在加长的袖子里和双方捏来捏去，同意了就点头，不同意再继续捏。总的来说是向卖方压价，向买方抬价，经济人尽量挣得较大差价。

当时搞运输的有推小车的，有赶大车的，有驴驮的，有骆驼驮的，都算是脚行。推小车运货叫推脚，赶大车的叫拉脚。赶大车的人叫车把式，通常称呼加上姓氏，叫张把儿、李把儿。驴驮东西一般是一边一个筐架在驴背的鞍子上，赶驴的人跟在驴后面走，叫赶脚的。而骆驼驮东西是人在前面拉着走，又叫骆驼把儿了。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色，不同行当的人有不同的称呼，而且很形象，这就是一种文化。

# 京西凤眼油

潘惠楼

京西物产丰富，很多植物的果实都含有食用油成分。除去芝麻、花生、葵花籽等油料作物外，很多树木的果实也能用于榨油，如核桃、杏仁、花椒等。还有许多人撰文介绍核桃、杏仁、花椒的榨油方法，但至今为止，我没有发现关于制作凤眼油的记载。

何谓凤眼油？就是以臭椿树树籽为原料制作的食用油。臭椿树的树籽成熟后，带着荚壳，其形状、大小如同凤凰的眼睛，故将臭椿树树籽称为凤眼，用臭椿树树籽制成的油也就被称为凤眼油。这种油色泽金黄、香气芬芳，风味独特，是生拌凉菜最佳调味品。其实世界上没有凤凰，人们创造凤凰这种神鸟的图腾时，凤凰的眼睛是以鸟眼、鸡眼为原型臆想加工而成的。臭椿树的树籽与鸟眼、鸡眼的形状、大小相似，但将臭椿树籽用凤凰的眼睛形容，就显得更形象生动，更让人有想象力，也更有美感。臭椿树的树籽在京西还有一个土名，称为“臭姑姑”，不知因何得来。如果以臭椿树籽的土名臭姑姑命名其树籽做成的油为臭姑姑油，不但词不达意，香臭不分，也是对这种珍品的亵渎。而以其树籽形状命名为凤眼油，确实显得文雅又耐人寻味，这可能也是对事物命名的学问。椿树有两种，其中之一为香椿树，会散发一种浓郁的香气，其叶、梗是人们喜爱的蔬菜食物。另一种则是臭椿树，也会散发轻微的异味，其实并不是臭味。为了将两种椿树分开，人们将两种树以香臭区分，好像臭椿树是因臭而得名，这实在委屈了臭椿树。

制作凤眼油的过程，与制作杏仁油、花椒油的方法、步骤基本相似，都有碾压、熬煮、提炼的工序，但臭椿树籽含油率低、原料收取困难、有毒成分多，比制作杏仁油、花椒油的工序要复杂、劳动强度也更大。

收取制作凤眼油的原料，要在秋后进行。此时的臭椿树籽成熟了，成为干的荚果挂在树上，但树籽没有从荚中分离，是采集树籽的最好时机。采集树籽时，用长长的铁钩子，将树上一簇簇带荚的树籽连毛枝一起掰下，装入麻袋或篮子背回来。臭椿树是一种高大的乔木，一般生长在山坡上、地堰边，尽管铁

钩子很长，有时也钩不到树籽，还要爬到树上去。臭椿树的枝干比较稀疏松脆，在树上极易踩空或踩断树枝，万一摔下树来可不是玩的。所以，爬到臭椿树上采树籽是一项强体力的危险劳动，还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采集的一簇簇树籽，先要清理去除枝杈和荚。方法是生起一堆柴火，将一簇簇的树籽用火烧燎，在石板上摔打，随着劈里啪拉的声响，树籽从荚中分离脱落。落在石板上的树籽，拌着烧焦的木炭和荚皮，黑糊糊的，要用簸箕簸出杂物，再将留下的树籽清洗干净。此道工序要注意的是，在用火烧燎树籽时，掌握好火候，既要烧焦连结树籽的枝杈和包着籽种的荚皮，又不能让籽种掉落在火堆里。

树籽清洗干净后，不必晾干，就可以用石碾碾压破碎了。树籽黏性很大，极容易粘在碾盘上，而且很结实，要用铁铲子不断地翻铲，还要适当地加水滋润树籽，减少树籽的黏度。树籽被碾压粉碎后，要加水像揣面一样揣，把树籽面揣成饼状。加水要一点点地加，如果一次加水过多，树籽面就会脱水，不出油。加水适宜，手与树籽面饼及面盆相互不沾。做好的树籽面饼，顺序贴在面盆内壁上，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如果阳光充足，十几分钟后，籽饼上就会有水和油珠渗出，慢慢流到盆底。但仅依靠阳光晒出油不会太多，还需要对籽饼熬煮提炼。而且依靠太阳晒比较被动，万一阴天或阳光不足时，揣好的树籽饼是晒不出油的，放得时间超过两三天后，树籽饼就会变质也出不了油。

熬煮提炼，是利用水重油轻的原理。将树籽饼用纱布包好，放入开水锅中，用长把勺子不断搅动，防止树籽粘锅。水开后，还要用勺子不断舀锅里水往起扬，让水中的油烟飘出。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水面浮起白色的油花，然后用勺子将油花盛出，放在碗里。由于采取的是以水托油方法，熬煮时，消耗水分很多，要不断往锅里加水。一般熬煮一次树籽，至少要往锅里兑水七八次，要用一个小时，直到熬不出油为止。

用勺子从锅中盛出的浮油，虽然脱离了籽种，但不是纯净油，还是油和水的混合物，还需要进行第二次熬煮，进行油水分离。把水熬干后，留下的才是凤眼油，原来白色的油花也变成了金黄色，泛出浓郁的芳香。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凤眼油食用可口、风味独特、有益健康，但制作的原料臭椿树籽却有强烈的毒性，误食后有毙命危险。凡在制作凤眼油过程中使用的器皿都要消毒。碾压过臭椿树籽的碾子，要碾压一次黄土或草叶等物品，用水将碾子清洗干净，才可以再碾压粮食。据我的母亲说，我姥姥家有一次制作凤眼油，碾子还没清理干净时，有一只狗到碾盘上舔树籽，结果被毒死了。熬煮树籽出油后的残渣，毒性更大，要挖半米以上的土坑深埋，然后压上大石

头，防止被猫、狗等动物扒开误食中毒。

说实在的，制作凤眼油如此麻烦，操心费力，成本真是太高。一般光景，只要能从其他渠道得到油料，谁也不愿做此种得不偿失的事情。

在我的一生中，只是随母亲制作过一次凤眼油。那是1962年，我十二岁，正是我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住在京西煤矿，四周都是农村，山上生长有许多臭椿树。当时我们居民家庭，每人每月可能是供应一两食用油。乡下的大伯家是农民，根本没有油料供应。大伯的大儿子结婚，我家将积攒的全部购油票支援了他们。没油吃，怎么办？母亲才想出了采集臭椿树籽榨油的办法。我们被母亲发动起来，上山采集了几天“臭姑姑”，堆在院子里，有一人高，像座小山。我们到农村熟人家里借用碾子压。一般人家的碾子我们是不敢借用的，也怕人家不敢借给我们，因为怕碾子粘上树籽的残留物引起中毒。熬煮树籽时，曾招惹得矿区很多人到我家观看，因他们不知道臭椿树籽能够做出食用油。前后我们忙碌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母亲带领我们还真制作出了七瓶凤眼油，大约也就七斤多点。

虽然这一个星期把我们忙得够呛，但毕竟做成了凤眼油。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除送给乡下的大伯家一瓶外，我们是很舍不得吃的，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才偶尔用上一点，平时只是看看凤眼油的油瓶或闻闻香味。直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过去，我家的凤眼油还有留存，几乎成了家里的纪念物品。所以我对这次随母亲制作凤眼油的过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已然50年过去，那上山采集树籽的情景、烧火燎树荚的快乐、用小勺从锅中盛浮油的小心、邻居们到我家观看制作凤眼油的评论，我都记忆犹新。据母亲讲，其实她的一生也只制作过两次凤眼油。上一次是解放前的民国三十二年，家乡闹日本，老百姓缺吃少穿、逃荒要饭，母亲跟随姥姥制作过一次凤眼油，并且学会了制作方法。再有就是这一次，在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带领我们制作凤眼油。

现在，我的母亲故去一年多了，制作凤眼油的技艺，在我家可能要失传。因为现在的生活好了，食用油的供应非常充足，食用油的品种非常丰富，食用油的质量也早就超过了凤眼油。当年觉得凤眼油香，是当时缺油、吃不上油，饿了粗粮甜如蜜，如今是饱了蜂蜜不知甜。

这种制作凤眼油的高成本、高投入的得不偿失的技艺也确实没有必要继承了。我写此文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大家，京西有很多物产，人们为了改变生活质量，有许多资源都是可以利用的。还有就是怀念我的逝去的童年生活，怀念



我那辛苦一生的母亲。

# 中华瑰宝汉白玉

赵润东

北京房山大石窝盛产汉白玉久负盛名，享誉中外。分布在历代宫廷、殿宇、亭榭、楼阁等建筑物中肃穆庄严的汉白玉雕塑精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大石窝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而且蕴涵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美学艺术的石作文化村落，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世人常说“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因为房山大石窝汉白玉的开采历史自汉代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北京城则是明朝永乐皇帝时所建，充其量也就有 500 多年的历史，所以孰先孰后不说自知。永乐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在南京登基。在朱棣继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明永乐四年（1406 年）下“诏书”，筹建宫殿，分遣大臣采集木材。同时在他原称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即北京）大兴土木，并以南京都城宫殿额名以为驻蹕。北京临时政权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大批工匠和差役，从事采石加工，在元大都宫殿废墟上筹建宫殿、皇城，用了 10 余年的时间，到永乐十八年（1420 年）主要建筑建造完成。于是，下诏书迁都北京，年号永乐。据有关文献记载，朱棣新建的北京宫殿是仿照朱元璋在南京所盖的宫殿的规模，并说比南京的宫殿还要宏伟。

北京故宫占地面积 72 万平方米，南北长 960 米，东西长 760 米，成一个长方形，四周再围起高 10 米城墙的城中城，这就是著名的紫禁城。城墙外还有宽 50 米的护城河，紫禁城内各组大小宫殿还有高墙围护，宫墙外密设警蹕值房，明代叫红铺，清代称朱车，月夜传筹，往来巡警，称得起金城汤池。这座宏伟的故宫建筑群用了大量的房山大石窝汉白玉做须弥基座及各种装饰，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和独特风格，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汉白玉是大理石中一种珍贵的品种，古时曾名燕石，《山海经》中又称“白珉”。何谓“白珉”？《韵会》曰：“珉，似玉而非也。”也就是说，珉是一种象玉的石头。

房山大石窝的汉白玉开采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闻名天下。房山境域历史上属战国时期的燕国，距大石窝东约 15 公里的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即为古燕国的都城。《水经注》曰：“燕石如玉。”这里所说的燕石即燕地之石。

由史料记载得知，汉白玉最早的开采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因汉白玉自汉代开始开采，且是北方汉人的白玉，又区别于异域白玉（如和田白玉），所以叫汉白玉。这就是所谓的“燕石如玉”也。

说起汉白玉，首先要了解一下石材的类别与构造。世间的岩石五颜六色，畸形怪状，种类繁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即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

第一种岩浆岩，又称火成岩。由火山爆发时地球内核岩浆喷出凝结而成。这些岩浆又分为深层岩、喷出岩和凝灰岩。属于火成岩的有花岗岩、辉绿岩、玄武岩等。

第二种是沉积岩，又称水成岩。是岩石风化侵蚀分解后，在重力、水力的作用下结合的产物。属于沉积岩的有砂岩，石灰岩等。沉积岩又分为三种：机械沉积岩、化学沉积岩和有机沉积岩。我国四大名窟之一的云岗石窟和我国第一大佛“乐山大佛”都是砂岩所造。

第三种是变质岩。变质岩是火成岩和水成岩随着地壳运动和火山爆发，岩石进入地层深处，在长期高温、高压影响下，改变了原来的结构，造岩矿物重新结晶、重新排列，最后形成变质岩。属于变质岩的有大理岩、片麻岩、皂石和板岩。有机变质岩，即石灰岩在地质运动中进入地壳内在高温高压作用下重新结晶形成的一种变质岩，属大理石的一种，再经地质运动拱上地表便可开采，（由碳酸盐经区域变质作用或接触变质作用形成），主要由方解石和白云石组成，此外含有硅灰石，滑石，透闪石，透辉石，斜长石，石英，方镁石等，其中质地均匀，细润，晶莹纯白无偏色者称汉白玉。

汉白玉的地质构造。北京房山大石窝汉白玉石矿，在地质构造上正处于西山拗陷中的褶皱隆起带，地层带状平缓，矿层位于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第二段下部，共有两个含矿层，7 个矿体，长约 790—1190 米，厚度 0.7—1.63 米。汉白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机变质岩石灰岩在地质运动中进入地壳内，在高温高压作用下重新结晶形成了一种变质岩，再经地质运动拱上地表。人们长期开采的，属于大理石类。这些大理石主要由方解石和白云石组成。

汉白玉洁白无瑕、晶莹透亮、端庄素雅、肃穆庄严，是石中贵族。汉白玉是上苍对北京房山人民的恩赐。但优质汉白玉多埋藏在数十米深的地下，开采

过程复杂烦琐，异常艰辛，并充满了危险性和挑战性。在汉白玉矿脉 30 余层中有半数以上是麻沙石英层。麻沙料也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成黑麻沙、灰麻沙、白麻沙几种。最白的麻沙料白度可接近汉白玉，在每一层常用料下都有一层或一层以上麻沙。一般人们广泛利用和熟知的按其不同材性和特点可分成十三层。根据相邻层具有相近料性的办法，又可把汉白玉矿脉分为五大料段：即青白料段、漫缙料段、花铁料段、正料段和未名层料段。每料段有材性特点相近的常用矿三五层不等。

地下第一料段是青白料段。该料段以石料的颜色特征命名，总厚度 3—5 米。第一层是该料段上部分“青料”，料色重，较杂乱；第二层是该料段中间部的“青白交混料”，青白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渐变交融、和谐过渡；第三层是该料段底部的“白料”，纯白色，料色与三尺厚接近，硬度高于三尺厚，开采价值非常高，但此料的缙门多而无章可寻，裂纹杂乱无章。此层料一般不用于梁柱类选材，而多适用于加工工艺品类。此外，该料段三层料开采时，一般与上层料同时开采出矿山，当地人有人主张归属一层，但其料色、料质、料价差异较大。

第二料段是漫缙料段。该料段以石料特有的漫道缙纹特征命名，总厚度 7—9 米。上部总称大铁盖。第一层又名头层，石英大麻沙、黑麻沙，厚约 2 米。该料层的明显特征是上部含有 0.30—0.40 米，下部含有 0.10—0.20 米的石英层。第二层即之间部分，有漫道，与大小六漫相近，只是含沙感更强，相对更黑，相同环境出来的料更厚硕一些，该层料造价相对较低，多用于建筑和雕塑的基础，也有经济条件较弱的利用其能出大块的特点来造牌坊和牌楼等；第三层是石英，为大铁盖底层；第四层是小六漫、厚约 1.50 米，有明显的深色漫道，漫道间白料约 0.05—0.10 米，漫道一般不会是缙裂，此层一般出厚薄板材，利用附加值较高，只要漫道夹在石板中间，出来的板料就较漂亮，小六漫料从深到浅都有，最厚的能接近二尺，但多数有褐色斑点和条纹。漫道就像洪水漫过沙滩留下的一层黑泥的垂直切面；第五层是麻沙，厚约 0.30 米。第六层是大六漫，厚约 1.50 米，成色和材性大体与小六漫相同，不同的是漫道间的白料层约 0.10—0.25 米，也便于出小型方料。第七层是麻沙，厚约 0.20 米；第八层是混缙，厚约 1.80 米，料性特征与大小六漫接近，漫道间 0.05—0.10 米，但不同的是混缙料中布满了毫无规律的细小缙纹，此处的缙裂纹与漫道不同。

第三料段是花铁料段。该料段总厚度 4—5 米。上部第一层是麻沙，厚约

0.20 米。第二层是花儿铁上漫，厚约 0.30—0.50 米，料白，但质量相对于花儿铁下漫要差，材性糟脆，硬度较低，不宜细刻。第三层是花儿铁，厚约 0.08—0.10 米，色褐红，质坚，硬度比汉白玉高一度，与上下漫易脱裂，易损伤工具，目前没有利用价值。第四层是花儿铁下漫，厚约 0.30—0.50 米，料白，但质量相对于花儿铁上漫要好，材性相对适中。第五层是麻沙，厚约 0.60—0.70 米，多为杂用。第六层是三漫，厚约 1.20 米，料白，晶莹透亮，硬度高，韧性好，抛光性能好，质量上乘，便于精雕细刻。由于三漫料间有两道间断性花儿铁，使料分成三道 0.20—0.30 米的不规则白料，因此出不了大料，但却是不可多得的小工艺品用材；第七层是麻沙，厚约 0.05—0.10 米；第八层是原碴，厚约 0.40—0.50 米，料白，相对三尺厚色偏暗冷，是汉白玉中唯一偏色之料。但硬度高，韧性好，抛光性能好，便于精雕细刻，虽出不了大料，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小工艺品用材。

第四料段是正料段。该料段总厚度 3—4 米。上部第一层是麻沙，厚约 0.70 米，白度通常相对略高；第二层就是最重要的正料三尺厚，厚约 0.90—1.40 米，料质白，晶莹透亮，硬度高，韧性好，抛光性能好，质量上乘，便于精雕细刻。料间多夹杂汗线，淡黄褐色，柔和，类似白布上的汗迹线。也有少数出现黑色的铁块或铁线。汉白玉是我国石材中第一个被国际市场所认可的 MI101 号，主要用于建筑及其配套设施。此层料不仅质佳，出材率高，而且弥足珍贵；第三层是麻沙，厚约 0.50 米；第四层是糙白，厚约 0.50 米，白度较高，但料质含沙，材性糟脆，硬度较低，柔韧性，抛光性能不佳，不宜精雕细刻；第五层是二尺厚，厚约 0.70 米，料质与三尺厚非常接近，只是厚度不及三尺厚，出大料无望，是出中型料的最佳选择，其开采价值仅次于三尺厚，并与三尺厚共同构成了正料段，是汉白玉矿的核心料段。

第五料段是未名层料段。该料段总厚度 3 米以上，有麻沙和白料三五层不等，构造上与上部的麻沙间夹白料一致，未名头层、未名二层厚多在 0.40—0.60 米不等。未名层料段各矿有较大差别，有些矿山的白料质地更接近汉白玉，有些接近糙白，有些接近白麻沙，因此称其为汉白玉、小二尺、糙白、白麻沙的都有，叫法不一。

大石窝的石材品种繁多，质地优良，较为稀有，此地所产石材，柔韧而且坚硬，最适宜雕塑。尤其被誉为“国宝”的汉白玉特点更加突出，质地均匀、细润、晶莹纯白无偏色者称汉白玉。汉白玉质地坚硬洁白，石体中泛出淡淡水印，即人们常说的汗线。汉白玉白如雪、坚如玉、面如霜、清润素雅，雕刻出

的艺术作品庄重伟岸，富贵高雅，是中国唯一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一种优质白色大理石。房山大石窝所产汉白玉，自古以来被公认为建筑石料精品中的极品。自汉代开采以来，从隋朝静琬法师为避免佛经遭法难被毁而开启的千年石经雕刻，到唐、辽、金特别是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浩大的宫廷陵墓乃至皇家园林，汉白玉成了皇家的御用之品。正因其历史上一直属于历代皇家所御用，所以又称为“白御石”。

据统计，全国 83 种优质石材中，北京有 4 种，其中房山区拥有 3 种，而大石窝镇占 2 种，分别是被命名为国标 M1101 的“汉白玉”和 M1102 的“艾叶青”。白色优质大理石只有汉白玉一种，是同类产品中一字号的精品。周恩来总理还曾将“京西房山大石窝的汉白玉”称为国宝。1998 年，国家标准工作组在福建泉州市召开的“天然石材统一编号”国家标准审定会中，房山大石窝汉白玉被命名为 M1101，称之为“中国一号”，并以抗压强度 156.4Mpa，抗弯强度 19.12Mpa，肖氏硬度 42.4 度，抛光度 102 度而名列“中国名特石材品种”之首。

关于汉白玉的储量。据高端设备对大石窝地区的汉白玉储量探测表明，三尺厚储量达 90 多万立方，总量约 450 万立方以上，（由于青白底、上下漫、花儿铁，原查，二尺、未名层的矿层厚度比接近三尺厚的六倍，所以三尺占成熟汉白玉总量的六分之一以下）。又据《房山县志》记载，长沟六甲房产汉白玉。经考察，此地确有汉白玉出产（现已关闭）。并且高庄和六甲房之间的后石门诸山均产汉白玉。如此看来，汉白玉产区以高庄为中心，到辛庄产区约 1 公里，到六甲房产区约三公里，由此推算，即使不记辛庄到六甲房南北和东西，还可能有矿藏带，即本矿带的汉白玉含量应在 2000 万立方左右。

汉白玉极品料的质量差异。在汉白玉石料中，存在着较明显的质量差异。那么，哪些品料的差异最明显呢？当然是三尺厚的极品料。三尺厚较老的矿脉，质地坚硬，小块料用手捏不出粉末，是最好的汉白玉石料。但是，此种矿脉多裂缝，并且纵裂多于横裂，较润的矿脉质地略软。小块料用手捏也不能成粉末，其质量略次。但矿脉较整，很少有自然裂缝，因此适合取大料。相对未成熟的房山白，一般很松散，小块料用手捏会全部成粉末。但在房山白矿脉中也有少量相对较老一些的石料，也比较硬，与较润的三尺厚接近，所以我们在用料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合的材料。

# 房山良乡县城老药铺

张广文

新中国成立以前至房良两县解放初期，两县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老百姓看病吃药主要靠中医中药。当时，两县城内共有中药铺十多家，中医十余人。1955年依据国家有关政策，禁止私医开业。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个体医生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老药铺公私合营，结束了千年的传统经营模式。为了反映这一时期中医药历史情况，现将所见所闻辑录一斑，以为存史。

## 一、药铺杂谈

药铺属于城镇坐商一类，只是其经营药材，又与中医药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形成了与其他店铺不同的特色。老药铺都是私家买卖，投资有限，经营业务量有限，因而规模都不大。一般都是一两间门脸房，而进深较大，一直通到后院。前面称为柜上，后院是库房、加工间和生活起居的地方。临街房门口上方悬挂题名字号（即店名）的牌匾，有的是××堂，有的是××药局，有的直接写字号名称。沿街明柱上一般还有一幅楹联，写悬壶济世、地道药材等内容。虽然都是药铺，经营也有不同，有的只卖药材，兼营批发零售；有的药铺里有坐堂先生。于是，有坐堂先生的药铺就挂起标志，即在门外廊下，两边各挂一幅酷似膏药形状的幌子。膏药用大约一尺见方的木板或黄铜板做成，底色为白色或黄色，中间涂成黑色圆圈，整板像一贴打开的膏药，一分两半的像一贴折叠的膏药，最下面一个以红布为穗，在门前随风飘摆，人们在街上很远就能看见。

药铺进门迎面是一个木制黑漆柜台，也叫拦柜，以示内外有别，用于摆方子抓药。靠近拦柜里面，埋着一个与拦柜齐高的木柱，上面放一个铜罐或铁罐，俗称药罐子，配一个半尺来长一寸粗细的铜杵或铁杵，用于砸一些需要粉碎的药材，如硫磺石膏之类。再往里靠墙是一排装药材的抽屉，俗称药匣子，抽屉

前面写着药材名称。药工拉开抽屉用手抓药放入秤盘(又叫戥子)称好分量再回柜台分包,所以也叫抓药的,或叫拉药匣子的。拦柜里面还有账房先生收钱的桌子和掌柜的座椅。有坐堂先生的药铺还要在拦柜外侧或后院设一个八仙桌两把椅子,用于给病人诊脉开方子。有的掌柜兼账房先生,也有抓药的兼账房先生,学徒则是沏茶倒水学抓药,擦桌扫地端尿壶,谁都可以支使,什么活都得干。因为旧社会有一句话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学艺反而要偷着学,反正是学徒三年,学成学不成,那就“师傅领进门,学艺在个人”了。开药店投资人叫东家,把经营事务交给掌柜的(相当于现在的经理),只管到时候收钱,一般不到店里去。

抓药有药方,俗称:“照方抓药”。据考证,中医起初是没有药方的,而且灸法在先针法在其后。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药方,《五十二病方》(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载医方280个。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方药体系,则是在汉代医圣张仲景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以后。

有的药铺,为了病家的安全和自家的声誉,抓药规矩很严。抓药时有两个不许:不许抽烟、不许说话,避免分神抓错药。抓的每味药都是先放在一张印有药名、药性、产地的纸上摆好,或在一张小纸上摆好,再放一张印有药名、药性、产地的标签纸条,等掌柜的或管事的——看方核对无误后,盖上药铺的印记,才可以包成一大包捆扎。有的药铺对抓药人会更加严厉,抓完药,管事的拿着方子,立即让抓药的把药方背出来,这看似严酷,其实是促使药铺的人干活认真,避免出错。

药铺掌柜对铺子里的伙计并不放心。药铺设有细料柜装贵重药,平时上锁,只有掌柜有钥匙,需要的时候打开柜子亲自称重量(有时用一个比柜上常用的分量更精准的小戥子),然后锁起来。药包好了就收钱,价钱没商量,这里和其他店铺不一样,谁都知道:药铺不还价。抓药时也有的给病家一些有益的提醒,一个是熬完药必须把药渣倒在窗台上放三天,以备吃药出问题好查对,不怕打官司。再就是熬药必须亲人熬,以免有人趁机放毒害死人。当然也有些提醒让人寻味,比如:婆婆的药让儿子熬不让儿媳熬,媳妇的药让丈夫熬不让婆婆熬……,可能是怕出冤案吧。

## 二、药铺与先生

说到根本,药铺是为病人服务的,中间离不了开药方的人。旧时中医不叫



医生，也不叫大夫，而称呼先生，和教书的一样称呼。这既是一种尊称，也体现了医儒不分的历史渊源，主方先生无不先读过四书五经，然后才读医书。先生在药铺看病即为某药铺主方也叫坐堂先生。说起这个称谓据说原自医圣张仲景。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伤寒病流行，病死者很多，其宗族 300 余人，十年中因伤寒病死亡的就有 100 多人。于是他在理政审案之余，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有时在其官衙大堂之上诊治病人，始称坐堂。沿习下来，先生在药铺看病，也称为坐堂先生。

坐堂先生有时也出诊，病家叫“请先生”。先生不能走着去，有钱人雇马拉轿车，差一点的雇骡马，顶不济的也要拉一头毛驴，在驴背上搭一条被褥，把先生接到家。先生出诊只是看病，回药铺再开方抓药，病家是把先生送回药铺再拿药。旧时中医成才虽有不同途径，有的家庭传承，有的师徒传承，还有的半路改行或自学成才，但都研读医书，都要理论结合实际，因此殊途同归。否则，学徒结束，也是一生拉药匣子，或成庸医，甚至还有学了一点皮毛冒充名医之徒招摇撞骗的。

房山县良乡县解放前后的两位名医一方（徽武）一袁（载民），恰是走了两条不同的成才之路。当时医界有一笑谈，说方圆（袁）不相交，大概也包含这层意思。

方徽武（1883-1972），房山县城东瓜地人，家兄是当地名医，虽家父不允徽武从医，但从私塾开始，徽武即接触医书，从事农耕之余也不曾释手，加上耳濡目染，自然学成，一矣出手，则一鸣惊人，终于走上悬壶济世之道。1956 年方先生入主当时房山县医院中医科，1957 年为光大中医事业才开始正式收徒，1959 年、1963 年又两次收徒讲课授业。三批收徒共 13 人。第一批：石玉波、高景永、张化雨、袁明鉴、张淑齐；第二批：贺家生、侯淑云、潘玉珍、石玉兰、杨淑珍；第三批：袁涛、袁凤云、胡文华。其中石玉波、张化雨、袁明鉴、贺家生、袁涛、袁凤云等人都成为房山区中医专家。

袁载民（1890-1974）良乡县城西大紫草坞村人。因家道贫寒仅读私塾两年，从 13 岁起即进窦店“复巨恒”药铺当学徒。打杂之余勤学苦读，偷艺看书，经历十五个春秋渐得医道，28 岁终成正果坐堂行医。袁先生集深厚的医药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一身，并不断创新发展，上世纪 30 年代成就一方名医，尤以妇科见长。但他谨遵学无止境的古训，一生勤奋读书，几乎遍及各部医学典籍，博采众长，并以其高尚医德，为良乡医院培养中医骨干，成为医界楷模。在老先生言传身教之下，家中竟有两代人走上房山中医院领导岗位。

其子袁景荣十三岁跟随父亲学医并得其真传，曾任房山中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房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子袁涛曾任中医院院长，房山区卫生局副局长；孙女袁风云（袁月）曾任中医院副院长，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办公室主任。一家三代为房山中医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三、袁景荣回忆良乡药铺趣事

#### 趣事之一：张先生不再看妇科

旧时中医都是全科医生，内、外、妇、儿科都能看，但从医时间长了，就会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济安堂张先生，因儿科擅长，被誉为“小儿张”，而且很有特色。每逢集市，病儿多时，让孩子们在一条板凳上坐好，每次五个，不许动地方，诊病开方时不问姓名，只是叫：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有一次，看一个妇科病人，后来死了，病家告到官府，说是枳壳那味药用过量了。经过查证，方子只开了二钱，属正常用量。虽然官司没输，张先生却不再看妇科，凡有妇科病人前来就诊，就说看妇科去找袁载民。

#### 趣事之二：首饰铺学徒跳槽学医

福祥药局有位坐堂的陈先生，医术不错，来看病的人对他必躬必敬，出诊时车马接送，显得风光高贵。这些被街对面首饰铺一个徒弟看在眼里，从心眼里羡慕，总觉着当先生比自己跑街串巷摇着波浪鼓卖首饰强多了，于是背地里找陈先生，要给他当徒弟学医。陈先生说不能挖人家墙角，没有答应。这个学徒不死心，三番五次的央求。陈先生烦了，随口说道：“跟我学医可以，先读《伤寒论》，以后再说。”谁知这徒弟当了真，又有私塾底子，暗地里下了三年工夫，把《伤寒论》背得滚瓜烂熟以后再去找陈先生。陈先生一考，他能对答如流，这一下不好再推托了。只好亲自去拜访首饰铺掌柜，说明情况，把这个伙计收为徒弟，改行学医。这就是后来开宏仁堂药铺的高先生。

#### 趣事之三：中西医合璧救崔秀

崔秀，良乡城南江村人，原为复巨恒记账兼抓药，后入人和永当伙计。“七七事变”后复店复巨恒关张，为了生活，四名伙计找到袁载民，在良乡南街找了几间房重新开业，说是开业，并不挂牌，只是靠袁先生的名声开方抓药维持生计。一日，崔秀忽发急症，上吐下泻不止，等袁先生出诊回来一看，手脚冰凉，四肢厥逆，都没脉了。袁先生赶紧去求街对面瓷器铺的赵掌柜，因为知道他学过西医，还有德国针剂，就请他给打一针能够打进去就发热的“返阳”药。

赵掌柜推托不过，只好拿出药，给崔秀打了一针。袁先生刚想看看药的名称，赵掌柜把药瓶扔地下一脚踩碎了，还告诉打针后不要给病人喝水。等赵掌柜走后，袁先生仔细一看，针药是抗破伤风血清。打完针，袁先生立刻开了一副药熬了赶紧给崔秀灌下去。不久就恢复了脉象。第二天，袁先生专门去谢赵掌柜，赵掌柜笑谈：“今后再有这样的病人可别找我了，我就有这么一针。”

袁景荣当时在复巨恒当学徒，一直在崔秀前后侍候，事后才知道得的是霍乱，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岂止是九死一生，恐怕万死也不止，当时没受传染，后来想起来还后怕。也是崔秀命大，一针德国药，一副袁载民的回阳药，把他从鬼门关上救了回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调养，才恢复过来。由于是特殊的经历，袁景荣牢牢记住了父亲当时开的药方，名叫“急救回阳汤”，出自晚清末科秀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这个方子一般人是不敢用的，每味药量都开到八钱，是最大量，所以说真见到这种病也要有熊的胆量才行。汤头歌是：急救回阳（人）参附（子）（干）姜，温中（白）术（甘）草桃（仁）红（花）方，见真熊胆能夺命，虽有桃（仁）红（花）气不伤。

#### 四、房良老药铺一览

房良城内的老药铺因年代较久，业内人士健在不多，已查找困难，现仅将解放前后这一时期药铺情况追忆如下。

##### 房山药铺：

**南永合祥** 位于南门外路西，今管道局北侧。主方先生方徽武，史怀壁（南尚乐人）。

**广和兴** 位于南街路西，原史家胡同以北，今奉先居饭店附近，曾有马玉林先生主方。后为国药店，今永生堂前身。

**大生堂** 位于南街路东，学房胡同口南侧，院大房多，曾有李同轩、吕耀宗、高桂荣、纪宪文坐堂行医，后改为联合诊所、城关镇卫生院，现中医院前身。

**北永合祥** 位于南街路西靠近十字街，今人民商场南侧。郭先生主方。

**恒隆泰** 位于北街路东，仓房胡同口南侧，解放前停业。

**裕升泰** 俗称小药铺，位于北街路东，北大寺胡同口南侧，张先生主方。

##### 良乡药铺：

**福元药局** 位于南大街路西，罗府街北侧，三间门面，掌柜姓金，是安国

县人。

**福祥药局** 位于南大街路西，福元以北，掌柜姓谢，陈先生曾在此主方。

**人和永** 位于南街路西，今功德福饭店附近，袁载民先生曾在此主方。

**济安堂** 位于东街路南，今良乡一小西侧，是张家弟兄的店铺，以儿科见长，人称“小儿张”。

**宏仁堂** 位于北街靠近北门路西，掌柜兼主方先生高春朴。

还有恒裕泰，广济生药铺，因时间短，已地址不详。另外，两个特殊的情况，一个是在良乡恢复开业的寰店复巨恒药店，在南街路西，福祥药局北侧，因为没有掌柜，也不挂字号，靠袁载民声誉营业，时间不长。另一个是在路家胡同四号院内，是袁家开的诊所，袁载民开方，袁景荣记账，抓药，也是不挂牌，但在包药纸上印一个“民生堂”的印记。一直开到公私合营。

# 张坊地区的商业

王绍清

张坊古镇位于龙安、河潞、大峪岭几条山沟的出口，又是拒马河出谷之处，是山区沟通平原的连接点。依山伴水，四通八达，南通涑水，北达三坡，西接易县，东南涿洲，一马平川，乃山川之门户。自古是兵家必争关隘要塞，是山货输出，百货输入的集散中心，车马盈市、商贾云集，市井兴旺繁荣。

## 商贸起源

张坊的商贸始于元、明，盛于清，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时期。古代这里战事频频，人口不足百户，自燕王扫北后，人口剧增，十渡、三坡、九龙、紫荆关地区的农民，一帮一伙的用驴骡和人背着花椒、核桃、畜皮、名贵的中药材，及无烟木炭到张坊镇，以物易物。当时，三斤食盐可换一张山羊皮；十斤花椒可换一把铤和一把镐；百斤核桃换七八尺白土布。秋季南北大街逐渐形成，“日出而市，日落而收”，附近农民披星戴月赶回家，而三坡地区的老客（山客）露宿街头。此时，骡马店，钉掌的，铁匠铺，鞣皮铺，饭铺小吃生意兴隆。外地豪商富户相继涉足，厂、栈、店、铺、坊接踵而起。清室贵族庄头李信在此开设印子铺，重息殃民，为房山放债首户，益照临盐业总店，在此设分号。涑水、易县、紫荆关地区商贩和驮盐马帮来往不绝。远近闻名的土特产品，百货、杂货、磁铁行业，及小手工业兴旺发达。清末民国初，东西和南北两条大街两侧，商铺比肩，大小店铺三十有余。初期商业不分行当，经营的商品，为“一店多营”，五花八门。

## 经营方式和谋利手法

张坊三益号，祥瑞、祥繁昌以及公和号炭厂，经营与谋利手法与房山、良乡及京城商号大不相同，表现形式。

一、田地出租。涿水县龙安村王氏五人，在张坊村有土地数百亩，传说占全村耕地一半，并开设三益号店铺，以土地出租、借贷为主，资金雄厚，吞吐力强，“秋季大收，冬季仓储”。春季两条路线输出山货，旱路由驴、骡、骆驼，驮运到长辛店、广安门销售。水路，经琉璃河上船，运往白沟河、天津等地销售完，再购进生产、生活用品。其谋利手段：

- 1.土地出租，每亩地租五至六斗，多者八斗粮食。
- 2.春季及青黄不接时借贷，月息三分，有的秋季以实物相还。
- 3.出售的商品加价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祥瑞店、祥繁昌店铺土地略低于三益号，仍以土地出租、放债，兼营粮行。几家店铺控制了山货输出，百货输入及物价。秋收旺季还僱数名能说会道的当地人跑沟联系业务，逢年过节宴客地头蛇。据有关史料记载：1946年平西专署指示，贫农租种地主的土地由“活契改为死契（土改）”，全村368户，耕地1572.8亩，经活契改为死契，全村耕地上升到2163.4亩，比原有耕地上升609.6亩，此地大部为三益号，祥瑞等改契土地。在205户贫农中有59户升为中农成份。

二、木炭是此地一项主要输出的产品。较大炭厂有三家：公和号，德顺号，德益号。主营木炭运往京津兼放高利贷。在收购木炭的同时，向售炭者放肥（债）。秋季以粮、木炭及其它山货相还。为拉着售炭者，不用铺保，月息三分，低者八厘一，急需者为崩崩利，借一还二。售炭者大部分是无地少粮的贫苦农民，靠烧炭为生。明知“借款付实”实物低于市价，因木炭是自己烧的，只要有人收，当时能借贷，不再计较，故炭厂生意红火。

三、药行。广和号、永和升、聚成永以售药为主。而锡茂隆前堂售药，兼营小型生产资料，后院收购药材，几种名贵药材，入库存放。等北京同仁堂、安国药商来此看货而售，有时以丸、散、膏、丹及南方药材进行互换，此店批发兼零售。

四、小作坊。多为前店后场。除果圃厂、鞍子铺外，高蜡房、樊腊铺的红白蜡烛，驰名房、涿、涿各大庙宇。农家红白喜事，或到年关，小作坊加班加点。樊家蜡烛，制作精细，不流油，不做根，行销五台山等地。

五、农商兼作。村、政、商合一，全村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农户经商。特点是“淡季以田养商（店），旺季是以商养田”。秋冬赶着毛驴进山，收购山货，到长沟、琉璃河、涿州等地销售。据土改时统计，全村有牲畜206头，除一头骡子，15头牛外均为毛驴，故毛驴是农民经商中唯一交通工具。农商多数资

金薄弱，逐利养家，在群众中有句顺口溜，“穷砍柴，富拾粪，做小买卖的瞎胡混”，反映小商贩的真实情况。

## 集市贸易

民国初年，国内受商战之影响，每逢农历一、四、六、九为集期。张坊是房山三大集镇之一，山货交易居全县之首。十里八乡赶集上店的车涌人流，前熙后攘，富户人家赶集，肩膀上扛着“褡裢”，俗称绍马子（装物用），褡裢上印有堂名或店铺名称等字样，现北京小吃褡裢火烧由此而来。

集市交易除粮食外，以木炭、香料、药材、干鲜果品为主。其次是檀木、荆编制品、石磨等。房山传统名优药材，招揽各地药商，主要产品有名牌产品“大青蝎”；药材之王“葛根”；驰名京津的“黄芩”；历史名产寒号虫屎“五灵脂”；神方原料“益母草”；还有黄精，柴胡荆花蜜等。上述药材，闻名遐迩，百年而不衰。凡集期、节日、香汛庙会，农商百作，四方商贩而来，搭棚设摊，帐篷连接，百杂俱陈，叫卖之声，此起彼伏，江湖杂耍纷纷赶市。店铺张灯结彩，最大灯笼如酒筵，饰以堂名，或走马观灯，灯内有两副对联旋转，左联是“大财源东进西来”；右联是“好生意南通北往”，门前悬挂，颇具盛况，俗称“张坊城”。集期繁华，商贾云集。店铺与农民经商混合一村，故采取商会与村政合一，村长兼商会会长，村长张宗德为发展商业，繁荣集市，富裕农民及农商安全。夜间设有更楼，更夫数名由村民担任，各店铺分摊工资，深受商家和农民的拥护，1938年张宗德被日军杀害。

## 张坊沦陷

“七七事变”，该村沦陷，此时盗匪如毛，打家劫舍，见到物资就抢还不时火拼，店铺只好歇业，店主各自星散。一个繁荣的集镇，市井集衰，一落千丈。1941年6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企图把八路军困在山上，在封锁壕与拒马河联接处安上据点。由于经济封锁，商业渠道受阻，在其统治区内又实行配给制度，对食盐，煤油，火柴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实行禁运，设岗盘查，有一名小商人，以贩盐罪，在张坊死于日本洋狗刺刀之下。在经商中稍有不慎，朝不保夕，市面冷落不堪，惨淡经营。日伪新民合作社，主管房山县各集市。在平原低价抢购粮食，囤积在房山城隍庙空地场，由日军看守。对山

区土特产品，疯狂抢购。1942 年秋，日伪房山县新民合作社副理事长田口多喜雄，理事中小洛道田（日本人）派购买部主任及其它业务人员在张坊伪组织配合下，低价抢购核桃、花椒及其它山货，急运东北及日本。

### 恢复工商业

日本投降后，1946 年春，处于解放区的张坊是房山县政府所在地。当时企业仅有政府万顺兴商店，青年妇女办的华兴号商店及市面私人几家小铺。根据北岳行署要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指示，行署实业处派来二名同志与县委、政府研究，因张坊是通往平西解放区咽喉要地，动员私人企业主投资兴业，对于平西物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据原万顺兴商店经理隗永高讲，政府抽调他与张坊村干部逐户动员私营企业兴业，经多方动员，约有 67 户恢复营业。经查阅有关史料，其中鞣皮匠 4 户，铁匠铺 3 户，钉马掌 3 户，制锣的 3 户，豆腐坊 3 户，肉铺 2 户，炸麻花打烧饼的 6 户，杂面铺 5 户，油房 2 户，小炉匠 3 户，鞍子铺 2 户，骡马店 2 户，绸鞋匠 8 户，织布机 1 户，织袜机 1 户，饭铺 2 户，杂货铺 15 户。上述店铺均为本地人。其中富余中农成分 5 户，中农成分 32 户，新中农 30 户。

### 供销合作社的建立

1948 年 6 月房山县生产推进社成立，华兴号机关商店撤销，万顺兴商店改为造胰工厂，1948 年 8 月并入生产推进社。1949 年 1 月县生产推进社迁至房山县城西大街，在张坊建立了分社，同年 6 月



图：全国供销合作社第四次史料工作会合影于兰州

改为县供销合作总社。1950 年秋张坊村供销合作社成立，分社业务全部移交



给张坊供销合作社，自贯彻上级以集镇为中心建社方针后，供销合作社全面占领经济阵地。私营商业撤股，转移资金，经营不佳。1956年农村由供销合作社负责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组成饮食合作商店一处，资金260元，人员7名；布百合作商店一处，资金597元，人员3名；杂货合作商店一处，资金389元，人员8名；综合大联组，资金214元，人员4名；合作理发店一处，散居的小商贩，归口管理，共28户。其中代销16户，经销11户，自营1户。

### 村名的变迁

张坊村名的由来，人云亦云，众说不一。有人说因为小商贩在南北大街摆摊“帐篷连接”，以地方口音，演变为张坊。又有人云，古代这里打仗，“军帐林立”，演变为张坊。经查证房山县有关志书载：金代仍行乡，里制为奉先县怀玉乡，张方里。与群众传说，每年正月16日，由乡头组织一次上香会，用一张黄纸写些风调雨顺吉利话，最后落款为“奉先县怀玉乡张方里相吻合”。元朝为张方里，不知何故在方字旁又加上一个提土，清朝以店坊而得名为张坊店。中华民国定为张坊村，是房山县第八区所在地，管辖29个行政村。新中国成立后，县以下仍实行区、村制，张坊属第二区管辖，是二区所在地。1954年撤区建乡，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建置，1983年实行乡、镇、村制，1990年实行乡、镇、办事处等，均为张坊村。

注：

(1) 赵鹤卿，原张坊供销社主任，本地人，15岁在私人店铺学徒，2012年病故，享年96岁。

(2) 起火店，免费供饲草喂骡马，人可在店内起火做饭。

(3) 钉马掌，在驴、马、骡的蹄子上钉上一铁片耐磨（已绝迹）

(4) 鞣皮匠，将牲畜皮经原料泡制后，成为熟皮而柔软再作皮袄或皮裤等。（除少数地区还有，大部分已绝迹）

(5) 印子铺，过去借款如分批偿还者，还一次款在借据上盖一次印章，俗称印子铺。

(6) 地头蛇，有一定资产，与官府政界有来往，说话占地位，民众常说“强龙压不倒地头蛇”。

(7) 走马灯，在灯笼里边将堂名或对联及人物等串成圆圈点上蜡，用蜡烛的烟和热气，使走马灯转动。

(8) 二路，房涑涿一带的杂牌军，群众称土匪。

(9) 小炉匠，此地有两种。一、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担子上挂一个小铜锣，边走边响，过去瓷器昂贵，如吃饭碗、盆、盘、水缸破了口子，小炉匠用铁锯子锯上（已绝迹）。二、有门市或在家里修金银首饰，给小孩子打长命锁。

(10) 锥鞋匠，过去人们穿的鞋是用麻绳缝合的布底，上山走路怕磨布底所以在鞋底钉上大帽铁钉（已绝迹）。

# 房山县经管站建站经过

魏志华

房山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简称县经管站），于1983年5月建立，在当时县直机关来说，是成立较晚的一个单位，但它的前身已有30年的历史。

解放初期，党为了尽快的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农村再次出现两极分化，就提出了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互助组，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区县都设立了互助合作办公室（县委办公室的一部分），掌握农业互助合作化的情况。1953年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农业合作化有了很大发展，房山县由20多个初级社发展到了100多个，基本达到了乡乡有社（当时还是五、六个村一个小乡）。为了使农村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1954年党中央决定县以上的各级党委建立农村工作部，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根据党中央和河北省委的指示，于1954年5月，房山、良乡两个县都建立了县委农村工作部。房山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吕镒、副部长隗合龙、郭宴、袁德印，干事五、六个人。良乡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罗玉源，副部长王树瑞、李顶荣、安成儒。在县委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同时，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农林局设立了互助合作股。房山县的互助合作股，股长罗士德，科员有蔡廷荣（文革后改名为蔡向阳）、高玉珍、赵宗礼、顿文彬。罗士德调走后，蔡廷荣任股长。良乡县的互助合作股，股长刘振祥，科员有张庆贵、李贤、李信。各县的互助合作股，编制在政府，工作由县委农村工作部直接领导。与县委农村工作部一起办公，统一布置任务、统一下乡，定期向农村工作部汇报。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管理，进行整顿，解决管理上的问题。由于农业社是个新生事物，如何管理谁也没有经验，互助合作股的几个人就轮流到河北省农校（保定）、通县专区合作干校去学习，重点是财务管理。通过学习，基本掌握了农业社的财务管理知识。

县委农村工作部和互助合作股建立后，重点抓了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一是抓农业社的会计培训。每年办二、三次会计培训班，把新上任的会计全部进行培训，使农业社的会计能够记账、管账。二是检查辅导。县委农村工作部和互

助合作股的干部，长期分片下乡，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954年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孟宪周和互助合作股的赵宗礼，到山区下乡，当时山区没有公路，不能骑车，就背着行李步行。从张坊进山，经过六渡、十渡、蒲洼、霞云岭，去了一个多月，走了20几个村，帮助农业社解决了不少问题，回来的时候，是从三流水爬过1200多公尺的青风岭、从涑沥水、黄山店回来，脚都磨了泡，虽然很累，但没有丝毫怨言。

1958年4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建立周口店区（后改为房山县），撤销了农林局的互助合作股，在财政局设立了农村财务科。1958年9月，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原来的农业社全部转入人民公社。房山县建立了7个大公社，农村财务科也改为公社财务科。由于农村体制的变动，公社财务科的工作重点也有了变化，由原来的农业社转向了人民公社，主要是大队、生产队的财务管理。除公社财务科外，县里还从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抽调了10来名兼职会计辅导员，每个大公社配备1名。公社财务科的业务主要由县委农村工作部领导。从1958年公社化以后，公社财务科的工作重点，一是抓大队、生产队会计的培训、辅导。二是检查了解农村财务上的情况，帮助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培训会计，每年搞三次。一次是春天，抓新会计培训。大队、生产队的会计每年都有变动，凡是新上任的会计，业务不熟悉的，每年春天要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了解和熟悉财会业务。二次是夏季预分前，办一次大队会计培训班，学习县委预分方案，研究夏季预分办法。第三次是秋季决算分配前，办公社大队会计培训班，研究秋季分配办法，熟悉分配政策。每年夏季和年终决算分配培训前，公社财务科都要搞一、两个试点，调查问题，摸索经验，给会计培训班打好基础。当时办会计培训班难度很大，县里没有招待所，没地方住，所以每次办班都要现找地方。除每年培训几次大队会计外，公社财务科的人，要常年分片下乡，到各公社，各村去检查指导，工作非常艰苦。文革前，山区没通公共汽车，干部下乡都要骑自行车。霞云岭、大安山、史家营等公社离县城100多里地，多数村没有公路，道路不好走，有时不仅要推着车，有时是车“骑人”，十渡、蒲洼等公社不仅远，还要过拒马河。拒马河每年五六月份要拆桥，怕水大把桥冲走。河水小时要淌几次河，河水大时，要从干河口、白石岭，走“狐狸险”，从七渡村对面的山腰上，一个一尺左右宽的小窄道，还要带东西，非常危险。平原也很艰苦，一般的下乡，一个人管一片，五六个公社，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住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所以衣服、被子、脸盆都要自己带。经常遇到刮风、下雨、下雪。像琉璃河、窑上、南召、交道等

公社，当时都是土路，不但刮风、下雨不好走，雨季还要过几道河。公社财务科不只有男同志，还有几个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样下乡，困难非常多，生活非常艰苦。除了平时到各乡、各村去检查指导外，抓年终分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每年春节前，公社财务科的同志都要到各公社抓决算分配，帮助社、队解决分配上的问题。每年春节前，都要把各村的分配方案批完，分配兑了现，才能回机关过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关的正常工作被打乱，1969年，县委农村工作部和公社财务科被撤销，大部分同志被下放劳动或到五七干校，整个农村的经营管理陷入瘫痪。经营管理中正确的政策、制度、经验，被当成错误的进行了批判，如评工记分，定额管理，说成是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正当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树，说成是“小生产”，“资本主义尾巴”，绝大部分被批判、被取消。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造成连年减产、减收，社员的超支借支翻了几番。

1971年6月，根据北京市委的指示，县委、县革委会成立了经营管理组，都是从下放干部中抽调的，开始时叫“落实政策办公室”，1971年底改为经营管理组。县委经营管理组成立后，到各公社、大队对农村经济政策、经营管理等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县委根据经营管理组调查的情况，对农村经济政策、经营管理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和改进措施。有几个报告受到市委的表扬并发了简报。1972年，县财税局也恢复了公社财务科，原来公社财务科的人也陆续调回。1975年县委又决定各公社设1名专职会计辅导员，工作上由财税局公社财务科领导。这一段公社财务科的工作，主要由县委经管组领导。经过几年的努力，社队的经营管理有了很大的改进。

1983年5月，市委决定各区县建立经营管理站。建站前，市委召开了区县农村工作部长和副区县长会议，我和副县长张进儒同志参加的会议。会上市委领导讲为什么要建立区县经管站，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农村的经营管理全部搞乱，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近几年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形势有了好转，但问题仍然不少。公社财务科只抓农村财务，全面的经营管理由县委农村工作部来抓（1980年后县委经管组改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作为党委的机构，编制不能增加太多。因此，市委决定各区县撤销公社财务科，建立经营管理站，与县委农村工作部共同抓好经营管理。同时还决定各区县的经营管理站站长，由各区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任。市委关于建立区县经管站的会议后，我们立即向县委常委进行了汇报，常委对建立经管站的问题进行

了研究。具体问题由县委农村工作部、组织部、政府人事局共同协商。除原财政局公社财务科的人员全部划归经管站外，还从农业局、工业局、县社等部门及几个公社抽调几个人，建立了县经管站、两科一室。经管站建立后，没地方办公，就搬到县委，和农村工作部一起办公。直到1984年底，县政府盖了新的办公楼，经管站才从县委搬到原来政府的办公楼。

1987年5月，房山县与燕山区合并为房山区，县经管站也改为房山区经管站。经管站从1983年建立至今已30年，这30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机构、人员增加，经管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管理职能也在进一步延伸。区经管站在负责全区各种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合同管理科、审计科、统计科、培训科、合作社管理科、资产管理科等。特别是近些年，区经管站更广泛地参与了全区社会经济建设，经管工作逐步由幕后走向台前。从传统的执行者角色，逐步向研究、起草、执行、检查等多角色转变。承担起了农村经济民主推进、农民负担监管、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工作，还直接参与了“五大功能园区”建设。同时，经管工作创建了服务管理新机制，实现了管理制度化，民主管理进一步加强，为全区乃至全市产权制度改革、“三资”监管等工作做出了新贡献。2010年获得全国百家仲裁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家获得此殊荣的单位。

# 房山商办工业发展回顾

李 耀

房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在改革开放前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导方针，在做好商业流通业务的同时，相应地兴办了一批简易的食品加工工业，在支持工农业生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关系群众生活需要的一些商品，国家通过明补或暗补的方式，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随着市场需求扩大，使商办工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商业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国家调整政策以后，把原来靠政策支持兴办的一批商办工业推向了市场，使其很快失去了竞争优势，陷入了生存困境，在改革的大潮中，纷纷退出了市场，走完了由小到大，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

## 商业工业发展概况

商业流通企业兴办加工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解放前，私营个体商业是市场经营的主体，规模稍大一点的私营企业，大多采取“前店后厂（坊）”的经营模式，店前销售，店后加工，自产自销，形成一批小作坊式的生产加工企业，这就是商办工业发展的雏形。解放后，国家为了加快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积极推动农村供销合作组织的发展，在重点集镇有选择的建起一批基层供销社，规模较大的村建起了分销店，小村通过代购和流动售货的形式开展购销业务，在广大农村逐步形成了一个供销合作网络。

1954 年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在职责范围上作了分工以后，使供销社成为农村市场经营的主体，特别是 1956 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相应地建起了一批生产糕点、糖果、酱醋、咸菜等加工企业。但由于我国长期

处于经济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商办加工企业多年来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虽然私营个体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仍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因此商办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相继兴建了一批生产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商办工业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1990年以后，又兴建了一批小厂。截止到1994年，全区商办工业共有46家，职工1978人，固定资产7616万元，年产值达6711万元，这是商办加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段的快速发展，是与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大趋势紧密联系的。这是主因，但也有其他一些客观因素推动了商办工业的发展。

1.领导重视，企业积极。党的十二大确定把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继续推进经济建设，全面开创新局面做为首要任务，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采取了多项激励措施，如在全区各行各业开展“五赛八奖”评比竞赛活动（五赛：经济腾飞杯、三创飞龙杯、农业丰收杯、机关争上游创一流赛、企业达标升级赛。八奖：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项目、发明创造、新产品开发、产品创优、出口创汇、合理化建议）通过这一评比竞赛活动，把全区经济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商业主管单位积极拓宽思路，广泛联合，招商引资，开发新产品，相继建起了油脂厂、果糖厂、造纸厂、饲料厂、酿造厂、石材厂，并扩建了面粉厂、改造了肉联厂。一些基层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建起了一批面粉、饲料、食品加工等小型企业。这一时期由于上下连动，形成了一个商办工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发展商办工业，为商业零售企业生存解困开辟了新路。随着商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私营个体商业凭着经营灵活，服务周到，人员精干等优势，在改革的大潮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过去长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国营商业，由于经营观念陈旧，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危机感，加之企业背负着多年形成的人员多，惰性、效益差等方面的包袱，逐渐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在经营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许多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面对商业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在探索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区商委和各商业主管部门考虑，除要求各商业零售企业，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层层落实承包责任制，把企业搞活以外，还认为国营商业虽然在零售业务上失去了竞争优势，但与私



营个体商业比较，还有场地、人员、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如能选好项目，发展一批有一定技术含量、市场需要的商办工业，逐步做大做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可能不失为使整体商业扭亏增盈、摆脱困境的一条生路。为此，商委专门成立了商办工业科，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各商业主管单位，也积极筹措资金，选择项目，仅1990年以后较短的时间内，就新建了23个厂，年产值达1300万元。但从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仓促上马的简易加工企业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不能解决商业企业面临的困境，使这些加工企业本身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都难以生存。

3.发展商办工业，为机构精简，人员安置预作准备。当时在理论界有的提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脱离行政管理，直接面向市场竞争，成为“无上级企业”。如果商业企业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无上级企业”，这就涉及区属各商业主管公司的撤并问题。这一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司，改革将势在必行。但这项改革牵扯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很大，我做为商委的主要负责人，对这项改革的思路当时也不是很清晰，只能在探索中循序渐进。为此，经区委批准，先以商业大楼做为试点，从副食品公司分离出来，独立经营，做为区计划单列的所谓“无上级企业”，就这点改革当时阻力也是比较大的。虽然对区属公司一级的整体改革条件尚不成熟，但公司机关科室林立，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基层企业每年上交管理费数额很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精兵简政则是急需要解决的。但公司机关精简人员的安置与基层企业改革后剩余人员的安置两项任务相叠加，工作难度是很大的。（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规定是不允许解雇职工的）必须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当时中央为了安置机关精简人员，提出“机关办企业”的措施，这也给了商业部门以发展商办工业安置人员一个启示。为此，这一时期迅速兴建的一批小型商办工业，为下一步改革安置多余人员做好了准备，这也是推动商办工业发展的一个客观因素。

### 商办工业在竞争中走向衰落

商办工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改革的大潮中，没有跟上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在竞争中逐步走向了衰落。大多数企业通过关、停、并、转、卖等多种形式，退出了原来的生产领域，这一产业的兴衰，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一些

客观的因素。

1.企业规模小,厂子分布散,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优势。全区商办工业 46 家,有职工 1978 人,固定资产 7616 万元,年产值 6711 万元。平均每个厂只有 43 人,年产值平均为 146 万元,年产值超千万的只有 1 家。1990 年后新建的 23 个厂,据 1994 年统计,年产值只有 1310 万元,平均每个厂年产值只有 57 万元。这些小厂遍布全区,具有鲜明的行政区划布点的特点。由于厂子规模小,分布散,不仅缺乏抗风险的能力,也形不成规模经营效益。

2.产业单一,产品落后,没有市场竞争优势。商办工业多是伴随着商业零售企业为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而逐步兴建起来的,由于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兴办的加工业,主要是一些面粉、糕点、熟肉制品、酱油、醋酿造,咸菜腌制和饲料加工等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低档产品。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商办工业快速发展时期,也没有摆脱原有的产业格局。这些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急需的低档产品,技术含量低,品种少、质量差,缺乏市场竞争力,在改革开放后的激烈竞争中,被淘汰则是不可避免的。

3.职工素质差,干部管理水平低,没有人才竞争的优势。由于商办工业的生产加工,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基本需求为目的。因此所生产的多是一些技术操作简单的低档产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匮乏,质量低劣,但产销却不成问题。所以,对职工队伍建设重视不够。这支队伍文化普遍偏低,技术素质差。据 1994 年统计,1978 名职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就有 1493 人,占职工总数的 75.5%。在管理干部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只有 5 人,占管理干部总数的 7.4%。这些干部大多是过去多年从事商业营销业务的,缺乏工业生产的管理经验,加之长期以来,企业生产和销售都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他们普遍缺乏危机感和开拓创新精神。试想没有一批具有科学管理水平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干部和一支较高技术素质的职工队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4.国家调整政策,使企业失去了价格竞争的优势。在商办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在国家资金,原材料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下兴建的粮油、食品、酿造、饲料、屠宰等生产加工企业。这些企业在过去经济落后、商品匮乏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适时的调整了政策,放开了商品价格,取消了财政补贴,把企业推向了市场,致使这一批过去长期以来,依据国家政策支持,缺乏危机感和竞争意识的生产企业,失去了产品价格上的优势,面临生存困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企业亏损严重，纷纷关停并转，退出了市场。

此外，在商办工业的发展上，由于资金不足，选项不慎，宣传公关不力等多种因素，都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致使在改革的大潮中，走向了衰落。当然也有少数企业，抓住了机遇，通过与大企业联姻，以股份制的形式继续得到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而更多的是以破产、拍卖，出租转让等多种形式转入新的领域。总之，在商办工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成绩，也有不足；有成功，也有失败；它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适者生存”的一个客观规律。

# 窦店砖瓦厂建厂始末

龚 荣

建国初期，刚刚获得解放的北京城百业待兴。为了尽快改变旧面貌，国家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为了适应大中建设项目的需要，北京市确定了大型砖厂建设项目，并成立了由江明波任组长的项目筹备小组。为了确定厂址，1952年底，江明波带领着筹备小组的同志，跑遍了京郊的许多地方，最后发现京广铁路窦店火车站东侧的一片开阔地的土壤，用手一抓捏，既不松散，也不粘手，非常适合生产砖瓦，就这样把厂址定了下来。叫什么厂名呢？经过一番讨论，一致认为，这里的窦店是具有千余年悠久历史的驰名古镇，又紧邻京广铁路，这个厂就叫“窦店砖瓦厂”吧。当时国家投资500万元，一个国有大型建材企业问世了，江明波担任了第一任厂长（1965年调北京市建材局任副局长）。

建厂初期的困难一个挨着一个，超乎想象。原材料奇缺，技术力量薄弱，生活物资匮乏等等。但是在党的号召下，3000多名过去受苦受难，刚刚得到解放的农民工人，不叫苦，不喊累，采土用铁锹，运土靠肩挑，愣是在这3451亩原来只有蒿草、荆棘的荒地上建起了一座有54个门的轮窑。1953年11月，建厂一期工程顺利完成。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北京日报》第一版作了专题报道：“我国最大的砖瓦厂——窦店砖瓦厂建厂工程基本完成，第一批烧出的砖瓦已运到石景山钢铁厂。”在表彰会上，市领导说：“你们的建设能力和施工速度，使当时在北京的苏联专家都感到意外”。

在此之后，窦店砖瓦厂生产的砖、瓦，日夜不停，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各个工程工地。然而，作为北京的城市建设，需要量太大了。即使后来在北京的东郊、西郊、北郊又相继建起了七、八座砖瓦厂，缺口仍然很大，远远满足不了北京的城市建设需要。怎么办？这个厂的工人、干部，尤其是技术骨干，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开动脑筋，大搞技术革新，向技术要质量，向革新要

产量。机械工程师曹树森 1954 年一入厂就拜工人为师，刻苦钻研，勇于实践，多项重大技术革新，他都是领导者和技术设计者之一。彭国章的“远提哈风，近打窑门，刹火烧窑法”；郭长波的“燕别翅、戳腿码窑法”；杜宝善的“上下倒，里外翻花架法”等一系列先进生产经验应运而生，产量跳着，蹦着，屡屡上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三项重大新工艺，新技术研究成果，在全国同行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项是：经过多次实验和技术探索，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自行安装的新型悬浮焙烧膨胀珍珠岩竖炉诞生（传统的皆为卧式）。在我国工业史上是第一个采用悬浮焙烧竖炉进行生产的，它为我国隔热保温材料填补了一项空白。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都进行了详细报道。

第二项是：全国第一台自动码坯机在这个厂问世。自动化生产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消息一经传开，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同行到厂索取自动码坯机的图纸。好几个国家的专家也来到这个厂参观。“西德的一位砖瓦专家，来到码坯机前，久久地不愿离去，他被这台自动码坯机深深地吸引住了。”

第三项是：我国第一组具有国际水平的多孔道一次焙烧小断面隧道窑在这个厂诞生。当时作为砖瓦生产的轮窑实际上已经够先进的了，但生产工艺复杂，从摔坯到出砖，要倒五次手、劳动强度大，工艺流程时间长，而这个小断面隧道窑完全是新工艺、新理念。只要码坯机把砖坯码在轨道车上，坯子在隧道窑里“旅行”一趟，就变成质量响当当的砖了。这项新工艺的采用，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产量比原来旧工艺提高了 18.8 倍，“产品质量一级品率达到了 95%以上”，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及经营新理念，让这个厂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该厂就成为了全国同行业的红旗单位和学习标兵，锦旗、奖状挂满了会议室。原设计年产砖 12120 万块，到 1983 年，年产砖达到 35370 万块，是原设计年产量的 2.9 倍。建厂 30 多年共生产砖 565160 万块，若竖向排列，可绕地球 33.8 圈。

该厂生产的砖及其他保温制品，每天都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市各个工地，环视整个北京城，从著名的十大建筑到巨大的地铁工程，从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纪念馆到各个高档宾馆饭店，都有窦店砖瓦厂生产的建筑材料在内蒙古和湖北省的航空航天系统的国防重要建筑工程工地都明确标有“窦店砖瓦厂”生产的砖。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厂生产的砖还曾多次远销日本、韩国、越南、美国等国家。

1997 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了保护耕地，该厂停产关闭。

# 房山历史上的农业用具

刘树霖

一个时期以来，儿时家乡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农业用具，时不时地浮现上脑际，挥之不去。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简陋，有的还比较笨重，但都是我区人民长期摸索创造使用的东西，有的还有较强科学性，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起过重要的作用。把其整理出来，对研究了解我区过去的生产生活状况会有一定作用。

## 一、耩

耩作为一种农田播种长期使用的工具，在我区已有很长的历史了。直到前些年还有人使用，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耩的整体外形像一个倒置的不规则的三角形。主要分三部分，前部为使用人力或畜力拉动的两根木杆，叫耩杆。后部是人握的两根把手，叫耩把。中间上边敞口装种子的是耩斗，耩斗下部有流出种子的耩眼，耩眼上有调剂出子量的闸板，还有一根拴住铁锤可以晃动使种子流出的铁丝。耩斗下是一个斜向前伸出中间空安一个铁尖的耩腿。种子就是通过耩腿种到地里。耩腿后边还拴一个铁圈或铁弓，用来掩埋播下的种子。在两根耩把中间拴一根耩袷，既可以用其拉耩又可调节长短和下种的深浅。耩可以人拉也可以牲口拉，牲口拉时要有人在一旁领着牲口，叫帮耩。后边拿耩的都是有经验的农民，要掌握耩下地的深浅和种子流出的多少。耩的构造虽然复杂，但不太重，耩地时来去地里都是由拿耩的人耩腿朝上扛着。耩这种农具经过我国劳动人们的多年使用，其中有很强的科学性，只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近些年才被机播取代了。

## 二、犁杖

犁也叫犁杖，是昔日比较大型的农具。从历史上到改革开放前些年，房山一直以农耕经济为主。农耕离不了犁，要种地就必须用犁来耕。因为地域不同，

气候不同，用的犁也有所不同。我区大部分地区用的是一种木犁。其主要部件有犁尖、犁镜、犁把、犁底、犁弯。犁底是一根二尺多长三寸左右厚的硬方木。其前部是一个圆尖头，生铁铸成的犁尖（也叫铧）就安在这个尖头上。在犁尖的中部是一块向右倾斜的生铁铸成的犁镜，其作用是把犁起的土朝右边翻过去。在犁底的前部安一根向后倾斜的犁把。在犁把的中间有一个直向下的长方孔。铁打的犁弯的后半部从犁把中间的长方孔插下，再插进犁底上的木槽内，用穿钉拴住。犁弯的前部向犁尖的前面弯下，在犁弯的头底下安一个木疙瘩叫柁头，柁头的底部与犁底基本成一个平面。在犁弯前面头上有一个钩子，用来挂牲畜套。在犁底为了防磨，钉着铁板。在犁弯穿过犁把处前后各有一个木楔，木楔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作用，再有是调节犁尖入地的深浅，前面的木楔往上提一下，犁弯前的柁头就挨地多一些，犁尖入地就可以浅一些。反之，就可深一些。在犁把的中部向后还有一个小木把，每当耕到地头，扶犁把式就把握住这个木把，把犁提起来，用脚踹后伸的犁底头，把犁上挂的土踹掉，然后调头把犁重新插入地。犁地时一般都用两个大牲畜，如骡子、马、牛等，如用驴必须用个头大的，较小的毛驴是拉不动的。

犁地时有两种犁法。一种是从地中间开犁，然后挨着第一犁顺时针方向犁，从地中间向两边扩展。这种犁法称扶耨，这种犁法是向地中间翻土，地中间会有一道土埂。另一种办法是从地边开犁，从地两边向地中间犁，这叫搅耨，犁完后地中间有一道沟。这种犁地办法，除了犁还有盖和耙两种用具。盖是二尺多宽，五六尺长的木框，里边挂满对折回来的酸枣棵子盖条。地犁过后，由牲畜拉着人站上去晃来晃去地把地抹平。耙是与盖大小差不多，下面安一些粗铁齿，当犁过的地里因天旱土坷垃多时用牲畜拉上人站上去，把土坷垃等耙碎。

以上三种耕具都比较大而重，耕地时来去地里是放在由硬木做成的方形拖车上由牲口拉着。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特别是拖拉机的大量使用，我区土犁才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

### 三、大锄

大锄是解放前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区农村平原地区常用的农具。主要用途是对玉米、谷子等锄第二遍和第三遍时用。构造由锄板、锄钩和锄杆三部分组成。其主体形态与电影、电视里猪八戒使的钉耙类似，但钉耙前头是齿，大锄前头是一块 30 厘米左右方形钢板，头上有刃，上部中间有一个安锄

钩的孔。锄钩是铁打的，前头有一个小回钩，叫锄信子，用它插进锄板中间的眼里，用铁楔楔紧。锄钩另一头有一个安锄杆的库儿。锄杠是一根一米多长一把粗的用机器旋的很光滑的梨木棍，一头较尖，用其镶进锄钩库儿里。为了防止生锈，锄板外面还镀了一层铜，一般都是很亮的。

用大锄锄地是力气活，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初学者锄浅了只蹭硬地皮，起不到锄地的效果，锄深了容易把锄板掀坏。锄二遍地时锄得要深，很费力。锄三遍玉米时正是伏天，地里热得很，可以热出痱子，而且玉米叶很快，会把臂上身上刺很多口子，汗一浸疼得很。大锄除了锄地，还有一个用途是钎麦茬，是用大锄的锄尖把割麦后的麦根锄掉，这更是一个力气活。除了水地在旱地这样做的并不多。因大锄锄地太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牲畜拉的耢子和耘锄逐步使用，大锄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 四、草苫子

解放前，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区农村苫盖用具很缺。塑料布那时还没有，用来苫盖防雨的除了旧席子、破麻袋、破口袋之类，用得最多是草苫子。这种苫子是就地取材，选用长得高壮的谷草，用三道细麻绳一根根地编起来制成的，很长，卷起来有人的一抱粗。不用时存起来。收了庄稼打场时，用其苫庄稼垛防雨。办法是把运回到场里的麦子、谷子、豆子等垛成垛，把草苫子搬到垛跟，围着垛一层层的打开，一圈一圈地从下往上苫，到垛顶成一个尖塔形。下雨时，雨水从顶尖部顺着苫子杆流下，使庄稼垛不被淋湿。天晴后，再把苫子卷起来。东西虽然简单，但不用花钱，也很实用。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塑料布等便宜好用的苫具的日益增多，以及谷子种植的减少和弃种，草苫子逐步消失了。

#### 五、拘勒儿

过去，玉米熟了收回后，人们除了把玉米剥去外皮提到房顶晾晒外，还有一个重要办法，就是把高粱杆用铁丝或麻绳一根根地穿起来，在场边院内地上垫起石头、砖头地基，把穿起来的高粱杆围在地基上，把剥去外皮的玉米装进去，直到装满。为防玉米多了把这种东西撑破，装到一半时外部用铁丝或麻绳箍上。这种东西人们口语叫它拘勒儿。天晴时顶上敞着让太阳晒。下雨时，把



顶盖上防雨。除了太阳晒，四外都透风透气，玉米装在里边很容易干，而且不会占太大地方，很是实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高粱很少种了，土地都归集体了，这种晾晒玉米的办法就很少用了。

## 六、拢驮和揽架

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我区农村运输主要靠牲畜驮。驮运时用得最多的是拢驮，用的较少的是揽架。把笼驮放到牲畜背上的木鞍子上，驮土、驮粪、驮煤、驮石灰非常方便。把揽架放到驴背的鞍子上可以驮庄稼、柴草类东西。

拢驮是荆条编的两个一尺多粗，二尺多高的尖底荆筐。用两根一寸多粗弯成八字形的木棍，并排分别从两个荆筐上部穿入，从底部穿出，把两个荆筐连在一起就成了。骡子可以驮二三百斤，驴子可以驮一二百斤。驮不怕摔的东西，如土、粪、煤等时，卸也很方便。由人站在牲畜脖子一边，一手抓住一个拢驮头，往怀里一掀一拧就扣在地上，非常安全容易。

揽架形似人字木梯，破木制成，下头两边各有一个木翅，用时打开，不用时合上。驮运庄稼、柴草类东西时，把两翅打开，往上装东西，装好后一边翅上拴一根麻绳，搭在一起把东西勒紧，防止东西散落。

这两样东西特别是拢驮在我区驮运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揽架在我区部分农村也经常使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马车、拖拉机等运输工具的大量使用，驮运逐步消失，这两样东西也见不到了。

## 七、栅筐

栅筐是荆条编成四角浅筐，一尺左右深，二尺左右见方。四角各安一根一米多一点的硬杂木木栅，上头用铁丝拧在一起，再拴一个铁丝或麻绳的套。用时用扁担担在肩上，前后各一个。用于担土、担粪、担煤、担庄稼、担柴草和出门担各种东西。担较重的东西装在筐里，担较轻的东西如柴草等可以把筐栅都装满。一般男人都可担一二百斤。用栅筐担是过去我区平原地区，除牲畜驮外，用得最多的运输方式。不仅近处用，有的几十里上百里也是担着栅筐运。听老人讲，吴庄及附近村子离北京六七十里，以前也有不少人担着担子去。栅筐在我区经济生活中发挥过不小的作用。解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胶轮小推车的推广和大量使用，栅筐运输才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 八、桑杈

桑杈是一种三股木杈，是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我区农村打场常用工具。大麦二秋、小麦、谷子、豆类等收割运回到场里后，垛垛、摊开、晾晒、轧场、翻场时都是用桑杈。小麦、豆类用车装卸时也是用桑杈。

桑杈是小桑树从很小时就由人用心修剪成三股杈形，长成以后，要人工烘烤整形、修理、刨光、晾干后就成了。过去集市上、庙会上卖桑杈的摊子很多，人们都是到这些地方去挑选购买。过去，我区出产桑杈最多的是梨村一带，那里土地广阔，桑树园很多。很多人有修剪、整形、修理技术。把种植桑树，出桑杈当成重要生产。种植桑树使用桑杈在我区以前的生产生活中曾发生一定甚至重要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特别钢铁业的发展，铁管杈子使用越来越多，桑杈的生产、使用逐步被其取代，逐步绝迹了。

